

# 新中国外交思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叶自成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叶自成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ISBN 7-301-04610-3

.新... .叶... .外交理论—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509 号

书 名：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叶自成 著  
责任编辑：金娟萍 吉宛  
标准书号：ISBN 7-301-04610-3/ D·482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4.25 印张 40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跨世纪  
人才培养基金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基  
金的赞助  
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谨以此书

献给我最亲爱的母亲

一个普通,平凡,勤劳,乐观,豁达,善良而品格高尚的劳动妇女,她的慈爱永远都是我信念的源泉和生活的动力。

# 前 言

所谓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是相对于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而言的,是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内思想在涉外领域的延伸。

一个国家的外交总是一定的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的体现,而对外政策又是首先通过统治集团或政治家、思想家个人的思想活动形成的,先有外交思想,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对外理论和对外意识形态,形成外交战略,再进一步形成外交政策,有外交政策的指导,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才能是自觉的行动。因此,外交思想是研究外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外交学研究的精华部分。

通常而言,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在对外领域的体现,因而它带有很强的阶级性。但外交思想又必须反映一个国家的民族或多民族的集体利益,因而它又有超阶级性。如一个国家的领土,一个国家的主权,一个国家的尊严,无论什么阶级掌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是该国全体国民的利益所在,因而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和领土完整等外交思想也具有超阶级的性质。

新中国的外交思想主要是通过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思想来体现和表达的,他们是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是这些战略和主要政策的主要推行者,所以研究新中国的外交思想主要应当研究他们的著作和言论。通过这种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在重大外交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和发展,从而可以从理论层次上更好地把握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从中寻找制定新时期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方面表现出共同的立场,在理论方面也都不

同于西方的外交理论体系;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又带有鲜明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高瞻远瞩,气势恢弘,目光远大,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具有外交大战略家的风采,但同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又充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也可以说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前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后期则表现出很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要超过他的现实主义。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则表现为沉稳务实,精于细节,在如何处理外交的具体问题上表现出他的超群的智慧和不同凡响的精神魅力。在外交战略方面,周恩来的务实精神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毛泽东的重大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周恩来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擅长于外交策略方面,是一个杰出的外交策略家,他的外交魅力主要是通过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家的个人风格和外交实践来表现的。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受到了周恩来务实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他主要还是继承了毛泽东在外交思想方面的哲学气质,和毛泽东一样具有外交大战略家的风范。他处理外交问题着眼于中国的外交大战略,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把新时期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路看得极为清楚和明白,并总是及时根据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调整中国的外交大方向,紧紧地把握中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使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任务。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虽然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具,但他的现实主义更为深刻,更能超脱于意识形态之上,更能准确地从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外交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思想从理想主义变为现实主义的一个转折点。

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这些不同的风格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又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的特点,同时,这些差异不仅要从他们的个性差异上来观察,更要从时代的变化,从中国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变化的大视野来观察。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外交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变化。

新中国 50 年的外交实践,正是在他们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

的,其中既有成绩又有问题,但总的来说成就是伟大的。在这 50 年中,新中国从弱到强,从一个国际上的病夫之国,一个被西方国家欺负和侮辱的国家,成长为一个较强大的国家,并且在世界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这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们外交思想的变化,也是新中国外交变化的一个缩影,研究他们外交思想,也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研究新中国外交的灵魂。

在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千年到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中国毫无疑问将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同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时代。他们的外交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中小国家、一个发展中的贫穷而又落后的国家的外交需要,而新中国在新的世纪、在新的千年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中国人民在新的时期创造出更新的外交思想,更高的外交智慧,以解决比过去更困难更复杂的外交任务。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过去人类的任何思想成果一样,会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中国外交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智慧,都是我们今后解决外交问题的一个基础,它们将在很长时期中继续发挥其作用和影响。中国外交新思想新智慧的产生和创造,也离不开这一极富有教益的外交思想的宝库。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不仅是在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基础上面对未来,创造出新的外交智慧和外交思想。

#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绪论.....	(1)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	(1)
1 .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现状 .....	(1)
2 .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2)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 .....	(35)
1 . 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 .....	(35)
2 . 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毛泽东 外交思想的关系 .....	(38)
三、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	(48)
1 .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48)
2 .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 .....	(51)
3 .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三原则 .....	(69)
第二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关于战争、革命、和平、 发展的思想 .....	(78)
一、毛泽东的时代观: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 .....	(78)
1 . 第一个时期: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	(79)
2 . 第二个时期:战争危险与和平建设 并存的年代 .....	(80)
3 . 第三个时期:战争与革命思想的“复归” .....	(84)
二、周恩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	(90)
1 . 对战争危险的分析 .....	(90)
2 . 关于世界和平力量能够防止核战争的思想 .....	(92)
三、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 .....	(93)
1 .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	(93)
2 . 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 .....	(97)



3 . 关于“ 发展 ”的概念 .....	( 106 )
第三章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 .....	( 111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	( 111 )
1 . 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四项原则到新中国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	( 111 )
2 . 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发展 .....	( 116 )
二、世界多极化思想的萌芽与毛泽东的世界大战略 .....	( 121 )
1 . 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集团 .....	( 122 )
2 . 反对世界霸权主义 .....	( 124 )
3 . 毛泽东对多极化格局的初步分析 .....	( 127 )
三、从“ 中间地带 ”论到“ 第三世界 ”论的发展 .....	( 128 )
1 . “ 中间地带 ”论的提出 .....	( 128 )
2 . 两个“ 中间地带 ” .....	( 130 )
3 . “ 第三世界 ”概念的最初含义 .....	( 131 )
4 . “ 第三世界 ”概念的新发展 .....	( 133 )
四、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思想 .....	( 138 )
1 . 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的提出 ...	( 138 )
2 . 多极化是建立新秩序的政治基础 .....	( 142 )
3 . 五项原则是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不干涉内政是 新秩序的核心原则 .....	( 143 )
4 . 建立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机制是新秩序的 主要任务 .....	( 145 )
5 . 反对建立和保持任何军事集团是新秩序的 组织原则 .....	( 148 )
6 . 反对霸权是新秩序的基本要求 .....	( 149 )
第四章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从结盟到不结盟 .....	( 150 )
一、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一边倒、两条线和一条线 .....	( 150 )
1 .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150 )
2 . 一边倒与结盟战略 .....	( 151 )

3 . 两条线战略 .....	(151)
4 . 一条线与准结盟战略 .....	(152)
二、毛泽东的结盟战略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关系 .....	(153)
1 .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与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 ...	(153)
2 . 与苏联结盟对中国独立自主原则的影响 .....	(154)
3 .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对抗性和封闭性 .....	(157)
4 . 中美准结盟关系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158)
三、邓小平的不结盟外交战略 .....	(159)
1 .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不结盟外交战略 ? .....	(159)
2 . 不结盟外交战略与反霸权主义 .....	(162)
3 . 邓小平不结盟外交战略的提出和实行 .....	(164)
4 . 邓小平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内容 .....	(166)
第五章 纵横捭阖中的大国关系 .....	(169)
一、中美关系 .....	(169)
1 . 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思想及其变化 .....	(169)
2 . 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想 .....	(198)
二、中苏、中俄关系 .....	(203)
1 . 毛泽东关于中苏关系认识的变化 .....	(203)
2 . 周恩来关于中苏关系的思想 .....	(229)
3 . 邓小平关于恢复和发展对苏对俄关系的思想 ...	(232)
三、中日关系 .....	(236)
1 . 毛泽东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述 .....	(236)
2 . 周恩来关于中日关系的思想 .....	(239)
3 . 邓小平关于对日关系的思想 .....	(245)
四、中欧关系 .....	(247)
1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 .....	(247)
2 . 邓小平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 .....	(249)
第六章 中国地缘政治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 .....	(252)
一、毛泽东对中国地缘政治总形势的论述 .....	(252)
1 . 毛泽东的地缘政治思想 .....	(252)

2 . 毛泽东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的分析 ...	(253)
二、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思想 ...	(255)
1 . 维护中国领土完整, 和平解决与邻国的 边界问题 .....	(255)
2 . 与近邻国家和平友好, 和睦相处 .....	(266)
3 . 出兵朝鲜是重大的地缘政治决策 .....	(272)
4 . 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 .....	(277)
5 . 区域主义和亚洲观 .....	(279)
6 . 妥善处理华侨问题 .....	(282)
三、邓小平的地缘政治思想 .....	(285)
1 . 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	(286)
2 . 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	(287)
3 . 邓小平关于华人的思想 .....	(287)
4 . 反对亚洲安全体系, 支持东南亚实行和平 中立政策 .....	(288)
第七章 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290)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思想 .....	(290)
1 . 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 .....	(291)
2 . 对邻国进行说服工作 .....	(292)
3 . 中国现在不称霸, 今后强大了也不搞霸权主义 .....	(294)
二、周恩来对“中国威胁论”的批评 .....	(297)
1 . 中国如何对待亚洲邻国的“中国威胁论”? .....	(297)
2 . 对亚洲邻国的担心表示一定的理解 .....	(299)
3 . 中国决不走大国沙文主义之路 .....	(300)
三、邓小平关于发展起来的中国不威胁任何人的 论述 .....	(304)
1 . 中国首先需要发展 .....	(304)
2 . 发展的中国永远不称霸 .....	(306)

第八章 从对外开放思想到对外开放战略.....	(308)
一、毛泽东的学习外国和对外开放的思想 .....	(308)
1 . 关于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思想 .....	(308)
2 . 毛泽东的学习外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311)
3 . 毛泽东的开放思想的局限性 .....	(317)
二、周恩来关于对外开放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 .....	(322)
1 . 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	(322)
2 . 周恩来关于经济开放的思想 .....	(324)
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 .....	(328)
1 . 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的战略决策 .....	(328)
2 . 开放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 .....	(330)
3 . 开放与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关系 .....	(331)
4 . 开放必须改革, 改革必须开放 .....	(332)
5 . 正确处理开放引起的问题 .....	(332)
6 . 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 .....	(334)
7 . 制定正确的开放策略 .....	(335)
8 . 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	(336)
第九章 一国两制思想与台港澳问题.....	(344)
一、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思想 .....	(344)
1 . 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 .....	(344)
2 .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 .....	(348)
3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思想 .....	(350)
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战略思想 .....	(352)
1 . 一国两制战略思想形成的三个理论前提 .....	(352)
2 . 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提出 .....	(356)
3 . 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358)
4 . 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 .....	(365)
第十章 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和外事管理原则.....	(367)
一、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外交本质论 .....	(367)

1 . 建立中国外交学思想的提出 .....	(367)
2 . 外交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	(368)
3 . 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 .....	(369)
4 . 外交学的主要内容是分清敌友 .....	(370)
5 . 新中国的外交是和平外交 .....	(374)
6 . 外交是实质与形式的统一 .....	(375)
7 . 外交与外交队伍的培养 .....	(376)
8 . 重信义, 说话算数, 考虑对方, 争取双赢 .....	(378)
二、外交工作原则论 .....	(383)
1 . 毛泽东关于外事工作和外事管理 原则的思想 .....	(383)
2 . 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原则 .....	(388)
三、外交艺术论 .....	(391)
1 . 外交不能冲动, 必须进行周密的分析研究 .....	(392)
2 .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精华 .....	(393)
3 . 外交工作必须做到不亢不卑 .....	(396)
4 . 真诚待人, 实事求是 .....	(399)
5 . 友好为先, 抵抗在后 .....	(400)
6 .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	(402)
7 . 抓住时机, 当机立断 .....	(403)
8 . 外交外事调研是外交决策的基础 .....	(404)
四、人民外交论 .....	(405)
1 . 人民外交概念 .....	(405)
2 . 人民外交的主要内容 .....	(406)
五、邓小平的政党外交论 .....	(410)
1 . 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	(412)
2 .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非共产党的关系 .....	(414)
第十一章 中国外交的策略战略思想 .....	(415)
一、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战略思想 .....	(415)

1 . 毛泽东关于对外妥协不要求对内妥协的 策略思想 .....	(415)
2 .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 纸老虎 ”的 策略战略思想 .....	(416)
3 . 关于“ 另起炉灶 ”的策略思想 .....	(418)
二、邓小平的外交策略论 .....	(420)
1 . 中国要强大但不当头的长期策略 .....	(420)
2 . 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期的应急策略 .....	(422)
主要参考书目 .....	(431)
后 记 .....	(433)

# 第一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外交思想绪论

##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 1.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现状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总体研究中,是一个很弱的部分。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课题。据有关材料统计,从 1949—1978 年,报刊上发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2 万篇,印了 500 多种著作,1978—1988 年的 10 年中,又有 7000 篇文章和 500 多种著作问世。

这些文章和著作对毛泽东生平和各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总起来说,它们在毛泽东的哲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甚至经济学的思想的研究方面获得的成果较大较多,虽然这些方面的研究在深度上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理论分析较弱,视野不够宏阔,但毕竟取得了巨大成绩。相比较而言,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研究应当算是最弱的一个方面,不仅数量少,且就其质量而言,也大有进一步努力和深入的地方。

比较集中地论述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成果有 1994 年由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 100 周年而召开的毛泽东外交思想讨论会的论文集《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该论文集是在这一方面较有权威性的较全面的一个成果,论文的作者都是从事外交外事的专家和领导者,具有较丰富的外交外事经验,

---

参见曾长秋:《近十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湖南社会科学》,1991 年第 1 期,第 74—78 页。

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具有与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视野。论文的作者从外交、国防、对外宣传、外贸、文化交流等不同的角度对毛泽东的外交外事思想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也有一些学者从学术方面对毛泽东的某一外交思想进行了论述分析,是国内水平较高的一次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交流。

在 1993 年毛泽东诞生 100 周年之际,国内还出版了大量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对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三个世界的划分、国际战略思想、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又先后整理出版了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文献,如《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一批回忆录,这对加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条件。

## 2.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1) 毛泽东对内思想和对外思想的关系与区别

正如钱其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生 100 周年而举行的毛泽东外交思想讨论会上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他的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永远是我们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就不完整。毛泽东思想中的对内部分和对外部分,是一个整体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毛泽东对内思想对其对外思想有重大影响,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扩展。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延伸,带有明显的从军事角度观察问题的印迹。

---

参见石仲泉、唐洲雁：《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若干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 年第 5 期，第 54—57 页。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页。



第三世界论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农村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援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影子。对毛泽东来说,第三世界就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大农村,中心城市就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毛泽东世界战略的农民兄弟,它们人数多,占据着广大的地区,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力量。

中间地带论则反映出毛泽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的反蒋斗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广大的西欧国家就是中国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应当争取的同盟军,但也是不可靠的,必须又团结,又斗争。

对内思想决定对外思想,对外思想为对内思想服务,对外思想受对内思想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对内思想。如毛泽东在判断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的时候,较多地受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国际共运争论的看重的影响,毛泽东正是在批判苏联国内放松阶级斗争从而出现修正主义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

这些说明,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分不开的,是统一的,但两者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例如,毛泽东的对内和对外思想都受到毛泽东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带有它们的深刻的烙印。但比较起来,毛泽东在对内思想上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左的东西较多,脱离实际较多。毛泽东在 1957 年后,其对内思想逐渐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先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批右倾、开展社教运动,后又搞“文化大革命”,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中国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并在实践和理论上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但在外交方面,则有所不同。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7 年中,除“文化大革命”中有“世界革命”的明显的错误倾向外,大部分时期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没有重大的错误。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的许多意识形态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在中苏两国关系上,毛泽东则是一贯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反对任何来自苏联的控制中国的企图,具体表现在反对苏联提出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台

等有损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在与苏联和美国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渝地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中国的一个外交战略重点，为中国成为世界格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打下了基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还英明地作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重大决定。

可以说，毛泽东的对内思想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极深，同时又自己创造出的一套偏离发展轨道的独特的错误理论，因此造成了巨大的错误。但在外交上，毛泽东较为一贯地坚持了他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较早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外交活动中鲜明的表现出务实的风格。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以 1956 后为界限，前后两个时期是相互割离的，后期的思想完全脱离了前期的思想方法和路线，而在外交方面，两个时期则有较强的一致性，后期对前期的许多思想都有继承和发展，如独立自主思想，起源于过去与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涉作斗争的过程，后来发展到反对苏联大国干涉，反对美国威胁；1946 年时提出的“中间地带”论，后来在 70 年代发展为“第三世界论”。

如果说，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对毛泽东的对内思想重大修正的话，那么在对外思想上，邓小平的理论却较多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

例如，中国在英国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搞所谓“直接选举”时，邓小平确定了“另起炉灶”的方针，而这一思想在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就提出过。毛泽东在当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外交方针，一是“另起炉灶”，一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关于这两点，周恩来后来在 1952 年 4 月 30 日的一次讲话中解释到，“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中国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又如，毛泽东曾经预感到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破裂，在 1956 年 12 月就说过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崩溃

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苏联东欧剧变的世界形势时,不仅思想与毛泽东相似,而且连语言范式都极为相近,提出“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又比如,邓小平同志在访问日本时说,如果钓鱼岛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解决,这一思想也是毛泽东曾经讲过的。1960年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讨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主权分割时,毛泽东提出两国各一半,如谈不到一起,“就拖下来,将来再解决”。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也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1961年6月13日就曾经说过:“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同样指出,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

如果说毛泽东的对内思想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具有理想主义和空想成分,那么,毛泽东的对外思想则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同样,毛泽东的对内思想表现为冒进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对外思想方面则表现的较为稳重,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中美建交,反对美国和西方禁运,中国加入联合国等,毛泽东是一点也不着急,反而认为晚建交,暂不加入联合国对中国更好些。为什么毛泽东的对内思想和对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差这么大,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谜,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 (2)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同一性和一贯性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像他的哲学思想一样,表现出大家风范,具有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7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96—197页。

明显的跳跃性,深刻的洞察力,博大的胸襟,高瞻远瞩。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宏观的哲学性。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向毛泽东提出要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惟有我们着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要力量,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些问题已经够宏观的了,也是两个大国领袖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毛泽东却说,“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对尼克松来说,讨论全球问题也就是讨论外交哲学的宏观问题,而对毛泽东来说,这些还不是他理解的外交哲学。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不仅亲自作出各种决策,而且为制定这些决策做了大量的直接工作,他通过与各种不同的外国客人的会见,了解各国的情况,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依据。毛泽东曾经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据曾在中联部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淑铮同志介绍,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9月的27年间,不完全的统计,他先后会见了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各界人士。

毛泽东曾经要求从事外交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有主动性和大气魄,他曾就对美斗争批示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这段话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家的大气魄。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新中国的重大的外交活动,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决策,都要经过毛泽东的深思,其中最能表现毛泽东外交大战略手笔的是中国脱离苏联影响和中美两国改善关系。

在判断国际形势上,毛泽东的有些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例如,毛泽东在1960年曾经对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因此,“我们

---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参见《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认为冷战对峙状态是和平共处,不认为似乎只要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就是和平共处,而这种观点是一般人所接受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强调在一组矛盾中,要找出主要矛盾,集中主要精力解决主要问题。这在外交思想中也有鲜明的反映。毛泽东从新中国建立起直到晚年,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一种方法论。他关于美国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要矛盾,苏联是新中国 60—70 年代的主要矛盾,关于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的思想均是这一方法论的体现。为了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最大的超级大国控制世界,毛泽东把争取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争取最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弱化美国或苏联一国或两国联合控制世界的局面,促使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从表面看,毛泽东当时决定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首先,这关系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大的战略选择。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完全照抄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苏联是当时公认的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发源地。但毛泽东早在 1956 年就已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病有所认识,怎样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是毛泽东后来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独立自主地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其次,中国与苏联关系断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大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苏联试图在意识形态的旗号下控制中国。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采取与苏联逐步脱离关系的措施。

中国与苏联从结盟到成为敌对国家,甚至发生武装的边境冲突,

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况。美国与中国在朝鲜打了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与中国在越南打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对中国一直采取遏制和封锁的立场。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在进入联合国问题上,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上,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力和干涉,因此也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但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做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战略决定,从此改变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敌的状况,使中国从中获益匪浅,也导致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后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中国能不能顶住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巨大冲击,能不能得到西方的大量的资金和技术,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毛泽东作为一代外交大战略家的风采还表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而许多主持正义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了许多努力。但毛泽东为中国制定了不急于加入联合国的方略。毛泽东指出,“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是希望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它的本意,“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当然,“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

们要维持世界和平”。毛泽东指出,不是中国不想进联合国,而是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但中国并不因此而看轻自己,因为“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

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也表现出惊人的预感力和洞察力,他在1964年曾预言中美两国要再有15年才能建交,后来果然中国与美国在1979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又认为,中国发展要有100年时间,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计划,就是将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作为中国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志年份。

1960年毛泽东就预见到了美国对古巴要实行全面禁运,但又指出古巴不会屈服。毛泽东是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30年后,美国果然对古巴采取了全面禁运的措施,而古巴也像毛泽东曾经预言的那样,一方面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损失,另一方面也没有被美国压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虽然也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毛泽东根据美国在台湾的卷入程度,也深知台湾统一的复杂性,因此在1975年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出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可能要100年的预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台湾问题的解决的确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很长时间。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这在外交思想上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在外交思想上最高明的方法论,并没有什么奥妙,其真谛就在于抓住主要矛盾。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建国初期,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在外交上不搞什么平衡外交,而是通过与苏联结盟,从苏联那里争取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宝贵的人才、经验、技术和资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1、45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2页。

金；当中国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威胁时，毛泽东又在两个威胁中找出对中国最突出的威胁，并把苏联作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从而作出与美国改善关系来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抉择。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家的气质也影响到他的外交战略。毛泽东经常用他的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来分析国际形势，并具有很深刻的见解。他从军事学的角度分析出美国和苏联都还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因为它们的兵力太分散，无法在多条战线上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在思考中国一旦遭到苏联或者美国的入侵时中国应当采取什么策略时，毛泽东曾经对基辛格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但他们在中国肯定会感到不舒服，最后会被中国拖垮。毛泽东的思路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当苏联进攻中国，中国将采取的策略是“敦刻尔克策略，就是允许他们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上海，透过这样的战术，我们将成为胜利的一方，敌人将会遭到击败。世界大战，第一次与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后来也都打赢了”，当然，毛泽东从传统的战争战略来理解现代战争也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当基辛格问，如果苏联只使用炸弹而不派兵中国该如何时，毛泽东对这样的问题似乎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了。

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外交上较为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大外交战略家的恢弘气势和宽阔胸襟，但在不少外交工作上，毛泽东也有他的细心的一面。例如，1949年5月，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黄华就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事，请示中央，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复电中，对黄华在会见中的言行作了极为仔细的指示。他要黄华在会见时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少说多听，并指出请示电中关于“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的说法有毛病，应明确要求美国停

---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止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和干涉中国内政,如美国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应断绝和国民党的一切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因为这样的说法似乎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中国共产党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好像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少了一些。毛泽东还指示说,黄华应申明,这次会见是非正式的,在谈话之前,黄华应与市委商量会见的情况,如果司徒雷登态度友善,黄华也应取适当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和气的态度,对于司徒雷登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并和中共办交涉修改商约事,黄华也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 (3)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来源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来源问题,是一个迄今为止很少人涉及的问题。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战略家,但从他的经历和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外交历史和理论的熏陶,更不知道西方的外交理论,但他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尽管有失误,总的来说,是正确地处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外交生涯中,最精彩的是三个方面:第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不搞平衡外交,而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为新中国成立后能依靠苏联的支持,很快在国际上站稳脚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作为一个弱国,在强国面前,不低头,不屈服,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使新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员,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第三,70年代做出了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战略性的决定,与中国最大的敌人美国改善关系,为日后形成联美抗苏,中国对美国开放打下了基础。这其中自然与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国家,使中国国力得到提高有关,但毫无疑问,作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和外交思想,在这一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外交智慧来自何方?又是怎样形成和产生的?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世界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88页。

外交思想中一个独特的流派,即中国流派。它可以说是三合一的产物。首先,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和平哲学的继承者,有着浓厚的中国儒家哲学的色彩;其次,它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时又是列宁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外交思想的矛盾交汇;最后,它的最主要来源还是革命实践中的外交活动。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外交思想,马克思、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本人务实的外交实践,是毛泽东外交哲学和外交思想的三大来源。

在这三大来源中,应该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毛泽东真正的涉外生涯,可以说是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开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发端于民间外交,起源于党际关系,从党际外交思想开始发展为国家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

起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完全服从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当共产国际的路线较为正确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发展,反之则遭受重大挫折。但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毛泽东等人开始根据中国国情来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开始慢慢发生质的变化,即从过去完全的“共产国际内部”关系,变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具有“外”的性质。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进入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处于“内外关系兼有”的时期。

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对共产国际来说,一方面,1935年共产国际调整领导和路线方针,承认各国共产党有权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在组织上可以独立,共产国际不得干涉各国党内的组织事宜,在思想上提倡各国党反对教条主义,这就开始了各国共产党成为独立自主的政党的过程。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及对具体事务的干预是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更由于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国际共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实际上对各国共产党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一定的支配权,对中国共产党也享有很大的权威性。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由于毛泽东思想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而一个政党成熟的外部标志就是独立地做决定,不容许外国党和领导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下达的指示,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或采取比较消极的立场,尤其是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人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一些条条当作上方宝剑的行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的强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可以不理睬共产国际,但绝对离不开苏共和苏联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尽管名义上中国共产党可以完全独立行事,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总是经常向苏共和斯大林通报自己的各项重大决定,无形中把斯大林和苏共当作自己的领袖。

这种矛盾的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甚至没有随着 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而结束,因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即苏共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就变为党与党,国与国的重叠交叉的相互关系,在其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关系所具有的两重性的影子。

这种关系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因为共产国际和苏共、斯大林如何对待毛泽东,一直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共关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毛泽东在创立中国革命根据地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国际共运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共产国际不得不对毛泽东本人表示尊敬。1927 年,共产国际曾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俄文译稿。抗日战争时期,《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曾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毛泽东,并刊登了毛泽东与朱德的合影照片,实际上是公开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袖地位。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还在 1938 年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表示,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权。但另一方面,苏共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持怀疑态度,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为保

持与美国的关系,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发展过于密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未真正大量援助过中国共产党,直到 1949 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才有所改变。而完全改变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则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发生直接的面对面的战争之后。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也是两种态度:一方面,是矛盾和斗争。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苏联的援助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实际上苏联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以特别的援助。它的援助,主要是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此较为不满。当苏联与日本发生矛盾,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把保卫苏联放在第一位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抵制,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时双方关系就已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而带有国与国关系的内含,因此带有真正的外交的意义。另一种态度是,尽力争取斯大林和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此,毛泽东不仅主动地自觉地把联合苏联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而且长期坚持主动向苏共和斯大林通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况和变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原则以及具体的重大问题上请示苏联,听取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例如,在建国前夕的 1948 年底,从 9 月到 12 月,中国共产党曾经三次致电苏共,就建国大计和增进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第一次是 1948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国共产党 9 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 11 月亲赴苏联,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第二次是 1948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 11 月你那商定”;第三次在 12 月 30 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说,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 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37 页。

这样一种矛盾状态,磨练了毛泽东的外交品质,导致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直接形成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在共产国际后期,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它的一个重点。共产国际关于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的思想,对毛泽东后来的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大国主义和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思想,对他的两个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理论,都有深刻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把成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理论推广到了国际斗争战线。不从这一点出发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等外交思想。第二,对毛泽东的灵活的外交斗争策略有重要影响。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及苏共的复杂关系中,毛泽东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利益,又要争取苏联的支持,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及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压力,既要抵制,不服从,又要考虑长远的关系,不要公开激化矛盾;既要维护苏共和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又要坚持根据中国国情处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这些对后来毛泽东形成较为系统的外交策略思想是有帮助的。第三,在与共产国际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在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首先形成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然后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的思想。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的外交实践,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与美国记者、美军观察组和美国总统特使的来往。后者已经具有国家外交的一些特点。在同美国人的交往中,锻炼了毛泽东处理外交事务的灵活性。这方面的实践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影响与前者是不同的。前者较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者却是将国家利益、国家关系摆在前面。它使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念得到很大的发展。1944年9月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工作文件。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理论来源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是一致的。它

主要产生于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这方面的例子,如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运用,明显地吸取了马克思和列宁策略思想中的精华。又如,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方法论也有很深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外交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原因之所在。

毛泽东一生爱读古典书籍,并从中获益良多,这些对他的外交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现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1916年毛泽东曾开列经书77类(共3460种),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毛泽东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共引用成语诗文20条,中国古代人物16人。毛泽东一直保持了这一传统。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曾说,通观《毛泽东选集》五卷,极少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仅有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俯拾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中途在曲阜下车,专门去看孔子墓。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上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建国后毛泽东买了《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毛泽东通读了几遍。毛泽

---

参见李君如:《论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来源》,《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3期,第5—16页。

东在 1975 年时已经重病在身,还在古书上批注了 1975 年 8 月再阅,1975 年 9 月再阅等。外国文学名著毛泽东只读过茶花女等三种,中国当代文学很少看,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的书读得更少,有局限。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吸取的内容主要是: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大同理想,同时也受到了大同理想的深远影响。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礼运篇,表述了古代中国人对一种和平宁静的世界的追求,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常常提到这一理想。毛泽东在诗词中写道,“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他早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一书中,曾写道,“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在文章中又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大同理想的影响表现为毛泽东外交思想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和传统,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反霸权,反外来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毛泽东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精神。毛泽东在说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而毛泽东的“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的思想,与老子说过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哲学思想就有共同性。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哲学传统,这就是求实、辩证思维的传统。如毛泽东在说明正义的事业必胜这一道理时,引用中国的传统说法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实际上是中国古语中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运用。又如,毛泽东在谈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也有自己的难处时说,“大有大的难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话来说明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孟子说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被毛泽东用来说明各国的情况的多样性。

---

参见李锐:《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一个侧面》,《东岳论丛》,1991 年第 5 期,第 44—50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06、482、167 页。

#### (4) 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几个矛盾

毛泽东一生中有许多谜。他的不同时期的思想之间有巨大变化,这些思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反差。在外交思想上,毛泽东的思想似乎较为直观,容易理解,其实这中间也有不少让人费解之处。总体上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至少有这样几个较大的矛盾:

第一,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与结盟政策之间有矛盾。

现在不少人都认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笔者本人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但如果认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独立自主是一样的,认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从形成后就没有变化,甚至认为同苏联结盟与独立自主没有什么矛盾,那么其中就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在 50 年代初,为了与苏联结盟,对苏联是作了一些让步的,如承认过去苏联在旅顺的驻军权,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权,甚至承认蒙古的独立,承认苏联在东北和新疆有一定的特权等,这些都是与独立自主有矛盾的。

独立自主的基本意义就在于不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结盟就意味着要对盟友信守一定的义务,在许多事情上不能自己完全决定,而必须与盟友进行商量,有些事情必须征得对方同意。就好像婚姻一样,只要有婚姻关系存在,双方都必须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这里产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到底如何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结盟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 30 年代就有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先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争取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独立自主权,后来在 50 年代又用于国家的外交政策。但问题在于,独立自主与结盟政策不是两个不同时期实行的不同的政策和原则,而是在同一时期内实行的。那么,到底哪个是主线?例如,在 50 年代,到底中国实行的是独立自主政策,还是结盟政策?或者两者同时并行?如果同时实行,那么,这两个矛盾的政策和原则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可以说存在两种不同的独立自主,一种是不结盟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一种是结盟的独立自主?或者,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时期,既可以是独立自主的,又可以是结盟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独立



自主与结盟之间还有什么实质区别？独立自主本身又有什么意义？

第二，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毛泽东到底是偏重于哪一个？在那些问题的处理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是重合的，在哪些问题上，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在哪些问题上，国家利益原则占了上风，在哪些问题上，意识形态占了上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例如，在朝鲜战争时，按理说是意识形态原则占主导。因为朝鲜是共产党领导，有苏联支持，同属于一个阵营，中国理所当然的要支持朝鲜。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偏向于国家利益，认为中国必须出兵朝鲜，因为朝鲜是中国近邻国家，对中国东北局势影响极大，中国在东北有重大的国家利益。而在与苏联冲突时，既有国家利益的冲突，也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两者都有。但到底哪个更主要？似乎意识形态更占主要。在整个毛泽东领导的时期，中国的外交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有些重大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又体现出很强的国家利益观念，往往超过了意识形态因素。例如在中美关系上就很明显。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但在 70 年代初期，两国关系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美两国都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上走到了一起。毛泽东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变化？而且在晚年特别重视与各国当权的右派打交道，甚至说右派比左派好，他更喜欢右派。他在与美国客人谈话时，甚至说，他不喜欢法国的共产党，也不喜欢美国的共产党，不喜欢左派，包括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倒是喜欢西方国家的当权的右派。毛泽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他过去信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当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使前者让位于后者？

毫无疑问，在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过去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外交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了。他在 1973 年 2 月与基辛格谈话时，甚至说，中美两国过去相互批评，互为敌人，而现在则已经是朋友了，两国进行着合作，共同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虽然有时两国还相互批评，不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

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是否已经放弃了他的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三,在对外开放上,毛泽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各国的?在他的学习外国的思想中,到底怎样处理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应当说,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学习外国上,道理是讲得很清楚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没有什么实际措施,在对外政策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体现。而且,在实践中,60—70年代的中国还出现了少有的全面封闭的局面,东南西北形势一片混乱,中国在国际上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在外贸、吸收外资上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办法。中国真正对外开放是在1978年以后。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反差这样大?由此也会使人产生另一个问题,到底毛泽东在对外开放和学习外国问题上的真正观点是什么?从毛泽东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定式。毛泽东向来具有迎接挑战的英雄气魄,不畏任何困难,敢于向任何强大的压力进行反抗并击破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上,毛泽东也表现出这种气势。早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来在对待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问题上,毛泽东也是不为然,认为“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这当然有鼓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自己国家的意思,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毛泽东内心有一种“不与外国发生联系也可以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呢?

第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也有矛盾的

---

《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5页。

地方。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观点和指导思想都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应当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发动的任何侵略战争,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不会对外发动扩张性的侵略战争。但在世界战争形势的判断上,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矛盾双方一定会找到一种妥协办法来维持和平。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一定是它们的末日的来临,这个思想是一条主线,在各个时期都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却又是与此相矛盾的。当然,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加强国防,增强自己国家的实力。但实际上,毛泽东在 60—70 年代采取的备战措施似乎是建立在战争已经迫在眉睫。马上就要打起来的判断上。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出现了全民皆兵,到处深挖洞,广积粮,到处搞三线建设,建内迁厂矿的景象。

第五,在中国外交大战略上,人们都知道毛泽东从 50—70 年代有两个大的战略转变:一是在 50—60 年代把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二是在 70 年代初把苏联作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但仔细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确认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但这种压力是否就一定应被视为美国和苏联对中国构成了重大的直接的现实威胁?早在 1964 年毛泽东就提出,美国到底是主要注意苏联还是主要注意中国?并为此同一些外国专家交换过意见。一些外国专家引用美国报刊的言论说,美国在当前,在短期内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从长期看,中国是主要敌人。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就是说,毛泽东的思想中关于这一个问题看法是有变化的。50 年代把美国对中国的威胁看得比较重,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敌对,是因为美国控制中国的台湾。在 60 年代,这两个问题已经不那么突出,或者说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会对中国直接出兵,美国与苏

联的争夺要比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在 60 年代,毛泽东已经提出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要争夺世界霸权的观点。70 年代初,从表面上看,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已经压倒了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因为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又在一些地区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武装冲突,苏联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现实威胁。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毛泽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视苏联为中国的最严重的威胁?是否认为苏联将直接出兵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刚开始看得比较严重。到后来发现苏联对中国也就是一种威胁而已,苏联并不一定会出兵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因为毛泽东从军事角度认清了苏联的真正的战略意图是“声东击西”,苏联的最主要的注意力还是在欧洲,苏联要控制东欧,要与美国争夺西欧,这样就不可能抽出大量兵力对付中国。正如毛泽东在 1972 年 7 月对法国外长所讲的,“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在 1973 年 2 月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向基辛格询问美国在苏联进攻中国时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俄罗斯人是否计划进攻中国……或许你们能为他们提供帮助?……苏联的目的是要占领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对上面的思想毛泽东是真的这样看,即认为苏联可能会同时在东西两线称霸,还是声东击西,或者只是说给美国人听的?稍后,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在 1974 年回答苏联是否构成对中国的威胁的问题时说,苏联“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中国不怕苏联进攻,但反对欧洲国家把祸水东引。

还有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到底怎样估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72 年毛泽东在与尼克松会谈时,曾经谈到“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97 页。

《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私下交谈》,美国《纽约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03 页。

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而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谈话时也申明，“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国土。我想你了解美国并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牵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我真的认为，中国或美国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为了让中国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大于美国，尼克松还特意向毛泽东指明，“苏联在与贵国的边境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在毛泽东决定与美国联合反对苏联的霸权后，毛泽东是否相信尼克松所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在联美反苏战略中怎样处理中美关系？似乎毛泽东在此后不怎么谈反对美国的霸权了，但毛泽东却在 1973 年向基辛格表示了另一方面的怀疑，在苏联进攻中国的威胁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有没有搞绥靖政策？他向基辛格说道：“我想说的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打算让西德和苏联握手，和平相处，然后使苏联得以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都有这种想法，让苏联东进，好对抗我们和日本。”

毛泽东又说，美国的战略是让苏联进攻中国，让苏联深陷在中国，那时美国就可以戳苏联的背后，并在寻求和平的口号下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为了让苏联进攻中国，美国“将以做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美国将用让苏联进攻中国以拖垮苏联的办法来瓦解苏联。

毛泽东在 1974 年 2 月突出地提出了第三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联合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反对美国和苏联。但在 1974 年 5 月毛泽东却又对英国前首相希思说，“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看问题的，这涉及到对毛泽东外交大战略的评价问题。实际上有几种可能的看法：一是把美苏先后作为中国的真正的威胁；二是在 60 年代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美国苏联并列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95 页。

参见《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记录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06 页。

为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威胁；三是毛泽东实际上到后来并不真正看重美国或者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第一种看法是最流行的看法，它也可以反映毛泽东外交大战略的眼光；第二种看法则认为，中国把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同时视为自己的敌人，这是一种最不高明的做法，以中国的实力，根本无法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它使中国处在一种很危险的境地之中，如果美国与苏联合起手来对付中国，中国就有被肢解的危险。

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也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但其中也有矛盾。第三种观点是笔者提出的，笔者认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从毛泽东看问题的视野和方法看，毛泽东完全可能有这样一种并不是太明确但实际上却有所表现的观念，那就是把中国贫穷落后作为中国的最大的威胁，所以为了为中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的余地，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为提高中国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争取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真正把美国或者苏联作为对中国的真正的威胁，而只是利用这一种矛盾。在 50 年代把美国作为中国的最大的威胁，与苏联结成联盟，是为了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是以苏联对抗美国，可以使中国得到苏联的援助；后来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成为最直接的对手，这是真正的矛盾，而从国家利益上考虑，苏联从未对中国形成真正的威胁，把苏联作为最大的威胁，也是为了利用美国对抗苏联，从这种战略态势中得到好处。因为毛泽东从 50 年代中期就已经对苏联的现代化经验产生了怀疑，认为苏联本身的问题太多并不值得中国作为楷模来学习，正如毛泽东在 1964 年讲过的那样，赫鲁晓夫说“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此外，毛泽东在估计形势发展时，总的来说是比较准确的，在此

基础上制定的战略和策略也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有时,毛泽东也会对形势发展作出错误的估计,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毛泽东在分析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时,不适当的认为英法与美国的矛盾会成为主要矛盾,当时对英法的左派力量估计比较高。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与当时联美反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总体来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一理论产生的最合适时期应当是60年代,即从1960年到1970年期间,因为这时正是中国与美苏同时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中国这时也最需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提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符合当时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但毛泽东却是在1973—1974年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从中国外交的实践来看,中国当时把与美国改善关系来反对苏联是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的,为什么这时还要提出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人们也许对毛泽东当时提出的这一理论是估计太高了。其实这一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是相矛盾的。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现在发表的毛泽东在1973年11月与基辛格的谈话,对重新认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点帮助。毛泽东当时曾提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要好过中国与苏联和印度等国的关系,对中美两国来说,“整个国际形势才是重要的问题”,而这个国际形势在毛泽东当时的战略考虑中,主要是指苏联试图控制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因此中国和美国共同战略利益就是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这一意图,因此毛泽东向美国人解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的政策时也承认,“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区。我们的黄大使提过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过他不了解美国阻止苏联势力的重要性”。在这样一种战略考虑中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92页。

就包含了三个世界理论与联美反苏战略的深刻矛盾。

#### (5)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体系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了外交外事的各个方面,但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中心点。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坚守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实践中,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中国甚至不惜放弃已经建立的联盟关系或政治关系。早在 30 年代,毛泽东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惜抗命,不完全执行当时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派下来的钦差大臣的命令。在 60 年代,当苏联试图干涉中国主权时,毛泽东就逐渐与苏联拉开了距离,放弃了建国初期的对苏一边倒的结盟战略。在 70 年代,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中国受到苏联的直接的军事威胁,中国与美国改善了关系,但这时中国也不放弃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信念,有四个产生的源泉:

一是来自于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把中国的独立看得高于一切,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根本的体现,是爱国主义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在 1973 年还在向美国人说起中国近代史的惨烈的经历,“在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中,主要是八国联军,接着是日本,日本侵略中国 13 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过去入侵的八国联军不但占了中国土地,而且还向中国要索赔款”。要避免中国重蹈过去的历史,就必须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这就是毛泽东始终把中国的独立自主看得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因。

二是来自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的遥控指挥,不能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使中国革

---

参见《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记录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记录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命遭受了悲惨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的错误决定,使中国革命再次遭受沉重的失败。这些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与外国交往中,始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让任何外国势力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

三是中国的具体的国家利益要求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国家利益是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的,是全民族的利益所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当代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两者应当是统一的。但在过去,苏联常想在社会主义的利益下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强加于中国之上,把苏联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要求中国实行“国际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甚至不惜与当时世界社会主义的权威国家挑战,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四是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力量决定的。毛泽东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毛泽东的高超的个人智慧和勇气,也决定了他不能容忍有一个外国的力量来决定中国的事情。

第二,和平哲学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对时代的基本看法是他的外交思想的出发点。应当说,在时代观的问题上,即在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建设等问题上,毛泽东的看法,特别在晚年的一些看法,是不尽正确的。主要问题在于夸大战争危险,夸大世界革命形势,夸大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因而导致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误入歧途,并在实践中导致中国的“革命外交”,使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外交思想充满浓厚的和平哲学,他是一位保卫和平的外交战略家。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和平哲学从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以独立自主的身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国的强大是为了增加世界和平的分量,减少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进行争霸从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如毛泽东一再声明的那样,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强国后,将是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对外进行侵略,中国不会扩张,不会搞霸权。与此同

时,毛泽东也最早希望看到欧洲的独立,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尽快发展,对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毛泽东都给以大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大战略家。后来的实践也表明,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的新中国的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世界和平的力量,成为稳定世界局势的重要力量,对防止一两个大国控制和支配世界起着重要作用。

其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和平哲学体现在,毛泽东一再严厉批判极少数中国外事工作人员的沙文主义和大国主义行为和情绪,希望世界人民监督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中国搞霸权,世界人民都可以反对之。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在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身上是看不到的。

其三,毛泽东严厉批判美国和苏联的霸权政策,明确地表达了任何侵略别国的行为,占领他国领土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观点。

其四,毛泽东主张用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关系,尤其是在领土争端上,在处理中国与邻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上,毛泽东都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的例子是对日本的立场。毛泽东虽然严厉谴责当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战争罪行,但却以极其宽大的胸怀来对待中日关系,主张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也反对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复仇”,在对待日本的侵华战争罪行上极为宽宏大量。

其五,毛泽东虽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决定在中国进行广泛的备战,但毛泽东同时也希望,人民和平力量的强大能制止战争,至少能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三,实事求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地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多变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其对内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从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原则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始终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始终坚持和平哲学,不对外搞侵略扩张,并坚决反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是他的外交思想中不变的主线。

但在方法论上,毛泽东没有一种固定的外交思维,没有一定的外交模式,一切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来决定。

在日本与中国的民间交往上,毛泽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采取以民逼官的外交思路,大力推动中日民间的友好往来,他自己也经常接见日本客人,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分开来,制定了先民间往来,后政府建交的渐进路线。

但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则坚持,要先解决中美两国的大的原则问题,并且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不急于同美国建交,在建交之前,毛泽东认为不急于解决美中两国民间交往的事宜。但后来,到1970年时,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过去的做法是不对的。他还向美国领导人承认了这一点,并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实行对美民间开放,允许两国人员进行交往,利用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从不容许民间交往,到利用它来推动世界大战略格局的变化,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外交思维的体现。

第四,外交战略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重点。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主要是四个:

一是一边倒(与苏结盟反美)战略(1949—1957)。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是联苏反美,把美国作为主要敌人,把苏联作为最可靠的盟友,实行对苏一边倒战略。

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已经定下了中国必须实行对苏一边倒的战略,认为新中国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行与苏联和美国平衡的外交战略是不行的。当时实际情况是中国没有可能与美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帝国主义政策,对中国进行封锁,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如果当时不与苏联实行结盟政策,那么新中国可能得不到来自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宝贵的支持和援助,新中国的独立也可能受到美国的更大的威胁。抗美援朝即是对苏联一边倒和对美国实行坚决斗争的战略思想的体现。有些人认为抗美援朝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大的独立的外交战略,但我认为这只是一边倒战略在朝鲜战争中的体现。或者说,实行一边倒政策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出兵支援朝鲜。因为美国出兵朝鲜是美国遏制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出

兵朝鲜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也是当时冷战局势发展的一个结果。

二是两条线(反美也反苏)战略(1958—1968)。

倒向苏联,反对美国的战略思想延续了差不多 10 年。到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实力较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这时中苏关系起了变化,主要是从 1958 年起苏联对中国的国内事务进行干涉,并且试图把大国主义强加到中国头上,让中国做出有利于苏联而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来。中国与苏联过去在友好时期被掩盖的矛盾这时爆发了出来,中苏之间发生了大论战,两国关系也迅速破裂。

这时的中国,与苏联交恶,与美国关系也不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在对抗状态。但这时中国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还是稍有不同。在 1958—1963 年,中国与苏联还维护着表面的友好,还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但在后半期,在 1964—1969 年间,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更直接地感受到的威胁来自于苏联,尤其是中苏边界发生的一连串冲突,更加剧了毛泽东对苏联威胁中国的迫切的感觉。虽然苏联和美国同时处在与中国对抗的状态,毛泽东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它们并列为两只纸老虎,而在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把苏联列为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

三是一大片一条线(联美反苏)战略(1969—1976)。

1969 年,苏联与中国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后来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了军事威胁。毛泽东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再次调整外交战略,把苏联作为最主要的敌人。这一时期中国虽然仍然反对美国,但实际上两国关系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思想,1974 年 1 月 5 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实际上形成了联合美欧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

四是“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战略(1949—1976)。

这两个战略其实也可看成是一个,其中心思想是争取国际上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个对中国最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

这一战略与前面的三个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它首先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有关,后来又与反对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有关,是反美反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外交战略,与反美反苏又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中国不反对任何国家,也会实行这一外交战略。它不以中国对苏对美的战略为转移,是一个更具长期性的外交战略。它也是中国实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只有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才能保证中国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否则独立会变成孤立。

#### (6) 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几个过于浪漫和不务实的观点

毛泽东是个热爱和平的外交战略家,他的外交思想贯穿着对和平理想的执著的追求,他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英国政治家蒙哥马利元帅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会见,他在 1960 年 6 月 12 日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中,谈到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和平特征:

“30 多年前,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毛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的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中国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中国人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大家团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因此 50 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若入侵中国会大倒其霉。”

不过西方的一些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文献,却经常引用一些毛泽东的话来证明,毛泽东似乎是个战争狂人。这当然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歪曲和污蔑篡改,是需要批判的,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也的确有过分之处,容易被人误解。

例如,在谈到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时,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到处

挥着原子弹威胁各国人民,威胁世界和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鼓励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要害怕原子弹的威胁,要敢于起来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把原子弹作为一只新的纸老虎。但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毛泽东是过于轻蔑原子弹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灾难了。他说,“原子弹不仅会毁灭人,而且会毁灭物质,但是,是否许多国家就会没有政府呢?不会的。只要有人存在,总是会有政府的。一个政府被摧毁了,另一个政府又会起来。人类总是要找出路的”,又说,原子弹要“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几千万年前有一种大动物叫恐龙,它在冰河时代就消灭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别的动物,最后出现了人类”。

应当说,毛泽东对原子弹出现所引起的战争性质的变化没有较为科学的认识,把它等同于一种更为先进的热兵器,没有认识到核武器可能给人类造成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灾难。他说,“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枪等。后来使用热兵器,例如步枪、机关枪、大炮等。现在又加上原子弹。但是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无非是死伤的人数更多而已”。

有时候,毛泽东在谈到核战争的前景时,似乎把它看成一场游戏:“如果他们要打,原子弹已经放在你头上,那么一炸,炸一个大窟窿,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这个地球不大,据我知道地球直径只有二万五千一百多华里,就是一万二千五百多公里,打了窟窿有什么了不起呢?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毛泽东在讲到不怕世界大战时,常常讲过头,作一些很不好的比喻,在讲到核战争的前景时尤其如此。1957年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时,毛泽东曾经设想,万一真的打起世界大战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2—173、174、170—17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4页。

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说中国人民不害怕战争是对的,但把战争带来的严重灾难轻描淡写,甚至于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就显得不合适。当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很不相信,以为是什么人故意造谣撒谎。后来毛泽东要斯诺“不要替我否认这个所谓谣言”。

另一个较大的问题是毛泽东对日本不反省在二战争中的罪行持有过于宽容的立场。在谈到过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时,毛泽东思考的出发点是,中日两国人民要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为了这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的罪行也要宽容一些。毛泽东的另一个主要思想观点是,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毛泽东在谈到这些思想时,有时过于宽容,有时又经常从反面来说,这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例如,毛泽东认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多次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由于美军对日本实际上是半占领,因此人们不要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进行讨帐,他对日本朋友说,“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怄气是不好的,这点,我们很可以谅解”。

又如,1961年毛泽东谈到要从反面来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认为“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时又重新提起这件事说,“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6—297、347、551页。

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1965年,毛泽东又同样谈到,“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

毛泽东的另一个有失误的地方是在中苏关系上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一方面表现了毛泽东不畏强国的勇敢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毛泽东那种喜欢挑战的性格。1963年,苏联曾经要求中国停止公开争论。应当说这对两国都是有好处的。但毛泽东拒绝这样做。他说:“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三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毛泽东还在1973年对美国人说起不与苏联停止论战的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因此表示要准备与苏联的扩张主义斗争一万年。在古巴领导人来中国访问并提出让中国停止和苏联的论战时,在罗马尼亚领导人访问中国表示同样的想法时,毛泽东用开玩笑的口气回答说,看他们的面子可以各减一千年,而在苏联柯西金总理在1960年提出停止论战时,毛泽东却向他宣布要与苏联斗争一万年,看他的面子再减一千年,可见毛泽东并没有认真从国家关系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5、226、460—461、534、535、564、517页。



上考虑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实际上,这场争论对中国没有产生积极影响,倒是加速了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的形成,并酿成了后来的十年“文革”的悲剧。

---

参见《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

### 1. 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

钱其琛同志在 1989 年举行的周恩来外交思想研讨会上指出,周恩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建国以后,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长近 9 年之久,为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周恩来在长达 26 年的时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外交和外事工作的领导人。早在 1936 年 7 月,周恩来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了会见,这可以被看作是周恩来外事工作的开始。周恩来还是第一位会见斯诺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已经表现出他的外交才能,加拿大学者柯让认为:“1936 年 12 月的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的个人外交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顶峰”。1944 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周恩来的外交手段受到了美国人注意。1944 年 7 月 27 日,当第一批观察员谢伟思等与周恩来会见后,谢伟思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如果共产党设一个外交部长,他一定是最可能的人选”。1944 年 8 月 18 日,周恩来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的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件。

在周恩来主持新中国外交的 26 年中,新中国的外交经历了 10 件大事:(1) 中苏同盟条约的订立;(2) 抗美援朝;(3) 制定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4) 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签订边界条约,和平解决与这些国家的边界问题;(5) 中印边界

---

参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参见张星星:《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事工作研究述评》,《周恩来研究述评》,第 164、171 页。

冲突;(6) 与法建交,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突破口;(7) 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救国斗争;(8) 中苏冲突;(9) 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10) 中日建交。

在这些年代中,周恩来通过谈话,先后会见过数以千计的外国客人,对涉外文件批示,处理过各种文稿数千件(仅外交部保存的文稿就有 5000 件),发表文章等,表述了他的外交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涉及到外交的方方面面,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 80—90 年代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和理论依据,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遗产。对这些遗产进行理论整理,也是中国外交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1978 年后,国内外陆续发表了一批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文章和著作,如王炳南的《回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的几个片断》(1979),邵国康《周恩来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外交态度》(1979),马列《周恩来同志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1981),魏史言《周恩来的外交思想》(1988)等。1978—1988 年间共发表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文章约 20 篇;1988—1998 年,国内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期间发表的较重要的文章和著作有:吴瑞章《周恩来在建国前后的外交思想与实践》(1988),马芷孙《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裴坚章《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季明刘强编著的《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1993 年版)等。1989 年 3 月,外交部主办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专题讨论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的大型的周恩来外交思想的讨论会,并出版了《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的论文集,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1990—1998 年,又先后有李连庆的《大外交家周恩来》(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4 年版),力平和程华主编的《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1996 年 1 月出版第二

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年2月)等著作,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的材料及研究成果。

1987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柯让写了《周恩来的外交》,这是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的代表作。此外,还有英国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4月),加拿大罗纳德·基思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东方出版社1992年5月),日本学者鸟居民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前苏联学者沃洛霍娃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等。

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外交生涯起自30年代,到40年代,周恩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外交家。1944年中共已经形成半独立外交。一些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功绩的杰出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这五项原则应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他为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取得成果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与周边国家睦邻相处,他亲自领导了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为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周恩来先后三次出访亚非24个国家,为打开新中国的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国不仅在争取与第三世界的友好相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且通过国民外交,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促使中法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左”倾路线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进行了抵制,并使外交工作从1968年就恢复了正常。70年代初,周恩来又在推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有较大成就。许多人指出,中国的外交战略出自毛泽东之手,但这不能否认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的贡献。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全面的,系统的,富于创见的,也是有特色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二者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但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个性、文化背景、所处地位等的不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又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存在着差异。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则完全是周恩来

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充满深刻的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精神,体现了其革命正义感和世界观。周恩来最早倡导了具有国际经济新秩序思想的中国援外 8 项原则,提出了国际合作平等互利的思想。他的思想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作为大国的外交代表,周恩来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周恩来反对战争,为推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还包括有关对外交本质,外交队伍建设,新中国外交基本立场,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方法、指导思想与原则等的论述。

这些研究成果指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感受。他 20 年代赴欧洲、日本留学的经历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最初的来源。但马列主义中关于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统一战线等观念对周恩来后来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列宁的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对周恩来外交思想有过很深的影响。周恩来也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吸取了养料,形成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

## 2. 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关系

在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时,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周恩来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1974 年 11 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时,曼斯菲尔德说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则回答说,我是个普通人,中国有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有时对一起共事的人容易看到一个侧面,不全面,而别人从大的方面去看,倒容易看到他的长处。例如,你们对尼克松总统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我们认为,他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就中国方面来说,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 1968 年当选以前的一篇论文。基辛格博士说了句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

---

参见李宏:《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陆建洪:《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风格研究述评》,载《周恩来研究述评》,第 294—298、299—308 页。

的,在美方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当然,在发展中美关系上,基辛格是有一功的。

周恩来讲的这一番话中关于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关系的谈话,也可以用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外交工作的关系上。

应该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主要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毛泽东对周恩来虽然有时也不满,如在 1958 年曾经严厉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主张,公开说周恩来是反冒进的,而他是反反冒进的,认为周恩来的立场与右派已经相差无几,周恩来为此作了检讨,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是相信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不管与自己的思想是否一致,也不管是否同意毛泽东的思想,总是在政府工作中加以执行,在对外活动中尤其如此。

周恩来生前曾经多次谦逊地说,他自己是经常向毛主席学习。1973 年 11 月,周恩来再次与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曾赞扬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总理这样全面地思考问题。周恩来总理说,你过誉了,这些话你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他的战友向他学习,但学的不够。

毛泽东在 40 年中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公认的领袖,周恩来历来尊重毛泽东的权威,尽力在工作中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尤其是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非常主动地向毛泽东报告中国外交的一切重大事件,甚至连他出国的一些小的细节也向毛主席汇报。如 1954 年周恩来总理在前往日内瓦参加第一次有新中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前,先去苏联,与苏联进行磋商。在与赫鲁晓夫见面的宴会上喝酒多了一些,虽然没有影响工作,但周恩来还是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根据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外交决策权是高度集中的,正如毛泽东在 1958 年 6 月所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685 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692 页。

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周恩来在文革中也说过，三外（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然而这是否表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或者说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呢？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侧重于中国外交的战略和重大事件方面，而周恩来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领导人，直接参与了新中国外交的所有重大决策过程，并亲自领导了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执行。在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关系上，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有三种关系：

（1）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有统一性。

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许多内容都来源于周恩来外交思想，或者是与周恩来一起研究，一起制定的结果。如，新中国最重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由周恩来提出的，虽然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提出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把它们完整地表述为一个原则体系，周恩来是第一个，全力把它变成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也是周恩来。由于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两人的许多思想是完全重合的，而且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长期合作，有些已经难以分清哪些思想是谁首先提出，谁对谁的影响更大些。但总的来说，周恩来的思想中也有许多是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发挥和阐述，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具体外交问题上的体现。在大的外交战略思想上，周恩来的思想明显从属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对毛泽东有过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周

---

参见《周恩来传》上，第438页；《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恩来的务实外交对毛泽东的影响上。周恩来的务实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首先表现在国内的经济工作中。周恩来在 1956—1957 年曾经提倡反冒进,为此他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为此一再作检讨,甚至在 1958 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请党中央考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在国内的务实的作风没有能够影响毛泽东,反而遭到毛泽东的扼制。周恩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得不采取一些违心的做法,一方面跟着毛泽东批反冒进并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一些有限的具体行动,在局部上抵制这种冒进风。周恩来在国内经济建设上的务实作风由此有很大的改变。

但在外交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没有提出过大的批评意见,反而在外交活动中无形中受到了周恩来的务实外交影响。1958 年周恩来因所谓反冒进而作检讨时,认为在外交上没有这样的问题,“一般地是执行了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有个别问题有时还有些偏差”。除“文革”中毛泽东在支持外国的革命运动方面有过冒进外,基本的外交活动还是比较务实的。在国内问题上,是周恩来跟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有些时候实际上是毛泽东跟周恩来。

(2) 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补充,二者之间存在互补性。

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新中国外交的领导者,但有角色和分工上的不同,再加上个人性格上的不同风格,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侧重点是比较清楚的。总的来说,毛泽东习惯于作外交战略和国际战略上的哲学思考,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总的思路进行宏观指挥,因而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他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一样,充满深刻的历史思维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气势宏阔,有大手笔;而周恩来外交思想虽然也包含大量的外交战略的思考,但比较来说,他对具体的外交问题思考较多,而这些细致的思考是毛泽东这样超脱的外交战略家难以进行的。这些思考主要表

---

参见《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8—249 页。

《周恩来传》,第 424 页。



现在周恩来关于什么是外交,关于外交学的中国特色,关于外交工作的原则,关于中国援助外国的原则,关于外交的具体的艺术和策略思想等。它们体现了周恩来思考入微,仔细周到,富于严整性和逻辑性,体现了周恩来作为外交策略家、外交实干家的特点。

这种互补性还表现在,周恩来通过大量的外交实际工作,通过他的务实的外交作风影响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人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务实思想是他的一贯的作风,而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却表现得闪烁不定,不断有所变化。在毛泽东的后期,他脱离了前期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脱离实际,用不切实际的理想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使中国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但何以毛泽东在1969年后的外交工作中就基本上走上了务实的道路呢?这与主持外交的周恩来的思想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如1971年5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外交外事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的外事工作要跟过去有所不同,要有所变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了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也停止了,现在不行。外国人不仅是左派,中间派要来,右派也要来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周恩来又提出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形势下,都要改变过去的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而言,提出对外交进行改革,指出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了,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可以说,正是周恩来的务实的外交思想,促使毛泽东的有关中苏美三国关系的思想发生很大的演变,以至于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感觉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认为周恩来是中苏美三角战略关系走向全球平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在西方人眼里,周恩来是外交平衡、势力均衡思想的大师。

相对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周恩来的思想似乎要更彻底些,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59、490页。

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中文版,第243页;尼克松:《领导者》,中文版,第271、284页。

对开放的重要性也看得更深。周恩来曾经讲了后来邓小平差不多重复讲的一段话：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离不开世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特别是中国不能与美国没有经济往来，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在建设中的国家，一个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当然是有贸易可以互通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孤立的”。

1964年，在周恩来同日本朋友谈话时，一个日本朋友表示他认为中国的独立过分了，周恩来对此解释说，如果说中国的独立是指中国自己孤立的话，不跟人合作的话，那么，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看法是，独立并不排斥合作。在现代，每个国家都不能闭关自守，孤立起来。真正的独立并不排斥国际合作，即同真正的友好国家合作”。

(3) 毛泽东与周恩来外交思想也有一定的矛盾性。

如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上，虽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矛盾之处，总的说来周恩来更侧重于强调和平，强调战争打不起来，而毛泽东虽然也讲这些，但在他的战争与和平的两个矛盾体中，其论述则强调战争的危险性，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有时对战争的灾难讲得过于轻松，让人难以接受等。

在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上，也可以看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思路不同。毛泽东在反对苏联方面比周恩来要强硬得多，火药味太浓，没有采取什么主动行动来缓和与苏联的关系。60年代毛泽东讲中苏关系时，讲两国关系的消极面较多。而周恩来在与苏联的大国主义斗争时，对苏联援助中国给予了较客观的评价，并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试图修复中苏之间的关系，或至少使之维持正常。

1960年是中苏关系开始公开恶化的一年，但周恩来为了挽救中苏关系，减少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国造成的损害，采取了尽量争取苏联的方针。如在1960年8月1日，周恩来已经收到苏联驻中国专家组组长关于苏联将在8月派8次国际列车来接专家回国的通知，此事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4、250、406页。

已经不可能挽回了,但周恩来还是在最后时刻尽自己的努力,他对波兰大使说,我们的态度是,我们需要这些专家,我们挽留专家,苏联专家工作得很好,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政府一定要坚持,那当然也是很大的遗憾。

周恩来后来还多次为挽救中苏关系免遭完全破裂作出努力。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主动向苏联提出,由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可惜访问期间,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出言不逊事件,使周恩来的打算未能如意,但周恩来仍不放弃。1965年2月,周恩来与访问越南后路过北京回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进行了接触谈话。周恩来真诚地对柯西金说,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双方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终究能够了解。不求一次了解一切,多次交换以后,总会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周恩来还对增进两国友好的一些活动表示赞成,希望加强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到1965年3月,周恩来已经对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等人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对胡志明等人说,苏共新领导上台,我们总认为他们有些变化,因此,建议我们去看一看,结果很使我们失望,苏联新领导执行的就是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能改变。但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与巴基斯坦客人谈到中国的工业建设时,仍然坦诚地说,虽然中国为苏联的援助付了钱,但我们还要感谢苏联,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给了我们一些援助,帮助我们搞了156个工业项目,搞了一点初步基础。

1969年3月发生中苏冲突后,周恩来也能作出理智的反应。他根据中国历来的原则,提出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力求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苏边界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在中苏冲突中之所以采取务实的立场,主要是由于:第一,当时中国文革使国内政治混乱,安定国内需要有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希望与苏联关系继续恶化;第二,当时,中国面临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又在进行抗美援朝斗争,南北同时都不安定,不能与苏联进一步恶化关系。而当时苏联方面也不希望中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85、428、436、438、439页。

苏冲突进一步扩大,因为对苏联来说,第一,对中美关系改善抱有警惕之心,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一再表示要调整中美关系。1969年4月,美国驻苏大使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尼克松的信,说美国不想看到中苏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同时也告诉苏联,美国希望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实际上是对苏联进一步对中国采取行动有所警示。第二,苏联自身也有问题,主要是1968年入侵捷克受到了各国的反对,如果再与中国发生战争,会对莫斯科的形象造成更大的损害。第三,在越南战争上,如果中苏两个越南的最大的援助国发生更大的冲突,与苏联想进一步参与越南事务的战略也有矛盾。

因此,双方都想和平解决。这样,在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双方都派代表赴越进行吊唁之时,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

周恩来知道,自3月两国在边境发生冲突以来,不断从莫斯科传出消息,说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战略基地、原子基地,苏联政府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因此在会谈中周恩来首先表示,中国无意与苏联进一步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都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向苏联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但周恩来也严正警告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为解决双方的问题,周恩来提议双方采取临时措施,在争议地区武装力量应当脱离,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并就此问题进行边界谈判。柯西金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同意,这样达成了双方控制边界紧张局势的口头协议,使两国从战争边缘重新回到改善关系的轨道上。1970年10—11月,双方把原来的代办级关系恢复到大使级关系,并恢复了中断两年的年度贸易协定。

可以说,在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严重的情况下,周恩来务实的

---

《周恩来年谱》,第335页。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125—126页;《研究周恩来》,第173页。

对苏政策思想,对减缓两国的进一步冲突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虽然在当时不可能从全局上使中苏关系正常化,但周恩来对此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按照周恩来的思想去做,也许中苏关系会与已有过的那种两国尖锐敌对的关系有所不同。

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与周恩来也有不一致之处。最典型的是所谓《新情况》153期事件。

事情起因于1973年6月2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6月26日,毛泽东看了这个谈话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153期刊登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一看法受到毛泽东批评。7月3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写信,要求撤回该刊,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时再次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报。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送毛泽东审阅,并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上批示说,“检讨不要写了”,这场风波才算了事。就此事而言,到底如何看待当时的国际形势,到底是毛泽东说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56—357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01、604页。

的三大(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还是周恩来认同的二代(大主宰,大欺骗),这本身是可以讨论的。但这也反映了周恩来在观察国际形势时的确与毛泽东有矛盾。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种矛盾不是在1973年才形成的,周恩来早在1969年11月21日对中国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成员的讲话中和12月12日与巴基斯坦客人谈话时就已经指出,当前世界事务是错综复杂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美苏既互相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尼克松说现在是谈判的时代,此话不恰当,现在是扩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这种思想指导周恩来观察当时的国际形势持续了好几年。

当然,周恩来也有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的判断过于谨慎而被毛泽东纠正的地方。如1971年4月,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要不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问题,递交报告,请示周恩来。这个报告的主导思想是,现在美国队访问中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周恩来在4月4日对这个报告基本表示同意,没有在报告上批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也许是真心同意这个报告的意见,也许是出于外交上的谨慎,将这个报告原样送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在这个问题表现出外交战略家的风范,在久久思考了三天之后,决定否定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意见,亲自和直接作出了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的决定。一年后,1972年4月18日凌晨,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国组成员讨论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队要不要在当天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见一事。关键在于美国飞机于4月16日轰炸了越南的海防、河内,在这一时刻中国为了表示对越南的支持,似乎以不见为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交部作出了以口信方式通知美国,拒绝见美国总统。但当天上午,毛泽东在见到周恩来时,否定了这一意见,指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系民间交往,去年美国队来华时中国领导人曾接见,今年中国队如拒绝见美国总统,会给美国人民以失礼印象,故中国队见美国总统和向美国赠送熊猫均应按计划进行。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46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34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49页。

### 三、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 1.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他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罗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维尔德茨时说,我已经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将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厚望。邓小平经过几次大的政治风浪后,终于在时代的呼唤下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在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中,把握时代的潮流,把中国引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使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开始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变成一个对世界形势具有越来越重大影响的世界性大国的历史进程。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钱其琛同志也指出,邓小平是当今世界上杰出的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是什么关系?在有关国内建设的思想上,邓小平虽然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但总体上是在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给予批评和否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创造性大于继承性,发展多于继承;在有关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上,邓小平继承和发挥了周恩来的许多思想。

而在外交思想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总体上是肯定的。邓小平曾经多次说到,“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713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1年,邓小平又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从实践上肯定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工作。

邓小平不仅较多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而且毛泽东思考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特点也被邓小平所继承,在思考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时,邓小平具有与毛泽东相类似的大战略家的恢弘气势,他目光远大,高瞻远瞩,能富有预见地观察问题。邓小平在以下一些思想上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和平政策,关于争取世界和平力量推迟世界大战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关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等。

但邓小平在外交思想上的创造性也是极为明显的,以至于人们可以说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是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外交思想带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邓小平则开始了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新阶段。他的外交思想虽然也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现实主义是邓小平观察国际问题的立足点。他关于和平与战争的观点,和平与发展的观点,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跳出了以阶级观点为分析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传统思维,第一次基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外交战略;有一些思想虽然毛泽东也提出过,但经过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思维的考虑之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提出来,立刻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如一国两制的思想因素毛泽东也有过,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因素不能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受到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的局限,更多的是从力量对比看问题,或者从策略上提出问题,不可能



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合理估计和分析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更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提出来,因而毛泽东虽然在一国两制思想上有贡献,但不可能真正产生一国两制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当然是在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继承为主到发展和提出新思想,这中间有一个思想发展的变化过程。有些人认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有两个飞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 1977—1984 年;(2) 1985—1989 年;(3) 1989—1992 年。其主要依据大体是说,1985 年时,中国的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改变了战争危险很迫近的观点,改变了过去的一条线战略;1990 年前后,邓小平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and 策略思想等。但这样的划分和依据似不够准确。如邓小平在 1978 年开始提出对外开放战略,1978—1979 年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1980—1982 年已经形成了独立自主战略等,1985 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两大全球性战略的问题的思想,1988 年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思想,1988—1989 年提出了系统的外交策略思想。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并不是从 1985 年起才发生大的变化。所以如何划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发展阶段似乎还可以再进行研究。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否是一个体系的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没有外交思想体系,他只是就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另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外交战略思想体系。

一些同志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体系归纳为和平外交战略体系,并认为它的首要目标是反对霸权与争取和平,根本原则是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基本准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与一切国家发展外交和经济文化关系,基本立场是立足于自己,同第三世界各国广泛合作,基本主张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用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基本保证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高准则是国家利益,最终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这些同志还指出,

---

参见《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 页。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sup>①</sup>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体系”，它包括四个部分：(1) 世界主题论——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2)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战略的根基；(3) 稳定国际国内局势的战略——一国两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解决双边关系改善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军队建设，促进国内发展等；(4) 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有些同志则认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包括以下 8 个原则：(1) 独立自主原则；(2) 国家利益原则；(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 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原则；(5) 党际关系原则；(6) 睦邻友好原则；(7) 反霸原则；(8)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还有的同志提出，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包括：(1) 关于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2) 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3)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4) 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5)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6) 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7) 关于一国两制；(8) 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9) 党的对外工作和国际共运战略；(10)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贡献。

这些讨论对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有益的尝试。

笔者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但对此也要实事求是。邓小平作为一个外交战略家和外交家，是从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对外交理论并没有专门作过系统的研究，因此凡是实践提出来的问题，邓小平都有很深刻的论述，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暂时还没有涉及到的问题，邓小平对此涉及也较少，甚至有些毛泽东和周恩来论述到的问题，如周恩来涉及到的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外交工作的原则艺术，外交谈判等方面，邓小平就很少涉及。

## 2.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

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既继承毛泽东又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的

---

参见丛凤辉：《论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载《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137 页。

参见《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第 171—178、205—212 页。

一个方面。毛泽东的思想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对内政策的思想,毛泽东在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许多想法从主观出发,脱离了他过去在战争时代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毛泽东是一个带有现实主义特点的理想主义者,其对外政策比对内政策有更多的求是精神和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做出了许多与对内政策思路完全不同的正确决定,并深刻地影响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因素的同时,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高峰。邓小平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无论在对内思想还是在对外思想上都表现出高超的现实主义手法,以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来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超越了毛泽东留下的理想主义的外交思想的局限,使之更符合于中国外交在新时期的实际情况。邓小平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无不带上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特点。这表现在邓小平在克服反霸权主义和第三世界观念上的理想主义观念上,表现在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利益概念,重视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为中国制定了极为务实的策略体系。所以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首先应当把握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哲学。邓小平开辟了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现实主义外交的新时期。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或多或少的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有些时期,有些事情上特别看重意识形态,看重外交原则和道德原则,在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中不时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看中苏两国关系较多,经常强调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首先表现为以苏联为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中心,中国应当维护苏联的威信等。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就需要牺牲中国的国家尊严甚至国家利益。也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意识形态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有 6 亿人口,是一个世界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经常认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应当支

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即使中国再苦一些,也要尽力给第三世界国家多一些援助。

周恩来的外交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为朋友不惜牺牲一切的仁义思想,说话算数的信义原则,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准则。在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时,周恩来一再向印度政府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以君子之风与印度打交道,苦口婆心地进行劝服,甚至不惜屈一个大国总理之尊,再三表示可以到印度与尼赫鲁进行谈判,以个人的委屈求得国家之间的和平;在越南战争中,周恩来一再向越南人表明,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中国可以牺牲任何利益,为此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这其中固然有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更主要的是中国应该承担国际义务。

邓小平在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后,面对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期形成的理想主义色彩较重的三个原则: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原则。霸权主义就是指一些大国凭借其军事政治优势,对别的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干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国头上,甚至使用军事力量对其他主权独立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占领。这种霸权主义完全违反各国政治独立,主权不受干涉的原则,是形成世界秩序不合理的一个根源,也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一个根源,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中一个大国,必须坚决反对来自任何一方面的霸权主义,不管是苏联的,还是美国的,或是其他地区霸权国家的霸权主义行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中国将“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第二,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原则。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世界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对世界各弱小民族欺凌,支持受压迫民族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运动,中国应当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128、162页。

争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做出自己的牺牲。基于社会主义外交的原则,新中国在建立初期把发展与维护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看得高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优先对象。后来虽然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了,但社会主义外交原则还是长期处在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上。如当时发表的重要文件有许多把中国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作为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外交原则后来又使中国在外交上把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主要考虑的不是它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会带来什么好处,而是看这些国家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国对任何国家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都给予支持和援助。

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原则还坚持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具体地表现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永远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正如邓小平所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我们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第三,和平是中国外交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中国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中国和平外交的理想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反对任何使用军事和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的方式。中国不仅自己表示在国家争端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且反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反对大国使用武力来维护他们眼中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原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又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的历史传统,二者在中国外交中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如果那时我们

发动战争,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外部特征上是一种“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曾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工作的邓小平,不能不受到这种理想主义的外交的深刻影响。

1982年8月,邓小平把中国外交中的这三个理想主义的原则正式称为中国外交的三个基本政策。他说,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1989年时邓小平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有时候,邓小平又把这三句话合成两句:一,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二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将来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这是对中国理想主义外交的一个概括,同时也表明了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在邓小平整个思想体系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这一哲学思想始终是占上风的。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放在一个很高的思想路线的地位上,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也是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首先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

---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事求是”，“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体现在邓小平的对内思想上，也体现在他的外交思想上。邓小平在1977年时就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越到后来，邓小平外交思想中超越理想主义的因素也越多，使现实主义成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流和基调。这一变化与邓小平对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有关，与邓小平对中国的最根本问题的分析有关。邓小平自1978年后就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根本任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奠定了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坚实基础，也使得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总体上超越了过去形成的理想主义的三原则。这表现为：

(1) 超越反对霸权主义原则，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邓小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是对毛泽东反霸权主义思想的继承。当然不能把反霸权主义原则都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它首先是在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现实外交斗争中产生的。当中国先是面临美国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后又面临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时，中国外交不得不打上深刻的反霸权主义的烙印。同时反霸权主义又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相一致，从而使它带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的烙印，主要表现为在处理对外事务中，中国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支持世界上各个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在外交思想上，这主要体现为邓小平所说的“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论点，邓小平在1989年甚至提出过西方七大国都在搞霸权主义，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那么中国应当同时反对这七大国的霸权主义。

当然，反对霸权主义是必须坚持的，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上的考虑，它并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是，对于正在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中国最大的和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不是既反对苏联也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或者说,反对霸权主义不能成为中国外交的最根本的目标,中国外交最根本的目标只能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服务。此外,中国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自然要涉及到,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的关系的问题。不错,中国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这一外交原则也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因为它不仅是针对国内各方面的工作而言的,也是针对中国对外工作而言的。

尽管邓小平有时候把反对霸权主义与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并列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政策,但实际上,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维护世界和平高于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二者之间还是有重大区别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和平战略高于反对霸权主义,因为和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的,对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而反对霸权主义,尚未成为各国的共识,有些国家愿意反对,有些国家则不那么坚决,有些国家还支持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对霸权主义不能与争取世界和平相提并论。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基本战略,而反对霸权主义则不是一个战略,它只是为和平战略服务的一个手段。

因此,在对美关系上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坚决反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政策,与美国作斗争;二是将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和中国商品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在外交上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当然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时候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也是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种很必要的手段,但反对霸权主义并



不能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当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和出于经济建设需要与美国发展关系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不得不退居第二位。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必须与美国保持和发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现实主义外交对理想主义外交的某种超越。

反霸权主义的理想主义还表现为它与中国外交利益的矛盾。当然,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都是应当反对的,这从原则和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同时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那么中国是否要同时反对呢?如果美国、俄国和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同时搞霸权主义,那就会产生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中国有这样大的能力同时有效地反对这些一起出现的霸权主义吗?第二,中国是否准备同时在两线作战,既反对苏联(俄罗斯),又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呢?再者,反霸权主义还包括反对地区霸权主义,有些时候,反对地区霸权主义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直接相联,如当越南对柬埔寨心存不轨时,中国就要对它的地区霸权主义作出强烈反应。但如果有些搞地区霸权主义的国家对别的国家进行侵犯却又不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直接联系时,中国是否作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是,中国是否有这样的力量,如果不是,那么是否会出现双重标准?

从现实来考虑,中国是做不到的。事实上,当中国在 1972 年与美国实现和解,以反对迫在眉睫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现实威胁时,并不等于说美国就已经不搞霸权主义了。美国从二战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是一个霸权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当中国联合美国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时,实际上是联合一个暂时对中国威胁较小的霸权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威胁更大的霸权国家。但美国始终没有放弃霸权主义,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这样,在现实斗争中,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理想主义与外交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战略配置发生了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中国只有根据集中主要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一高度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行利用各霸权国家的矛盾,联合虽然也搞霸权但对中国威胁较小的国家来反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霸权国家,这样,反霸权主义的理想因素就被其中的现实主义所超越。

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只有 60 年代中至 70 年代初这几年处在

这样一种状态,即中国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中国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霸权主义,在南线与美国处在准战争状态;中国反对苏联在东欧的霸权主义,反对苏联在中国边境对中国搞霸权主义。这一时期,中国倒真正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但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外交最糟糕和最危险的时期!

而邓小平外交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实际上遵循的是这样两条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

第一,中国必须避免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处在敌对状态。中国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政策要维持在这个范围内,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不投赞成票,而不能因为它们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就像过去理想主义占上风时那样,宣布它们为中国的两个最大的敌人。相反,中国应当尽量缓和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独立自主的外交实际上就是使中国有更灵活的机会来改善同它们的关系。

第二,中国对任何一国的霸权主义的反对都不能损坏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不能超越中国当代这一最大的国家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处理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的矛盾。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内部问题,中国用什么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不过实际上,邓小平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始终把现实主义的原则放在第一位。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涉及到中国主权原则的问题上不做让步,始终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坚决拒绝美国一再提出的要中国首先承诺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出发,灵活地处理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纠葛。邓小平提出的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也考虑到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符合中国大陆与台湾双方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深深地卷入中国内政的美国的利益。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甚至表示,中国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这实际上是在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诺在和平方式的潜力没有用尽前不首先使用武力的方

式,把和平方式置于武力方式之前,对美国也是一种有原则的让步。

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这一中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对任何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遏制的理想主义外交正好处在尖锐对抗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外交理想主义是不干涉内政,反对大国对中小国家的侵略和控制,反对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这些所涉及的是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美国的外交理想主义则把民主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并以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础,它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行为准则,要实行它就必然干涉别国的内政。如果中国在这样的状况下坚持实行僵硬的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原则,就必然与美国的外交霸权主义始终处于尖锐的矛盾和对抗之中。

但实际上,两国的外交在涉及到两国关系时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需要放弃自己的外交理想主义原则,而是在实行这种原则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方法有多种,如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被中国视为地区霸权主义行径,中国是坚决反对的,为此中国采取了最坚决和最强硬的手段,以军事和战争的方式,对越南进行了边境自卫反击战,直接打击越南霸权主义的军事力量,并对反越的柬埔寨武装给予直接的军事物资援助;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军事占领,被中国视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为,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与国际社会一道对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抵制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从政治上、道义上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对阿富汗的抵抗运动给予声援;对1991年伊拉克公开侵略和吞并科威特的地区霸权主义则采取坚决谴责的态度,要求伊拉克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并承认科威特独立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美国一直实行的各种霸权主义,中国主要采取的反对方式是:从道义上谴责美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批评,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对美国对别的独立主权国家实行的侵略、控制、颠覆、制裁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谴责,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者在投票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对美国干涉中国人权事务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其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图谋,对美国公然拦截中国货船“银河号”的霸权主义做法也给予了反击,但中国没有采取全面恶化两国关系,在全世界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相对抗等极

端性措施。

到邓小平的晚年,对反对霸权主义的理想主义则有更多的超越。邓小平和过去一样,多次提到反对霸权主义,但仔细阅读就可以看出来,邓小平晚年的反霸思想与前期不同,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1978年至1986年,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侵略就反对谁”,但在1987年后,虽然邓小平也一直提反对霸权主义,直到最后的南方讲话也仍然坚持这个提法,但邓小平一次也没有再重复过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观点。

第二,邓小平在1989年后多次提出的思想对于这一观点有重大的修正。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思想,与中国应当支持各国的反霸斗争等联在一起。依照这一思路中国应当积极地反对两个霸权国家的侵略和干涉政策,中国为了反对地区霸权甚至不惜出兵与之一战。但在1989年后,邓小平强调的却是,中国与那些搞霸权的国家还是要友好往来,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反对霸权行为就需要支持别国的斗争,要反对和批评那些搞霸权的国家,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强调中国“要少管别人的事”。虽然美国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对中国施加压力,但中国也不是光反对美国的霸权,而是要把重点放在继续与美国打交道上。由于“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不要当头。中国对霸权主义虽然不怕,但也不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而是谁也不得罪,承认中国要做到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力量不够,且这样做使中国锋芒太露,邓小平强调中国在新的时期应当观察为主,“少露锋芒”。

(2) 超越意识形态原则,正确处理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和国际主义问题。

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外交重点的做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82、289、344、348、353、358、363、383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4、302、318、323、356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359、363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代的后期已经开始改变。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放在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美国实现和解,这已经是对过去的中国外交中的社会主义外交原则的超越了。邓小平在 1975 年时就认为,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的时代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因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

而且,邓小平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表现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

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上,曾经发挥了关键作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一帮穷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邓小平多次讲中国应当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于宣布“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也是属于第三世界”。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呢?

在邓小平的外交词汇中,第三世界有两重含义:一是政治概念,二是经济概念。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与过去的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控制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对而言的,它具有反霸权,不结盟,反对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含义,而且它代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当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将永远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时,总是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将永远站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边。

应该看到,在宣布中国将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邓小平关于这一概念的论述包含了理想主义的成分,即使仅仅从政治概念上看也是如此。

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后,中国仍然需要与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看,中国不管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多么好,也不能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外交必须摆正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位置。无论怎么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影

响。因此,在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外交实际上是把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放在重要位置上。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有一个两面性问题,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与中国友好。相反,现在支持台湾当局并承认它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几乎清一色都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边界领土的纠纷甚至发生武装冲突。

在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上,中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仍然可以见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子。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原则是直接由过去的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的斗争的政策发展而来的。而在过去,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其中也包含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们把第三世界理想化了,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团结的纯洁的群体,一个遭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国际阶层”,认为它的使命有些类似于无产阶级,注定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力军,注定是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天然盟友。第三世界国家也被认为是一个美好的概念,以至于中国一再宣布自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发展起来也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说,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受到了这一理想主义的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过多次表述。第三世界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是指经济文化发展较落后的国家,是不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这两类国家为基础组成的不结盟运动的国家。邓小平曾经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不结盟国家也是多样的,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开不成会,不结盟国家有一个会。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没有任何损害不结盟运动的言行,没有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反对不结盟国家这个概念,这同我们讲的第三世界概念并不矛盾”。

但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超越。这表现在: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40、21—22 页。

第一,邓小平在最后的讲话中,不再认为中国应当永远做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将来发展起来后也应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但中国不应当以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为荣,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指不发展的落后国家,中国不可能,不应当,也不能够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所倡导的现代化,正是要改变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面貌,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而且还要成为经济大国。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邓小平说的“少管别人的事”,既指不干涉发达国家的事情,更指不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事。邓小平说的中国不要当第三世界的头,当然是一种策略,但里边也有要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的含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还特别指出,中国应当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然后继续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这正是邓小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超脱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当然,到那时,“发达国家”将不再是西方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在从经济上为中国定位时,邓小平并不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或者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在经济意义上,发达国家是与发展中国家相对的,说中国发达起来,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也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就等于说发达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从词义上是不通的,自相矛盾的。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或者努力使中国成为接近于西方国家那样水平的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邓小平为之努力奋斗的一个崇高的目标。他在1975年时就曾表达过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望,要在本世纪末达到“比较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只是比较接近,要完全同美国、西欧、日本水平一样,恐怕办不到”,要用几十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美国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383页。

的水平。1986年邓小平又再次指出,中国要经过30—50年的努力,使中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邓小平在1987年后还多次说过中国是第三世界中的一员,认为“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并宣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很少说中国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有时候还把中国与第三世界分开来讲。如1989年11月,邓小平说到新的冷战时,没有说西方国家针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而是分开来说,认为西方国家在同时进行两个冷战,“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并指出西方国家经常侵犯贫弱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则不属于此类国家,因为中国敢于与美国作斗争。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显然是把中国列入社会主义国家之列而没有列入第三世界国家。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邓小平曾经把支持第三世界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作为中国外交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1989年3月,还提到过去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但邓小平实际上在1987年后就没有再提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只有前两个部分,在1988年12月和1990年3月,邓小平曾经两次提到中国的对外总政策,却只谈到了和平与发展 and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没有再提第三世界,说明第三世界在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第三,调整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还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有关。

在毛泽东时期,无论在中国与苏联、美国同时交恶时,还是在中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6、17、21页。

《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23页。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24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249、290、352、360、363、344、345、289、281、282、353页。



国与美国调整关系实行一条线战略时,第三世界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都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中国借重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数众多的特点,广泛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建立起与苏联和美国相抗衡的力量体系,强化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后,中国把与大国的关系,即把与美国、苏联、日本、欧洲等的关系放在更重要的全球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相对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下降了,所谓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就是要把中国过分借重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改变为与大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战略,就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中地位上升。其实邓小平在1980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在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很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在1974年关于第三世界的重要讲话也是对他讲的)会见时提出,虽然中国“还是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是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

这一变化也与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战略有关。对外开放当然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方位开放,但其重点是向发达国家开放。中国所有外交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经验、市场大部分都取决于发达国家,中国吸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70%—80%来自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主要是同发达国家进行的。显然,中国必须把对外战略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放在大国之间,而不是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因为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停滞也不能叫社会主义。这种对外战略的调整必然决定了第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51—152页。

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下降。

第四,超越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国际主义的问题。

国际主义也是与意识形态原则相联系的一个理想主义的因素。

现在有许多人说邓小平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笔者认为,与其说邓小平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还不如说邓小平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因为什么是国际主义,容易引起许多误解,对国际主义如何评价也会引起歧义。传统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指两个含义:一是指一个国家的利益应当考虑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一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二是指一国应当为世界的整体利益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中心的时期,国际主义成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借口,成为苏联利己主义、大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种幌子。国际主义的提法让人感觉到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印迹。当然,国际主义也包含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等正确的思想,但国际主义的最大的误点在于把抽象的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要求牺牲一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去满足某种所谓的国际利益。国际主义是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特定目标为出发点的。

在邓小平的外交词汇中,“国际主义”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词,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中,只有几处明确使用过,即在1978年5月,邓小平提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中国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1978年6月在谈到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时说,中国经过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979年10月,邓小平再次谈到,中国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此后,邓小平几乎不再使用国际主义这一词汇,而与此相反,在1978年10月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对外开放这一概念后,“世界”,“国际和国际经验”,尤其是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0、134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

对外开放等与世界主义相连的概念却成为邓小平最经常使用的词汇。邓小平 1981 年在谈到国际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关系时,肯定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但同时却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而不是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受到了国际主义的影响,但主流不是国际主义,而是世界主义。邓小平总是把中国放在世界体系、世界范围中去考虑,把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世界主义外交思想包括四个内容:

第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对把中国孤立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之外,认为中国应当参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它的发展也好,动乱也好,都必将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因此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

第二,中国的外交也要从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尤其中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要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关系世界的事情。例如,在中美关系上,邓小平就始终认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因为“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第三,国家利益与世界主义的统一。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不同就在于,世界主义要求从世界角度来观察问题但不要求牺牲一国的国家利益,不要求以牺牲民族和国家利益去服从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目标。每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都为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邓小平始终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上,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了,也就能为世界做出更多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182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0 页。

的贡献,因此,中国的发展这一国家利益与为世界做贡献是统一的。

第四,社会主义与世界和平的统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同时,也不能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决心,为此要与那些试图进行意识形态战争,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同它们所搞的干扰、制裁、阴谋进行斗争。

邓小平在批评美国有人鼓吹“中国意识形态威胁”的观点时指出,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这不是企图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更不会去搞什么活动来改变别国的社会制度,以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种观点至少不是 80 年代的观点,也不是 70 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 60 年代以前的观点。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意识形态的斗争,不等于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邓小平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 3.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三原则

除了在以上所述的超越理想主义的因素外,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三个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外交原则:

第一,在中国国际地位的定位问题上,提出了中国不要急于争世界大国地位的原则。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较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因此人们容易产生中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世界大国的思想。但邓小平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定位。

邓小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中国虽然落后,但决不要小看自己,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必须要看够,特别是从中国长远的发展前景来看,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邓小平指出,“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 6000 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

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30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11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

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取决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决定于中国的综合国力。邓小平看到,今天的世界仍然处于一个以西方的实力政策求地位的时代。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谈到为什么要对苏联进行军事遏制时,曾经向杜鲁门总统说,苏联人能够接受的只有一个,就是看你有多少个师的兵力,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为了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中国必须有与此相称的足够的实力。当然,这种实力并不是只指军事实力,而是一种综合国力。邓小平指出,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

在中国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邓小平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始终持一种谨慎态度,他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符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

所以与其说中国是个大国,还不如说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指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但总的来说,邓小平认为,就发展水平来说,中国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中国是名副其实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

当许多人在80年代都把中国作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一角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

时,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邓小平不太赞成说中国是大三角中的一角,因为中国的作用和力量虽然在国际事务中也有自己的分量,但是邓小平主张,“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

第二,邓小平的现实外交哲学表现为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敌对、对立、分歧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区分开来,一切外交的活动都围绕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服务。在5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中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思想,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这一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明确地使用了国家利益的概念,他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那么什么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呢?它不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只不过是坚持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手段,并不是中国外交的最高利益之所在。它也不是支持第三世界,支持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105、128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8页。

第三世界的思想主要与反对霸权的战略相联,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主要是为争取中国国家利益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直接体现。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全部,从一个方面说,维护和平是中国实现根本国家利益的一种必需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国家表现,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关心的利益的体现,中国的国家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应当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就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在 1978 年后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中国从 80 年代的第一天起,就必须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这不仅是指国内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且也是指中国的外交要以此为中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反帝反修的革命斗争而进行外交活动。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就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外交外事活动的基本方向,是要为中国建设四化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开创新的外交格局。一心一意搞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让中国发展起来,富强起来,发达起来,这就是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其他的一切都要服务于它。邓小平指出,各项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外交外事工作,都必须要有“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也可以说,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也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30 页;同前书第 2 卷,第 163、248—249 页;同前书第 3 卷,第 23 页。

他鲜明地提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观点。当国家主权面临外来威胁时，中国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当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时，邓小平总是毫不客气地向有关国家指明这一点。1983年2月，邓小平向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指出，美国地方法院对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的缺席审判对中国没有用，“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

国家尊严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爱国者，邓小平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行为极为敏感。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一再表明对外国干涉中国的坚决抵制的态度。邓小平从1979年起就曾一直对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进行严厉的批评，多次指出，“《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了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1989年，邓小平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还向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指出，“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



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国家的统一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还有一个港澳台问题,有一个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保持独立自主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应当在国际地位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能够看别的大国的眼色行事。

核不扩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1982年10月,邓小平与来访的利比亚领导人会谈时,谈起核不扩散问题,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中国的政策是达成协议,逐步减少以至最后消灭核武器,中国有一点核武器是为了更有利于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但“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同超级大国斗争、较量,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同他们较量。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时,又强调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通过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来解决冲突,而不是单方面地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本国利益。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 第三,外交实力论。

邓小平认为,中国外交只有在中国不断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始终把国家的外交建立在真正的实力之上,不讲空话,国家的外交与国家的实力相适应。为此,邓小平认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要根据中国的实力,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处在贫穷状态,要反对霸权主义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49、359页;《邓小平年谱》,第248、250、433、239页。

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外交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对实现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经济不仅是一个国内政治的思想,而且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主义基础。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邓小平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外交中的实力论观点首先源于对中国过去苦难历史的深刻反省,源于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因此他把中国的强大,把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中国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各国真正尊重的国家,使中国在国际上具有与西方大国平等的国际地位,作为他的长远的外交追求。邓小平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实力是一国外交的基础,当一国总体实力较弱时,其外交也必然是无力的。而当一国实力较强时,就有条件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邓小平在回顾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时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

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正因为中国有力量,所以才能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英国对香港仍然有管理权时,给予坚决驳斥,邓小平当时就指出,如果英国方面不合作,根本谈不拢,或香港发生重大变化时,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这只有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才能做到。邓小平指出,“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与中国落后,综合国力不强有关。如果中国人均产值达到 800 美元,虽然这对中国来说还不算什么,但它意味着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达到 1 万亿美元,“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哲学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现实出发处理中国的外交是他的一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式和方法,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现实问题非常复杂,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灵活多变,不断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新的对策,这是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第一个特点。

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乐观主义来源于他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来自于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的追求,尤其与他三上三下的特殊的经历有密切的联系。邓小平曾经对人们说,为什么他能够保持健康,“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在许多问题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乐观主义。在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6、279、237、358、356、85、269 页;同前书第 2 卷,第 237 页;同前书第 3 卷,第 57 页;同前书第 2 卷,第 240 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304—305 页。

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邓小平相信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一定可以避免;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大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集团政治、霸权政治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战争,谁搞霸权主义,最终都得收缩回来。绝对优势也没有用,到头来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正像邓小平经常说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他相信世界的未来,相信人类的未来。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46、353、356页。

## 第二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关于战争、革命、和平、发展的思想

新中国的外交不是一个孤立国家的外交,它首先与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的总趋势的分析和认识紧密相关。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战争即将临近,那么反对战争和准备打仗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就是如何避免和防止战争;而如果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主要和现实的危险,那么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和建设国家就成为第一位的任务。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和平外交战略的大师,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争取中国的和平环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正是在如何判断世界总趋势的发展方面,邓小平根据后来发生的变化,在继承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的同时,又大大地修正了毛泽东的外交总战略,把建设国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一切工作的总任务和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总战略。

### 一、毛泽东的时代观: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

毛泽东总是基于对当时的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他对时代的认识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毛泽东一生中总是对世界时局极为关注。

早在 1941 年 6 月中旬,我党做国际情报工作的同志从几个渠道获得德国即将发动对苏战争的消息。6 月 16 日,收到这一情报的周恩来同志在一封电报中告诉毛主席,国民党政府内部传说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定在 6 月 21 日。党中央立即把这一情报电告斯大林。当时,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会立即发生,所以苏德战争爆发时,延安的人包括毛主席,和全世界一样感到突然和震惊。当时,党中央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毛主席也为苏德战争写过一篇社论《苏必胜,德必

败》，可以看出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毛泽东认为，苏德战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6月26日，由毛泽东修改过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说，“今天的战争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7月12日，毛主席又专门写了一个指示，说，“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硝烟和革命激情的时代，也是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和平建设的年代。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时代浪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一个新的矛盾：那个年代，到底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年代？如果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那么要一心一意进行和平建设就是不可能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准备战争和推动革命方面；如果是战争打不起来，就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平建设，外交上致力于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两种判断是很不同的。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两种思想是交替出现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主旋律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来，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的主调都是有变化的。

### 1. 第一个时期：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毛泽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战争，战争引起的结果将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末日来临，那也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之日。这一观点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的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

这种比较乐观的观点在1938年有过较完整的表述。毛泽东在当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目前开始了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

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在毛泽东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由于战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战线可能有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所以,“目前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 2. 第二个时期:战争危险与和平建设并存的年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60 年代中期,是局部战争不断,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时期,是革命形势不断成熟的时期,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紧进行建设,并有可能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超过帝国主义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争危险始终存在,但不会真正发生世界大战,这一时期是战争与和平建设并存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东欧出现了新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也有很大发展,但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那种帝国主义总崩溃的局面。战争削弱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同时又造就了一个新的世界强国,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两个世界阵营的对立和对峙。两个阵营保持高强度的军事对

抗,但世界性的最后决战不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就是冷战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可以说是最早看到这一特点的政治家。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两者结合形成的洞察力,使他在观察问题的时候比较其他的政治家更容易看到战后世界形势的本质。早在1945年10月,当毛泽东回答“是不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时就指出:“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历来都是由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而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空前强大的局面,这就迫使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而且一定会与社会主义国家达成某种妥协,所以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1948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局势时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另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不致爆发战争。毛泽东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世界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帝国主义就更不敢发动战争了。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开始就与美国处于严重的军事对抗状态,还在朝鲜半岛与美国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军事较量,但毛泽东对世界总局势的分析没有发生变化,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它不可能真正发生,世界人民有力量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1950年6月,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对世界和平较为乐观,因此,在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和平建设的讲话。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



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毛泽东希望,能与西方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一起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以保证几十年不打仗。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后来,毛泽东又几次讲,中国最好能有一段和平的时间,“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至少要争取到十五年时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这一年,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裁军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和建议。他对英国客人说:希望美国“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让我们大家统统解除武装,我们自己的几个兵也都不要了。让我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倡议一下,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毛泽东希望,能以“和平为上”,东西方国家能避免战争。“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

毛泽东认为,战争从政治上来看,对美国不一定有利,他指出:“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这“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整个世界或世界的绝大部分将处于革命状态。……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9—10、30—31、53、70、136、160、161、173、206页。

小”。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对和平较为乐观，还与毛泽东经常用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有关。他认为，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另外，从军事力量的聚集来看，美国似乎也没有真的要打仗的样子。“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无法打仗。看样子美国现在是想霸占些地方，不一定就会打起仗来”。

毛泽东认为，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和平友好是基本的”，战争、和平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打不起来的可能性大。

这样，一方面，战争危险存在，另一方面，战争打不起来，毛泽东把中国对战争的立场确定为两条，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为什么反对？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

但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那么中国也要奉陪。之所以不怕，是因为，第一，怕也没有用，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也没有办法，怕也不行，怕也要挨打，不怕也要挨打，不如不怕。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不如）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第二，不怕是因为，真的打起来，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力量不一定就不如美国，毛泽东指出，“但是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不要打，它打来，那末便要扫它几下。在亚、非、欧，扫它是有把握的。如果打起来，三个洲都会变成一个腔调。因为我们有力量，对帝国主义我们并不怕。……（我们）准备打他几年，把战争从三个洲的土地上扫出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第三，不怕是因为，真的打起来，中国当然

会受到严重损失,但其最后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这)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

基于这样的立场,毛泽东有时也把准备反侵略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在1958年指出:中国现在要“准备反侵略的战争。……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

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在战争危险存在的情况下,要把立足点放在抓紧时间进行国内建设上,只有建设搞好了,实力提高了,才更有可能阻止战争。而把力量用于准备战争,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 3. 第三个时期:战争与革命思想的“复归”

这十多年中,毛泽东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和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政治向“左”倾斜,毛泽东把主要精力从过去搞经济,转为抓阶级斗争,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来引发“文化大革命”。而国内的“左”倾路线也对外交思想有重大影响,表现为从过去主张和平共处,发展到后期的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放在重要地位上,期望中国的新革命能引发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二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是中苏关系紧张,后来又发展为军事武装对抗,60年代末期发生了边境战争和流血冲突。这使过去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思想更为发展,过去战争危险并不是迫在眉睫,而现在有了新的紧迫感,来自北方的威胁与一直存在的战争威胁,使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因此,毛泽东希望有一个新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6、162、213、170、207、171、205、224、347、206、211、347页。

的世界革命的高潮来缓解对中国的战争压力和威胁。这样,在这一时期,革命与战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问题,战争一定会打起来,各国革命者通过革命来制止战争的战略成为毛泽东的主导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变化还与当时越南战争的扩大有关。1965年3月,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并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1965年5月3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发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上,有一篇题为《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的文章,说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现在,是否要把轰炸扩大到海防、河内,有争议。这表明,美国政府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注说,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1965年1月,斯诺见到毛主席时,曾问:“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毛泽东回答说,中国革命最后的安全这点很难讲,中国实际上不安全,因为美国和苏联都没有真正裁军,但毛泽东没有否认斯诺提出的问题。

1965年后,毛泽东与外国客人谈话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所以他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支持越南人民进行的反美斗争,鼓励日本青年起来进行斗争,影响日本广大的群众和其他阶层,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赞扬在二千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号召所有国家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并认为“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81页。

新时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主席希尔时说，“请你考虑一下，世界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在1969年4月，毛泽东又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毛泽东1970年5月发表的著名的五二零声明，标志着毛泽东这一个外交思想的完成。他在声明中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各国人民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毛泽东还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时，再次重申了战争将会爆发的观点。当年，来华访问的布迈丁问及美苏协议与战争问题，毛主席说，协议有可能，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它是一时的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世界战争，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5、577、579、563、567、570、574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4—586页。

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打不打原子战,可能打,也可能不打。

毛泽东还讲了朱元璋的故事,说朱元璋召见朱升,问他当时形势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同意,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学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时说,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他们没有一个真正裁军的,因为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和平长久不可能,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正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越到晚年,毛泽东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也越成形。

他在1974年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则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泽东在1976年2月23日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也重申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他说:“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

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在认定战争将会马上发生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中国制定了革命外交战略。它的基本内容就在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延缓战争的爆发,或通过革命来制止战争,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有这种含义。它的实质在于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同时,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独立主权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缓解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压力。

在这一时期,支持革命斗争成了毛泽东外交的主导思想,主要是出于三个考虑,一是希望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能够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减少对中国的压力;二是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和平;三是从力量对比出发。过去不怕美国发动反华战争,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而现在苏联不但不可靠,反而成了中国的另一个主要的敌人,到1969年以后甚至成了最主要的敌人,使中国对抗美国侵略战争的力量大大削弱。虽然,过去中国不怕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可能进行的侵犯,但现在毛泽东实际上担心的是中国同时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因此,在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考虑中,这一时期是把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因素来看待的。

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这一做法,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恶化了与有关国家的合法政府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还出现了输出革命的做法,在各种涉外场合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模式,给中国外交带来危害。毛泽东后来在1968年对输出中国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一些修正的意见,如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认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80、331、383、417—418、524页。

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说:“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但这些没有能够消除这种错误做法的根源。

在思想方法上,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外交思想也较多地受到了他自己革命经历的影响,实际上是把过去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战争、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和策略运用于外交领域,把广大的第三世界作为“农村”和“广大群众”,把这些国家所处的广大的地区作为中国外交安全迂回的外交战略空间,用军事战略的构思来进行外交斗争。

同时,由于感到战争的危險更加迫近更为现实,所以毛泽东在国内又把大规模的备战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远远高出了前一时期作为遏制对中国的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最主要方法和手段的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实力的任务。他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他甚至还劝法国人也搞一点“民防那一套”。

1965年4月,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起草了有关加强战备的中央文件,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绝不能不理,准备随时与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还要准备对付把战争引到中国国土上来,所以要加强战备。要估计敌人可能冒险。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对付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础,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国的土地上作战。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中、大打,都要做好准备。4月14日,这个指示以中发65208号文件的形式下发。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全面进行了战备工作,各地大建防空洞和各种备战设施,对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一个重大失误。

从7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对这一战略进行修正,避免两线受敌,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7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9页。



而且也改正了因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与各国政府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形,与各国当权者开始进行更多的接触,并得出一个结论,即要解决问题,光靠人民战争不行,还要靠各国的统治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了与美国政府的接触。这意味着毛泽东放弃通过广泛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来改善中国国际安全的做法,改为更为正规的外交斗争和外交方法。

## 二、周恩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 1. 对战争危险的分析

周恩来在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分析上,总的来说是受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但也表现出自己分析的独特性。

1950年3月,周恩来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作了判断,得出了战争打不起来,人民有力量制止战争的结论。他指出,“战争究竟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呢?今天的世界形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对比。八万万人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在帝国主义一边,“美帝国主义最希望的是别的国家替它打。但是,今天的欧洲人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欧洲是工业发达地区,打烂了不容易恢复。……在东方,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要控制日本。”但日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至于美国本国的人民,也不想打仗,“要本国人民打先锋,这就要危害美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因为从美国人民来说,打仗将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大量财产遭受损失,这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怕战争,都主张为了和平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以制止侵略战争,但两人的思想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毛泽东在反对战争时,更多的是表现在从战略上对战争的藐视,甚至极而言之,从最坏处着想,认为即使是核战争也不能毁灭人类。这种说法只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3页。

是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周恩来则认为，必须高度重视战争可能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所以必须尽量避免战争。周恩来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要侵犯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出来打大战，准备核战争呢？如果爆发核战争，将无前后方的区别，双方都将遭受损失，几十年的建设将遭到破坏。这一点，美国人民以及不少资本家甚至垄断资本家都是了解的，都认为核战争是一种冒险。因为资本家第一需要劳动力，第二需要市场，如果打起核战争，人口损失一半，市场也因之缩小一半，资本家将失去剥削的对象，无从再获取巨额利润”。

周恩来把高举和平的旗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他指出，“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和平更贵重的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应该支持和平中立地区的扩大，因为这个圈子扩大了，战争就不容易打起来。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我们的回答是，要和平，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搞对立的军事集团”。

周恩来对北约进行了抨击，因为它是一个排斥性的有针对性的军事集团，而“和平是集体的事情，不应该排斥任何人”。

1957年初，周恩来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和平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战争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孤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可以争取得到的。

对于帝国主义的战略意向，周恩来也认为要有正确分析。1961年9月，他根据毛泽东50年代初的一个讲话的观点，在分析当时的世界局势时认为，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的一个基本道理，还在于从军事战略来看，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还是处于战略防御状态，无论是马尼拉条约，中央条约组织，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防御性质的，当然，说它们是防御性，不排除它们可能冒险。

关于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观点，周恩来的看法与毛泽东

---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06页。

《周恩来传》，第304页。

的也是有所不同的。1970年5月,毛泽东发表声明,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时却指出,虽然25年来局部战争不断,但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原因之一的确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一场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害怕打。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夺核优势,越争取开支就越大”。周恩来分析说,战争扩大不一定是世界大战,原因是大国不敢发动核战争。与毛泽东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要用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不同的另一个地方是,周恩来强调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并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对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周恩来也作了较缓和的解释,他说革命不一定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战争,夺取政权,更主要的是民族独立运动,如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甚至捍卫二百海里领海线捕鱼权的斗争,也具有革命的意义,而且是更主要的。因此,周恩来的结论也是与毛泽东大不同的,毛泽东强调世界形势的紧张,而周恩来则认为,“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

## 2. 关于世界和平力量能够防止核战争的思想

周恩来对核战争的恐怖也有极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认为要正视核武器带给人类的巨大危险,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类防止和制止核战争的能力和智慧,没有必要对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也没有必要为人类的前途过分悲观。1963年7月,周恩来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秘书匈曼和普特尔就核战争与人类的前途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匈曼向周恩来转交了罗素的新书《非武装的胜利》,并说,这本书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以来,人类就尽一切力量做愚蠢的事,最后有核爆炸,表示人类将以此告终。周恩来说,太悲观了,我看人类历史不会走这样的路。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道路。我们看来,人类历史会前进,人类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并且还会得到更大的范围的发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51、152、224、318、465—466、467—468页。

展。

匈曼认为,人们很担心的是,核战争很可能会被雷达的错误情报所引起,因为雷达是分辨不出敌视和自然现象的。人们必须在1分钟至15分钟内作出决定。同时,国际局势也很紧张,国家领导人可能经不住这样的紧张,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可能引起核战争。

周恩来不同意,说人们在偶然现象损害力小时,注意力就小,但知道偶然现象的损害力大时,注意力就大。人们现在知道核战争的毁灭性,对它的保险和防御就要注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知道核武器会伤人,也会伤自己,所以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同意不用核武器,我们认为,拥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破坏力,就会找预防的办法。世界科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的,一种新武器发明了,就会有一种更新的东西来保证它不出乱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拥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危害性,最后就可以达成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这些思想反映出周恩来对人类的理智和社会进步抱有坚定的信念。

周恩来对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在国内建设的思路有所不同。周恩来在1956年时就提出,要以今后主要是和平时代为依据来安排国内的经济建设,要减少国防工业的比重。周恩来认为,战争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一种较次要的可能性,因此他“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允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如果“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

### 三、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64—365页。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 1.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有许多战略思想,“中国同任何国家关系都是从战略出发的”。但这些战略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有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区分。

外交总战略或全球战略,是邓小平战略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最具有全球性质的长期和基本的战略。

那么,什么是邓小平的外交总战略和全球战略?邓小平曾经有不同的表述。

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首先把中美两国关系这样的政治问题视为全球战略。他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所谓政治问题,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这里邓小平明确地使用了全球战略这一概念。什么是全球战略?这还取决于对当时的主要大国的全球战略的分析。到80年代初,苏联的进攻咄咄逼人,所以邓小平首先指出,苏联有一个争霸全球的世界战略,认定“苏联要争霸全球的长远战略目标是既定的、决不会放弃的。它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一有机会,就可以马上下来。对苏联的长远战略目标,大家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挫败它的争霸世界的战略部署”。针对这样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把团结一切力量反对苏联的争霸战略作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全球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从全球战略出发,不但提倡欧洲和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加强协调行动,而且主张日本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历来对美国人也说,对日本人也说,日本应该第一是同美国的关系,第二是同中国的关系,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又说,“中国总是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个全球战略出发考虑问题的。中国同东盟、同日本、同美国和西欧发展关系,都是从这个全球战略出发的”。

---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2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8、222、234、235页。

邓小平也常用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概念来代替中国的外交总战略或全球战略这样的概念。但不同时期,邓小平所指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容是不同的。如1980年5月12日,邓小平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三句话: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5月29日又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针对霸权主义,力求日中美欧第三世界联合;10月17日邓小平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概括为中国的对外政策,这里的对外政策,就有中国的全球战略的含义。邓小平后来又在多处表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同内容。

(1) 1982年8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1989年时邓小平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邓小平在1984年时也曾把这三句话合成两句:一、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将来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这些表述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作为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2) 邓小平在1984—1986年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表述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 邓小平的第三种表述是在1985年提出的,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

(4) 第四种表述是邓小平在1986—1987年时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5) 1990年3月,邓小平对此又提出了新概括:“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27、228、233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

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在所有这些表述中,虽然都有强调和平的共同点,但又各有侧重,反映了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的变化。总起来说,笔者认为邓小平最后一种表述更为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的外交总战略的性质。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在一起。所以,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它们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具有纲领性质,是总政策,基本政策,在中国当代的外交战略体系中,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将处于支配、制约其他战略的地位,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中国的外交走向,其他战略不论如何变化,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首先要根据对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来制定。如果认为国际形势处于战争时代,随时可能发生大的战争,特别是会发生针对本国的战争,那么很显然,进行战争准备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和竞争的时代,如果判断资本主义将很快灭亡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那么很显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任务就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并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的到来作准备。对大形势和大趋势的判断失误,会对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重大的灾难性影响。因此,对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判断,历来是外交战略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在 1978 年之前,人们关于时代的特征受到了传统的时代观的深刻影响,这一时代观的主要内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它是腐朽的、没落的、行将灭亡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另外,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和最大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世界各国人民起来进行革命。简言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9、56、105、116、126、156、105、156、162、233、353 页。

但实际上,这种时代观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是不完全符合的。资本主义虽然面临种种危机,但仍然在继续发展,新的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相反,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面临着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任务,不存在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形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同时,在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前景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相互妥协的一面,世界战争难以打起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观。它是对当代世界局势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邓小平早在 1982 年 10 月就使用了“南北问题”这一概念,把发展——南北问题与和平——东西问题并列,这一观察问题的视野是过去没有过的,它超越了过去把战争与和平看得最为重要的观念。

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对此问题的表述是有变化的。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用和平问题与南北问题来概括世界形势,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邓小平认为,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南北问题,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极其重大,这是世界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邓小平在 1985 年 3 月又以和平与发展的提法代替了和平与南北问题的提法。他指出,看问题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政治角度,就是和平与战争问题,一个经济角度,就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把它们叫做世界上带有全球性战略问题,并且总结到: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其中,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指出,“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1990 年 3 月,邓小平在讲到国际形势问题时再次指出,和平与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56、96 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82 页。



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 2. 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

邓小平的和平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三个意义:

第一,邓小平的和平概念是指对世界形势发展大趋势的基本判断。作为形势判断意义上的和平概念,着眼于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导致的国际战争与和平的变化。邓小平所说的和平是针对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提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在和平环境中,世界各国有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而各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增强和平的物质基础。和平环境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新的趋势,所有国家都希望发展,许多国家的发展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大增强,同时也大大改变了过去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关系,使世界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的重大变化。对世界形势大趋势的判断是和平还是战争,这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前提,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执行什么样的国策:是准备战争,反击外国的侵略,还是立足于战争可以避免,立足于加强国防,但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平建设。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对外战略。

第二,邓小平的和平概念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对外战略,即将维护和平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和长期的任务。和平既是一种大趋势,又是中国要争取的一个战略目标,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作为和平战略的和平,着眼于“维护”两字,它的主要内容是要以把握世界各国的和平与战争的力量对比为基础,争取和扩大和平力量,反对和防范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和平战略要求分清哪些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哪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哪些是阻碍和平的主要力量。和平战略还要求确定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目标。

第三,邓小平的和平概念也是中国外交的始终如一的和永远的目标,是一种理想,它最终要体现在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上。

和平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和平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要求和平。邓小平在 1986 年指出,发展与和平是互相关联的,第三世界越发展,和平就越有希望,反过来说,只有保持一种国际和平环境,才能赢得国家的发展,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建设国家,二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邓小平又指出,“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中国的政策……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主要任务”。

可见,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和平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支撑邓小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柱。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是在超越过去的和平与战争的主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邓小平又是什么样的考虑呢?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准确判断并科学考察和分析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基础上的。

讲和平与战争,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也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邓小平最初提出“和平问题”是从核战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着眼的。邓小平认为,“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但邓小平更多更主要的是从常规战争角度来谈和平问题的。

70 年代末期以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受到毛泽东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观点的影响。虽然毛泽东也认为世界战争不一定打得起来,世界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可以阻止战争,但在指导中国外交和国内建设时,却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备战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322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86—387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250 页;同前书第 2 卷,第 77—78、241 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邓小平在1977年指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希望战争晚一点来,我们总要准备它早来,来凶的,准备它早打,大打。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分析国际形势时还认为,苏联全球战略没有准备好,美国处于防守状态,所以世界战争可以延缓爆发,可以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但仗总有一天要打起来。

1978年后,邓小平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了新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结论。

邓小平认为,战争的危險虽然存在,但不能说有多么严重。80年代初期前,邓小平的思想是:战争不可避免,但通过各国人民的努力是可以延缓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是可能的。邓小平认为,虽然国际形势很复杂,非常动荡,充满危机,但延缓战争,争取和平时间更长一点,这是可能的。这一观点还多少受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但邓小平的分析也与毛泽东的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毛泽东的分析把战争危险看成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危险,主要是从反对战争的力量的发展来讲阻止战争的爆发的,主要是从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在高涨,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已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来看问题的。

而邓小平的分析侧重于两个方面,除了毛泽东所讲的那一方面的因素外,邓小平还从谁能发动世界战争的角度来分析。他认为,只有美国、苏联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但这两个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谁也没有准备好,它们的全球战争部署都没有到位,所以世界大战的危险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而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再有,毛泽东的战争打不起来是建立在各国人民反战的基础上,同时他也要求中国采取实际的备战措施。但邓小平认为,战争既然没有现实危险,就可以不进行大规模的备战,中国可以减少军费开支。1980年3月,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邓小平在1982年8月表示,中国必须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至少20年不打仗,希望最好有50—70年的和平时间。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9、161页。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思想开始转变,但不稳定的,不时出现反复。1981年9月,邓小平在检阅部队时的一段讲话表明,邓小平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思维。在他看来,战争威胁还是严重的,因为超级大国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和我国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邓小平看来,战争的因素还在增长,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中国要防备有人把战争强加于中国。

从1984年11月起,邓小平的思想就开始变为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和平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因素,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泽东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把他自己对世界形势所作的新判断作了一个总结,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

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到1989年,形势更加明朗,邓小平也因此进一步认为,“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邓小平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和结论,为中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提供了正确的依据。它首先导致中国扭转了过去实行的半军事经济体制的战略,使国内经济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其次,中国在1985年6月宣布裁军100万,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实行和平外交的决心。

总结起来,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思想,是基于四点考虑:第一,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打世界大战,但这两个超级大国谁也没有部署好,战争没有现实威胁;第二,现代战争是核战争,它可以使双方同时毁灭,没有胜利者,美国和苏联都相互拥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谁也不会先动手。第三,世界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反对战争的力量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加。反对战争的,不仅有中国,第三世界各国,还包括欧洲和日本,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让世界各国都面临压力,要求把发展经济和科技放在首位,准备战争和发展军事与这一大趋势不符合,也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就国际形势方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关于正确对待和平演变问题。这个问题与战争问题一样,也是事关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的一个大前提:如果把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看成是一个很现实和很危险的问题,那么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一个样;而如果认为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的问题,那么采取的对策又是另一个样。

和平演变是一个早就提出的问題,毛泽东时代就已多次讲过。

毛泽东为反对和平演变,防止中国变修,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路,使中国经历了一场大灾难。所以,中国在新的时期里如何看待和平演变问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的基本走向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时,对和平演变也是高度重视的,甚至一度有失望情绪。邓小平在1989年11月与尼雷尔会谈时指出,“美苏双方会谈,裁军的势头不错,我们表示欢迎。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邓小平把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看得较为严重,把它作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基本态势。

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没有改变过去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他认为,不管西方国家是否进行针对中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针对中国进行新的和平演变的攻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能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不能变。邓小平告诉外国客人说,“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这一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第二,和平与战争的核心问题是反对霸权主义。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过的观点,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资格,别人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在于搞霸权主义的国家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不仅世界大战的主要威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且许多地区战争、局部战争也是源于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些地区的争夺。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

在过去,霸权主义表现为对弱小国家的直接干涉和控制,但在新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为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并以人权为借口,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试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国家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所以,正如过去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侵略控制一样,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新的霸权主义行为,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论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面对西方的压力,中国要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

以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是新时期西方国家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新形式,其实质和过去一样,也是“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西方国家以人权损害别国的国权,就是对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一种损害。“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

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所以“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为了维护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第三,中国要和平但并不怕霸权国家的战争威胁,为了和平必须进行裁军。

邓小平早在1964年就曾指出,世界上有些人说我们好战,是好战分子,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有和平的环境来改善我们的国家面貌,在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要花几十年时间,既然我们面临这样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和平不是更好吗?当然我们中国人民有这样一点,谁要是用战争来威胁我们,我们不怕。美国就一直用战争来威胁我们,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原子弹是吓人的,但总拿它来吓人,是吓不倒人的。1973年在与英国客人会谈时,邓小平又指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来自北方,这个历史很长,苏联把百万大军放到我们的边界上,我们并不怕,中国对于来自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的态度是两条,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和加强自己的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

由于对战争形势的判断的变化,邓小平在裁军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

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苏美的裁军和缓和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不彻底,欺骗性很大。在苏联和美国没有进行彻底的核裁军以前,邓小平对建设无核区并不持太肯定的态度。1975年邓小平在重申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主张各国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立场后,表示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不如中国的两条,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反对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344—345、348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20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7、75、159页。



美国和苏联继续搞军备竞赛上面。对于苏联主张的欧安会,邓小平认为赫尔辛基协议只是达成纸面协议,其真正作用在于掩盖苏联扩军备战,欺骗世界和欧洲人民,达到分化和控制欧洲国家的目的。到1985年,邓小平对美国苏联裁军开始持较积极的立场,认为美苏就裁军达成协议,可以起到缓和的作用,改变了过去所持的态度。在谈到美苏首脑会谈时,邓小平也表示欢迎,虽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认为减少一些核武器总是好的,当然最好是两家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这才能让世界人民放心。

在对和平与战争的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后,邓小平下定决心,作出了中国也要裁军的决策,在1985年6月4日宣布中国裁军100万,表明中国不参与军备竞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 3. 关于“发展”的概念

与和平的概念一样,“发展”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的发展概念包括三层含义:发展是一种世界大趋势;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既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独立发展的问题,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发展也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首先,发展是与和平密不可分的世界形势的大趋势。

说发展是二战后出现的世界大趋势,有一个问题与此相连,就是过去人类世界也有发展,能不能用发展两字来概括过去的世界的大趋势?这里涉及到现在的发展与过去的发展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二战后的发展大趋势与过去人类世界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发展的主要不同在于,第一,动力不同。二战后的发展是以新科技浪潮为动力的,尽管过去人类世界也有过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但无论从其深度还是广度,以及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上,它们都不能与今天的世界性新科技浪潮相比。第二,现在的发展是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的大趋势,把世界所有各国都卷进去了,而过去的发展主要是地区性的,主要在欧洲和亚非拉的个别国家。第三,过去的发展导致两个结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2、143、145、299、306页。

果,一个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富,而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却越来越贫穷,另一个结果是,过去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军事力量的发展超过经济力量的发展,在一些强国之间和另一些强国之间不断产生战争,并由此引发了两次人类的大灾难。所以,在过去,人们谈到发展时,总会想起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现象,而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并超过过去的发达国家和强国时,就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新的冲突,那时战争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因此,发展与战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邓小平不强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与战争的联系,而强调发展就一定会减少战争的危险?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用另一种新的思维来看问题。邓小平认为,第一,所有国家都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失去优势,就会变成落后。这会使所有国家都来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外政策,并把和平放在首位,其中也包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经济发展将会超过军备竞赛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这样,“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第二,发展的趋势对第三世界和欧洲、中国有利。发展的趋势将会减少美国 and 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而中国、欧洲、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增强,“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所以,只是到了二战后,发展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时才显得更为明显,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逐渐都把发展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其次,邓小平的发展概念还涉及怎样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的分析包括四个层面：

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的问題。原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继续发展,这就有一个资本找出路,贸易找市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发展总是要受限制的。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南北关系问题。发达国家要解决继续发展的问題,就必须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二种,富国越富,贫国越贫,解决这一个两极分化是国际社会一个重大问题,但解决起来也难。要富国多拿出钱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南北问题的表面现象是南北贫富悬殊太大,但它的实质却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邓小平认为,南北关系的实质问题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的问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个关系使得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发达国家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所以邓小平认为,在解决南北问题上,“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应当的。但要做到这点不容易,因为人越富,越吝啬,要他让一点,他不肯。

但要实现发展又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因为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发展中国家占了四分之三,前者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后者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而且,在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下,发展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不大容易,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邓小平的观点是:“第三世界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

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讲了多年的南北问题,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并且越来越大,邓小平对此经常感到很担心,因此多次把这个问题作为发展的重点来讲。他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在谈到南北合作时,邓小平也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与西方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合作的同时又必须进行斗争,“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与北方国家合作和与北方国家斗争,这两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不能偏向哪一个方面。

第三个层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要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能把希望完全放在发达国家身上,“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邓小平认为,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邓小平指出,“要发展自己就需要加强相互谅解和相互合作。对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惟一的出路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8、28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20、56、106页。

.....我们发现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我们相互变成对方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在很多方面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彼此都有好处。甚至在技术方面,也不能说我们全都落后,我们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时,还必须注意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要注意发展的实际效果。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政策。只要政策符合实际情况,经济发展就可以快一些”,但经济发展也可以不那么急,“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调整经济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

此外,邓小平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科技力量要发展,“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钱就要花。.....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发展的第四个层面是南南合作,也就是发展中国家要进行集体自力更生。邓小平在1982年时曾高度赞扬南南合作这一提法,认为这是个新提法,“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因为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这是两条腿走路。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但同时也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国家的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邓小平认为,过去南南国家都是落后的,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得较好,因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特别是60—80年代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1、238、346、387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以来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发展,有东西可以交流合作。这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

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减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邓小平特别提到,像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进行合作:“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1、211—212、215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3—184、20、56、282页。

## 第三章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新中国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重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和更加和平的世界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多极化的思想,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不断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 1. 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四项原则到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党,制定处理对外事务和对外关系原则的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对外事务和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利益原则高于一切,国家利益甚至也高于党的原则,不能从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毛泽东在 1936 年 7 月 23 日与斯诺谈话时,第一次谈到了党与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同和区别,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活动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外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但又带有外交的性质,正如 1944 年 8 月 18 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外交工

---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 561 页。

作的文件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外交往来还须经过它的承认,而国民政府是不愿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力争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禁令和约束,争取开展独立的外交。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都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办外交要首先站稳民族立场。

1945年,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由此提出了独立、平等、互利等原则。

1949年1月,毛泽东又把不干涉内政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原则提了出来。他指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949年4月,在英国军舰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把前面提到的三个原则,作为新中国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三个原则,“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包含有和平共处原则思想萌芽的讲话。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新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6页。



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但这里指的是与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还未提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在1954年8月,这是在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毛泽东在回答英国工党代表团提出的中国与西方国家能否和平共处的问题时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稍后,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把这一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基本准则。这首先是指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其次是指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平共处。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国家,是否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指出,这一时期,这个所有国家实际上不包括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及阵营的关系还是一种特殊关系,意识形态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957年9月,毛泽东还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分为三层,“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显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了,因为毛泽东在谈到五项原则之中的平等互利时,深有感触地提到了过去的经验和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9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0—16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8页。

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这里显然是有所指的。

平等互利这条原则,毛泽东认为它首先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国家大小只是形式”。要做到大小国地位平等,大国应当采取主动,对“小国的地位也应尊重”,应把小国的代表团“当作大国的使者来欢迎”。在毛泽东看来,大国小国都只是相对的,大国往往是由许多小国组织成的,中国在古代就是由一万个左右的小国组成,后来变成八百个小国,以后又变成七个小国,最后才统一成大国,中国在柬埔寨老挝等国面前是个大国,而在美国苏联面前,“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日本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

毛泽东还对什么是不干涉内政作了解释。“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1—19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4、521页。

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在与老挝客人会见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里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

互不干涉内政也包括不对外输出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

毛泽东还将邀请外国政府派军队和专家来本国,与干涉内政作了原则区分。他认为,“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

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应该长期实行的外交方针和原则,不是权宜之计。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他还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6—187页。

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

## 2. 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发展

周恩来不仅协助毛泽东提出和创立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在这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巨大的贡献。

1950年2月,周恩来在与苏联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就提出了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的思想,并在条约中第5条体现出来。这一条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就西藏问题进行会谈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后来写进了中印与中緬的联合声明中,这一提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和认可,逐渐形成为新中国指导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周恩来对制定这一原则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国庆讲话中,又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后来,周恩来又在实践中深化了和平共处原则的内涵。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前四条,是基本的准则,和平共处是这四条原则实现的结果,也是这四条原则要争取实现的一个目标。只有实现前四条才能有和平共处。什么是和平共处?周恩来解释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事实。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可以和平共处。譬如英国有国王,这是英国人的事,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的事,英国也不应干涉。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社会制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6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3页。

度不同并不妨碍和平共处。

对于不干涉内政,周恩来也有过一些解释,他说,这种不干涉内政,不仅是指别国日常的事务不应干涉,而且包括这个国家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譬如发生政权更迭,只要没有外国干涉,那么在中国看来,这就是属于内政的范围,外国不应进行干涉。他指出,对别国政权的更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选举组成新的政府,另一种是武装政变,只要不是外国干涉,不管我们同过去政府的关系怎样,也只能尊重他们本国的行动,所以即使是武装政变,我们也都不能干涉它们的内政。

平等相处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要平等地同中小国家打交道。1971年12月,周恩来对挪威大使说,我们准备在瑞典办博览会,原来不准备去挪威,后来挪威提意见,要求也去挪威办展览,我们就接受了,并且对挪威大使说,“凡是合理的事情,不管哪一个国家提出来的,我们都接受,这才叫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然叫什么平等!国与国之间应该平等相处,这样才可以互相商量,交换意见,以为只有一方的意见对,另一方的意见是错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互相交换意见,才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才能在国际创造出一些好的气氛,否则,只是一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是要不得的”。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不仅把五项原则用于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且还逐渐地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要求苏联用五项原则精神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不断坚持下,苏联逐渐也接受了一些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在1957年3月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中,团结和互助一向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但是,正由于这种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还缺乏充分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中还不能说一切都是完满的,正常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的大国主义倾向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都曾经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解。现在,这些缺点和错误正在克服当中。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宣言,表示要根据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69、465、616页。

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项原则,发展和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声明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主要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尤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主张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我们知道,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就意味着这些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和平竞赛。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敢于进行这种和平竞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向外扩张,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主张由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愿意同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保证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它提出了正确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问题,这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中国与自己周边的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能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它不仅着眼于维护不同国家之间的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为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交流提供了原则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独立国家搞好关系是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一个重大发展,但它更重要的内涵在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吸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引进技术等有很重要的意义。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共处,则是周恩来对这一思想的直接的具体的贡献。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95页;苏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初探》,《研究周恩来》,第157—169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97页。

2.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五项原则是周恩来的又一重大的理论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适用五项基本原则,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五项原则与国际主义准则是一个什么关系。周恩来对此提出了这两条原则并行,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的双重基础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它们的关系是以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但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以独立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这一观点对当时存在的国际主义准则高于一切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一直被视为神圣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似乎都只能是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曾经说过,对无产阶级来说,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经常发生一些国家借口国际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事情,使得这些国家不能按照自己国家的国情和特点来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在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适用双重基础原则的时候,也指出了过去曾经有过的错误,就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忽略民族平等原则的沙文主义的错误。

双重基础的意义还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活动分成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部分。一部分基于意识形态,即国际主义,也就是说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思考问题,执政党在这一方面起重要作用;另一个部分则基于国家利益、国家关系,即从各个民族具有特殊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国家政权在这一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在这两个部分中,周恩来的五项原则更侧重于国家关系,包含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所区分,不能以意识形态代替国家利益的思想。

1954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团会见时又进一

步提出,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开的思想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适合于不同国家的政党之间。周恩来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我们应该把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确有许多分歧。在这一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否则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了。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

因此,周恩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要考虑国际主义,也要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平等,要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应当指出,在谈到周恩来关于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来认识。必须承认无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虽然也主张平等、互利等原则,但实际上还是比较强调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等原则的,甚至可以说是把这些原则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的。如周恩来在1961年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指出,维护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兄弟国家之间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这里,周恩来是把国际主义、团结等原则放在最前面的。

3. 五项原则对于反对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五项原则的提出,最初并没有反对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含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但越到后来,越具有反对大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意义。

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特征就是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对广大中小国家、弱小国家进行侵略、欺负和干涉。而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它要求国家不分大小,不论贫富,不论意识形态,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大国不能把自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81、325页。



己的意志强加于小国,必须尊重小国弱国的主权。只有独立,才能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共处,这也是建立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社会必备的条件。五项原则在经济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内容主要是体现于主张国与国的经济关系应该以互利为基础,应该以国家的经济主权独立为基础,不能以援助为名对中小国家和贫穷国家进行控制,不能以此要求特权,也不能以此作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五项原则不仅是对外国的,而且首先是对中国自己而言的。周恩来一再声明,中国的外交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办事,不容许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周恩来曾经指出,各国的事情各国都有自己的办法,不能把别国的办法强加于一国身上。中国有中国的办法,日本可能有日本的办法。这要由自己国家的人民来决定,别的国家不能干涉。中国有一句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愿意别人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干涉别人。

正如钱其琛同志指出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70年代末,已经有90个国家在同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和苏联实际上也承认这些原则,并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与我国改善和发展关系。

## 二、世界多极化思想的萌芽与毛泽东的世界大战略

世界多极化格局,严格地说,是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出现的,但打破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让中国、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思想,毛泽东却早就提出来了。

毛泽东的这个世界大战略思想萌起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方针,应该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已经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5页。

有了产生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最初的土壤。1939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该严守中立”的观点也有一些类似的含义。

毛泽东有关世界多极化的思想有两大基础,第一个基础是世界各大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和势力;第二个基础是各大国中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两个霸权国家统治世界。

### 1. 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集团

第一个思想基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有一些萌芽。他不把世界各大国,尤其是不把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成铁板一块,而是看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正是在这个国家不同、利益不同的基础之上长出了世界多极化的最初幼芽。毛泽东是较早地看到这一点政治家之一。1940年,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日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另外还有“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这实际上是把当时世界上的各大国进行了划分,将它们划为英美、德意日及苏联三个不同的势力集团,并且制定了依靠苏联,团结英美,打击日本的策略。毛泽东为此还提出了后来在多极化时代经常为人们所运用的策略原则:“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是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国家,也可以算是一个单独的势力,实际上加上前面的三家,也就是四家。当然这时贫弱的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极,但在其中也可以见到一些多极化的雏形。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划分尤其具有意义。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集团外,毛泽东还在1939年提出过“两个世界五个集团”的划分方法。他认为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即社会主义的苏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页。

联,这是光明世界,还有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而资本主义世界又有四个集团,这就是欧洲的两个集团即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再加上在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四个集团。这四个集团又划分为帝国主义的两大阵线,即英美法阵线和德意日阵线。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吸收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意见,形成了把欧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而不把它完全看成美国的附属的思想。如毛泽东曾经很赞成当时驻英代办宦乡 1959 年 1 月 5 日给国内的报告。这个报告分析说,1958 年,英美两国相互依靠,而实际上,两国各谋扩大自己,削弱对方,经济矛盾有新的发展,会更深刻化,英法矛盾白热化,英德矛盾更尖锐,英与美法德矛盾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力量的发展和对比对社会主义有利,美国经济危机影响到西欧,竞争空前,民运发展,德国再次崛起打破了平衡。毛泽东对这种观点表示赞成,在中央文件中批示说,“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

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当时西方一些专家的有关看法。

1960 年 4 月 8 日,新华通讯社呈送毛泽东的《美报打击英国分化英法》的资料中说,美报记者提醒戴高乐将军,在访问伦敦时不要因为现在受到的热情接待而忘记第二次大战间流亡英国的待遇。另一个材料是美国《明星晚报》谈西方矛盾的文章,其中说英国反对西欧一体化并特别担心西德强大,美英关系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支持一个欧洲六国集团,而反对英国统治的外部七国集团。第三篇材料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它指出英德关系不和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危害,西德由于它过去的历史地理工业和无民主,可能再次成为对欧洲的威胁;共同市场是改善英德关系的主要障碍。毛泽东在看这些材料时形成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毛泽东在这些资料上批道: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25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8—29 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36、39 页。

“英法将走向合作,对抗美德,是一件大事”。在这些观点中包含着欧洲联合起来成为一极的思想的萌芽。

## 2. 反对世界霸权主义

另一个思想基础,即反对一两个世界大国称霸世界的思想,则产生较晚,严格说来,是产生在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较长时间中是把中国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是两大阵营的对立、两极对立占主导。但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并逐渐产生了反对“两大纸老虎——真老虎”称霸世界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体现在毛泽东争取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反对苏联和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可以说,毛泽东的反霸思想最早是通过做欧洲国家的工作慢慢体现出来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第一次谈到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全世界的问题。他指出,美苏两国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到处都在碰钉子,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对美国不满意,东欧国家对苏联不满意,实际上都是一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1964年1月,毛泽东已看出美国和苏联都有控制全世界的企图,指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这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大国称霸世界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欧洲应成为一极反对两霸的思想,以及中国要支持各国反对两霸统治世界的思想。

196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团时说,中国与法国虽然是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但中法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大国欺侮,不许大国控制自己,而不管这个大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思想,毛泽东鼓励法国像中国与苏联作斗争那样,起来与美国作斗争,提出法国可以与中国合作,在欧洲与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3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7页。

美国顶一顶,并希望通过法国“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法国靠拢一些,毛泽东尤其希望,法国能带头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形成反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统一阵线。毛泽东指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还引述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和法国的戴高乐将军的话说,要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毛泽东对法国在建立多极世界中的作用是情有独钟,多次提到要法国带头独立于美国,表示中国“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的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

毛泽东对欧洲与美国的同盟也持一种分析的态度,并不认为它们就是一块铁板,毛泽东指出,“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尽管中法不是同盟国,但中国与法国两国有许多共同点,谈起来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1965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稿上批示说,这个文件很好。这个文件写进了毛泽东同时反对两个霸权国家的观点,批判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批评苏联对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实行军事上的控制,把中国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指出苏联的所谓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苏共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苏联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毛泽东指出,现在美国到处霸占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0—52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毛泽东反对霸权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使其他大国找到了更多的切身利益，使它们与两个大国拉开距离；同时，这些大国本身又没有力量单独与两个大国对抗，必须与其他大国进行合作和配合。这正是以多极化反对霸权国家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在对法国客人谈话时指出，不仅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有损欧洲国家的独立性，而且苏联对欧洲也一直怀有野心，表面上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但“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这才是欧洲的真正危险。因此，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国家的斗争中，应当联合起来。这些大国真正独立，对别的国家就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特殊的联合的方式。美国也好，苏联也好，相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同时对付所有其他大国的能力。毛泽东在 1974 年 5 月和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苏联对中国和欧洲的威胁时，明确地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希思认为，苏联的实力得到增强，对欧洲形成了主要威胁，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而“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对此表示，“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毛泽东关于多极化世界的战略构思的两个思想基础，从 1939 年提出两个世界两个阵营五个集团，到 1964 年提出反对美国、苏联两个霸权国家，尽管前后相距 25 年，但却是有逻辑联系的。大国划分为不同的势力集团，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和分歧，这是世界多极化的一个基础。它必然导致一些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起来反对另一些最强大的霸权国家控制和主宰世界的企图，而在反对霸权国家的斗争中，这些大国的独立性也会随之增长，一个利益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394—395 页；第 13 册，第 180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97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02—603 页。

多元化的世界也将形成由多个国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的局面,这时候,世界的多极化时代也就到来。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达过世界多极化的概念,但在他的思想中,世界多极化的轮廓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认为,反对两霸统治世界,其目的是争取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就开始涉及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秩序的问题,当然毛泽东那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来。

### 3. 毛泽东对多极化格局的初步分析

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世界上五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而且也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在这样一个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毛泽东向基辛格说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国并不把中国看得太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优先次序,第一是苏联,第二是欧洲,第三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同样,毛泽东也把中国算在五大力量中心之内,但在这些力量中,中国只能是第五,是五个指头的小拇指。他在分析这五个力量时指出,世界上美国与苏联是超级强权国家,在五个指头中,美国是老大,其次是苏联,再次是欧洲、日本,最后才是中国。毛泽东向美国人指出,现在的多极化格局还不成形,主要是欧洲太弱,欧洲国家不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日本国内有人想搞霸权,对日本成为一极,毛泽东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是十分警惕的。基辛格虽然一再为美国将苏联列在美国外交的最优先地位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的分析。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 三、从“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的发展

#### 1.“中间地带”论的提出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论。当谈到美国是否会进行反苏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美国的确在准备反苏战争,但从当时的局势来讲,美国更主要的目标并不在于直接进攻苏联,而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其中也包括在反苏的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真正的实际目的,“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外交战略家,对国际局势有着深刻的见解。从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美国在二战后,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反对苏联扩张的口号下,发动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冷战”。它的真实意图不在于用军事手段来消灭苏联这个国家,而是防止苏联进一步越出它的势力范围向外扩张。同时,美国在冷战的口号下,实现着美国的霸权,建立起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力量,把西方国家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内。而毛泽东在这时提出的“中间地带”论,可以说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60页。



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指出美国在反苏的口号下实施其霸权计划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隐含了反对美国世界霸权以及把美国 and 苏联与其他的国家区分开来的双重意义。这在外交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实际上是把除美国 and 苏联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后来,毛泽东一直坚持这一看法。1954年,毛泽东又重新提到了它。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谈到,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这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这就是说,这里所指的中间地带,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和广大的新兴独立国家。在1946年第一次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时,毛泽东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包括在中间地带中的。1955年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毛泽东一再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主要目标是为了占领中间地带,不一定是为了要打仗。他在1958年指出,美国到处驻兵,在亚非拉欧四洲都有军队,“这么几个兵,分得这样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这时候,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美国霸权,二是把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争取到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来,这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59—16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0页。

也是中间地带论的一个主要目的,三是表明对战争的看法,认为美国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马上发动反苏战争,因此世界战争不会打起来,四是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包括在中间地带之中,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是在中间地带之外的。

## 2. 两个“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论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1962年,当时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毛泽东在把日本和西德这些地方都称做中间地带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这其中的重大变化在于把中间地带中的西方国家与二战后出现的新兴独立国家区分开来,这是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向第三世界思想转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963—1964年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中间地带有两个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东欧的问题,说“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未把东欧与苏联放在一起,未把中国与苏联放在一起,反而认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实际上已经开始把美国、苏联放在一起。这样,三个世界在这里已经有了它的最初的雏形。毛泽东还进一步总结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7页。

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 3.“第三世界”概念的最初含义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与一批美国老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可以看出,这里的两个“第三世界”概念,是直接从“两个中间地带”概念演化过来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进一步把东欧国家与苏联区别开来,正如过去把西欧国家与美国区别开来一样,尤其是把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古巴也同他吵。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还把中国与苏联的分歧透露给了那些外国客人。稍后,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与法国一样,在反对大国控制上有共同点,他在与法国客人会见时说,中法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都是不允许的”。毛泽东还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也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能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但在与法国议员团的谈话中,毛泽东了解到,法国人讲的“第三世界”与他提出的不一样,因为法国强调的是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第三世界中不包括法国和发达的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8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5—51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0—522页。

西方国家。这对毛泽东后来修正他自己提出的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理论有较大影响。

在 1965 年到 70 年代初,毛泽东对外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支持新兴独立国家的正义斗争。他多次发表谈话,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斗争给予声援。在这样的活动中,毛泽东感受到了新兴独立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重大差距,这也是他对中间地带论和第三世界理论进行重大改变的一个直接因素。

当然,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期就已经很重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了,把它们视为中国争取在国际社会中提高自己声望的一支重要可依赖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多次讲过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毛泽东一再鼓励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不要受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指出,“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但它们到处侵略占领,它们实际上是野蛮的,“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所以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应当在人民中进行教育,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毛泽东鼓励它们说,“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发展中国家必须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在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时,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搞好自己的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在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要害怕帝国主义。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将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共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47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19—32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38—339 页。

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有与毛泽东同样的思想。1957年周恩来在总结自己出访亚洲8国的情况时说：“亚洲和非洲正在觉醒和复兴。独立了的和正在争取独立的亚非国家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和平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万隆会议第一次证明了这个力量的存在，埃及事件又更加明显地证明了这个力量的发展。亚非人民自己掌握亚非地区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特征”。

到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支持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的立场更加坚定。1964年6月，毛泽东指出，“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反对外来干涉”。毛泽东认为独立的主要内容是要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要争取在几十年时间中将经济搞上去，赶上西方国家。到1970年，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客人会见时，第一次将西方国家排除在第三世界的概念之外，指出“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而这里的帝国主义，不仅指美国，也指英国等西方国家。

#### 4. “第三世界”概念的新发展

在中国反对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与控制的斗争中，毛泽东发现，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中国应当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1973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与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会谈中提出，“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毛泽东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总统会见时的对话更是表明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

毛：两个超级大国有点怕第三世界。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03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4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6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7页。

尼：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它们就不会怕。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

毛：那不能这样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为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必要的援助，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早在1956年，中国刚刚走上经济建设的正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毛泽东就指示，要尽可能地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及客人说，“中国也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中国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当然，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不可能给予发展中国家较多的经济援助，所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还是以道义声援为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是支持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援助”。

1974年，毛泽东正式完成了其从中间地带论向第三世界论的转变，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从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两个理论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但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52、379、38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3、55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又有重大的不同：

从总体来看，中间地带论主要是反对美国的霸权，强调争取西方国家，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第三世界论则意在反对美苏两霸，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反对美苏两霸的主力军，把西方国家作为争取的对象，目的在于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利益和地位。

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来看，在中间地带论中，美国是主要敌人，苏联是反对美国的最主要力量，二者是对立的，起的作用是相反的，苏联的利益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利益是有重大的一致之处的；而在第三世界论中，美国与苏联虽然仍是对立关系，但二者都是试图控制别国的霸权国家，因而二者都是其他国家反对的对象。两个理论的变化中，苏联的地位和作用变化最大，从过去的正面国家，变为负面国家，从世界反美国家的头号领导国变为与美国同样的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的国家。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有重大变化。在中间地带论中，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同一条线上，但发达国家是重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在第三世界论中，这两部分国家已经分成了两个单独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而且作为第三世界主体的亚非拉新兴国家是反对美苏两霸的主力，西方国家则处于较次要的地位，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既有矛盾也有共同之处。

在思想方法上，中间地带论还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了美国和中间地带中的法国、英国、德国等，但又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而在第三世界论中，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作为观察国际格局的出发点。

中国在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两个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在刚提出中间地带论时，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是中间地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中国建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部分，不属于中间地带。在第三世界论中，中国是作为第三世界中一个重要成员，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一起，共同组成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统一阵线。

应当指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是西方人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

有人认为,一些法国学者如艾尔弗雷德·索维 1956 年在其《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文中说:“我们常说有两个对抗世界(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世界),常说它们可能会发生战事或能够相互依存等,却常常忘记还有一个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像第三等级一样遭到忽视剥削。”由此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

还有人认为,1955 年印尼万隆会议时,法国报纸就引用了第三世界一词。60 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条目。1964 年英国学者 P 沃斯林还出版了《第三世界》一书,是最早的专著。最早从世界战略来看这一概念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他说,今后的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苏联世界的竞争将压倒一切,法国必须在这两大世界之外的世界里占据领导地位。到了 50 年代,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以法国为领导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并连结大西洋彼岸的统一的革新的拉丁世界,使之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虽然这不是现在的第三世界,但开创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先河。1960 年 3 月,戴高乐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又说:“巴黎政府以及国家的一部分收入支援第三世界,相对地说,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支援的数目都大”。这里提到的“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国家。他在对外活动也很重视第三世界的国家,先后出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既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又促进了第三世界这个新词的流行。所以,在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论时,这个概念已流行了十多年了。

但实际上,从前述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的变化和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第三世界论的形成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有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绝对不是因为法国人讲了之后才产生了第三世界的

---

参见扬铮文:《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3 期;《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6 期。

转引自《戴高乐言论集》,第 231 页;《战争回忆录》第 3 卷,第 202—174 页;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41、271、273 页。

参见罗时平、朱维红:《关于第三世界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的考释》,《晋阳学刊》,1991 年第 5 期。



理论。在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中,已经有第三世界思想的萌芽。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 50—60 年代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及其在国际舞台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这一客观现象,也才越来越引起世界政治家们的重视。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主要是通过自己长期以来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毛泽东 1946 年提出了美国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在中间有一个辽阔地带,提出了中间地带论。他在 1962 年提出了中间地带国家性质各有不同的观点,1963 年又明确提出有两种性质的中间地带,1964 年提出第三世界概念取代中间地带的概念,1970 年再进一步把西方国家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分出去,直至最后完成第三世界概念的表述。可以说,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有自己明显的发展轨迹。毛泽东第三世界论的发展过程虽然也受了外来思想的影响,但有很强的独立性。

从内容上来看,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与当时流行的第三世界的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1) 对世界的划分不同。1969 年法国的《小拉卢斯辞典》说,第三世界是所有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不属于自由经济工业化国家,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1975 年美国的《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认为,第三世界是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不同于美国、苏联;1985 年英国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指出,第一世界是自由经济国家,第二世界为中央计划国家,不发达的自由市场国家为第三世界。苏联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世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而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则将美国和苏联作为第一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其余为第三世界。

(2) 对第三世界看法不同。西方把第三世界视为贫穷、疾病、战争、经济不发达的同义词,而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把第三世界作为反对美苏两个霸权国家的主力军,是革命动力,对国际关系有深刻影响。

(3) 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同。人们一般都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作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东西方矛盾为主要矛盾,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超越意识形态,把全世

界人民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视为主要矛盾,在这一斗争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第三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所需争取的对象。

## 四、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思想

### 1. 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的提出

早在 50 年代中期,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束缚后,很快意识到,一个国家要想独立,必须要发展民族经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巩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就必须打破原来的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导的、对亚非拉国家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一旧秩序已经成为新兴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严重的阻碍。正因为如此,在 1954 年的亚非会议上,新兴的亚非独立国家就国际贸易条件、原料价格、技术转让和金融机构等涉及自己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对旧有的体系进行改革的建议。随后,1964 年亚非拉国家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第一次会议上组成了 77 国集团,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拉开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序幕。1973 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其《经济宣言》中,第一次使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1974 年 5 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文件,同年 12 月,联合国第 29 届大会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1979 年 2 月,发展中国家又通过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这样,发展中国家首先在 60—70 年代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独特的作用。中国一方面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一员,也尽可能地对一些亚非国家提供援助。

周恩来作为这一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制定了中国援外工作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中,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的和平外交哲学,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包含着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性主张。

周恩来在 1957 年初指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我们同任何国家的经济合作或者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援助都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并不排斥这些国家同任何别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或者接受任何别的国家的经济援助。我们愿意看到,一切对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援助都不附带任何条件,真正是为了帮助不发达的国家得到独立发展”。

在周恩来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义务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1963 年 8 月,当索马里总理就中国的援助向周恩来表示感谢时,周恩来说:“不要感谢了,这是我们的义务,谁叫我们先胜利,谁叫我们是大国呢?先胜利的大国就有义务援助后胜利的小国,世界上有人说,我们只同贫穷的小国做朋友。这正是中国的特点,我们是大国,不能依靠人家援助,别人也援助不起,大国主要靠自己;而大国应该援助小国,使它们也能逐步靠自己。我们最高兴与贫穷小国交朋友。世界上小国有 130—140 个,是多数;大国有几个?大国要垄断一切是不可能的。”

1964 年 1 月,周恩来又提出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

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周恩来把是否控制受援国看成是区分真正援助这些国家,还是搞殖民主义的标准。他在与瑞典大使布克会谈时指出,是不是殖民主义的援助的分界线,第一要看是否要求特权控制;第二要看是真正帮助别人建立独立的经济,还是使别人永远依赖下去,只限于为他们提供原料和进行一些加工;第三要看是真正帮助别人投资后很快投入生产,还是在很长时间建设不起来,很大部分的投资、贷款花在他们的技术人员身上。

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权平等、互助互利、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和发展经济等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不仅一再宣布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任何措施,而且还表示,“不容许自己的后代走殖民主义的道路,中国强大了以后,也要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

周恩来提出的这些原则为邓小平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思想提供了素材。同时,邓小平也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在1974年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时,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坚决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4、388—389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67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06—307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9、314—315、179—180页。

支持建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立场。

到 1988 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苏联实行改革,与西方国家搞缓和,东西方关系大大改善。同时国际关系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想垄断世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国际上的许多问题都有待国际社会的合作来解决。国际社会应当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建立这样一个合作机制,这就成了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条件下,不仅提出了要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而且还认为,光有经济方面的国际新秩序还不够,还必须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两者应当联系起来,由此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在 1988 年 9 月与斯里兰卡总理会见时,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1988 年 12 月 21 日在与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晤时,邓小平又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世界总的形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 1974 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提”。1989 年 10 月,邓小平又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邓小平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的两个最根本的任务之一,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13 页。

## 2. 多极化是建立新秩序的政治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建立在多极格局之上,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社会。用多极化反对超级大国的世界霸权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主张。

邓小平在 1990 年 3 月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包含着以下内容:

第一,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发展的大趋势。

过去的秩序是建立在一、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基础上的,但实践表明,正是这样的一种旧秩序不能解决有关世界事务的任何重大问题,因此,今后的国际新秩序,一方面还要发挥大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打破少数国家垄断一切的格局,充分发挥世界各主要国家在解决世界事务方面的作用。90 年代初以苏联、东欧剧变为标志,旧的格局宣告结束,新的格局正在形成。虽然人们对什么是新的格局还看不准,但邓小平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的国际秩序必定是与过去少数大国垄断一切完全不同的。

第二,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趋势,还有许多问题要进行研究。

邓小平虽然对多极化的发展抱有乐观的信念,但又清醒地指出,多极化进程在 90 年代初才刚刚起步,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首先,旧格局是不是已经结束,新格局是不是已经形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2、328、353 页。

成？邓小平认为，旧的格局正在改变进程中，新格局也还没有形成，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这一过程才算完成，以什么作为标志，这是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其次，苏联在旧格局结束新格局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过去两极中的一极，但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苏联在这一动荡的年代综合国力大大下降，苏联已经不能控制东欧国家，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解体的趋势在当时已经很明显，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作用即将结束。那么，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起什么作用？邓小平认为，俄罗斯肯定还会是一个重要力量，在多极格局中会有它的一个席位。但和过去的苏联相比，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的作用与苏联在两极格局中的作用将会有什么不同呢？最后，多极格局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多极？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邓小平提出了三极、四极或五极的具体形式。毫无疑问，邓小平这里讲的几极是有所指的，肯定地包括了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西欧和中国等重要力量中心在内。但多极也不限于这些，邓小平也没有排除出现更多的极的可能性，比如印度、巴西、东盟等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国家联盟在多极格局中将会有什么作用？

处于多极格局中的这些力量中心相互之间将会是什么关系？已经处于多极格局中的大国与那些不是极的大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多极化强调大国的作用，那么广大中小国家在未来格局中又将起什么作用？它们与大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中国在多极格局中将会起什么作用？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不管怎样，中国都是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这表明了邓小平将发展中的中国在多极格局中的地位定位为有所作为，中国在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将超过过去在两极格局中的地位。

3. 五项原则是新秩序的主要内容，不干涉内政是新秩序的核心原则

邓小平指出，“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

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不干涉内政,认为这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在处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上,邓小平也是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的。如在1978年10月,智利军政府外长来华访问,邓小平就对他说,对智利1973年的事件,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当然是有看法的,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中国就不应该干涉智利的内政,他指出,“对智利国内七三年事件,我们采取了同别人不同的态度,因为中国在国际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413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328、359—360页。



事务中从不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第三世界国家用什么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从不干预。我们不愿意任何国家内部的事情影响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关系。当然,从道义上讲,我们不是没有一点意见,也感到某种遗憾”。1977年,邓小平又表示,中国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决策,间接的也不行。我们对朝鲜,对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1990年,在与美国友人谈到苏联发生的变化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别人不幸的事,不好的情况,不会落井下石,我们不会发表或采取伤害别人的言论和行动。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我们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

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国家提出来的,但可以适用于全世界。他说:“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

#### 4. 建立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机制是新秩序的重要任务

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认为,为了实现和平,应当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方式,并建立法律和道义双重和平监督机制。

周恩来认为,和平不能光是一个口号,必须要有监督。中国“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怎样监督呢?周恩来提出了两种监督的办法:“国际上有两种约束,一种是法律上的约束。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扩大成为集体和平公约,这种公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军事集团,而是为

---

转引自陈笃庆:《邓小平同志对拉美工作的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242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9、185、365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3页。

了集体和平；不排斥别人，也不反对任何国家，各国以五项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固定下来。另外，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各国通过彼此来往，可以发表声明，签订协议，发表演说，强调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这样做不仅可以形成国际的道义上的约束，而且可以作为对国内人民进行教育的内容”。周恩来还曾经提出，外国军队应该从一切外国领土撤走，而为了保证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大国可以订立和平公约，可以订立亚洲—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

邓小平继承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在 80 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指出，当代世界虽然自二战后没有爆发大战，但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用老的办法不能解决，必须寻找新的办法。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出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邓小平经过思考后提出，中国的外交有两条经验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作为参考：一是中国为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他表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这是可取的。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二是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设想。邓小平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用中国的思路来解决国际争端，是邓小平后来多次强调的一个问题。早在 1978 年 8 月，邓小平就指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一代找不出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邓小平表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

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些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邓小平还用和为贵的思想来劝说有争端的国家用和平方式来解决。邓小平多次亲自出面为两伊和解做工作。1985年邓小平对来访的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说,“我们实在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请阁下考虑一下,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结束这个战争。如果为了结束这个战争需要中国方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十分愿意做的。我们同你们是朋友,是友好国家,同伊拉克,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也都有友好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过去不介入。但如果你们双方都觉得需要中国出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很高兴去做的”。后来,他又对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说,希望两伊和平共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我还是那句话,“和为贵”,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只能选择对话,不能选择战争。

两伊战争开始时,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较好,与伊朗的关系有些问题。因此伊拉克认为,中国会支持伊拉克。但邓小平却始终从劝和的立场出发,对伊拉克做工作,劝其在双方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达成和平协议。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邓小平也是以和平解决争端来劝导冲突各方的,他明确提出阿以争端要和平解决。邓小平在多次批评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时指出,美国不放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中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同时,邓小平也一直劝说阿拉伯国家和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87—88、19—2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4、325、425页。

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他赞赏埃及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和解的政策,并劝告埃及要以兄长对弟弟的态度来对待容忍当时阿拉伯国家对它的批评。邓小平给阿拉法特做工作,向他说明美巴对话在解决中东冲突中的重要性,如果不承认以色列,就不可能同美对话,路也就断了。邓小平向阿拉法特指出,可以将承认以色列与要求以色列归还所占领土以及巴在约旦河西岸建国联系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剥夺了以色列发动侵略的一切借口,并使人感到巴解组织尊重现实、合情合理,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赤裸裸地支持以色列,站在以色列一边,它道理就少了”。

### 5. 反对建立和保持任何军事集团是新秩序的组织原则

邓小平在 1975 年时就提出,两大阵营这一形式已经过时。他说:“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因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拿帝国主义阵营来说,当然老殖民主义还在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掠夺第三世界,但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邓小平还明确地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

邓小平一再坚持,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这个战略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搞军事政治结盟,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不结盟国家。

---

转引自雅菲:《从中东地区的外交实践学习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论文集》,第 233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282 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412 页。

## 6. 反对霸权是新秩序的基本要求

反对霸权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也是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指出,建立新秩序就是要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也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新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而且,霸权主义也行不通,因为“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世界霸权。1975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曾说过,“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后来邓小平还指出,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反霸条款既是约束中国,表明“中国永远不称霸,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6、74页。

## 第四章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 从结盟到不结盟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从结盟到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巨大变化。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中国的根本利益，都主张中国要独立自主地决定内外政策，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由于中国外交的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的不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区别。这些区别尤其深刻地向世人昭示，在外交方面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一切都要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国际局势的发展而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怎样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和坚持中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始终如一的主线。

### 一、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一边倒、两条线和一条线

#### 1.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含义。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提出这一口号主要是指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不要因为讲统一战线而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和革命的利益，不能无原则地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一定要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不能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完全交给国民党。毛泽东这一时期尤其批评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认为这可能导致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丧失，对党来说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独立自主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主要涉及的是政党利益，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二是这里边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 1935 年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已经走上了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道路,但在原则上说,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要受共产国际领导中心的指挥,独立自主思想与共产国际一个中心是矛盾的,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一直强调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但这一原则较多地用在经济建设应当自力更生的意义上,并不是明确地作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捍卫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在不同时期也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 2. 一边倒与结盟战略

1949—1960 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时期,是外交“结盟时期”,是结盟的十年。中国的独立自主思想受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制约,是在与苏联结盟的条件下争取独立自主地位,而实际上中国在一些对外事务上要与苏联保持一致而不能做到完全和真正的独立自主,中国的对外活动不能不受到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如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的决策,曾经在很大因素上受到了苏联态度的影响,直到出兵前夕还在争论之中,以至于使出兵日期三次变更。苏联因素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影响表现在: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可以保证美国不会轻易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所以,虽然中国出兵朝鲜是中国自己主动作出的抉择,但不能说这一抉择完全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的。中国在实际的对外政策中做到了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目标,但独立自主还不是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与苏联的结盟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3. 两条线战略

新中国外交的第二时期,是 1961—1971 年,即两条线战略的十年。它的基本特征是实行了不自觉的独立自主外交,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外交。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与苏联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盟,但实际上逐渐从盟友关系变化成敌对关系。苏联从中国最好的朋友,变成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甚至是比美国还危险的敌

人。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继续处在敌对状态,尤其是越南战争,使中国和美国处在间接的军事对抗的境地中。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与其说是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如说是孤立的外交,是企图通过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来对抗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主要特征是把与第三世界的外交放在重要地位上,并且通过穷朋友的帮助,使中国进入了联合国。

#### 4. 一条线与准结盟战略

新中国外交的第三个时期从 1972 年到 1981 年,是实行一条线战略的时期。

1972 年时,中美两国出于对苏斗争的需要,决定抛弃意识形态的障碍,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虽然双方都没有使用战略结盟的字眼,但此后建立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有准结盟的意义。为此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中写道:中美已经心照不宣地结盟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在中美两国实现和解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内,中美关系就由尖锐对立进展到实质结盟对抗苏联。

关于什么是一条线战略,邓小平有一个具体的解释。他指出:“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

---

参见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3—674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34 页。



## 二、毛泽东的结盟战略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关系

### 1.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与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

独立自主就是指不屈服不依赖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独立地处理自己国家的对内对外事务。而结盟意味着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本国的事情。与外国结成政治军事集团,就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对内对外的主权交与同盟方,甚至要在一些问题听从外国的意见。这样,独立自主就与结盟政策之间存在一种矛盾:要么放弃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因为独立自主的方针就是要求不结盟,不与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结成任何联盟;要么结盟,但结盟就会对独立自主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独立自主从来就是与结盟政策分不开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是在结盟基础上的独立自主。这样,独立自主与结盟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矛盾。二者矛盾的结果是,独立自主与结盟决裂,形成完全的独立自主思想。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一个从结盟的独立自主,变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过程。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曾提出与美国搞好关系的思想,为此也做了大量争取美国的工作,希望美国当政者能把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放在较重要的地位上。但一当毛泽东发觉这种关系可能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时,毛泽东就会强调独立自主,把其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如胡乔木后来回忆毛泽东与美国人第一次进行谈判时的风格说:“毛主席对美国人表现出很大的吸引力。美国人承认,毛主席使谈判者无拘无束,同时毛主席很机警,他遇到有威胁性的话,回答是很严肃的。例如,在赫尔利背弃五条协议后,包瑞德劝我们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很气愤,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意思是我们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自己的路线,是不会畏惧的”。

## 2. 与苏联结盟对中国独立自主原则的影响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60年代,毛泽东把中国与苏联结盟,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抗日战争时中国要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建国前夕中国提出向苏联一边倒,50年代中国与苏联结成紧密的政治军事联盟,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外交的一条主线。那么,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独立自主原则和与苏联结盟之间,哪一个原则更为重要,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很显然,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例如,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应当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对内对外事务。但实际上,中国一方面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对内事务,但在处理内外事务的过程中,受到苏联这一外在因素的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与苏联结盟时期可以分为1949—1954年、1954—1960年两个不同阶段,两个阶段的独立自主与结盟的矛盾有所不同。

在第一时期,虽然从毛泽东内心来说,他是始终把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斯大林在当时不仅是苏联的领袖,而且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公认的领袖,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较多地尊重斯大林和苏联的意见,这就影响到了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的制定。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内事务上,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制度大体上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成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经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页。

的关系等许多重要的国内问题上征询苏联的意见。所以,中国在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内事务时受到苏联的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自己后来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会议上也承认,在建国初,“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从 1958 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两国关系中,中国出于对苏联因素的考虑,被迫承认当时一些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主要涉及外蒙古独立、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等问题。这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后来也承认,苏联在 50 年代初“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50 年代初,毛泽东曾就一些与苏联毫无关系的仅与第三国有关的事务主动征求苏联的同意,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处理外交事务没有经验,同时也由于中国和苏联是结盟国家。毛泽东在 1952 年 9 月 13 日对周恩来指示,关于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英国策动墨西哥提出三点建议,中国对它们应如何表态,“请与苏联同志商定”,又说“印度和缅甸从侧面表示愿和我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表示希望你访问印、缅一次,其本意是尼赫鲁想来访问中国,然后希望中国总理还礼访问印度。此事是姚仲明大使反映的,我看很有可能提出来谈,如印、缅正式提议我们不大好拒绝,究竟是否可以和印缅签订上述协定,亦请和苏联同志一商”。

中国在朝鲜战争的重大问题上,也受到苏联的重大影响,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的。在出不出兵,何时出兵,以什么样的规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35 页。

《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544—545 页。

模出兵等问题上,中国都必须考虑苏联的意见,而后才作决定的。由于苏联在给中国军队以空军支援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影响了中国出兵的时间,也是由于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装备,中国才最后决定出兵卷入朝鲜战争。可以说,在斯大林在世时期,中国的独立自主权当然是始终坚持的,但是受到了与苏联结盟的重大影响。

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在独立自主方面比过去做得更好,突出表现在中国在国内政策上开始反思苏联经验的教训和消极因素,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赫鲁晓夫无法取代斯大林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许多做法和意见并不赞成,所以当苏联试图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时,毛泽东这时是真正地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毫不客气地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如1959年,苏联与美国搞缓和,赫鲁晓夫在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晤后,飞到中国,要毛泽东释放朝鲜战争前后中国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当场拒绝,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在赫鲁晓夫试图干预中国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的立场时,毛泽东也不予理睬。

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毛泽东也在许多问题上持批评态度,后来还进行了两党的大论战,中国的独立自主开始在与苏联的矛盾和冲突中显示出来,连外国观察家也看到了中国表现出的不追随苏联的独立性。

但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承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按理说,在新中国成立时,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国对此应该表示自己对南斯拉夫的谢意并与其保持友好关系,但实际上,中国却在当时对南持一种批评态度,没有表现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

有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是追随苏共反南共的。1958年4月3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一封信,表示苏共认为南共纲领有错误,将改变派代表出席南共七大的决定,只派大使以观察员身分出席。4月8

日,毛泽东回信说,“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在各国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改善同南共的关系之后,提出并准备通过这样一种有体系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基本原理的纲领草案,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企图向全世界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同莫斯科会议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我们决定同你们采取一致的步骤,改变过去的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而委托我驻南大使伍修权同志以观察员身分列席。我们并决定不向南共代表大会发贺电。请将你们通知南共不派代表出席南共大会的信(副本)及发信日期告诉我们,以便在你们发信给南共之后,我们随即把我们的新的决定通知南共。”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对南共进行攻击。可见在对南问题上,中国未能执行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毛泽东后来曾为此当面向南斯拉夫客人致歉。

### 3.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对抗性和封闭性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在外交上的表现除结盟这一特点外,还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封闭性。在1960—1970年间,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在外交上表现为既反美又反苏的两条线战略。

这一时期,中国与苏联表面上还维持结盟关系,实际上双方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与苏联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外部的主要矛盾,这当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对抗,又有国家利益的冲突,甚至还在边境问题上发生了武装对抗;中国完全不依靠苏联,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甚至凡是苏联同意的,中国就反对,中国有意选择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建设道路;全面批判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另一方面,中国也继续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尤其是在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时,中国再一次处在与美国直接对抗的状态中。中国多次表明,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中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甚至准备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与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2、193页。

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这样,毛泽东在 60 年代的独立自主思想,具有相互矛盾的内容。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独立自主,中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经济军事体系,自己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了中国的人造卫星,中国对外援的依靠也减到了最低程度,能自己制造的都自己制造。独立自主在内部政策上还表现为中国开始形成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独立自主思想也使中国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他的独立自主的选择走错了道路,逐渐演化成文化革命的思路,无视当时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与正在出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走上了一条较为封闭的道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加强了与欧洲国家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并把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摆在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激进的革命外交战略,又使中国与大国关系处在多面树敌的状态:中国与苏联几乎处在战争边缘,中国与美国处在严重对抗的状态中,中国与印度的关系自 1962 年边境战争后处于对抗时期,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在 1965 年 9·30 事件后也急剧恶化,中国由于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而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恶化。所以,这一时期如果说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思想的话,那么它带有对抗性和针对性,主要针对美国与苏联两个大国,但与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对抗。

#### 4. 中美准结盟关系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1970 年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结盟基础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重新分析了世界形势之后,尤其是中苏两国在 1969 年发生珍宝岛的武装冲突,苏联内部有人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后,毛泽东就把中国的外交战略重点转向了对付苏联威胁上,既然中国没有能力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对抗,中国就只能在两个主要的敌人之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最主要敌人。毛泽东这时是从军事战略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毛泽东终于借助于乒乓球外交,借助于巴基

斯坦和华沙两条外交渠道,打破了中美两国自新中国建立后的僵持对抗状态,打开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大门,并与美国实际上结成了准结盟的战略关系,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外交战略。在与美国的新的结盟中怎样坚持独立自主,成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问题。过去与苏联结盟,从意识形态说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当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并且为推进世界革命而共同努力,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中国当时面临的情况一是没有经验,二是苏联又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源泉,是中国革命的老师,斯大林又一度被奉为世界革命的领袖,三是苏联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国,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给予了中国大量宝贵的援助,在这种状态中坚持独立自主较为困难。而在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中,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没有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反是在与意识形态相敌对的国家实行结盟,因此毛泽东在处理这样一种结盟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原则时,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凡是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时,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坚持,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从不把它作为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威胁的一个筹码,相反,在这一问题上从不让步。所以,这一时期毛泽东与美国结盟的思想,是一种有限的结盟,不像过去与苏联结盟那样,是一种全面的结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结盟。这样一种结盟关系不太容易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状态中坚持独立自主,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这也不能绝对化,就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也涉及到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由于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微妙状态之中,为以后的中越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

### 三、邓小平的不结盟外交战略

#### 1.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不结盟外交战略?

80年代初,为什么中国要从一条线战略变为不结盟战略呢?邓小平有一个解释。他指出,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

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

问题在于,中国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要从这种中美准结盟战略变化为不结盟战略?其中的主要原因何在?

邓小平在 1982 年 8 月已经产生中国要实行不结盟战略的思想。他在当时会见法国外长谢松时说,中国也奉行独立政策。

现在看来,有四方面的因素促使邓小平决定要改变与美国的准结盟的外交战略。

第一,中国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是在两国实力极不平等的状况下实现的,中国与美国相比,实力差得太多,中国在向美国开放中得到了许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设备、专家、经验等。中国担心,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不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损害中国的自力更生能力。

第二,美国国内在 80 年代初出现了一股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对中国实行压力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

邓小平在 1981 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一年年初,美国国内有四种言论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警觉:(1) 中国太落后,不值得美国重视;(2) 中美结盟实际上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3) 美国可利用中国出于反苏需要而对美国有所求,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让步;(4) 美中关系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是要摧毁美国。

邓小平在批驳这些观点的时候意识到,与美国关系过密,不利于中国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也会让人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错误判断,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美国的帮助,但中国也必须准备应付未来的变化,为此中国必须要有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的情况下也能够生存下去的能力,也必须警惕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搞阴谋。这些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反映了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使邓小平得出了中国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决定。

中国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外交,还与当时美国外交中表现出来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34、225 页。



的不友善有关。邓小平谈到这一变化时指出,“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乎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乎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邓小平这里所讲的美国对付中国的几乎,主要是指美国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里根上台后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加强对台湾出售军事武器,一再声明中国不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当美国这个霸权国家也对中国不友好时,中国为什么要继续帮助这一个霸权国家来反对另一个霸权国家呢?邓小平1984年谈到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时指出,“中国对全球战略看法的一些变化,主要来自美国的变化。来自美国的变化中最深刻的是台湾问题。《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不能低估的。美国应从南朝鲜、台湾、以色列、南非这四艘‘航空母舰’的圈子里走出来,否则,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问题上取得主动”。

第三,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与美国关系过近,不利于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均衡,不利于世界和平,会有损中国的国际地位,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已经改变了70年代苏联在战略上采取进攻态势的局面,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减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而美国在里根上台后,加强了对苏联的压力,实行强硬政策,美国的实力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较大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较量由过去70年代苏攻美守变为苏美在战略上大体均衡,相互僵持,两个超级大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中国如果继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6—378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4页。

《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78页。

续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会加强美国的霸权,影响世界力量对比的均衡。而当美国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增加压力时,中国继续与美国保持准结盟关系对中国是不利的,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是不利的。

第四,一条线战略本身也有缺陷,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中国外交的灵活性,对中国国家利益没有好处。

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是以战略关系划线的。一边倒战略是以对苏联友好划线,凡是与苏联友好的,中国就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而与苏联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要与其发展关系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与苏联关系的问题。同样,一条线战略突出了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的敌对关系。中国与美国一起反对苏联的霸权政策,一方面不利于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政策,要受两国反苏霸权准联盟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国与苏联改善关系,中国与苏联总不能永远处在敌对状态。无论结盟还是准结盟,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一条线,中国在国际上都分别处在一个从属或半从属的地位,中国的独立自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国际团结,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支持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维护世界社会主义的形象,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要保持一致,苏联是这个阵营的领导国家。而在一条线战略中,作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阵线中的一员,中国必须与西方国家反对苏联的斗争进行战略配合,在反对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斗争中与西方国家站在一条线上,并实际上站在最前列,中国参加国际社会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但这个阵线的领导国是美国,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在结盟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是受到限制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改变与美准结盟的战略关系,而实行一条更符合中国的大国地位的战略路线。

## 2. 不结盟外交战略与反霸权主义

促使邓小平对美外交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理想主义的遗产。

邓小平在 1978 年回答中国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的问题时,曾

对外国朋友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现在如此,将来中国发展了也将如此。如果有一天中国在上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就等于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1982年,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提了出来。他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点时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个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特别重要,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但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第三世界,因为二战后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主要是小仗不断,而小战主要是在第三世界打,它的根源在于霸权主义国家在那里挑唆,在那里插手,利用小国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必须使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永远结束。邓小平指出,反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纲领。

反霸权主义自60年代提出后,其内容就不断有所变化。最开始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60年代毛泽东经常对欧洲国家领导人提起要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控制世界。到60年代末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中美改善关系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成了首要任务。80年代初,邓小平从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中国需要改变与美国在70年代初形成的实际上的准结盟关系,既然是霸权主义,都应该反对,而不管它来自哪一边。中国不仅要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也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这种考虑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向独立自主方向发展。

邓小平认为,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更有利于执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总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

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

邓小平还指出,各国都实行不结盟的政策,会更有利于世界和平,而同时,世界已经出现了各大地区实行独立政策的趋势,这也是推动中国进一步实行不结盟外交战略的一个动力。邓小平 1985 年 9 月指出,“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政策,东欧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还受到了法国外交思想的影响,邓小平多次对法国客人表示赞赏法国的独立外交政策,他在 1982 年对法国客人说,“我们历来欣赏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这不是今天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么评价的”。1983 年邓小平在提出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又说,“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

### 3. 邓小平不结盟外交战略的提出和实行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从 1981 年起调整一条线战略,逐步停止了与美国实行的实际上的准结盟关系,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最终与美国在 1982 年达成了“8·17 联合公报”,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准结盟关系转变为正常的国家关系。

到 1982 年 9 月 1 日,从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开幕词上可以看出,其有关中国不结盟外交战略的思想已经正式形成了。1983 年,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

是独立自主”。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虽然没有使用独立自主的外交这一概念,但它已经包含着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第一,邓小平不是一般地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问题,也不是一般地讲中国应当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特别强调国家间关系上的独立自主,指出,中国将格外珍惜长期奋斗争取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而且,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邓小平讲话中所说的任何外国,实际是有所指的,因为能让中国做他们的附庸的国家,当然肯定是要比中国强大,实际上主要就是苏联和美国,而中国与苏联早已不来往,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问题,惟有美国当时与中国关系很密切,而且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中国力量太弱,算不了什么,中国不值得美国如此重视。邓小平的讲话是经过近一年多的思考,是对美国国内这种希望把美国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意图的一种回答。更为明显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国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的,而邓小平紧接着上面的还有一段话,指出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中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不允许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荣誉。

1983年11月,邓小平已经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1984年5月,邓小平把中国对外政策概括成独立自主外交,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这一政策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不结盟”。它是相对于过去在50年代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外交战略,和70年代初与美国实际上准结盟的一条线外交战略而言的。邓小平为此特别强调:这个独立自主外交战略表明“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并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中国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415—416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8、335、225、274、246页。

1985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时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小平还更加明确地宣布,“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 4. 邓小平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内容

邓小平的不结盟外交战略,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四不一全”: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进行全方位的外交活动。

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基本核心,是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而这意味着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集团政治。这些集团政治的形式包括:

##### (1) 大家庭形式。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大家庭形式主要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依照这个理论,苏联有权对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东欧国家对苏联而言只是一个主权有限的国家,而苏联的主权实际上则是无限的,它可以借口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集体利益而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和军事占领,就像它在1968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样。

##### (2) 中心主义。

这是苏联为首的大家庭的另一种形式,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的共产国际。在这种形式中,多国的政治组织形成一种严密的等级制度,一个指挥中心对他国进行遥控指挥,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内部组织。

##### (3) 军事政治联盟。

主要是指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这样的多国参加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127—128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4、33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

的军事政治联盟,它们都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联盟集团而建立的,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在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对这两个集团的成员国或多或少地进行政治军事干涉和控制。

#### (4) 势力范围。

势力范围是指一些大国把自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或一些特定的地区和国家视为自己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保持强大的支配控制能力和影响,不容许其他国家插手。如过去美国宣布美洲是美国的特殊的利益范围,不许欧洲染指,苏联把过去的东欧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等。

不结盟外交战略与过去的联苏战略和联美战略有重大的不同,它首先体现为实行全方位的外交。邓小平指出,中国在不结盟外交战略的指导下,“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目前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实际进展。同苏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争取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这样就提出了中国必须调整与所有大国的关系的外交任务,这主要是指,调整过去与美国实行的实际上的准结盟关系,使之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防范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对中国产生重大的不利的影响;调整与苏联的关系,使之从一种实际上的敌对关系,转变为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这既是双边关系的需要,也是对付美国的霸权行为的需要;提升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使之从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变为一种在反对霸权主义基础上更加接近的关系。

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不与任何一个大国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邓小平的不结盟外交战略思想还包括,独立自主的中国必须始终珍惜自己的独立,要敢于同损害中国利益的任何国家进行斗争,中国要顶住任何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邓小平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

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对任何反对中国的势力进行的反华行动进行坚决的反击,捍卫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基础之上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在西方始终会有人进行反华活动,“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因此,虽然中国强烈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中国不会乞求美国。这也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中国早已在1982年时就形成了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这使中国能在形势大变时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地位上,并且在冷战后时代的新的国际格局中占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邓小平后来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 第五章 纵横捭阖中的大国关系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发展中的穷国,一个国力有限的国家。在信奉实力外交的国际社会中,美国和苏联曾控制和操纵国际社会几近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在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格局中,新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处理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历代领导人放在第一位的外交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在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小心谨慎地制定中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又及时地调整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这其中包含了他们的高超的外交智慧和智谋,也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在现时代的更高水平上的发挥。

### 一、中美关系

#### 1. 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思想及其变化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作为新中国的创始人,把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始终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上。从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中美两国关系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大体上可以说,毛泽东外交思想中关于中美关系的考虑,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三个时期的变化:

##### (1)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联美政策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对美国反法西斯给予较高的评价,希望与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萌生了联美反日的思想。他在1914年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时,已经看到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但

中国本身无力对抗日本,只有借助于美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美两国在反日战争中必“亲和接近”,此为“千载之大业”。

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预言,美国与中国必将结成反日同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受到苏联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美国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尤其是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全力扶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转而对中国国民党给予有限的支持。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兴趣,而是由于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表现有所不满。1942年,美国派驻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抵达中国后不久就发现,国民党政府是“由一个无知、专制、顽固不化的家伙掌握的机构”,而国民党军队则“处于令人绝望的状况,营养不良,领不到薪饷、未经过训练、没有妥善管理,由于贪污而腐败不堪”。史迪威将军由此与蒋介石产生了无法调解的矛盾。美国驻华人员谢伟思也在1943年提出要美国政府考虑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援是否对中国和对美国有利,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这些军援不可能有效地用于对日作战,而是可能用于内战,以使用武力强行统一全国”。另一个驻华使馆人员戴维斯也在1943年向政府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较自由民主,并得到人民拥护,为此建议“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1943年8月,史迪威将军提出了让国民党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军队联合作战的建议。蒋介石政府在1943年对中国共产党抗日军队发动的反动的内战,对中美英盟军在亚洲战场的对日作战计划产生了消极影响,使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美国驻华人员的一再建议下,美国罗斯福总统终于在1944年2

---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参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9页。

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1—178页。

月、3月和6月,连续三次向蒋介石明确提出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团的要求,并迫使蒋介石同意,因为当时蒋介石政府军队在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面前再次打了大败仗,一些美国的观察家甚至认为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1944年7月,美军派出观察团赴延安,这是美国从全面扶持蒋介石的政策到扶蒋也有限联共的政策转变。

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时会主动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主要原因是:第一,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抗战不力深为不满,美蒋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如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时曾说,他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比他听到的传闻更不好。第二,中国共产党在美军轰炸敌后日军时可给美军提供情报和营救美军的飞行员。更重要的是,美国当时正考虑在华北和沿海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希望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支持。第三,美国政府想全面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便为日后制定对华政策作准备。当时林伯渠和董必武曾致电毛泽东,认为“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是今天轰炸日本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这就是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題。

胡乔木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在延安时,与美国人打交道有两种关系,与美国记者的关系是对外交往,与美军观察组的关系是外交。当时为什么出现了与美国官方、军队合作的可能性?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当时出现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二是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派了观察组。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他们有求于我,我们则抓住了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情况并非是因为我们主观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最后落空了;更不是说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当了。这一点要写清楚。美国曾考虑给我们一些援助,但始终没有下决心;在观察过程中,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认为不需要了,这就失掉了合作的条件。如果美国给了我们一些帮助,有少量合作,也不能说明美国的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6—337页。

政策有了多大变化,它的根本利益还是和蒋介石联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也不会完全成功。

罗斯福总统的高级顾问霍普金斯在给总统的信中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

在这些外交官的影响下,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是以扶蒋为主,但也不放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在抗日战争后期有很大发展,主要有三件较大的事情发生,一是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二是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三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这时的外交虽然不是正式的,但中国共产党却是高度重视的,外交工作高度集中,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少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事实上,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们亲自布置安排。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要实行联合美国的政策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42年5月与驻在重庆的美国官员进行了多次接触,并向美方提出希望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参观,还向美方提出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1942年11月20日,周恩来在与美国使馆官员谢伟思和文森特会见时提出,希望美国采取措施来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具体而言,这些措施应包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反法西斯的力量之一,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应有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当时外交工作主要是针对美国的。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提出要派出由18人组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8—79页。

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参见刘德喜:《两个伟人与两个大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成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蒋介石出于无奈同意了。这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种官方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1944年7月4日,毛泽东特地指定为《解放日报》写一篇《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的社论,并亲自提出修改意见,其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美国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后来,在8月15日,毛泽东又亲自把美军称为“战友们”。

当时,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在这一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以较大的影响。他们在电报中指出,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又较小心,虽然不满蒋政府,但还是在各方面支持他,对中国共产党,美国为抗日要联共,但对中国共产党又怀着较深的怀疑,决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南方局认为,只有在现实已经造成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地位而美国又不能否认时,才可能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中国共产党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问题的主要因素。毛泽东对此深表赞成。

1944年7月22日,美军上校包瑞德和政治顾问谢伟思等人乘美军飞机飞抵延安,这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变,同时也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一个转变。在此以前,虽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团结英美等国一起结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但在理论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封建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而美国则是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最主要的国家,美帝国主义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也属打倒之列。然而毛泽东在美观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7—338页。

察组到达延安后,以极其兴奋和高兴的心情亲自动笔为新华社写下了一篇很动感情的社论,认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除了表示客气的欢迎外,毛泽东还在其中盛赞“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中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并称美国为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还在社论中强调希望美国最高当局能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为此发出指示,认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为普通的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的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要积极主动帮助其做好工作,要坦率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政治平等和讲原则的基础上,尽量照顾好其生活。毛泽东认为,“他们在延安要长住下去,因此必然会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建立友谊,但是我们必需时时提醒他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任何外国必须尊重我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更不能搬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要维护国格、人格。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

毛泽东当时已经看到了中国应当与苏美同时搞好关系的必要性,他对来延安采访的英国记者斯坦因指出,“中国不能只限于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英美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37—38页。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7页。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进步倚恃真正的世界和平。只有跟随各国热诚合作和帮助它们克服它们的分歧才能增加中国的国际地位”。斯坦因在谈到这点时曾认为,“延安的领导者们对于密切的中美关系和密切的中英关系的看法十分现实,也十分敏锐,所以他们不要求中国采取单一外交政策或者是特别依赖苏联”。

朱德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时也指出,“我们相信罗斯福总统,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会帮助中国的民主势力。……为拥护战后世界的民主原则,美国应该帮助另外的民主势力——而不是独裁势力。……你们美国人在你们的独立与民主的战争中也受到外国人的援助,我们请求你们对我们做同样的事”。

毛泽东等人甚至提出,为了表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中国共产党愿意将军队交与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不会同意建立盟军司令部,而只想要外国顾问,但我们愿意要”。周恩来指出,这个盟军最高统帅“必须是美国人,并且完全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朱德强调说:“指挥中国一切部队的一个盟国最高统帅是必要的。只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中国一切部队的平等待遇,惟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充分利用抗敌的一切武力和克服统一指挥的一切妨害,这一切妨害在过去曾大大阻碍了我们的抗敌方式。除此之外,中国军队没有别的配合方法”。朱德认为,“一个美国总司令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在中国人民和我们自己的官长与士兵心里,不会引起丢脸的问题,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欢迎有个盟国最高统帅,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指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破产了。再说,英国军队和人民不是曾甘心服从一个美国统帅的指挥进攻德国么?……有个盟军统帅团结中国一切军队从事可能的最大的作战努力,同时间接可以奠定战后中

---

〔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303页。

〔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193页。

〔美〕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0页。

〔美〕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14页。

〔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94页。

国团结的基础。而且以民主为基础的举国团结对于胜利的中国是最主要的”。

在毛泽东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44年8月18日,专门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的文件,对如何与美国、英国等在抗日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合作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个文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英国打交道时应遵循的原则,指出抗日根据地军民应站稳立场,“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的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立场”。这个文件还指出:

在军事上,经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的同意,美国、英国的军事人员可以进入根据地执行抗日活动的一切工作,并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欢迎美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提供军事援助;

在政治上,欢迎盟国在抗日根据地派出外交使节和外交机关;

在文化上,欢迎盟国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出记者来根据地进行采访;

在宗教上,欢迎外国宗教人员到根据地进行活动;

在经济上,欢迎盟国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各种经济和医药援助。

毛泽东的联美政策在当时主要的实现方式是:其一,美国空军对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根据地的日军基地和运输线进行轰炸,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则对美军飞行员进行救援和保护。据统计,1944年底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军飞行员达44名。其二,进行军事情报合作。美军当时曾向新四军五师提出,要和新四军进行合作,在汉口、上海和广州建立无线电通讯网,要求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以随时轰炸日军后方补给线,协商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登陆并与新四军协同作战。毛泽东对此曾多次致电新四军五师领导人张云逸和饶漱石,指示说:对美军提出的问题,“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敌军情报;第三,美海军

---

〔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94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573—576页。



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在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1944年9月1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再次致电说:“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所以,要“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可见,毛泽东当时对发展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是抱有较大希望的。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谈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时说,“从来没有那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地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接待美国派往延安的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时,致信罗斯福总统感谢其“为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并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浓厚友谊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进行的谈判,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涉外重要谈判,毛泽东亲自参加,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参与讨论,确定立场。在会谈中,赫尔利拿出一份提纲,主要内容有五点: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

---

转引自刘德喜著:《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9—341页。

〔美〕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23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40页。

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原则，双方将遵行提倡进步与发展政府民主程序的政策；四、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所有军官与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在谈判中对赫尔利的五点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政策也必须改变以适应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不然，协定就没有基础；第二，关于改组军队，这一条可能主要是蒋介石先生写的，我以为首先应当改组的是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待遇很好，如果要改组成与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一样，我们的军队就会吃不饱穿不暖；第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与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判中的立场是先对国民党攻一攻，把赫尔利五点中的最主要内容冲掉。赫尔利听完毛泽东的陈述，很不高兴，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合理一些。毛泽东在向赫尔利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后，作了一些妥协和退步，对五条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意第一和第五点，原来的第三点作为第二点，强调提倡民主与自由，确立各种自由权利，增加第三点为国民政府的改组和宣布实行改革军事、政治、经济 and 文化的民主政策，合并第二、四点作为第四点。赫尔利问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点是否仍要蒋当主席？毛泽东作了肯定回答。赫尔利对此感到满意，说“我们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敬佩毛主席的宽大态度，你所希望的各种改革，我完全同意”。他还说：“明天早晨我们签字后我还要赶回重庆去。请毛主席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是我的吉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结婚在星期五，第一个小孩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个勋章也在星期五”。在这次谈判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即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在改组政府上与蒋介石合作。中国共产党期待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在这一协议上签字，再次确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承诺实行抗日

政策和改组政府。但赫尔利回到重庆后,未能说服蒋介石,蒋介石还借机提出三个反建议,第一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由国民政府收编,然后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后,国民政府可指派中国共产党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第三以三民主义为国家之统一目标。赫尔利这时改变了立场,当周恩来向他问及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中提到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他反要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立场。周恩来当时曾主张,要设法寻找一个折中办法,使谈判继续下去,主张不直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如暂时不改组国民政府,可要求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在中国战场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作统帅,其策略出发点是拉美逼蒋成立联合政府。但毛泽东在听取陈毅的建议后,没有同意周恩来的方案。陈毅建议说,即使蒋介石同意中国共产党与赫尔利签订的协定,也不能根本改变局面,因为国民党政府的病症不能靠一个签字来改善,即使中国共产党派一两个人参加内阁(这对蒋来说已是大大让步),也不能改变国民党政府,而美国的企图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利益,在政治上,仍是要保持蒋的体系,并无诚意要改革政治,即使给我们一些装备也不过是美军的残汤剩水,这就是所谓公平分配,实际上是要中国共产党付出较大的代价替美国人做事。如蒋不签订这一协定并提出他自己的要求,反而对中国共产党有利。陈毅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坚持原来的五点协议,不拆开提出,我不入阁,也不宜急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而应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时间大发展,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毛泽东听取陈毅建议后,立即电令周恩来依此办理,拖一下再说。毛泽东还转告赫尔利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

这一时期,美国领导层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规模较小,而且也不稳定。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使与美国的合作继续下去。1945年2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5—355、357—359页。

要求华中局,为美军在沿海登陆做好配合工作。1945年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即将破裂前夕,先后两次与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谢伟思谈话,再次表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愿望。毛泽东对谢伟思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毛泽东尤其强调中美两国在发展经济合作方面具有的巨大可能性,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生活水平来提供所需的资本”,因此,“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而且,“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她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而中国“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此外,中国还能“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并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它将能够向其他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所以,“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还指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共产党是否得到哪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他们都有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实行与美国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都把这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地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望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而这种合作将使美国“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

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

## (2) 毛泽东的反美思想的第一阶段

尽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种种措施,希望与美国发展官方关系,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友好的这一番表白并未能得到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美国在1945年初改变了立场,完全倒向了蒋介石政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美国合作的外交努力以无果告终。

实际上在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的第二天,即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离开美国赴莫斯科之际,就发表了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声明美国决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美国只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支持。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尽管一心要与美国合作以牵制蒋介石政权,但美国政府立场的这一重大转变,不得不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重新思考对美政策。如果说过去,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的矛盾,且前者战胜了后者的话,那么1945年4月2日后,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重新在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中占了上风。毛泽东在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上所作的闭幕词中,正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毛泽东还特地引用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三大矛盾的论述,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把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公开于世,并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抨击:“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赫尔利后来背叛了他在延安代表罗斯福总统所实行的政策,“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

---

参见〔美〕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32—34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页。

人,而中国共产党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毛泽东最后指出,“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由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的政策,转向了反美反蒋的立场,把美国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敌人。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讲话中,明确把美国称为“美国帝国主义”,并认为它是“外强中干”,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表示“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在1945年时对美国的认识已经有所变化,但毛泽东直到1946年还未完全放弃与美国交好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11月28日制定的《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确定了中立美国的立场,指出“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只要美国军队尊重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应欢迎其与我合作,对美方应取友好合作的方针。

1946年,马歇尔来华时,毛主席要周恩来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毛主席讲这个话是有些原因的,一方面是策略,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摆出一个姿态;另一方面,对苏联也有看法,中国共产党当时确实想争取美国的援助,但中国共产党争取美国援助,斯大林又紧张。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希望那么殷切,反映出我党和苏联的关系虽时间更长久,但始终冷淡。胡乔木为此指出,苏联始终没有什么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7—4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52页。

转引自刘德喜:《两个伟人与两个大国》,第260页。

真刀真枪的援助。抗战后期,苏联在舆论上对我们的支持是有点,登了几篇文章,但当时国际舆论对国民党已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有所表示。就是在皖南事变时,苏联的反应亦不如美国。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解放区的外交方针的文件还指示在解放区要与美国进行经济上的合作。

到1946年7月,由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才彻底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想法,实行反美的外交战略,再次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这一个时期的反美思想,主要是与当时国共斗争的局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侧重揭露美国扶持蒋介石政权打内战的政策。而且,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集中于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反美政策限于在报刊上进行揭露和批评,没有采取其他更为具体的措施。

### (3)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美思想的变化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毛泽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一方面作好美国直接出兵的准备,1949年1月8日他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看到,在如何对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问题上,“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而且,“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初又产生了试图改变过于强硬的反美立场的想法。毛泽东在1949年3月谈到与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时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只是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态度来对待中国,所以“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帝国主义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8—89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6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1—82页。

能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也会考虑与其改善关系的。所以在 1949 年 4 月,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和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6 月,毛泽东再次把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区别开来,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在 4—6 月,毛泽东还批准黄华通过他的当时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书的同班同学傅泾波做工作,希望黄华能说服他的老师司徒雷登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黄华曾与司徒雷登两次会晤,向他转达毛泽东关于美国应当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看法。而司徒雷登则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两个条件:一是维护过去的美中条约,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要得到人民的拥护。

周恩来后来在 1967 年 4 月,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说,对于 1949 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认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我们解放南京时,美国大使还留在南京,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 50 亿美元。我们根本不理这套,结果美国大使就跑掉了。

到 8 月,当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时,毛泽东对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两文,实际上也表达了毛泽东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83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91 页。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143 页。



本人的心情,对与美国改善关系不再抱有幻想。毛泽东在文中不仅尖锐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种种罪恶,而且认为中国的内战“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并认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实际上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希望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想法成了毛泽东对美思想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 (4)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与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从过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考虑中美关系,不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考虑中美关系,而且更多地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

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关上了中美建立关系的大门。

1950年6月发生的朝鲜战争,使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卷进了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战争。两国关系从此由1949年以前的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不同产生的敌对,变成两个敌对国家的对抗。毛泽东在此之后,对中美关系的思考最多的是美国可能对中国产生的现实威胁,美国对于中国统一的阻碍。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美国既怕又不怕的矛盾心情,而且从他的讲话的实际内容来分析,似乎把重点放在了如何防范美国对中国进行侵略上,对美国实际上是比较担心的。1954年,毛泽东曾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中国独立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美国飞机飞到我国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我们很难睡稳觉”。当然,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且毛泽东也常把美国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98、10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165页。

比作纸老虎,但对美国在冷战中针对中国进行的“遏制”,如美澳新条约、东南亚条约等,中国还是担心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美国压力的心态,正像毛泽东所说,“美国可怕,又不可怕”。“如果说不怕它,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因为美国是孤立的,它的战线太长,不可能真的要和中国打仗,而且它真的要打,中国也不怕,“它打来,那末便要扫它几下……我们有力量,对帝国主义我们并不怕”。1956年毛泽东又对外国客人承认,“美国是有一点怕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也有点怕美国”。

在以后的时间里,毛泽东把美国作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他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经常强调这一点,“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毛泽东知道,光凭中国一国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与美国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的,最主要的是要发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行动。所以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尽可能地团结国际上受到美国侵略压迫的国家,结成反美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如美国的杜勒斯等应使用“绞索”,这个绞索就是美国在外的军事基地。“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美国把绞索“丢到了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它现在进退两难”,绞索会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因此,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自己一国的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不仅要团结“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且在“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20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99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8—34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8—509页。

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时说:“当前世界上最大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5月14日在与日本、古巴等国代表团会见时,毛泽东又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毛泽东在1959—1960年很强调反美,这还与中国和苏联的矛盾有关。当时苏联与美国搞缓和,中国是反对的,中国强烈反美,也是表明与苏联不一样,以反美来突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把中国放在反美最坚决的位置上,可以突出中国的作用,使中国与美国面对面地对立,摆脱中国受制于苏联的阴影。

从1964—1969年,毛泽东关于中国应把主要力量用于支援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声明和谈话,中心思想都是表明这一点的。尤其是在1964年1月12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口号,全面揭露美国在亚洲、非洲、东欧、西欧、拉丁美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深刻地指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提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美思想达到了最高点。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83、187—18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9页。

把毛泽东反美思想推向最高点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不在于意识形态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而在于当时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了美国的侵略压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些问题主要有:

其一,台湾问题。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阻挠中国的统一,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和军事基地,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独立。1958年台湾海峡两岸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出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与美国处于较强度的军事对抗状态。

其二,朝鲜问题。中国与美国在1950—1953年进行的战争,虽然美国未能在战争中取胜,但美国却在南朝鲜驻扎重兵,实际上对南朝鲜进行了军事占领。

其三,禁运问题。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经济禁运,也不准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做生意。

其四,不承认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时说,“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虽然毛泽东并不把它看得多么严重,但对中国的国际地位终究是不利的。

其五,联合国问题。由于美国反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

其六,战争威胁问题。美国不仅在中国周边国家日本、南朝鲜驻有重兵,而且在其他亚洲国家拼凑反华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反美思想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主导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两国的一些问题即使有改善,中国反美的旗帜是不能不举的。中美“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5页。

在中美国家关系上,毛泽东对与美国建交持一种较消极的立场。当时的形势是,美国没有与中国搞好关系的意向,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1957年在谈到与美国关系时,毛泽东认为,“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就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1959年12月,外交部编印了《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等三个材料。第一个材料指出,美国三次发表声明放宽记者访华限制,在中印问题上表现中立等,可能会引起对华政策的改变。材料说,美众议员周以德认为,美国要裁军,就要与中国共产党交往。摩门教首法兰希登认为,美国要以更多的注意力关注中国。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认为,最好同中国共产党直接打交道。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认为,美国工商业家同中国有多年通商历史,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外交部分析说,这些意图主要是:要抢夺和平旗帜,争取民族主义国家,继续推行其两个中国阴谋,但其中也有与中国扩大接触之意。估计今后美国可能更多地向我伸出触角,甚至利用华沙谈判向我进行新的试探。另一个材料是《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它认为,美国为了推行两个中国,正从外交、经济等方面对蒋进行控制,矛盾日益深化,表现为:美国力图贬低蒋的国际地位,使之成为一个小中国,公开宣传台湾是一个独立政治单位,逐步削弱在其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让盟国对蒋冷淡,而蒋则一再申明台湾和大陆是一个实体,不可分离,增派在联合国人员并设法恢复在其他国际组织的会籍,加强对

外机构。美国还从经济上加紧削弱蒋,以控制它,具体做法是削减美援,扶植台湾亲美的地方资本,而台湾反对美国对策则是力图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限制美国资本渗透,打击地方资本。外交部的第三篇材料是《美国最近发表的有关对华政策的五个材料内容》,这一材料指出,美国加州 31 个团体起草的《康伦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改变对华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以分阶段探索和谈判来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报告说,从长远看,应对中国继续采取实力政策,进行冷战。霍普金斯大学报告说,要从美国目前衰落的地位提出对中苏政策。美国外交学会主张用军事力量支持外交政策,加强冷战。斯诺则主张由国共直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

面对这样一些表明了美对华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材料,毛泽东以不变对万变,把美国作为中国最大敌人的思想没有变化。毛泽东在这些文件上批道:“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

1963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让刘邓、外交部、外办对美国国务卿助理希尔斯曼 1963 年 12 月 13 日的对华政策的演说进行研究。希尔斯曼的这篇演说是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发表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一份对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对华政策进行全面阐述的文件。这篇演说对中国仍然是敌意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提法:承认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中国问题;以在外围遏制中国为主;肯定中国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对苏政策对中国也适用。国内有关方面就此得出的结论是:估计美国对华政策会有一些灵活松动;它经过了长期准备,是美国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

但这些也没有引起毛泽东反美思想的变化,毛泽东甚至还想重新与苏联和好,把反对美国这一最主要的敌人的斗争放在首位。

1965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苏联祝贺中苏条约签订 15 年,说,“中苏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有利于确保我们两国的共同安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当前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是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主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大敌当前,要团结起来,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情况,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将坚决地同伟大的苏联人民站在一起”。

#### (5) 从对抗到缓和合作:毛泽东对美思想的再变化

毛泽东外交思想包含较强的辩证法,他总是善于在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时,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反美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与美国的关系能有所缓和。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对美国思想的变化是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这当然有道理,因为这的确是促使中国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重大事件,但严格说来又不完全如此。

就在毛泽东对外国客人大谈反美设想的时候,毛泽东内心深处也产生了要与美国搞缓和的念头。这种思想的萌芽最明显的表现在他与他在延安时期结下的老朋友斯诺的谈话中。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长达几小时的会谈。当斯诺谈到“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时,毛泽东向斯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毛泽东深信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战,“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要斯诺向美国领导人传递的另一个信息,“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更不会像美国人无端猜想的那样要占领整个东南亚。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〇”声明,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发表强烈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的讲话。事隔半年多后,毛泽东与再次来华访问的老朋友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明确表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页;同前书第10册,第467—469页;同前书第11册,第333—334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7页。

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这是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一个信号，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仅是针对尼克松个人。毛泽东在谈话时认为，“现在的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而且要优先让掌权的右派来，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当权者，“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还表示，尼克松来华，“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并表示考虑到美国 1972 年的总统大选，认为在 1972 年上半年可能进行会谈。毛泽东认为，“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

在 1970 年 12 月 18 日与斯诺谈话中，毛泽东甚至说他喜欢尼克松，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的欺骗的一面，又说，如果尼克松要来，“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他是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斯诺提醒毛泽东过去曾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毛泽东这时实际上已经把国内强调阶级斗争与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阶级斗争分开了。

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是在 1971 年，毛泽东当年作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批示，一个是放松对美国人来华的限制的指示，第二个是允许美国的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而这两个变化都是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精神的政策化。

1971 年 2 月 17 日，外交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美国人来华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说，1969 年尼上台后，两年来已约有 830 名美国人通过各种途径申请访华。此外，尼曾通过几个途径私下向我表示愿派代表来北京谈。鉴于美国国内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美苏在勾结的同时争夺激化，毛主席发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重要指示，改变了过去一般不让美国人来华的做法，这是带有战略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92—594 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170 页。



意义的重要决策。为贯彻这一重要指示,在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上,拟遵循以下原则:以我为主,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除对我友好的进步人士和有声望、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外,还可视情况批准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来访。在1971年,初步设想可批准若干起(约30人)美国人访华,一般根据对方申请,必要时我方可从旁推动。毛批示:“大体可以。凡没有主动申请访华者不邀”。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尼克松总统终于在1972年2月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再次明确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毛泽东还对中国在与美国对峙中的一些做法做了自我检讨,认为“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了一条线思想。他对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基辛格一向以聪慧著称,这时对此毫无准备,无言以对,不知该如何对答。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正式向美国提出联合对付苏联威胁的建议。会谈后,基辛格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他在回国途中发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敦促美国更放手地干——希望我们在各处反击苏联的图谋,同我们的盟国保持密切联系,维持我们的防卫态势”。

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时,有一个复杂的台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要把中美两国的关系作为一种战略关系,应当超脱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1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

转引自《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第179页。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台湾问题这一局部问题。毛泽东向美国提出，“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问题，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问题分开来处理”。当然，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完全断绝与台湾的关系，但考虑到美国的国内因素，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有个台湾问题两国就总是处于对抗阶段，而且相信，从两国的利益出发，“我想不需要用100年时间来处理”。毛泽东表示，中国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不能太着急，也不会催美国，“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毛泽东后来又对基辛格说，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和这相比，“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两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高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利益，所以应当从大局出发来处理中美两国关系。为了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毛泽东还提出了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建议，并亲自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到中国的东北、新疆、蒙古去访问。

毛泽东在1974年1月5日与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会见时，又提出一大片思想，两者的中心都是要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1974年5月，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中表示，现在中国对美国已经不再担心了，“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1974年11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基辛格访华请示毛泽东，说基辛格将于11月25—30日第7次访华，美出于同苏争霸的全局，在战略上有求于我，所以福特急于在今年内让基辛格再来一趟，以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毛主席在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的批语中说：叶帅已多次见基，我应邀请美国防部长来访，这样就把两国的关系从政治外交推广到了军事战略领域。基辛格这次来华才算对毛泽东的一条线思想有了个回答和交待。

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从过去强烈对抗发展到缓和，从害怕与担

---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6页。

心变化为比较放心,这种思想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大变化所致。

这首先是对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尼克松 1969 年入主白宫后,发现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之时,苏联利用美国的困境迅速发展力量,成为比过去更强有力的对手,因此尼克松上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带话和做姿态给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两国关系。

1969 年 3 月,改变对华政策的想法首先在基辛格的思想中模糊地形成了三角关系的概念。1969 年 6 月,尼克松让人向中国传递信息,7 月,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 100 美元的中国造商品,取消美国公民来华的禁令。在印尼、泰国访问时,尼克松又表示反对苏联针对中国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巴基斯坦,尼克松向中国转达希望对话的信息。在罗马尼亚,尼克松再次表示出同样的愿望。

1969 年 9 月,中苏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达成的原则协议,使尼克松政府加快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9 月 9 日,尼克松接见了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要他加快与中国接触,后又让基辛格三次拍电报给他,指示他加紧行动。1969 年 12 月 3 日,两国外交官一起出席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当美国大使见中国代办同翻译一起离开时,跟了出去,代办已坐进轿车,美国大使只好一把抓住翻译,用波兰语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最近刚从华盛顿回来,得到了同中国大使建立接触的指示。中国翻译说,他将向大使转达。12 月 5 日,斯托塞尔接到中国大使馆的正式邀请。12 月 11 日,美国大使来到中国大使馆,恢复了大使级会谈。美国大使后来说,他当时急出了一身大汗,而周恩来也对基辛格说,美国大使的行动使中国代办差一点得了心脏病。10 月,美国又通过巴基斯坦向中国表示,美国将停止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 月,美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

参见龚惠平:《周恩来同柯西金机场会晤及其启示》,《研究周恩来》,第 170—178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274—275 页。

毛泽东也及时领悟到美国方面的意图,通过斯诺和巴基斯坦政府等各种方式对尼克松的姿态表示出善意。1970年1月8日,中国驻华沙使馆代办回访了美国大使。中方向美方表示,中国可以答应美国提出的派代表来北京讨论问题的建议,并希望能接待部长级或总统特使级代表。1970年12月,毛泽东又通过斯诺向尼克松表示,欢迎他到北京来。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意识到苏联对自己造成的威胁要大于对方造成的威胁。对中国方面来说,中苏关系从过去的盟友变为敌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但他所领导的国家的利益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对中国来说,都是敌人,但苏联由于与中国接壤,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与中国在东北边境发生了直接的武装冲突,因此,敌人这个概念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美国虽然还是中国统一台湾的最重要的阻碍,还与中国处在敌对状态,但美国的威胁并不是太直接的,而中国与苏联的冲突则有可能使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1969年初,中苏发生冲突后,毛泽东曾指示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元帅研究当时的中苏中美关系问题。他们在1969年7月向毛泽东呈送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其中说:

美国、苏联一面与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又相互为敌,尼克松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会轻易进攻中国。苏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比美国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还有很大的顾虑。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对华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苏联扩张是挤占美国的地盘,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经常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这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这种变化,在整个战后的国际关系中,都有着转折性意义。

对美国来说,美国也看到苏联在军事上,尤其是在核武器数量方面已经赶上了美国,在战略态势上苏联已经居于攻势,力量对比发生

---

参见《毛泽东国际交往录》,第201页。

了对美国不利的变化。因此,美国认定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对两国都有战略好处。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时毛泽东的联美反苏的“联”与50年代初联苏反美的“联”,从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有质的差别。联苏的“联”,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根支柱上的。联美的“联”只是一种统一战线意义的合作,不是一种结盟关系,主要是基于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利益,而在意识形态上两家还是各唱各的调,并且是完全相反的,完全对立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现在我们把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这一思想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外交思想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放在比意识形态更高的地位上。尽管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但两个国家仍然可以合作。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当时苏联、中国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但谁又能说它们不会再次走到一起呢?只要国家利益有共同点,两个敌对的国家早晚会走到一起。这个命题有些像老黑格尔说的那个著名的命题一样:只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当然,即使是从国家利益上来说,对中国和美国双方来说也有不同的含义。对中国来说,是要改变反美又反苏这一对中国极不利的两线受敌的外交战略,是要联美这个敌人来反另一个更危险的敌人;对美国来说,联中与对苏缓和,主要目标是增加美国在与苏联的较量中的分量,取得一个对苏更有利的战略态势,是基辛格的均衡战略思想的体现。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美国是既要喝茅台酒,又要喝伏特加,在北京与莫斯科继续敌对的情况下,它除了借助我们的力量之外

没有别的选择。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毛泽东的对美思想在经历了 30 年甚至可以说 60 年的磨砺以后,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起步的地方。在 1944 年,毛泽东向美国提出了中美两国合作的战略思想,但那时的美国总统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一来自中国西北一个极为偏僻的延安发出的信息;1914 年,当毛泽东还是一个村野少年,只不过是与朋友的闲谈中说起过中美亲和对日的想法。但有谁知道,对美友好,与美合作这些想法在 60 年后,在 30 年后却变为现实,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战略。

## 2. 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想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邓小平对美的战略思考是建立在反对苏联这一最危险的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基础上的,这一思考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而达到了极至。邓小平当时多次指出,战争主要危险来自苏联,所以“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也包括美国。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主要力量”。邓小平还批评美国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1980 年他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说,苏联的霸权主义不会变化的,大家要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联美反苏构成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的基调。

80 年代初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后,邓小平的对美思想主要有:

(1) 中美两国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而且也是事关世界的重要关系,两国都应当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处理两国关系,应当从大局着手,不要纠缠小事。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多次讲过,中美两国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从战略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01、221 页。

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如何认识中美关系,事关两国关系是继续发展还是停滞不前,邓小平提出,“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但不要停止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邓小平认为,中美两国不要光看到两国的问题,“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

在 1988 年邓小平甚至指出,“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

所以,中美关系非要好起来才行,因为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从 1972 年到现在的 17 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

当然,中国真心诚意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但中国也必须面对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因素。邓小平指出,“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还经常有那么一些事情或因素来干扰这种意愿。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邓小平认为,美国对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处理中美两国关系不够重视,“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2—23、166、191—192、232 页。

起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

(2)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作为大国和强国应当在改善中美关系中采取主动。

邓小平认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也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在现实中,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改变社会制度,但中国不可能改变社会制度来迎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照搬,美国制度好不好由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但要中国照搬美国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在 1989 年 7 月 2 日会见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因此,在中国向美国表示善意之后,“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但美国却采取行动中断了中美正常关系,对中国进行制裁。而且,“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太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

(3) 中美两国不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应当相互让步,照顾对方的利益,要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建立起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不能打架,不仅不能在军事上打架,而且在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也不行,不要提倡这些。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



双方都要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邓小平早在 1975 年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时就提出,“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点”。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邓小平专门与美国领导人谈到了如何建立起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问题,邓小平在 1983 年 2 月向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我们两国之间的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

(4) 中美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此处理中美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台湾问题。

邓小平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立场,不能作出让步。邓小平在 1977 年 8 月与美国国务卿万斯会谈时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坚决拒绝美国方面提出的要中国承诺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指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07、265、433、443、23、442、247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0—351、331 页。

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症结,就是美国坚持要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与中国建交时,美国国会于1979年1月26日通过美国政府提出的《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邓小平为此多次指出,“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邓小平在批评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时指出,“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的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邓小平认为,“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出卖武器、装备给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种损伤”。邓小平还向美国人指出,“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大的障碍,还不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1984年,邓小平还对来访的美国总统里根指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发性问题”。

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上的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就是,

防范台湾独立势力利用台独来加深中美关系的矛盾。邓小平在1985年9月指出,“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

## 二、中苏、中俄关系

### 1. 毛泽东关于中苏关系认识的变化

中美关系主要是个国家利益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更为复杂,因为在相当长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对苏的考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苏关系实际上包括两层关系,一是意识形态关系,即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问题,是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的问题。二是作为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领土完整、国家民族尊严、主权、独立、经济利益等问题。两个本来不同的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被紧紧地联在一起,很长时间里分不清楚,扯不明白,但这终究是两个有重大区别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问题,在毛泽东考虑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时,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两者的关系也常常难以很好地被把握,最终导致了两者从完全合一变为最终分离和对抗。

#### (1) 建国前联苏抗日和联苏反蒋的思想

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中国革命与苏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他在1936年9月时就曾制定了打通革命根据地与苏联之间通道的战略,并为此下令红军要夺取宁夏,因为夺取宁夏是发展红军的枢纽,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6、36—37、90、97、118、204—205、228、232、282、335—336页。

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具有决定意义。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时,把联合苏联始终作为一个既定的方针。他把抗日战争时的力量分为四种:第一,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应该打倒;第二,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三,“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要“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第四,对苏联,中国应“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但是无论是联苏抗日时期,还是在后来的联苏反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有特殊的紧密关系,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盟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联苏”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对外政策上支持和拥护苏联。比如,在1939年9月1日,当苏联与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不仅完全肯定和支持这一条约,而且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它“巩固了苏德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奠定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毛泽东还按苏联的宣传口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德意帝国主义集团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掠夺性战争,是不正义的战争。

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和物资援助,主要是给国民党政府的,给中国共产党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主要存在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

---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8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23页。

实际情况决定的,但其中受到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实行的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方针的影响。而且,苏联为了与美国、英国搞好关系,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上,较为拘谨,甚至有时为了苏联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也为了给美国、英国以面子,在许多场合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与英美达成妥协,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放在第二位的。

毛泽东后来在讲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时说,“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 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因为联苏抗日,对苏联的意见较为尊重,但结果使中国共产党吃了大亏。因为斯大林派王明回国,他按照苏联的意见,“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一切服从国民党,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再有,就是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进行的是否真正的革命”。

不过当时毛泽东对苏联的意见还是很看重的,如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毛泽东一开始不想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但 1945 年 8 月 22 日左右,斯大林来电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快。毛主席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打来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36—237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53—254 页。

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到最后,毛泽东还是去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

在1958年7月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对此有所论述。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过问题,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就向我进攻”。

毛泽东在1948年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 (2)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说:“‘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采取一边倒战略?其中的原因有五:

第一,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现代革命的经验决定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的。这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在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当然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

第三,与当时的世界冷战格局,与当时存在的两大阵营有关,美国与苏联尖锐对立,想走第三条道路是不行的。

第四,与当时美国奉行的反共政策有关。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附属,中国共产党必然跟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美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0—40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2页。

《毛泽东选集》,第1473页。

国对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实行遏制政策,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派黄华与他在燕京大学时的老师、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进行接触,甚至考虑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辩证法,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相对于苏联的独立性,认定中国共产党必反美,因此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

第五,从当时新中国建立后急需发展生产的角度来看,苏联比美国更愿意给中国以援助。如果中国保持一种所谓的中立立场,则苏联可能也会采取观望态度。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联苏思想,与过去不同,既考虑到国家利益又考虑到意识形态,是二者并重的时期。1950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即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指出,中国之所以要把与苏联结盟的关系以国家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主要还不是因为中国与苏联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由于这对新中国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他又说,新的条约的主要内容是防御日本及承认外蒙独立,以及其他的协定,“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也就是说,与苏联签订一个保持两国紧密关系的条约,主要是为了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能有所提高和巩固。

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主要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小兄弟与老大哥的关系,是一种不太平等的关系。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确定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日期。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再提出由斯大林决定中国方面访问的时间及主要人员。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1949年11月9日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说:我们已请柯瓦略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20—122页。

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为了向斯大林表达中国人民对他的尊敬,毛泽东特别选定了12月作为访问苏联的日期,因为这样可以参加斯大林七十大寿的庆祝活动。毛泽东在祝寿贺词中盛赞斯大林,称斯大林为“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认为“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说明了中苏条约的重要意义。他说,“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较为尊重苏联的意见。如在1950年1月,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建议中国给联合国安理会发一个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有资格继续作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合法代表,并表示苏联愿协助中国行动。毛泽东马上给周恩来发去电报,要周恩来照此建议采取行动。又如,后来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时承认,新中国在与南关系上是采取与苏联一致的立场的,“自从我们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3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5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1页;同前书第2册,第123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23页。



建国以来,你们就一贯支持我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我们同你们延迟建交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后来毛泽东对此解释说,中国是个独立国家,为何要听苏联人的话?“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因为苏联也有人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后来还说过,“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维护苏联的中心作用,“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

这一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苏联作为中国的老大哥,对苏联极为尊重。毛泽东不仅号召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全面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验,而且在最为关键的军队建设上,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让苏联顾问参与重要的军队领导人会议,并把是否向苏联顾问虚心学习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他说,苏联顾问可以参加部队党委会议,而且“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

1952年12月27日,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报告说:“苏联顾问卡林对总干部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后,他们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召开了座谈会,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顾问对我们干部工作的成绩、缺点和今后改进工作谈了不少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好,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把这个报告转发全军,并“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学习苏联经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4—215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5页。

验是真学,不是做样子。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全军,凡与苏联顾问发生冲突的,都要写检讨,并指示“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迅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二次,1953年应于7月间检讨一次。此件并发给政府系统各有顾问的单位以为参考”。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号召掀起全国学习苏联的高潮。他说“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真心学习苏联,甚至把与苏联的关系放在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自觉地把中国几乎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提前事先告诉苏联,让他们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的情况。

1955年4月,毛泽东要杨尚昆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交尤金转苏共中央,请其提意见。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说,“现特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求你们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你们的意见希望于6月1日以前通知我们,因为6月间我国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并要公开发表。自然,提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亲爱的同志,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此外,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

会议上,还有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和我的开幕词,一并送给你们,作为参考。你们如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如有意见,也请向我们提出。这些都是不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并且是机密的”。

在中苏同盟的前几年,情况是很好的。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时评价说,“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156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1945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所以这个同盟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

1956年时,毛泽东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主要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的。如在批评斯大林过去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压制时,毛泽东还强调在外面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形象,对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关系,毛泽东还是很满意的。他在1957年为中国实行的对苏联“一边倒”政策辩护时说:“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我们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07、674页;同前书第4册,第1、45—4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8—199页。

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

一边倒战略在当时中国的成长和壮大过程起了积极作用。它使中国得到了当时苏联的大量和宝贵的援助和经验,一大批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是不能否认的。

但应当指明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其实并不是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老大哥和小兄弟的关系基础上。而中国是注定不会永远做小兄弟的,这也埋下了两国关系不和的种子。

### (3) 苏共二十大和毛泽东对中苏关系的重新认识

1956年3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由此对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亲密的结盟关系开始产生不同的看法,开始重新考虑中苏两国的关系。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是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起点。这次讲话也涉及了对中苏两国关系的重新认识。毛泽东打破了对苏联模式的崇拜,认为任何民族和国家,包括苏联也有短处和缺点,对苏联经验,也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比如,国内有人认为,苏联设电影部、文化局,而中国是设文化部、电影局,中国也应向苏联学习,但没有想到后来苏联也改过来,设文化部、电影局。毛泽东还批评“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中苏关系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而中苏同盟出现裂痕也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的过程中,也开始涉及到两党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过去不能批评斯大林,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也导致两党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甚至带有某些封建色彩。“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78—279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7—238页。

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

1957—1958年是毛泽东对苏思想发生转折的年代,有两个相矛盾的因素推动毛泽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来处理与苏联的关系。

一方面,苏联1956年发生的事情,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一是对苏联经验的重新认识打破了对苏联经验的崇拜,不再把苏联经验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开始思考苏联经验中的不足。二是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上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打破了国内对斯大林的崇拜,而当时的赫鲁晓夫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取代斯大林的形象,出现了无形的竞争。对赫鲁晓夫,毛泽东远不如像对斯大林那么服气,如果说过去可能不服斯大林但无法与斯大林的威望相对抗的话,现在这个因素不存在了。从国家实力说,中国当然远不如苏联,但按领袖的个人资历和影响,赫鲁晓夫远不能与毛泽东相比。三是过去在苏联正确思维掩盖下的许多矛盾在这时得以爆发,这些矛盾既有历史上形成的老账,也有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家利益上与中国的冲突。

这三种变化成为毛泽东的对苏关系思想向与苏联对抗方面发展的刺激因素和动力。

另一方面,前一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冷战格局,也继续推动毛泽东对苏关系思想中那些旧的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要维护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利益和形象,而且毛泽东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放到了这个集团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的地位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利益极为重视。正是在这种旧思维的推动下,毛泽东仍然把对苏友好继续放在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位置上。

这样,在1957—1958年,毛泽东对苏关系的思想受到了两个矛盾的因素的推动和影响。前者使他对苏联不满,与苏联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后者又使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苏联为首的集团利益,并

在维护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利益中起一种比过去重要得多的作用。

传统的对苏思想在这些年代发展到了极端。甚至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也没有把苏联推到如此高的地位,但是在1957年,在经历了1956年的动荡之后,毛泽东的维护苏联权威的思想却发展到了高峰。

1957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它的中心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树立以苏联为首的信念。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个首。就我们的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毛主席认为,过去斯大林时有些不愉快,但是“我们要看大局”,与苏联的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说,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现在是协商的办法,在斯大林后期不可能,“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譬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

在第三天,毛泽东第三次发言强调苏联是头的道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问题,说很高兴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就像一个国家、一个党都有一个头一样。哥穆尔卡也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

在谈到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时,毛泽东以绿叶与荷花的关系作比,说“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毛泽东还把会议承认和强调苏联这个头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认为它“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团结一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

但与苏联不和的因素后来很快超越了与苏一致的因素。

1959年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全面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的矛盾和分歧。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

1945年,苏联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1945—1951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同盟互助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954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我们两篇文章。1957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6、627、628、629、639、640、649页。

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同年,1959年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泽东后来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中国要“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但苏联也加入了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而“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这时毛泽东已经把苏联作为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了。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还公开指名批评苏联领导人,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的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毛泽东还特别批判赫鲁晓夫的所谓“对表论”。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党的七大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在看到这个讲话几天后写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批判说,“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总结起来,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历史因素。这不是单纯的算旧账,而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中国与苏联以及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重大的问题。

第二是意识形态因素。这一因素又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

对外的矛盾表现为两国两党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

苏联当时主要攻击中国不要和平共处,认为战争必不可免。而中国对西方凡是报道扩军备战,认为东西方关系紧张的观点都持欢迎态度。一些西方报刊认为,在观察国际问题上,中国比苏联高明,尤其是在预测美、苏、法、英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每次都是中国分析占上风,西方一些记者甚至称 1960 年是中国年(如法国《快报》1960 年 7 月 14 日发表题为《中国年》的社论)。毛泽东在 1960 年 1 月 12 日看到《外国资产阶级怎样议论中苏分歧》等材料后,分别在中苏分歧的问题上加上了着重号,这些分歧涉及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最主要的有:一、苏联害怕战争,强调缓和、和解与和平共处;中国不怕紧张,不放弃武力抵抗,反对和平主义。二、苏联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样要和平,采取亲美政策;中国不信任美国,坚持反美政策。三、苏联主张引诱民族主义国家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拒绝煽动反帝火焰;中国要联合反帝力量打击美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开展革命斗争。四、中国坚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认为无需打苍蝇。

1960 年 5 月 16 日,赫鲁晓夫的对美国缓和的政策遇到了麻烦,因美国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赫鲁晓夫被迫表示,要美国惩办罪犯,当美国拒绝时,苏联退出四大国会议。西方一些国家纷纷揣测赫是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中国的影响。保加利亚报刊提到,不应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波兰认为,中国同志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有道理,帝国主义本性不变。苏联记者说,现在的事实证明,中国党关于帝国主义本性不能改变及其有两手的论点完全正确。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601、602 页;同前书第 9 册,第 252、250—253、263、7 页。

这个事件坚定了毛泽东对苏联对外政策进行批判的决心，并且更加相信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1960年6月7日，毛泽东看了宦乡写的国际形势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说得很好，批示把它印发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宦乡在这个报告中指出：1. 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表明，一年来国际上流行的对西方抱有幻想的政策是错误的；2. 苏对美的政策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变为坚决揭露和斗争，是美国逼的；3. 赫鲁晓夫态度软化，表明对帝国主义本质、战争与和平等根本性问题没有真正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可能还会有犹豫；4. 事件也使美国丢脸；5. 加剧西方阵营混乱；6. 西方怕中苏加强团结，会把矛头对准中国，加紧挑拨中苏关系，对此应该慎重处理。

毛泽东为了争取苏联与中国一道反对帝国主义，为了向苏联表明对美缓和政策行不通，还把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的《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送给苏联人看。这个材料指出，美国在1960年的军费为450亿美元，有640万人从事与军事有关的活动，其中军火及军事建筑303万人，部队250万，军事开支占政府开支的9%，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批示说，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毛泽东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说：“此件送给你一看，值得严重注意，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一个问题呢？”中国对苏联的批评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8年10月20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个方面的情况有一些新变化。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在国际斗争方面，对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较之前有了比较完善的论述。赫鲁晓夫从北京回来后的几次公开演说和苏联报刊宣传，都强调了我們不怕战争和和平不能乞求的正确立场。苏联对东风压倒西风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但认识的深度还不足，对战争与和平、紧张与和缓的辩证关系理解不够深刻，掌握不够熟练，对于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和毁灭性仍有顾虑，甚至在指导思想上还占着上风。第二，在同我国的关系方面，由于中苏两国政策思想更趋一致，苏联在国际斗争中同我国的配合比较密切。苏联对我国在

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我国对苏联的影响,已在若干政策上发生作用,他们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

毛泽东试图做工作,帮助苏联改变政策的办法,作用是很有有限的,苏联领导人也不能完全赞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在国际局势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趋于冷淡。在中苏分裂前夕,毛泽东于1960年7月指出:苏联“态度有变化,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当时,中国驻南代办报告说,自从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苏已将矛头对准中国,不分敌我,苏联报刊对中国消息一点不报,连中国两字也抹掉了,南斯拉夫已看到这一点,自1960年6月以来,基本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不与我交锋,南报大量发表苏中有矛盾的报道,我馆干部天天接触这一问题,可否有必要对干部做个交待,驻苏大使也报告说,苏正对中国冷淡,不与大使约见,不答复,不热情。

意识形态的矛盾也表现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个问题上,对苏联的批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中国使馆的上述报告还指出,苏联对于我们党的战略思想和策略的运用以及我国当前发展的许多新事物新思想还理解不深,对人民公社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和目前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问题不很了解。中国的情况对苏联也有刺激。中国使馆的报告说,苏联国内情况最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特别强调要加快建设的速度。赫鲁晓夫从北京回来后的公开讲话和报刊宣传,都强调要赢得时间,加速建设。报告还说,苏联形势今后继续向着健康的方面变化的这个总趋势是肯定的。这将主要表现为曲折和渐进的变化过程,但变化的快慢将最终取决于苏联内部和外部因素对它相互影响的发展。

1959年1月13日,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一年来,苏联对中国重大方针政策主要是赞扬的,对一些问题有保留,这是自然的,对此处理不好,易引起苏联同志误会,不能不谨慎。近来有些同志不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有办法,无所可学,不适当地强调我国的成就,甚至夸大我国的建设速度,不负责地随便讲未确定的远景,有的甚至

态度傲慢,使苏方难过,建议多做工作。毛泽东认为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1958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联使馆报告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约夫楚克在讲课时说,不能把中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苏联来,中国人认为人民内部有矛盾,而苏联不同,只有部分官僚与被领导者之间有矛盾。有些人(中国)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拼命地干,认为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的规律,有些人(中国)认为国家应立即消亡,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要一些中央领导看这个报告。

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又指示印发驻苏使馆报告,并起名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该文说,苏联一些干部基本特点是抛开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同天,毛泽东还指示印发《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这是苏联国家计委计划司长瓦修金在使馆作的报告内容,认为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一半,要大力革新才能保证超过美国。毛泽东为苏联经济出现了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苏联一些人的重视而感到自豪。他还引用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话来证明,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路线是对的,因为岸信介曾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毛泽东因此对持批评意见的人说:“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

苏联对中国的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毛泽东知道后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1959年7月21日的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7月18日在波兰一生产合作社的讲话,说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建立的是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96、201、202页;同前书第7册,第486—487页;同前书第8册,第5—6、28—29页。

农业劳动组合,而不是公社,公社建立了,当时没有条件,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美国《纽约时报》在7月22日指出,这是苏联领袖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去年秋天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使俄国人烦恼。毛泽东看到这个报纸的文章后,指示要印发这两篇文章,并请有关人士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毛泽东让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准备调查材料,“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请……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后来按毛泽东的指示,他们准备了三份材料,一份是有关公社的一些资料,第二份是《关于十月革命初期一个公社的回忆》,第三份是《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解释。毛泽东在印发这些材料时加了一个标题,叫《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和《第一个公社的回忆》。有一个苏联人在题为《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的文章中指出,“借助于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其公有化的水平,并不意味着将农业组合变成公社”,“而在共产主义下,公社作为一定所有制占有者的集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所有社会财富都是全民财产”。毛泽东读后很生气,认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的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

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毛泽东曾经想在1959年国庆节后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但后来毛泽东觉得这样不妥,没有让发表此文。上述这些都可以表明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对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是很不满的。

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两个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在两国关系受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时期,毛泽东有了一个思考中苏关系的新的角度,那就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思考中苏关系。

这一时期是中苏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变化之一,是更多地从国家利益,而不是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角度来思考两国关系问题。为此,中苏两国间生出了新的矛盾冲突点。

在处理中苏关系的初期,毛泽东对从国家利益上看两国关系是不太敏感的。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帮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拥有原子弹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向赫鲁晓夫表达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愿望。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想同苏联同志商量,希望能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想了一下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太费事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它。我们的想法,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改善人民的福利为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你们目前要搞热核武器,我看把中国目前的全部电力都用上去,是否够用也很难说,那么,其他生产怎么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先建一个小型的原子反应堆,也可派一部分有基础的人员去苏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7、385、390—391、390、462、463、511、504页。

联学习、深造,你们以为如何?毛泽东只好说,让我们考虑以后再说。毛泽东过后又曾向赫鲁晓夫提出过希望苏联帮助中国搞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样品的问题,但都被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件事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尽管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从1957年起,毛泽东就开始较多地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角度来思考中苏关系。他在1957年1月中国共产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中苏关系“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毛泽东还第一次明确讲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提出要与苏联的大国主义作斗争,“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周恩来在苏联的时候,“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苏联长期以来的大国主义不满情绪的一次大发泄。毛泽东还表示,现在中国还是要尽量争取与苏联同志改善关系,但“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中国会把过去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要统统捅出来”。

1958年6月发生的苏联要在中国建特种长波无线电台事件,表明了毛泽东对中苏关系的认识的一个重大转折。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指挥在太平洋的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1亿1千万卢布,苏联负担7千万,中国负担4千万。毛泽东在彭德怀给毛泽东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报告和1958年6月4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纪录稿上批道:“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又表示,“这是中国的意见,

---

参见师哲:《领袖毛泽东》,第13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2页。

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毛泽东还特别生气地对尤金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又说,“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毛泽东说,中国不再和苏联搞核潜艇舰“合作社”,海军“合作社”和长波电台“合作社”。因为这有损中国主权,中国这样做了,“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毛泽东认为,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毛泽东这里讲的政治问题,就是国家主权问题。

毛泽东还联系过去苏联对中国的大国主义,对苏联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6—317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0页。



国人”。毛泽东还对苏联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表示强烈不满,批评苏联领导人把中苏关系当作“父子关系”,说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联合进攻……”当时,这些人对毛泽东代表中国要回中东路不满,于是毛泽东“发了脾气,拍了桌子”。在向中国派苏联顾问上,毛泽东也有所不满,指出“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1958年台海危机时,毛泽东对苏联也不满意。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可以叫黄克诚将8月19日汕头空战以来五十多天中,我歼敌机多少,敌歼我机多少,确查统计,准备告诉苏方,他们信敌人谎报,不明敌情……地对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

另一个引起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因素是1959年发生的事件。毛泽东后来谈到中印边界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时说:“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

到1960年,两国关系进一步公开恶化。赫鲁晓夫利用中国的困难,决定在7月召回全部苏联专家,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把两国友好的脸面也撕破了,两国关系走向破裂。当时邓小平总书记在苏联参加中苏两党高级会晤,他郑重向苏方申明:“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和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23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6页。

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中国发展核武器上,苏联与中国也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苏联撕毁原来的协议,要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向苏联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后,苏联又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关于这一点,在基辛格同毛泽东的会谈中也有表述,他说,“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你们总理和大使说过,我们想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子武器”。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从盟友逐渐变为敌对关系。

#### (4) 从盟友到敌人:毛泽东关于苏联也是纸老虎的思想

1958年后,中苏关系表面上维持着盟友关系,但实际上双方的关系是在不断恶化。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的分裂实际上在1958—1959年就已经开始了,他后来说,“我们在1959年决裂。他们1958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他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他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耀”,毛泽东当然不买账,两人就谈崩了。

到了1963年,毛泽东不仅在国内的讲话中,而且在与西方人士

---

转引自《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第145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记录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记录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的谈话中,都已经公开谈论两国的矛盾了。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首次把苏联与美国相提并论,认为西方国家对美国不满,而“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中苏两国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

1964年,毛泽东已经把美国、苏联都当作中国的敌人,认为“美国是只纸老虎……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那一套,我不迷信。……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1957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毛泽东认为,中国不怕与苏联和美国同时进行斗争,因为美国和苏联只是两只大纸老虎。“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

在中苏矛盾公开化后,毛泽东对苏联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了。在1964年时,苏联曾提出要求停止中苏两国的争论,这从当时来看是有益于改善两国关系,对中苏两国都是有好处,也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苏联“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3页。

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苏之间的这场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双方都是有害的。对中国的害处更大，因为正是这场争论，使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得以发挥和发展，并把中国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 (5) 1969年后中苏关系变为敌对关系

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两国从意识形态上的公开争论走向军事上的直接对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在战略思想上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但又以现实主义的立场来处理中苏两国关系。周恩来1969年3月22日报告毛泽东说，从21日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说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有命，有话要转达。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说，这是苏联试图以外交活动方式来强占珍宝岛，中国方面可以备忘录形式答复之，可以让外交部出面向苏方提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通过外交备忘录形式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表示赞成，指示有关方面研究中国政府的备忘录立场，准备与苏方进行外交谈判。

但毛泽东反苏联霸权的思想，把苏联视为中国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的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到最后也没有改变。在毛泽东看来，中苏两国的问题是苏联对中国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只有苏联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中苏两国关系才可能好起来。

毛泽东在晚年时还说，“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俄国对）中国有啥好怕？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7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1页。

呢？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

这个思想后来在邓小平的对苏联思想中得到了发展，邓小平提出的中苏改善关系必须苏联先拿出实际行动的思想，与毛泽东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 2. 周恩来关于中苏关系的思想

作为中国对苏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周恩来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是支持毛泽东的立场的，但他对苏联的批判比毛泽东要缓和一些，对苏联援助中国的积极意义，也始终给以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在1956年10月谈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时，中肯地说：“关于苏联的帮助，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有时帮助的方法有毛病，他们也有主观主义。苏联同志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斯大林过去倒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各种工业部门都要搞起来，要担负起保卫东方的责任。苏联帮助我们，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互利的。（苏联）总的来说，还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考虑苏联的困难。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设备”。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是一度坚持苏联为首的提法的。1959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9、180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2—173页。

年2月苏共二十一大会议前,苏共中央与中国共产党协商,要取消过去曾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并认为这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事态,但毛泽东、周恩来却认为,在现在条件下提出这一问题不妥当,因为以苏联为首,以苏共为中心是历史形成的,四十年来一直如此,而且也需要这样,同时,这一提法也写入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应该予以坚持。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苏共二十一大时,说服了苏共,不再提出这一问题。

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后,周恩来在中苏和解问题上更为务实。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对苏联在对华关系中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极为不满,多次在与外国朋友的谈话中抨击苏联。如1973年8月说,雅尔塔协定把中国的大部分划为美国势力范围,把东北、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使中国的外蒙古独立,依附苏联。1975年1月,周恩来会见联邦德国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说起今天的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说黄祸的,头一个是德皇,后来版权被赫鲁晓夫拿去了。施特劳斯说,这件事发生在1955年10月阿登纳访问苏联期间。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改善中苏关系,缓和两国矛盾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1964年10月28日,在赫鲁晓夫下台和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际,周恩来对利用苏联领导更替的机会来改善中苏关系持积极立场。他在接见苏联大使时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派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参加莫斯科十月节,与新领导接触;二是如果有困难,中方可以欢迎苏联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公开或不公开都可以。10月30日,周恩来对东欧6国大使说,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是一个好事,我们打电报对新领导人表示庆贺,我们还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已向苏提出,派一个代表团,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和总理为首,这样能有机会互相接触。10月31日,苏联大使转告说,欢迎去苏联,并认为这可以为进行接触和交换意见创造条件。11月5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但苏联领导人没有真正领会周恩来和中国领导人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顽固地坚持赫鲁晓夫的反华立场。在周恩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82、707页。

来与苏联新领导的会见中,发生了所谓马利诺夫斯基(国防部长)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攻击和恶意挑衅的事件。在欢迎宴会上,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这时还有美国记者在场,周恩来对苏联人的挑衅当即严词驳斥并愤而离去。周恩来在11月9日与格瓦拉共进早餐时说,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表明,一他企图当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记者的面侮辱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我本人;二企图煽动中国党推翻毛泽东同志;三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原则性争论看成是个人权利之争。这是赫鲁晓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一会儿骂帝国主义,马上又伸手同帝国主义友好,接着来攻击中国党。

1969年3月中苏冲突发生后,周恩来为防止两国间爆发战争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从中国方面来看,根据中国历来的原则,所有国家间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且,现实情况是,当时中国“文革”使国内政治混乱,安定国内需要有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中国不希望与苏联关系继续恶化;当时,中国面临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又在进行抗美援朝斗争,南北同时都不安定,不能与苏联进一步恶化关系。对苏联来说,对中美关系改善抱有警惕之心,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当选后,一再表示要调整中美关系,1969年4月,美国驻苏大使向苏联政府提交了尼克松的信,说美国不想看到中苏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但同时也告诉苏联,美国希望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实际上是对苏联进一步对中国采取行动有所警示;苏联自身也有问题,主要是1968年入侵捷克受到了各国的反对,如果再与中国发生战争,会对莫斯科的形象造成更大的损害;在越南战争上,如果中苏两个越南的最大的援助国发生更大的冲突,对苏联想进一步参与越南战争的战略也有损害。

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双方都派代表赴越进行吊唁。借此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举行

---

参见《周恩来传》,第828页。

了会晤。周恩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表明了中国不希望与苏联进行战争,希望两国关系能有所缓和的愿望。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中国无意与苏联进一步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都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从而向苏联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但周恩来也严正警告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为解决双方的问题,周恩来提议双方采取临时措施,在争议地区武装力量应当脱离,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并就此问题进行边界谈判。柯西金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同意,这样达成了双方控制边界紧张局势的口头协议,使两国从战争边缘上重新回到改善关系的轨道。1970年10—11月,双方把原来的代办级关系恢复到大使级关系,并恢复了中断两年的年度贸易协定。周恩来缓和中苏两国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积极作用。

### 3. 邓小平关于恢复和发展对苏对俄关系的思想

在1980年以前,邓小平对苏思想的主调是,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主要威胁,中国要联合一切力量,建立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统一战线来反对苏联的进攻性的霸权主义。邓小平指出,只要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不变,中苏关系就没有改善的可能。

1982年,中国开始了在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基础上与苏联调整关系的步伐。1982年8月,中国在与美国签订“八·一七联合公报”后,邓小平就派人去苏联,向苏联表示中国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当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后,邓小平在1982年12月对此表态说,“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

---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125—126页;《研究周恩来》,第173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36页。



1983年8月,邓小平批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所说的中苏改善关系不能涉及到第三国的观点时,指出,中苏关系改善必须涉及到第三国,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它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摆了一百万军队和三分之一的导弹,还在蒙古驻军,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

中国在1985年实行的外交战略调整,正好与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的外交新思维不谋而合,两国关系由此开始向结束敌对状态,实现正常化的方向过渡。

邓小平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向苏联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指出,由于苏联在进攻战略上得手不多,“需要改变这方面的战略态势。苏联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情况迫使他们谋求改变。但如何改变,戈尔巴乔夫上台半年多了,还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我们有明确的标准,改善中苏关系存在三个障碍。这三个障碍无论苏联愿意先消除哪一个都行,愿意先走一步或两步都可以。如果苏联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步,它对和平就做出了贡献”。邓小平还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这是邓小平为改善中苏两国关系而向苏联伸出的橄榄枝。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7月28日的海参崴讲话中表示,苏联准备与中国在任何级别上认真讨论中苏关系,并同意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将从阿富汗撤军,并将把苏联军队撤出蒙古,实际上表示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的条件。邓小平也再次抓住机会,对苏联方面的变化作出积极回应,再向苏联方面表示,他本人愿意与戈尔巴乔夫见面。邓小平甚至表示,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他愿意破例到苏联的任何地点与戈见面,尽管他本人早就决心不再出国访问。邓小平稍后还向苏联人表示,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之间还会有一个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1989年5月,邓小平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

晤,邓小平在会晤中表示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在对苏对俄关系上坚持的立场是:

(1) 对过去的事情说清楚,但不纠缠历史。

邓小平在 1988 年 10 月提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指导原则是: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两国外长和两国最高层会晤时准备不谈过去的问题,但简单的历史回顾恐怕也难以避免,这要当作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要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解决中苏关系问题。稍后邓小平又指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

中国与苏联过去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事情。邓小平对此的立场是,大体上把一些重大的问题说清楚,对历史有个基本的交代。邓小平指出,“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在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而这两个问题的真正实质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中,邓小平对以下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

关于中苏过去的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在 1983 年 11 月曾指出,“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对这场争论,“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44、264、339、341、411、414、419、272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7—169、292、294—295 页。

都是对的”，而且谁对谁错在今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邓小平也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识问题上存在说大话的倾向，认为“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1980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1990年，也还只剩下5年。他的大话吹破了”，“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100年前就实现了，中国不讲大话。

对中俄关系、中苏关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严肃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受到各列强的侵略奴役，欺负中国的国家中，有两个国家从中国得利最大，“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到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占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100万人，这对中国形成了威胁。

邓小平在指出这些历史事实后，又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虽然过去沙俄和苏联与中国有过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历史的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主要的是要使两国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着眼于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

在谈到中苏结盟时期的关系时，邓小平对苏联对中国实行的大国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

## （2）中苏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向前看。

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指出，讲清楚历史问题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对开辟未来有好处。“我们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

上”。对过去的问题，“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讲清楚过去的历史不是为了算账，不是为了吵架，中国的立场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讲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过去，是为了使苏联方面理解中国怎样认识过去，历史账讲完了，这些问题也都一风吹了。邓小平指出，尽管沙俄与中国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重要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交往要多起来，两国关系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3) 正确对待苏联解体的事实，在正常和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及俄罗斯发展关系。

1989年后，苏联、东欧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瓦解，苏联从一个国家变成了15个共和国。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发展道路。刚刚恢复正常的中苏中俄国家关系受到重大考验。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化时期，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利益，把保持两国的正常关系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指出，苏联即使以后解体了，仍然是多极中的一极，中国要把苏联与美国同等对待，都要加强来往，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 三、中日关系

#### 1. 毛泽东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述

中日关系是毛泽东关注的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毛泽东关于中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44、245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5、353页。

日两国关系的思想观点始终表现出深厚的和平外交哲学。

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毛泽东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毛泽东认为,中国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日本与美国合起来对付中国。他指出:中国有些怕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包括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企图,因为“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在毛泽东的心里,日本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对中日两国的未来如何也看不准。1965年2月,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曾经揭露,在1963年,日本防卫厅经过长期周密策划,秘密制定了一个名叫“三矢计划”的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日本应该和美国、南朝鲜一起,共同对付中国和朝鲜,日本也出兵对中国作战。这给毛泽东印象很深。因此,直到晚年,到1974年时,在回答中国是否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毛泽东仍然对日本怀有很深的疑虑,认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毛泽东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但毛泽东在60年代批评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内的问题,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却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

毛泽东认为,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半占领国,中国应该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以中国人对人要宽宏大量的传统观点来看待日本,对日本处于美国压力下的一些做法表示理解和同情。毛泽东指出,“过去亚洲有一个日本是侵略国,但是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处于半被占领国的地位,日本民族受到压迫”,美国“排斥日本民族,奴役日本人民”。毛泽东同日本朋友谈话时,表示谅解日本不承认中国这一立场,因为日本头上有美国这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42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页。

只“手”，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谅解你们的，根本不责备你们没有与我们建立国交。过去你们承认蒋介石，我们外交部曾责备过你们。但我们对整个日本民族是谅解的，中国人民愿意你们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把美国的手顶走”，毛泽东认为，日本争取独立于美国的斗争，对中国有好处，中国应该支持日本民族为恢复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因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毛泽东对日本友人说，“美帝国主义占领你们的领土冲绳，在你们国内设立了军事基地，你们的国家处在半占领状态。我们的台湾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因此，中日“两个国家，需要相互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们，完全没有界限”。毛泽东相信，“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

毛泽东同样也以中国以德报怨的传统哲学来对待日本的过去，提出面向将来建设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他指出，日本民族过去犯过错误，“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中国对日本没有提出过什么苛刻的条件，不希望中日关系紧张。“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计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在谈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时，毛泽东也表现了中国宽以待人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1—48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3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3、22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

的历史传统。毛泽东曾经说,“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是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指美国人)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日本民族从总的来说是个伟大的民族,中国在建设方面应该向日本人民学习。毛泽东认为,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想要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日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中国高明,是个工业化的国家,而中国是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日本在这点上比中国强,所以日本有很多东西是中国应该学习的。因此毛泽东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在中日关系中,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美日安保条约,更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在1960年5月14日就曾指出,“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认为,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是对中国的最大的威胁。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70年代初对基辛格说,“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他还同意基辛格所说的,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的观点。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87页。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 2. 周恩来关于中日关系的思想

新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日两国的关系。周恩来从中日两国是近邻,应该永远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始终把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在第一位。在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中,相对于中美、中俄关系而言,中日两国关系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是较突出的。

(1) 必须正确对待日本过去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问题。

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三点:一是必须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批判,日本方面必须认罪;二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侵略罪行从大局出发,给予宽恕;三是从中日关系总的历史来看,友好是主流,处理中日关系要有向前看的精神。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致田中的欢迎词中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到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应该牢牢记住。稍后不久,周恩来又指出,日本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就是防止军国主义。政治家也好,军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如果不研究东条英机的侵略失败的历史,而且还要美化他,将来还要重蹈覆辙。

日本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巨大的战争灾难,对此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其外交思想也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宽厚待人哲学的影响。

周恩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但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因此,在对日本客人的会谈中,周恩来多次表示,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但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日本客人对过去的战争表示告罪时,周恩来总是以一种仁者宽厚之道待人。1961年2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经济友好访华团时指出,“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必再提,双方应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永远地友好下去”。“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以历史为鉴,努力



消除近几十年来的不愉快事情的影响,使中日两国几千年来的友好关系在新时代的基础上,永远地发展下去。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的”。

周恩来在与日本客人会谈时还指出,“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你们国家在海上,几千年都是独立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是元朝的蒙古族上层”。周恩来指出,虽然中日两国有过不好的时期,但“同几千年比较,60年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让中日两国的后代能在和平环境中友好相处。周恩来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都从两国战争60年和友好2000年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虽然中国在战争中受到了日本的损害,但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都和中国有切不断的联系。

对于中日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总是提倡以向前看的眼光来对待,主张以较宽大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教导人们看中日两国历史中友好交往的主流面。他向日本朋友指出,“中日两国相互了解最深。在东方国家中,知道我们最深的是日本,我们也比较知道日本。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很多人是去日本学习过,在你们那里取过经。孙中山先生也去过日本,中山两个字就是用的日本的名字。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很多人去过日本,如李大钊去过,不要老是说日本帮助过伪满,那是少数军国主义者做的坏事,多数日本人是做好事的,好事做得多,坏事做得少,因此不要光记坏事,不记好事”。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海外侨胞时指出,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52、562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03—304、87—88页。

半个世纪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2) 中日两国友好的基础要放在两国经济的合作和互助上，中日两国友好的基础在于两国的经济联系。

中国要发展，市场要扩大，需要同外国互通有无，开展贸易，需要输入和输出。而“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你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也知道什么东西你们最需要。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中国国土大，人口多，需要量大，生产数量也大”，这对发展两国关系使两国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共存共荣是极有好处的。

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也有很深的文化基础。“历史上两国的文化往来很频繁，近80年来，中国学西方文化，许多是通过那里最早学来的。所以，按照正常的往来，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思”。

在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周恩来主张通过民间的交往加强关系。他指出，由于日本被美国半占领，使得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起了根本变化，过去的对立情绪逐渐化解，旧的友谊恢复了，新的感情也产生出来，这也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两国人民感情上的接近，友谊的加强，是亲善的最可靠的基础。”所以周恩来指出，“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和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发生影响”。

当时，日本的一些政党，在日本政府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纷纷自己制定本党、本团体的对华政策，把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明确主张只承认一个中国。周恩来对这些方面表示肯定与赞扬，但又认为，要看到日本的现实。他对日本政府不承认新中国的方针表示一定的理解，因为在美国占领之下，在美国没有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很难超越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周恩来在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会见时指出，在日本对华政策上，要看到美国的因素，“在这方面，日本人民遇到了困难，贵党的外交政

策也遇到了困难,日本政府则处在更困难的地位”。因此,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需要时间和采取一定步骤的。一方面应该摆脱美国的干涉,另一方面,要恢复中日邦交,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根据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提出了通过国民外交逐步实现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思想,指出“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两三年来,我们几次和日本朋友谈过,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而中日民间的一些协定,如文化、贸易、渔业、经济、青年和工会等协定,实际上都超过了国民外交的范围,已经属半官方性质。这样长期坚持,“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销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周恩来认为,在中日两国建交问题上,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日本,中国人民不干,太勉强了日本政府也做不到,所以,周恩来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广交朋友,以民促官,汇细流成江河,到最后一举突破。在这里,最充分地体现了周恩来开展民间外交以促进国家政府外交的思想。

1952年5月初,日本参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和众议员宫腰喜助在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后,应邀访问北京。日本政府在他们的护照上特别标明不得前往共产国家,回国时三人又因违犯签证法被问罪,但他们的行动却受到了日本各界的欢迎,尤其是三人在北京期间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的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更是开创了中日国民外交的先河。1953年9月,周恩来战后第一次会见日本人士大山郁夫,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国红十字代表团于1954年10月底访问日本,成为战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把中日国民外交进一步推向前进。

当然,中日双方的国民外交达成的结果,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支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6、651、144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57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9、190、226、227页。

持,也难以实现。为此,1960年时周恩来关于通过国民外交促进两国关系的思想又有些变化。他看到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中日贸易行不通,因为两国任何协定都应通过政府来签订,民间协定没有保证,特别是由于日本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这些协定的实现更加不容易。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又提出了官民结合的思想,在1960年8月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当然,要日本政府与中国签订政府协定,就要求日本承认政治三原则:一、不敌视中国;二、不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三、不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1962年起,中日关系进入半官方交往时期。1962年,在日本池田内阁的暗中支持下,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于9月再次访华,开辟了半官方交往的渠道。不久,曾担任过日本内阁企划厅长官的高崎达之助率领日本各方企业家到北京访问,并与廖承志达成了贸易备忘录,其中有日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参与,从而形成了半官方关系与国民外交同时并行的状态。

周恩来认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要把眼光放在经济贸易上,要以此为两国的和平友好奠定一个坚实而巩固的基础。中国已经确定了经济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这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靠自己,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就日中两国来说,首先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它会使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具有广阔的前途。虽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量还很小,1964年时才2亿美元,但这只是当前的开始的现象,“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以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这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国有6-7亿人口,日本有1亿人口,彼此有很大的市场,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发展。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

(3) 必须严肃对待日本国内恢复军国主义的思潮,把防止日本

军国主义的复活作为一个重要任务。

周恩来认为,中国必须支持日本走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的道路,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中国对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给予宽宏大量的处理,也必须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高度警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周恩来认为,日本人如何对待战争,如何对待今后日本的发展前途,是分为两种势力的,“广大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中立、民主道路的,几年来国民运动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有一小部分人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中国人民是支持的,因为和平、独立、中立、民主的道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作为邻邦,我们应该充分支持。后一条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周恩来严正地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会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1. 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
2. 如向西侵略,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不利;
3. 与东南亚人民的矛盾,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
4. 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
5. 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会加深,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有利,但对日本经济会造成危机,不利于日本经济。

### 3. 邓小平关于对日关系的思想

邓小平在 1975 年曾指出:“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中日之间的关系不单有历史渊源,就是从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28、289、414 页;《研究周恩来》,第 23 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543 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306—308 页。

现存的近邻关系来看也应该发展。政治关系、人民之间的来往以及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有益”。这表明邓小平在这时是从一个较全面的角度来思考中日关系的。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邓小平在这一时期也表示,应当从全面考虑。他指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两国不友好的历史仅仅只有半个多世纪,而且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都要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休戚相关,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邓小平着眼于从长远的角度来处理两国关系,强调指出,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两国政治关系良好,但还不够,需要增加民间关系的继续发展,因为它影响到人民,影响到将来,现在的关系不只是提出21世纪,也许还有22世纪、23世纪,我们要千秋万代友好合作下去。

但在1984年前后,围绕中日两国出现的一些问题,邓小平的对日思想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突出了要求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刻反省的立场。

邓小平针对日本国内出现的不愿认罪倾向指出,日本人民和政治家应该正视过去的侵略行为。邓小平在1985年10月向来访的日本外相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有自己的解释,但对人民来说,不仅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他们看问题要看事实,看本质。我说不但是中国,而且整个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都有这个感情问题。所以,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那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这是真话。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样的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4、173、286、341—344页。

邓小平认为,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反映了日本国内有一股不健康的情绪,就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情绪,为此邓小平多次严肃地指出,“要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邓小平严厉指出,战后日本一直有一部分人,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不小,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总有些人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用另外的角度来解释日本战后的宪法,没有忘记在中日之间造成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中日之间出现的问题,中国没有责任。中国不会改变与日本友好的政策,但中日之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日本方面需要妥善处理,中国强调向前看,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纠葛,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在两国关系上,短视是有害和不可取的。邓小平并且认为,在一些问题上,双方看法是不一致的,日本看成法律问题,而中国认为是政治问题,分歧很大,解决问题的基础还是回到中日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上去,中国对任何涉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情都很敏感,希望日本早一点解决这些麻烦。

## 四、中欧关系

### 1.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在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多极化与反霸权的思想中已经有所表述。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总起来是:

第一,把欧洲国家与美国分开来。虽然欧洲国家与美国同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国家也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但毛泽东认为,美国是第一世界的霸权国家,而欧洲国家是第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40、386页。

二世界,它们与美国在利益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中国在对美国的外交中,在全球战略的考虑中,必须尽可能地争取欧洲国家,利用它们与美国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周恩来在 50 年代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在国际关系中,不能把两个世界搞成铁板两块,互不往来,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就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这对我们不利。周恩来认为,所谓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在很长时间内就是主要与对中国不那么敌对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这是中国和平共处的一个重点。周恩来还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三类,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英法为首的和平中立派,维持现状派。中国就是要争取和平中立派和维持现状派,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扩大和平中立的趋势,团结这些国家一道维持世界和平。在实践中,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英国在 50 年代初就表示要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来维持了一种半建交的方式;荷兰也学英国模式,与中国保持半建交方式,就是一方面宣布承认中国,在北京设立代办处,但在联合国中又与美国一道,支持台湾的席位;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和北欧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与台湾断绝了关系。

第二,中国应当支持欧洲国家的团结,促进欧洲的统一。毛泽东、周恩来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军事优势,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洲国家,都无法单独与之抗衡,欧洲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有较大的潜力,但现在分散的欧洲国家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团结起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欧洲才能取得与美国和苏联相当的地位。欧洲的团结和统一不仅对欧洲国家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

第三,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与法国的关系,对戴高乐领导的法国表现出来的独立于美国与苏联的精神给予肯定和支持,并把中国与法国的关系看作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要部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在外交工作中也始终把发展中法关系作为中欧关系的一个重点和突破口。周恩来认



为,由于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法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努力推动欧洲的团结和发展以加强自己的影响,这与中国在外交战略上有共同点。而法国作为西欧的一个重要国家,在西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中法关系,扩大中国在西欧的影响,这也有利于孤立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抓住戴高乐政府在60年代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美国指挥西欧的政策这一时机,决定在中法关系上实行突破。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华比较友好的国家,它在许多公开的国际场合不与中国对立,与台湾关系较冷淡,在西藏问题上不赞成英美的立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也较为中立。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前总理富尔来华访问,期间他明确表示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是一个错误。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推动中法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下,中法两国经过3个月的谈判,在1964年1月达成协议,正式建交,法国也由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大国。中法建交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并由此推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此后一批欧洲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关系。

## 2. 邓小平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欧关系的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又有一些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

70年代末,邓小平把欧洲看成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他在1978年指出,我们历来支持建立一个团结、联合、强大的欧洲。我们赞成你们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苏联发动战争的重点在欧洲,这方面我们的观点没有变化。这并不是说我们放松自己警惕,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不但法国,欧洲也需要独立的武装力量。邓小平表示,中国人民希望看到一个独立、强大、繁荣的法

---

参见《研究周恩来》,第238—252页。

国,一个团结、强大、繁荣的欧洲。

邓小平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在欧洲的看法上有一点变化:

(1) 过去中国习惯于把欧洲看成是应当加以争取的中间力量和中间地带,而现在邓小平认为,在分析国际状况时要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

(2) 过去邓小平曾经认为,如果战争打起来,首先受害和受害最大是第三世界国家,但在邓小平提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后认为,欧洲国家是反对战争的重要的和平力量,因为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是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的痛苦有切身体会,一旦东欧和西欧国家不把自己绑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邓小平指出,“欧洲是世界主要的战略地区,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我们完全理解西欧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联合的愿望。我们一贯认为,一个联合强大的欧洲是符合欧洲人民的利益的,也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

(3) 一个独立和强大的欧洲有助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因此,邓小平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大的、联合的、发展的欧洲,而与欧洲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也成为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时候,邓小平曾经希望欧洲与美国联合起来。但到 80 年代中期之后,邓小平更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同时又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希望欧洲能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法国的独立外交。在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时候,也要借重于欧洲实行比较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也是邓小平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一个战略考虑。

邓小平 1985 年与比利时首相会谈时指出,“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霸权主义要称雄世界,第一个目标是欧洲。要取得欧洲,不一定要采取正面进攻,那是下策,可以两翼包围欧洲,特别是从中近东着手,取得中近东资源,卡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163、164 页。

住欧洲的脖子。正因为国际战略态势如此,所以我们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欧洲只有联合,没有别的出路。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同时也希望有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欧洲只有在联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很穷,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相互把对方看成是和平的力量,这是中国与欧洲发展关系的基础。

邓小平认为,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关系不仅是在外交战略上,也体现在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上。因此,如何加强双边的经济关系,也是邓小平从战略上思考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多次向欧洲领导人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三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6—317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17、243、324、346页。

## 第六章 中国地缘政治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大国,向来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外交思想中,地缘政治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也把地缘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在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他们还从历史、民族、文化、领土和边疆等方面,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论述。

### 一、毛泽东对中国地缘政治总形势的论述

#### 1. 毛泽东的地缘政治思想

毛泽东有没有地缘政治的思想?可能会有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从新中国的地缘政治来看,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似乎恰恰缺少地缘政治的理念。因为中国几乎与周边的主要国家都发生过冲突,而这种情况从中国的地缘政治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即使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处在这样一种恶劣的地缘政治的环境中而安然自得,更何况中国是一个不很强大的国家,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还是美国,与中国任何一个周边国家中稍稍强大一点的国家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构成严重威胁。中国曾经在同一时期与所有这些国家几乎都处在一种敌对的状态,尤其在 60—70 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地缘政治最糟糕的时候,中国在东边与美国及其支持下的日本、南朝鲜、菲律宾等为敌,在北边与苏联发生严重的边境冲突,在西南方向与印度发生边境战争,与东南方向的印尼关系交恶,实际上当时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没有什么国家真正支持中国,和中国站在一边,即使表面上与中国关系很好

的越南,后来也把中国视为最直接的敌人。从这些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似乎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地缘政治的观念。但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也有一个矛盾,即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反差。在地缘政治方面,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比他指导的中国外交的实践要好一些。因为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来看,毛泽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总的情况还是有所考虑的,而且形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线,中国不能与东边的美国、日本及西南的印度同时处于敌对状态,不能两线受敌的思想。

地缘政治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讲,主要就是中国与其地缘接近,具有共同的边界、相邻的领土和领海的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没有接触过西方的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思想,也没有过明确的地缘政治概念,但他自觉不自觉地在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其总的形势作出过基本的判断。

## 2. 毛泽东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的分析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地缘政治的总形势时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形成的威胁最大。因为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地缘政治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划分,中国在北方、西南方向和东方三个地缘政治的方向上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方面。1957年毛泽东在与缅甸客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当然我们不害怕日本、菲律宾、台湾和香港,而是害怕美国,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达一万二千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在我们西南部,我们不必放很多军队”。1959年5月,在中国与印度的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2—303页。

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两国关系时有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与印度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矛盾,中国不能放弃地缘政治的主要方向而与印度成为敌人,这会使中国处于极不利的两线受敌的境况,是中国必须要注意避免的。中国要始终把地缘政治的重点放在东线上,这应该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国策。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1960年5月,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问题在于,怎样理解毛泽东的地缘政治思想与他指导下的中国地缘政治外交实践之间存在的这种巨大的矛盾?答案恐怕在于,第一,毛泽东思想中的地缘政治思想并没有在他的外交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相对他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他的第三世界的战略思想而言,地缘政治的思想观念是不巩固的,也是比较模糊的,在指导中国外交的实践中起的作用也是较小的。第二,中国的地缘政治本来就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的10—20年中,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所谓的三线地缘政治形势的形成并不明朗,它只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6—37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4页。

是到了冷战结束后,才有比较鲜明的轮廓,人们才看得比较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地缘政治观念具有超前性。它不适合当时的情况,但却与冷战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极为吻合。

## 二、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思想

### 1. 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于 1949 年 12 月前往苏联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国事访问。在此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发表了一篇讲话,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从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知悉这一消息后,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声明进行反驳,表明中国在维护领土完整方面的立场。

在西藏问题上,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向外国表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无可争辩。

1950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指示外交部发表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过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副外长章汉夫召见印驻华大使,毛泽东在其谈话记录上批示说: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召见使馆参赞申健,说如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为事实,印深感遗憾。申健指出,印度常把中国侵略西藏的提法发表在报上,在印度政府的照会中也使用了,这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仍表示希望中国用和平方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26—128 页。

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毛泽东知道后,当即批示指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的态度还可强硬一些,“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达到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军队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和边界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邻国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外交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另一方面在涉及到与邻国的领土纠纷时,又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形成了后来成为新中国解决与邻国边界、领土问题的一个原则,即在领土问题上,双方都应采取一种现实的立场,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再说。毛泽东在1954年12月与缅甸政府代表团会见时,谈到了中缅两国的边界划分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在中印两国的领土争端上,毛泽东也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1955年8月,印度因果阿地区问题与葡萄牙发生冲突。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原为印度领土,后沦为葡属地。印度独立后,要求将其移交给印度,但被拒绝。在1955年8月15日,印度独立纪念日,有几千名印度志愿人员分别进入果阿地区,葡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死伤二百多人,导致印与葡于8月19日断绝外交关系。20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中国应当有所表示,对印给以支持,并指示除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地外,还要增加三个城市开会声援,认为此事“有颇大的国际意义”。后中国先后在上述五地及沈阳、重庆、西安八大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声援印度收复果阿地区。当时毛泽东希望,中国对印度在果阿问题上的支持,能改善两国的关系。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9、587、62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4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2—183页。



1959年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毛泽东仍希望能与印度达成协议,妥善地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不要因此而影响了两国的全面的关系。在他审阅过的中国外交部关于两国领土争端的照会中,反映了毛泽东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 1959 年 12 月 26 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就中印边界的事实和谈判解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1. 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过? 中国认为整个中印边界,无论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是没有划定过的。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据。2. 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在哪里? 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中国政府关于传统习惯线的看法,无论在西段、中段或东段,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且为大量史实资料所证明了的。而印度地图所标出的边界线,除了中段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东西两段的边界线,特别可以不容置疑地看出,是英国近代史上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3. 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线争端正确途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二:其一,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就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因此,它还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其二,在边界正式划定以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境的安宁。

除了领土纠纷以外,如何管理好两国的边界线也是值得关注的,毛泽东为此也发表了许多谈话。如对中缅边界,毛泽东表示“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

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至于与缅甸交界的云南省,毛主席建议吴努总理不妨到云南省去观察一下,“看看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是对你们友好,还是暗害你们”,也可打消缅甸人“怕云南”的心理。

解决中国与邻国的边界争端是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毛泽东高度关注中国 50—60 年代解决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许多意见,总的精神是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平共处的大局出发,考虑双方的利益而不仅是中国的利益。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毛泽东关于解决中国与尼泊尔边界争端的观点上。毛泽东在 1960 年 3 月与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会见时指出,“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毛泽东提出,中尼双方在解决边界争端之前,可以实行边界地区不巡逻的制度,使双方的军队隔离开,至于有争议的地方,可以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解决。在珠穆朗玛的划线上,毛泽东提出一半一半的解决方案,“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问题的中心”是两国的友谊,“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边界和领土事关一个国家的主权、民族尊严和国际地位,事关当事国之间的关系的全局,历来被置于各国外交的重要地位。而中国的边界问题又特别复杂,共有二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所以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如何处理边界领土问题占有重要位置。曾参加过边界谈判工作的一位大使回忆说,周恩来在 1957 年 8 月一个史地学家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 10 年内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80—181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82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89、394、395—397 页。

决,这样它们才放心。周恩来又指出,如果边界问题都严重化,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精力搞建设了。

周恩来指出,“中国同十二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护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这些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但不能超越现状”。为了处理这些边界问题,周恩来亲自抓中国与缅甸的边界谈判,以此为突破口,使缅甸成为中国的周边国家中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缅甸是首先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又是首先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同中国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也是首先同中国缔结边界条约的国家。中国与缅甸的边界谈判也为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积累经验。此后,中国先后与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以及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

在中国处理与缅甸、印度和苏联的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周恩来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领土纠纷的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思想的内容是:

——中国对任何外国的领土决没有任何要求,我们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当然我们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们,纠纷的双方应当各自让步。周恩来指出,“至于领土,中国的地方已经很大,人口已经很多,我们立国的政策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恶化后,中国曾经对印度友人说,“中国决不会侵犯印度,也不会占领印度的一寸土地,我们希望真正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愿意采取让步的方针,但是让步必须是双方的”。

——把和平协商作为解决边界领土纠纷的基本方法,把维护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作为根本,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

---

参见姚仲明等:《周恩来总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光辉业绩》,《研究周恩来》,第94—110页。

参见《周恩来传》下,第336页。

周恩来指出,中国与许多邻国之间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许多边界问题都是由来已久的,是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造成的,问题本身比较复杂,再加上外国势力利用边界纠纷,制造舆论,挑拨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因此,解决起来不容易。但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采取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地寻求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1960年,当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已经发生冲突时,周恩来仍强调: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边界问题的争端只是暂时的,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不仅过去友好,而且会千年万年地友好下去,边界的一时纠纷能够得到解决。

从大处着眼解决边界问题,是周恩来的一个指导思想。他曾经指出,现在已经有了人造卫星,不久就可以到月亮上去了,而我们还在争论边界问题,未免太小气。这个大处就是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时机成熟的问题,必须寻找这样的时机。对新中国来说,最初几年,中国面临大量的国内事务,又有朝鲜战争等,不可能立即解决边界问题。但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政府开始与一些政府就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接触,并达成了一些意向,积极准备解决问题的条件,其中包括对边界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等。

——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解决边界问题时,必须有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观点,照顾到历史的因素。“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边疆界是不十分明确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30、236、362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85、294页;《周恩来传》下,第362页。

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各国的地图对边界的划线也很混乱,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又必须注意到历史的变化,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公正的解决。

周恩来认为中国与邻邦的边界问题大多是列强迫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中国和这些国家都不能负责的,处理这个问题,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应以原有的条约为基础,互谅互让,最后以一个新的条约来取代旧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缅 2200 多公里的边界划分问题上,周恩来曾经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双方应本着求实公正的原则加以解决。在边界调整中,中方不能把凡是历史上曾向中国进过贡的地方都纳入我国版图,也不能追溯太远,如不能把元朝的疆界作为根据提出要求,而应以清末民初和国民党统治时的资料作为重要参考材料,但也要区别其真假。如国民党在 1941 年划线时,对英方提出的要求作了不应当的让步,把一片原是中国的领土划到了缅甸,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在划图时尽量把线向西划,把属于缅甸的 7 万多平方公里划到了中国,实际上这些地区中国的统治一向未曾达到过。所以周恩来强调,中方不能以此作为根据。对于过去的旧条约,凡是中国政府签订的,都只能先承认它,再提出修改意见,不能单方面作出决定。

——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到民族因素。中国的边界地区往往也是少数民族居住较集中的地区,有许多跨界而居的民族,一个民族被边界一分为二,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解决边界领土问题时,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使领土边界问题的解决,不至于引发民族纠纷,使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1960 年在划定缅甸

与中国的边界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骑寨家族,本是一个家族,却被划到了两个国家,是一家两国,生活很不方便。周恩来因此提出要进行调整,力求保持每个家族的完整,不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

——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双方应采取避免发生冲突的措施,其中包括撤出或减少军队,在争议地区停止巡逻,避免边境冲突,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在解决时,有些可以采取按自然分界线划分的方法,有些可以按照双方承认的习惯边界线划界。

周恩来 1960 年访问印度时曾经指出,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占领着实际上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历届政府不予承认。但中国主张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在边界谈判时,中国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维持现状就是指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由双方控制实际控制的边界,不采取任何激化问题的行动,如强行派军队收复被认为是属于自己的领土等。

——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要统筹考虑,重点突破,全盘解决。如中缅两国在 1957 年时就已经就两国的 2200 多公里长的边界中的大部分地段达成了共识,但由于其中有阿瓦山、勐卯和尖高山等三段存在分歧,因此缅甸与中国的整个边界协定到 1960 年时才完成,并于 1960 年 10 月 1 日,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

1969 年 2 月,中国与苏联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为了避免边界武装冲突发展升级为全面战争,周恩来于 1969 年 9 月 18 日在给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信中,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原则和办法,这就是,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周恩来认为,中苏边界是以 19 世纪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所以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应该将争议地区合理解决,划定走向,然后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所谓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互谅互让,彼此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37、279、230、238、462 页;《研究周恩来》,第 102—104 页。

照顾现状,但两国现已谈判4年,连临时措施都未落实,甚至连争议地区的客观事实,苏联方面都不愿意承认,这如何谈得上合理解决?

周恩来不仅对如何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也亲身参加了许多边界问题的解决,尤其对中印边界谈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中印两国边界从未划定,只有传统习惯线,有2000多公里,分为西(新疆喀喇昆仑山口至扎达县6795高地)、中(6795高地至中印尼泊尔三国交界处)和东(不丹以东中印不交界处至中印缅三国交界处)三段,其中西段有3.3万平方公里、东段有9万平方公里被印度单方面划为印度领土。根据是1913—1914年间在印度西姆拉由英印和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根本没有为中国政府接受。

周恩来1960年访问印度时,印度记者问边界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东西段都有争议,中段争议小。在东段,印度划入自己的地区,是一直由中国行政管辖的地区,有时印度说这是麦克马洪线,我们绝不承认,因为这是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划出来的,中国历届政府不承认。但中国主张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在边界谈判时,中国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在西段,两国不一致,中国历来的地图基本一致,印度的地图变动大,主要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小部分在西藏。印度在19世纪中叶前,与中国地图大致相同,1954年才有现在的划法。中国要求印度政府像中国政府在东段的立场那样,维持现状,可以保留意见,但不越过中国的行政线。印度不同意,有较大的争议。

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周恩来也仍然保持了通过谈判解决的基本思想,并为此作了大量艰苦的努力。1960年4月17日,周恩来访问缅甸时,与吴努总理会谈。周恩来谈到中印两国发生冲突,将前往印度访问时说:我提出在任何地方谈判,也可以在缅甸,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30页。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72—77页。

但尼赫鲁说离不开,所以我就去。吴努说,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周恩来说,为了国事,任何地方也可以去,你知道,人家称我为谈判者,这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

但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周恩来也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自卫,以达到在解决问题之前维持现状的目的。1962年10月,总参报告中印边界有可能发生三年来真正的军事冲突。10月5日,周恩来向军队指出,“敌人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同时歼灭其若干处据点,请罗总长立即考虑这一设想,并要总参提出方案送中央考虑”。

1962年10月8日下午3时,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通知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他们利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事先通知苏方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我们只是通知,对苏方没有任何要求。

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在朝鲜会见金日成时,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他说,1961年我和陈总去印度与尼赫鲁会谈,证明他们没有诚意解决边界问题。回来后我们就建议为了避免双方人员的冲突,各自从当时的巡逻线撤退20公里搞一个缓冲区,以后,我们主动撤退了,但印度方面没有撤,这样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发生问题。今年,台湾海峡有些紧张,中苏关系有矛盾的消息传出去后,印度就配合美国和蒋介石在中印边界上闹事。首先在西部蚕食我领土,在西部共设据点、哨所43个,我们发现后,恢复了巡逻。这样在这一地区我们的哨所就同印度军队的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形势,互相距离有的只有20米,互相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方针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进攻我,我击退你,我不出击。开始他们没有打枪,后来他就打枪催我退,我不退,我们向印度提出过数次抗议,他不听,我们实在忍无可忍,采取了自卫措施,这样双方都有了伤亡。从地形上说,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要进入我哨所必须要爬上山来,从



9月起,那个地区已经大雪封山。他们就用苏联造的安12直升飞机运送东西给印度军队。战士们看到苏联造的飞机非常生气。在这一地区,没有飞机他们是没办法前进的。以后,印军就在东段进攻,他们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后,我们的方针是不承认,也不超过,我们打算和他们谈判。

1962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尼大使苏卡尼,再次谈到中印边界战争。他说,10月20日前是小打,我方一直遭到损伤,印度也有。10月间尼赫鲁从欧洲回来,就提出要把我们清除掉,并调动军队,准备大打。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情况,也做了准备,要自卫反击。因此,10月20日印度大规模进攻,我们就进行了反击,印度国防部长恰范11月15日又命令在东段大规模进攻,我们也反击,经过两次反击,它就溃不成军垮下去了。我们在报上不公开反击结果,但外国报纸公开了许多情况。这些说明印度军队没有斗志,第一次打,我们就俘虏了900多名印军,第二次打,俘虏的数字比上次超过很多。印度方面宣布说一个中国俘虏也没有抓到,这叫什么战争,印度有错觉,以为搞了我们,我们克制,就可以一点点进来,占领西段的43个据点,以后在东段如法炮制,它做错了估计,以为我们只能挨打,到了我们一还手,它就知道事情并不简单。印度要马上再打的话,连英美军事专家也不赞成,这点尼赫鲁是心里有数的。

1963年2月,中国军队主动后撤,4月10日至5月25日,中国释放了俘获的印军的一名准将、26名校级军官、29名尉级军官和3200名军事人员,归还了他们的武器。

毛泽东在1965年向巴基斯坦客人说,印度认为我们不会打他们,就一步一步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这也表明了周恩来在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主导作用。

1968年7月,周恩来与阿联大使谈中印边界问题时说,1954年第一次访问印度,见到尼赫鲁。我和尼赫鲁谈到边界问题时说,麦克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37—338页。

马洪线不仅在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划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我告诉他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这条线,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他听了很高兴。1960年时尼赫鲁不愿达成原则协议,当时争议的问题不仅是东线,还有中线和西线,很奇怪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中方已经做了很大妥协了。1961年陈毅在日内瓦时又提出与印度外长梅农谈,提出共同发表一个声明,他也不干。他错误地认为,我们怕有冲突,当时中国有灾荒,他觉得我们有问题,从日内瓦回去就动兵了。

在中缅因为边界问题发生冲突时,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曾经9次出访缅甸,缅甸是他到过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955年中缅两国发生“黄果园事件”,当时有一个1941年在英国压力下签订的中缅界线,将我国的一些地区划给了缅甸,在战争时双方又未立界桩。1949年时,解放军到达了中缅1941年时的线;1951年国民党军队李弥部几千人入侵,1952年被击退,解放军追击时进入1941年线以西,没有马上撤回;1955年缅甸军队推进,与中方在黄果园附近发生了小冲突。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并与缅甸达成协议,中方从1941年线以西撤回,缅甸从占领的中方地区撤出,双方均不马上进驻撤出的地区。后又互换土地,中方给缅甸了一块,缅甸也给中方了一块。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在解决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 2. 与近邻国家和平友好,和睦相处

### (1) 中蒙关系

蒙古是中国北边的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从两国的历史关系出发,应当承认蒙古独立这一事实。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国大使的国书时说,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

---

参见姚仲明等:《周恩来总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光辉业绩》,《研究周恩来》第94—112页。

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毛泽东还认为,作为与蒙古相邻的一个大国,中国还必须对蒙古进行援助。为此,中国在自己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先后从人力、物资、资金等各方面给予过蒙古一定的援助。

当蒙古向中国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 1955 年来中国访问,说起 1954 年中国给予蒙古很多的援助,派了 1.3 万工人和技术员,1955 还给了 1.6 亿卢布无偿援助,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时,毛泽东说:“不不,上次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蒙古领导人说,历史上的债务,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只是感谢你们。毛泽东却说,“不,要还债的,这是我们在追还祖先们的债务。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

考虑到中国境内也有蒙古族人,中国把与外蒙古搞好关系当作加强国内的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团结的一个内容来做。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国家利益。

1957 年 5 月 20 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达姆巴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允许迁移内蒙古人去外蒙古。毛泽东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 870 万,其中 700 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 100 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牲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213—214 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215—218 页。

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的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

## (2) 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1950年,毛泽东在接受印度驻中国大使呈递的国书时说,“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在尼赫鲁总理1954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与尼赫鲁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再次表达了希望中印两国和平相处的愿望。在毛泽东看来,中印两国的经历是很相近的,又都主张和平共处,没有理由不搞好两国的关系。他对尼赫鲁说,中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在为尼赫鲁送别的时候,毛泽东很动感情地引用了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他对尼赫鲁说,中国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1959年,中印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毛泽东仍然把印度视为友好国家,并且在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关于中印关系的文件上批示道:“总的说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83—48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3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174—175页。

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我们不能把友人当作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次机会,再次向印度方面表达中国与印度友好相处的愿望。

1959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西藏叛乱的宣传稿中,不同意把尼赫鲁指为反动派,认为稿中的“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毛泽东特别指出,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因为当时尼赫鲁说,和平共处原则仍然是好的。毛泽东还想做工作,恢复两国的友好。

关于中巴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中巴之间的一些误解,如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等,及巴基斯坦对中国有一些担心等,这些都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化解。毛泽东在1955年谈到两国之间的这些问题时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周恩来在中巴关系上的贡献主要有三:其一,使两国的关系发展符合各自的战略要求;其二,推动巴改变了结盟的立场,先后退出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组织,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其三,与巴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使巴基斯坦领导人在中美两国改善关系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4页

50年代,中巴关系处于不太正常状态。当年的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台湾问题上跟着美国走。为了争取巴基斯坦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向巴提出备忘录,对巴美军事协定表示关切。1954年巴回答说,是维护自己的主权,不针对中国。1955年亚非会议时,周恩来又与巴总理会谈,提出了巴参加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的问题。周恩来向巴总理指出,巴作为一个大国加入联盟对巴不利,也使中国不安,对中国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巴总理保证,如发生针对中国的侵略,巴不会参加。1962年中方再次向巴方提出两个条约的问题。1963年布托外长对中国说,巴不加入反华,两个条约正在失去作用。1968年巴决定,不再让美在巴使用军事通讯基地。1972年巴退出东南亚条约,1979年退出巴格达条约。

在与巴发展关系时,周恩来坚持中巴关系不针对印度,同时也赞成印巴两国发展关系。1956年周恩来对巴领导人说,巴印两国是同一民族母体,应友好相处。1961年,巴正式向中国提出建议进行边界谈判。实际上1956年中国就已经作了准备。中巴边界问题不难,只有600公里,历史上是未定界。双方从未发生过重大的边界事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与巴控克什米尔的边界问题。中方提出在中巴之间就实际存在的边界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声明,在巴印解决了克问题之后,中国将同主权国进行重新谈判。在周恩来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巴两国1963年正式达成了边界协定。此后,巴一直支持中国,批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对巴也进行了较大的援助。1965年援助巴5000万美元,1970年又给5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由于中国友好合作的方针,巴基斯坦多位领导人都向中国表达过要为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出力的意愿。1956年,巴总理访问中国时主动要求代中国向美国传话。1963年布托外长访华时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周恩来也利用了这一渠道,在1965年访问巴基斯坦时要巴向美国表达中国在越南战

争上的立场。这为中美两国关系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管道。

### (3) 与东南亚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印尼人民的良好祝愿。他在 1955 年对来访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时说道,印尼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印尼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印尼同日本相比,有更好的条件,“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些遗留问题,毛泽东也主张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在 50 年代,中国与缅甸有一个国民党军队在缅甸活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于缅甸政府不努力解决。当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谈起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麻烦问题时,毛泽东对缅甸的困难表示理解说,“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在缅甸领导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在缅中边境组织革命时,毛泽东向他们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革命不能输出。……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并且由姚仲明大使在缅甸内部策动。姚大使决不会干这种事,如果他干这种事,我们一定马上撤他的职”。

毛泽东一再向缅甸领导人申明,中缅两国国境毗连,不但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两国人民间更存在着兄弟般的深厚友谊。近世纪来,中缅两国人民都曾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进行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因此,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同情与了解,也是很深切的。现在中缅两国新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无疑将使已存

---

参见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研究周恩来》,第 11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13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79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89 页。

在于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发展。

泰国曾经对中国有较多的疑虑,毛泽东为了促进泰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一再对泰国政府的领导人进行说服工作。当时“泰国有些人怕我们去侵略他们,因此有人就造谣说,中国要给在中国避难的前泰国总理乃比里十万大军打回泰国去。又造谣说,中国在搞自由泰国活动”,泰方对中国成立云南傣族自治区也很担心。为此毛泽东说,“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同泰国如此邻近,按道理应该搞好关系。外国报纸怀疑我们搞傣族自治区是要侵略泰国,是要建立什么‘自由泰国’。傣族在云南省有三十万人,他们要组织一个自治区。……我们并不搞‘自由泰国’,也不想打进泰国”,泰国总说怕中国“侵略”,至于中国是不是真是要侵略,泰国也可以派人来看看,可以在昆明设立领事馆,也可以到中国的云南傣族自治区去看一看。为了使泰国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毛泽东曾经多次请缅甸领导人对泰国领导人做一些工作,以打消他们对中国的误解,这取得了一些成效。

### 3. 出兵朝鲜是重大的地缘政治决策

近年来,国内外有人根据一些国外公开的档案,对朝鲜战争的起源进行新的研究。胡乔木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现在,有人说在前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了什么材料,说朝鲜战争是我们让打的,可以肯定,这是胡说八道,中央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中国为什么出兵朝鲜,是由于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同处一个阵营,还是由于朝鲜是中国近邻,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来看,后者是毛泽东当年出兵朝鲜的一个最主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6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4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0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6页。



要原因。1950年10月1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给毛泽东拍了一封加急求援电报:“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给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你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在面临要不要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时,毛泽东有几个困难:

一是苏联不积极。当时根据雅尔塔协定,朝鲜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担心中国如果出兵朝鲜,万一失败会把苏联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过程中,斯大林先是答应中国,由苏联派空军掩护支持中国军队,但后来斯大林又犹豫了。当10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时,斯大林告知周恩来,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不能支持和掩护中国军队。

二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出兵朝鲜意见不统一。在10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认为,中国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而美国又是最强大的国家,取胜无把握,所以当政治局要林彪挂帅出兵朝鲜时,林彪以身体不好推托。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认为,我国经过几十年战争的摧残,财政也困难,国内又有沿海和边远地区未解放,新建的政权还不巩固,加上我军的装备也不如美军等,所以主张可以不出兵或暂不出兵。

三是都对美国的意图不摸底,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有意侵犯中国。担心中国出兵为美国侵略中国提供借口。

只有彭德怀等人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国军队出现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毛泽东权衡左右,思考了很长时间。当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说:“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思,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了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

下,还要再三考虑,最后才下了决心”,决定出兵。

当时毛泽东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狂,于整个东方是不利的。再说,朝鲜同志处于国家危急之时,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至于战争打起来的后果,毛泽东分析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美军,则问题不大,但也要做好美国宣布与中国进行战争,对中国城市进行轰炸的准备。所以虽然国内会有困难,但要克服,在敌人占领平壤之前,必须立即出兵。

毛泽东在 1950 年 10 月 13 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前夕指出,中国必须和应当入朝作战,因为中国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战争无疑对中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使美国遭受到一次重大的失败。但对中国来说,它的军事战略意义可能要比外交战略意义更明显一些。正如毛泽东所说:朝鲜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守住了三八线;取得了军事经验;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进行较量,跟它打了 33 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军并不可怕。

1970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见,谈到当年出兵朝鲜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虽然摆了 5 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的政治局总是定不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

---

参见《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第 328—340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44 页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5 页。

吧？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的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补充说，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周恩来后来在 1971 年 12 月 30 日又说，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彪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联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可见，在要不要出兵朝鲜问题上，毛泽东是经过了很多长时间的考虑，下了很大决心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朝鲜对南朝鲜发动进攻。

在毛泽东思考要不要出兵朝鲜的过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抗美援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 1950 年 10 月 3 日代表中国向美国提出，美国军队不能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就要管，这是对美国的警告。周恩来在对印度大使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他又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提出使朝鲜问题地方化，不要成为国际性事件，地方化的前提就是美国军队不越过三八线，并且通过中国和苏联等参加进行和平解决。周恩来的谈话表明，当时中国政府在美国军队不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出兵朝鲜的。但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中国就别无选择，必须出兵援助朝鲜。

1950 年 10 月 6 日，周恩来主持最高军事会议，林彪再次反对出兵，他说，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却难说，美国

---

参见《周恩来总理生涯》，第 54—55、60 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5、27 页。

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军事工业基础,把美国军队逼急了,它扔两颗原子弹或用飞机对我军大规模狂轰,将够我们受的,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他说,如果一定要出兵,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甚至斯大林也曾经说,如果中国很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周恩来在分析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朝鲜的时候说:“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周恩来的援助朝鲜的思想是与他的地缘政治的观念分不开的。周恩来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8月27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12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接着,周恩来从中国和平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必须出兵朝鲜的理由,他说,假如中国不出兵,用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因为“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和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

---

参见《周恩来传》上,第60—61页。

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过去人们曾经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出兵,主要是从朝鲜、中国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意识形态考虑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但实际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才是最主要的原则。这也是在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时期,中国领导人作出的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点的决定。

#### 4. 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

1964年8月,美国军队在越南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并开始由此干涉越南事务,一步步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深渊。从1965年3月到1969年,美国先后向越南派出了50万军队,花费了约1000多亿美元,在越南进行了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的战争。

作为越南的近邻,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毛泽东一再对越南领导人说,中国是越南的可靠的后方,中国将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

1965年4月,毛泽东又领导制定了中国对越南战争的四项原则:(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将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而如果因此引起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将会战斗到底;(3)中国做了各种准备,将使入侵中国的敌人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没有界限。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正如越南领导人黄文欢在1979年11月所说,“根据胡主席的请求和两国政府的协议,自1965年10月起,中国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达32万多人,来到越南北方工作。中国击落了许多敌机,修筑了成千公里支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29页;《研究周恩来》,第180、181页。

美国学者艾伦·惠廷早在60年代的书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 Allen Whitting, *China Acros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持前线的运输线,并保证道路畅通无阻,成千中国战士牺牲在越南的土地上。在物质方面,从中越正式建交后,中国援越物资的总数达200多亿美元,在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和民兵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此外,中国还在自己的石油、粮食、美元都极缺的情况下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尽可能的援助。

周恩来在制定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多次表示,中国将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1965年春,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并宣称存在着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为此,周恩来一再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带话,表明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立场。

1965年4月,周恩来指出,在美国扩大对越南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决心支持南越人民取得胜利,准备向南越人民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援助,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刻,将派出中国人员和南越人民配合作战。周恩来还指出,“如果美国决心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抵抗。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怎么能支持越南”。中国和越南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邻国,中国对越南的物质援助,是完全应该的。

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就越南问题对巴基斯坦记者发表谈话,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1400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38、456—457页。

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

周恩来把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视为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他在1974年会见越南政府领导人时说,从你们抗美救国战争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把援越摆在援外工作首位,至今仍是如此。有的属于贷款,但大部分是无偿的,援越经济、军事总金额占我们援外的48%,外汇、粮食都占我援外的首位。根据毛主席和我们党中央的精神,你们在打仗,不援助你们,就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 5. 区域主义和亚洲观

作为亚洲最大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把中国与整个亚洲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多次指出,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民自己管,体现出鲜明的亚洲主义色彩。毛泽东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毛泽东在与亚洲各国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强调,“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如果亚洲的人民都团结起来,那么“到那时候就不会由几个大国称霸了。整个亚洲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亚洲的地方也是好地方,有两个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的东亚各国,更要团结起来,“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的国家自己来管”,美国的“军队要从西太平洋撤走,要撤的地方很多,如日本、菲律宾、朝鲜,还有台湾”。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0—461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74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7、539、614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7、163—164、194、371页。

周恩来也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同的信念。

1950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反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时指出,艾奇逊在演讲中说什么美国没有从亚洲得到任何东西,但难道不正是美国通过战争得到了菲律宾吗?二战后,美国又控制了日本和南朝鲜,并帮助中国反动派打内战,还想控制印尼、越南、泰国、缅甸和印度等。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进行挑拨,破坏亚洲人民的团结和友谊,说什么中国干涉亚洲国家的事务,对此,周恩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反驳说,美国人应当打开地图看看,“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1954年5月,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周恩来又指出,美国在亚洲组织侵略集团的活动,与维护亚洲国家的集体安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的这些活动是背着亚洲人民和许多亚洲国家进行的。在亚洲组织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的对立集团,只能制造和加深亚洲的不安和分裂。这种计划的实质,是为了在亚洲进行‘分而治之’的阴谋,以便把殖民主义的枷锁强加在亚洲人民的头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解决,指出“维护亚洲的持久和平和集体安全,需要亚洲国家共同努力。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的义务办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1957年初,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缅甸、越南、阿富汗和柬埔寨8国。在访问中他的加强亚洲人民团结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回国后的报告中对亚洲国家所共有的特性作了进一步的解释:(1)亚洲有悠久的历史 and 文明,对世界文明有巨大贡献,“我们这次的访问中,在每一个国家都曾经参观了许多有意义的历史遗迹。它们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民是有光荣的历史的人民,是曾经对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的人民”。(2)亚洲国家都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我们亚洲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密切的历史联系。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我们之间就开始有了往来”。(3)亚洲各国都在近代受到过西方的侵略和压迫,“自从西方



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到东方以后,苦难就临到了我们这个曾经以智慧的光辉照耀了古代世界的大洲。除了日本以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先后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处于他们的势力控制之下。我们的民族受到了屈辱。我们的人民受到了奴役。我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压抑和摧残。我们相互间在几千年来形成的联系受到了人为的破坏”。(4) 亚洲各国都为自己的独立的巩固进行坚决的斗争。亚洲国家的人民“曾经为争取自己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而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也认为我们这些国家的独立还不是巩固的,还必须坚持不懈地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斗争,我们都还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因此,我们都要求建设自己的祖国,赶上现代国家的水平”。亚洲各国人民的这些共同点对培育“亚洲意识”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在,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过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因此,“友好合作是亚洲人民的共同利益”,必须反对西方国家分而治之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

周恩来提出,亚洲各国应当在五项原则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冲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国在这方面也将积极作出努力,首先解决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尤其是要实现中国与泰国、菲律宾和马来亚三个中国邻国的关系正常化。

保持亚洲国家团结的一个前提是不让欧美大国卷入这一地区的事务。对当时苏联要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周恩来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他指出,苏联不是亚洲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根据这个原因没有邀请苏联参加,周恩来表示,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将为此而斗争。

周恩来的亚洲主义观还表现在他提出的在东南亚实行和平中立主义的思想上。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10、70、207—209页。

1954年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会谈时,提出要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与东南亚国家实行友好交往。尼赫鲁把周恩来的这一想法明确为和平中立思想,说如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东南亚国家,那就会创造一个很大的没有战争恐惧的和平区域,在这个区域中,所有国家都是中立的,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干涉,没有侵略,而是鼓励和平。周恩来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在此之前,周恩来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时曾经提出,要让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像印度那样的和平中立国家。到1954年底,周恩来又进一步明确地把印度称为和平中立派,它们与美国等主战派国家不同,与英法等维持现状的国家也不同,应是中国争取的对象。他认为,和平中立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战争,在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上与中国有共同之处,但在社会制度上反对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完全与中国站在一起。所以,中国争取它们和平中立是比较现实的。在实践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和平中立思想给予了支持和理解。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时指出,亚非会议的参加国大多是和平中立主义和接近和平中立主义的国家。中国与它们接近,有利于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并为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和平中立思想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两大阵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对指导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1972年6月,周恩来与美国参众两院领袖谈话时再次表达了在东南亚建立和平中立区的想法,并把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周恩来指出,东南亚国家是五个国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可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南亚五国希望成立一个中立地带,他们要保持中立,我们就赞成。如果这五个国家真正变成中立国家的话,对美国、远东都有利。

周恩来多次向东南亚国家的客人表示,中国支持东南亚提出的中立的要求。1975年3月,在与新加坡外长会见时,周恩来说,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东南亚中立化的愿望,并认为如果东南亚五国能够和平友好相处,就能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不久,他又对澳大利亚客人说,我们赞成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和平、中立和独立的

国家,我们理解他们的这一立场。

## 6. 妥善处理华侨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从明清两朝起,沿海一带有不少华人向海外移居,并在所在国繁衍后代,与当地人民融洽相处,成为所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迁移,东南亚一带的华人越来越多,成为中国与这些近邻国家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怎么处理邻邦国家中的华人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坚持尊重近邻国家利益的态度和立场。

毛泽东指出,华侨首先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1954年10月,毛泽东指出“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为了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华侨政策的疑虑,毛泽东一再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中国希望这些国家的华人和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并明确表示反对双重国籍。毛泽东指出:“我们经常嘱咐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国生活,就要守法,不应该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我们常常做这种教育工作,叫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华侨多的国家,这一关系更要搞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怀疑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这也要在长时期中加以证明:到底我们是在教育华侨守法呢,还是暗地里策动他们反对居留国政府?……各国可能有非法政治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35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700、71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5—17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185页。

国的利益服务”。为此,中国要与这些国家合作,对华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毛泽东还指出,华侨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处理好中国与这些国家中的华侨共产党组织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为此提出了解散这些国家中的华侨共产党组织的方案。他指出,“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否则会使我们很尴尬,不好办事。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毛泽东又指出,“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要相互体谅。在与泰国客人会见时,毛泽东针对泰国领导人怕泰国华侨的问题,耐心地做工作,指出“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

周恩来关于解决华人问题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周恩来在1959年10月9日会见印尼外长时,说中国与印尼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中国印尼如果有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华人问题,1955年我们和印尼政府缔结了华侨双重国籍条约,就是为了帮助印尼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华侨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当的方法解决,这样既有利于印尼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华侨的正当权益。这两种利益并不矛盾,可以结合起来解决。至于进行投机倒把和破坏经济,这并不包括在正当权益之内。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将对印尼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9—190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7—18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0页。

的经济发展有帮助,也是华侨本身的利益,华侨经济是印尼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我们希望印尼政府把华侨经济纳入印尼经济发展之中。华侨正当的经济生活如果受到损害,也会损害到印尼经济的独立发展。

在华侨问题上,过去中国的国籍法是以血统为准,而一些国家如印尼却以出生地为准,这就造成了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澄清说,华侨的双重国籍是过去遗留的,新中国将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不会让它影响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不让它影响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如果华侨还是侨居的身份,他们就应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不应参加驻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他们已经取得驻在国的公民身份,他们就应该脱离华侨的身份。这是新中国在华侨问题上的政策”。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时还对印尼的华侨说,中国不实行双重国籍,因为这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政,“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百万外国侨民,他们也是双重国籍,我们政府好不好办事呢?凡事都要推己及人。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形,也不愿意,那么,我们在国外怎么能要求人家接受双重国籍呢?今天中国政府执行和平的、平等的外交政策,所以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说,尽管中国可能声明,说中国决不会利用海外 1000 多万华侨来搞颠覆,但“双重国籍问题如果不解决,人家还会感到有些不放心的……如果还承认双重国籍,那就是不尊重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今天的新中国不能这样,要讲道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 1955 年与印尼就双重国籍达成了一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华侨应当根据自愿原则在两国国籍中进行选择,作出决定,只能保留一个国籍。

新中国按照这一原则,先后与缅甸、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解决了华侨问题。新加坡的华侨问题也是如此。周恩来在晚年曾对新加坡外交部长说,有人说新加坡是第三中国,但我们尊重你们的国家主权,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20 年来,都是这个主张。所以你们不会是什么第三中国,连第二中国,我们都不承认,怎么还会有第三中国呢?你们不是第三中国,你们是新加坡共和国,是独立的,有

主权的。

### 三、邓小平的地缘政治思想

邓小平的地缘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如,邓小平在 1978 年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表示支持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赞成东盟加强东盟自身的团结的立场。邓小平的地缘政治思想较多地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 1. 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中印两国应当建立正常和良好的邻国关系,这是邓小平对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看法。邓小平在 1982 年与印度客人谈话时指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

1987 年,邓小平严厉批评印度宣布成立阿鲁纳恰尔邦的做法,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64、709 页;《周恩来传》上,第 193 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35—137 页。

但同时又表示,中国主张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成立这个邦,实际上是想迫使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对中印解决边界问题设置了一个障碍。解决边界问题只能是合情合理一揽子解决,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也就是互谅互让。这样邓小平再次重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期提出的解决中印两国边界问题必须互谅互让的原则。邓小平在1988年12月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谈时,又提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把发展自己的国家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他还向印度领导人提出了调整两国关系的建议。

## 2. 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一些领土争端,除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外,还与日本存在钓鱼岛之争,与越南有陆地和海疆之争,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南海岛屿之争。邓小平在谈到这些问题时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避免用战争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邓小平经常提到的一个思想就是“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尤其是在南海的争端上,邓小平多次谈到,“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的,属中国,现在除了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 3. 邓小平关于华人的思想

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华侨华人问题上的错误,指出,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0、282—283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38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87—88页。

华侨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四人帮”把它搞得一团糟,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如果不这样做,会受到后代的谴责。为此,邓小平在1978年11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有较多华侨的国家。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时声明,中国侨务政策的要点,第一条,就是鼓励华侨自愿选择驻在国的国籍。华侨多的国家对华侨很有戒心,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把鼓励华侨选择当地国籍作为重要的侨务政策。加入了驻在国国籍的人,就是驻在国的人,应该对所在国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第二条,我们也不能强迫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加入驻在国国籍。我们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驻在国的发展和两国友谊做出贡献,遵守驻在国的法律。理所当然的,中国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也是国际惯例。第三条,我们历来不赞成双重国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贯政策。在访问马来西亚时,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些原则。

#### 4. 反对亚洲安全体系,支持东南亚实行和平中立政策

1975年邓小平针对当时苏联鼓吹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在会见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时,多次提出,中国明确反对亚洲安全体系,因为它的作用首先是苏联要同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逐个分化亚洲国家,把这个地区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三就是有对付中国的一面。邓小平指出,苏联搞欧安会最积极,目的是分化欧洲,接着要加紧搞亚洲安全体系,包围中国是一个内容,但主要内容还是两个,一是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争夺,一是分化亚洲国家,对此亚洲国家普遍警惕,不管亚安体系搞得怎么样,都改变不了现在问题的实质。邓小平还表示,支持缅甸的既不参加美国搞的这个条约那个条约,也对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不感兴趣的立场,认为这符合亚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于支持东南亚建立和平中立区的思想。邓小平对菲律宾领导人说,中国支持东盟国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59—60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94、196页。



家要求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并与东盟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他向泰国领导人表示,中泰两国本来就是很亲密的亲戚关系,没有理由不友好,我们亚洲各国的事情,应当由亚洲来管,中国反对超级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东南亚是属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不属于任何超级大国。邓小平对缅甸领导人执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也表示赞赏。邓小平特别指出,美国所拼凑的军事集团在亚洲宣告瓦解,而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也受到亚洲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抵制。邓小平还在 1975 年就表示支持东盟扩大到印支三国。他在谈到东南亚中立化的问题时对缅甸领导人说,中国明确支持东南亚国家要求结束美国基地的立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提出把东南亚建成和平、中立、自由的地区,我们支持这个立场,这个地区把印支三国包括进去,我们也支持。

到 1978 年邓小平恢复其领导职务后,邓小平再次对东盟国家表示了中国希望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的愿望,并重申支持东盟建立和平中立区的立场。邓小平指出,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这种联合有利于反霸,有利于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国支持东盟和平中立区的政策。中国在保持与发展同已建交的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三国关系的基础上,与印尼和新加坡发展关系。

邓小平在 1978 年访问新加坡时,再次表示,东南亚形势变化很大,亚安体系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有市场,中国政府当然要正面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提倡全世界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中国反对绥靖主义,中国希望东盟把和平中立自由的主张贯彻到底,这可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131、133、138、140、151、169、195 页。

## 第七章 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围攻。这种“中国威胁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国家发出,具有不同的含义。毛泽东和周恩来及邓小平在他们的外交活动中,也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中国威胁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反华言论,他们进行坚决的回击;而对周边一些小国对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后,会进行扩张的怀疑,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向这些国家解释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不渝地重申,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一再严格教育中国外交外事工作人员,在与小国、发展中国家交往时,必须始终警惕表现出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追求和平的历史,但也有过中国封建王朝对外扩张的小插曲。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宣传中国的和平主张时,也一再就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有过的侵略扩张,向有关国家进行道歉,表现出大国领袖和新中国外交的“君子之风”和泱泱大国的风度。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有所不同,各有特点,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一致的。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是这三位伟人留给中华民族的永远的遗训,也是中国应当永远遵循的基本国策。

###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思想

中国过去是一个世界大国,曾经在东亚起过主导作用,但在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对象,成为一个饱受西方欺凌和侮辱的弱国和贫国。怎样使中国重新强大起来,使中国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是近代以来历代爱国者和亿万中国人的强烈的心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中国革命先驱都把使中国重新富强繁荣作为一个最崇高的使命。新

中国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开始了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第一步。

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一直是以仁义礼仪来维持这一地区的秩序的,许多统治者都把与邻国和睦相处作为外交的一个基本方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尽管也有过对一些邻邦国家的侵略和征伐,但大多数时间中,中国与邻国都保持了一种和平相处的关系。不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新中国日益强大,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50年代亚洲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人说,“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毛泽东在和外国客人会见时,尤其是和中国周边国家的领导人会谈时,曾经多次对这种“中国威胁”的论点进行反驳,并对他们做工作,表明了中国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外交哲学。

### 1. 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没有能力对外国进行侵略。“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毛泽东驳斥说:“中国一没有抢夺各国市场,二没有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三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四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说中国威胁别国是没有理由的。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中国没有让人害怕的东西,“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5—25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6页。

毛泽东指出,西方鼓吹中国侵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从没有侵占美国一寸土地,檀香山和中国还隔着中途岛,日本我们也没有去侵占过,而美国却侵占着我们的台湾。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侵略者?”“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无非是说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无非是说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把美国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无非是说中国为自卫与印度进行了边境战争,并支持越南人民进行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 2. 对邻国进行说服工作

5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有不少国家听信西方国家的宣传,在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中国会不会对他们的国家进行侵略的问题。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体谅他们作为小国对大国所具有的天生的不信任感,一再对他们进行解释,表达中国希望与他们和平相处的愿望。1955年底毛泽东与对中国强烈不信任的泰国客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我们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们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说怕中国要侵略泰国,其实我们是怕人家侵略,怕美国侵略。我们不怕印度或泰国侵略我们。现在美国正侵占着我们的台湾”。

1960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时又指出,“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9—23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9页。

毛泽东一向主张大国与小国一律平等,但毛泽东也清楚大国与小国在外交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也不相同。在所谓“中国威胁”问题上,毛泽东把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威胁与周边一些小国对中国强大了是否会进行扩张的担心是区别开来的。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毛泽东给予坚决的批驳,但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毛泽东一方面对它们做工作,向它们解释中国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会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时,又对这种担心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表示中国可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来缓和边界局势。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时指出,“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但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侵略你们”。毛泽东提出,为了减少尼泊尔的这种担心,中国可以和尼泊尔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在边界都不布置正式军队,“双方正式军队隔开一段,双方都安心。划界、不巡逻等都是为了永远保持和平友好,使双方安心,不怕对方侵略”。

在此之前,1957年12月,缅甸吴巴瑞士副总理在访华时也曾向毛泽东说起过缅甸对中国的担心。吴巴瑞士说,缅甸害怕中国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国总是欺侮小国。缅甸是处在大国之间。毛泽东对他们解释说,中国的可耕地是少,“但你们不用害怕中国是否想要缅甸的土地。缅甸的土地是缅甸人民的,中国任何人都不能要缅甸的土地……前次吴努总理来华时,我问他缅甸是否有人害怕中国,他说有些人害怕。当时我也向他解释过,缅甸不必害怕中国,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尼赫鲁总理也对我们讲过,说有些国家害怕中国……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因此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多数时期都是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现在的中国,是主张和平至上的,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0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2—303页。

但毕竟历史上也有过中国的一些封建王朝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事情。“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所以一些周边小国对中国怀有一些疑虑也是难免的,中国应当给予体谅。毛泽东曾几次向中国的周边国家的领导人承认,在历史上有过中国人侵略这些国家的行为。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谈到中国在元朝忽必烈和清朝对缅甸的战争时,毛泽东承认,“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 3. 中国现在不称霸,今后强大了也不搞霸权主义

毛泽东在驳斥“中国威胁论”时,也一再表明中国的这个立场。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贡献。他强烈地预感到,中国在下个世纪,即到2000年左右,肯定会比那时的中国强大得多,但中国不能因此谋求一种特殊的世界地位,不能因为中国成了强国而走过去的帝国主义走过的道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国全党宣布:“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又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时说:“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7—178页。

转引自《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第323—324页。

样,永远应当这样”。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变得富强起来,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当然中国发展起来,也要反对大国主义,也要防止今后“翘尾巴”,“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1960年5月,毛泽东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蒙哥马利元帅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问:“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蒙哥马利元帅是以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来看待一个大国成长起来后的外交走向的。在他看来,凡是大国,强大起来后没有不进行对外扩张的,从英国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其他国家。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讲到了英国和美国侵略扩张到处遭到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最终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被世界人民赶回去,美帝国主义以后也将会被人民赶回去这个历史教训。他对蒙哥马利元帅说,“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因此,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像英美那样走对外扩张的路。

毛泽东认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教育中国党和国家的对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41—24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6—25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8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9—430页。

外工作人员,教育他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国沙文主义。

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在与蒙古领导人的谈话中就希望他们对中国的沙文主义进行监督。他对蒙古代表团说:“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全心全意称王称霸。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有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

1957 年 5 月毛泽东又说,中国援助蒙古的工作人员问题,“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完全按蒙古的意见来派。如果中国人员在蒙古有违法行为,“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1959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道:对中国在对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骄傲情绪,“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61 年 10 月,毛泽东又说道,“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称它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公开教育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有时也会出一些问题,有些干部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别人。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教育,并作适当处理,使他们改正缺点”。对那些在对外工作中犯有自高自大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人,毛泽东主张要进行处理。“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毛泽东对一些小国的客人讲,“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220、484—485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78—479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8 页。



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

1967年10月,中国某驻外使馆在国庆招待会上点名批评指责另一国家,并对驻在国的国内问题提出不适当的评述,引起驻在国的不满,在提出意见后,这位大使还不愿修改,驻在国于是对国庆招待会进行了抵制。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厉批评该大使把中国的思想强加于人,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进行教育。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一文件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的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党内的沙文主义再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1974年2月22日与卡翁达等谈话时说,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送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 二、周恩来对“中国威胁论”的批评

### 1. 中国如何对待亚洲邻国的“中国威胁论”?

50年代初,在一些中国的亚洲邻国中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时就指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是出于三个原因:(1)中国不但大而且很强,或者可能会强;(2)有许多海外侨民;(3)害怕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本地的共产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83—284页;同前书第13册,第381页。

党来活动。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泰国旺亲王直接攻击中国说,有三件事引起泰国的担心:(1)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人;(2)泰国有300万华侨有双重国籍;(3)泰国东北部有50万傣族人。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这个会议上也发表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言论。周恩来对此不是简单地进行批驳,而是进行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周恩来指出,新中国的出现和强大,在邻近一些国家中引起一些猜疑、恐惧,怕中国要向外扩张等等,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我们知道,一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别人的充分了解,而且还常常引起某些疑惧。如果再加上某些方面别有用心的造谣和挑拨,这种缺乏了解和疑惧的现象还可能加深。但是造谣和挑拨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缺乏了解和疑惧,也可以经过较长时期观察和实际的接触来消除的”。

新中国的制度首先不容许向外扩张,而且事实上亦绝无此必要。这主要要靠中国自己的表现来说服别人,并且要很耐心。周恩来根据中国的确比周围国家要强大,在历史上中国也曾侵略过一些国家,亚洲小国对中国存在一种担心等情况,确定了中国应当要首先申明中国的和平立场的方针。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都表示,中国是亚洲一支和平力量,决不会侵略别国。但光这样说还不行,周恩来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给予明确的表示。如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申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但当一些不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家在会议上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时,周恩来又针对这些言论,更加具体地表明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决不是从外部输入的。“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周恩来针对当时的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的误解,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我们的邻邦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着恐惧。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

是容许他怀疑的。在这次同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接触中,我向他们保证,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并欢迎两国派代表去中国的云南和广东、福建等地看一看,了解中国是否对他们形成了威胁。周恩来还对菲律宾客人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一贯坚持这个原则。革命要靠本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大多数人民选择什么制度,这个国家就实行什么制度。这决不能由别国人民的意志来决定。尽管各国人民都希望世界进步,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各国人民如何实现进步,这条道路还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走”。

周恩来还向泰国客人解释中国在云南省成立傣族自治区与所谓自由泰国没有关系,“外面有人把它们混在一起,我们觉得很遗憾。还有一个谣言,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云南的军队很少,我们的边境一面靠近缅甸,同泰国还有一段距离;一面同老挝和越南相邻,我们需要同这些国家友好,同东南亚各个国家友好。我们聚集很多军队在那里干什么?中国是不会侵略泰国的,也不可能那样做。一个国家想要确立什么制度,革命不革命,这要由他们本国人民去选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有人想把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到别人身上,那么他们一定要失败”。

周恩来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意识形态上,中国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但外交是国家之间的事情,革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两者不能混同。外交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主要对象是做当权者的工作,与各国的当权者打交道,必须遵守国际法准则,尤其不能干涉国家内部的事情。所以中国对革命的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但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1970年周恩来又指出,革命思想是可以传播的,别国也可以在道义上支持。思想上的传播是没有界限的,没有国界的,但输出革命是一种行动,是代替别的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是一种干涉。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6、130、131、123、429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31页;《研究周恩来》,第66页。

## 2. 对亚洲邻国的担心表示一定的理解

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华。他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说,在万隆会议前,许多国家不清楚中国的外交是要侵略别国还是要与别国友好合作,对中国有所担心。它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要吞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是容易的。他还论证说,“过去,鞑靼、蒙古的侵略都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周恩来听到这些言论后没有马上反驳他的观点,而是承认,“中国的解放、胜利和发展,有一方面的理由可能引起周围的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恐惧。这我们是理解的。中国是大国,人口多,如果在一个相当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发展成为强国,人们很容易会联想起过去的某些国家在强大以后向外扩张的例子。也有人会回想起东方的历史,某些民族曾经向外扩张过,中国封建帝国向外扩张过。联想到这些就会有恐惧,特别是中国的邻国”。周恩来为此解释了三条:第一,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情况不同了,新中国不会向外扩张;第二,中国历史上曾经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所以中国不会走老路去侵略别人,这也是中国的政策和制度所不许可的;第三,中国也没有需要,因为“我们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这足以让我们得到发展。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只有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不容许自己重蹈殖民主义的覆辙,才不致失败”。

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越南时,还专门参观了被越南人民视为民族英雄的征侧和征贰的纪念庙,并说“这两位女英雄曾经在1900多年以前抗击过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我们要向这两位越南民族英雄的塑像献花致敬”。

## 3. 中国决不走大国沙文主义之路

### (1) 新中国的国际定位

周恩来多次指出,中国虽然从人口来说是个大国,但是从经济军事上来说,又是个穷国、弱国、落后国,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估计,特别是当外国和国际社会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

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更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人家一吹,就不知天高地厚了。1972年周恩来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973年9月,周恩来在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又说,有人说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说既是又不完全是。从面积大、人口多这一点上看,这算是个大国;但从经济发展、经济实力上讲,却差得很远。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看,我们要小得多,不能和你们比,你们现在十倍于我们。因此,说我们是潜在力量,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是有发展前途的,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21世纪时,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因此,中国最主要的事是把中国自己搞好,这是我们最急迫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20世纪内做不完。

周恩来还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国家也应是如此。应有自知之明,我们在国外有影响,但主要还是在国内。我们国内的负担很重。

## (2) 新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到50—60年代,就不断有人向周恩来提及,如果中国有一天强大起来,会不会走军事侵略的道路?周恩来对此多次表示,中国会从过去的战争灾难中汲取教训,“决不会走国家强大了就向外扩张的路。这不仅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制度所不允许的,而且从利害关系上看也不允许,因为凡是侵略别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几千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发动侵略战争必定失败”。1955年10月10日,周恩来与英国客人会谈时,一客人问,中国强大了会不会侵略别人,周恩来回答说,你这个问题也正是我要讲的问题,第一,中国强大不是短期能实现的,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美国,东方只有在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强大。美国人的技术我们也需要,我们不排除西方。只有相互帮助,各国的经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34、623、670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04页。

济才能发展很快。第二,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扩张?这是不允许的,首先是制度不允许,我们是社会主义,它是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其次是历史教训不允许,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不是都失败了吗?我们要造成一个反对扩张的国际环境。

周恩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扩张的道路。他指出,世界近代史表明,凡是搞扩张的民族和国家,总是要失败的。现代有些大国搞扩张主义,也肯定是要失败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又说,形势的发展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扩张,建立霸权,总是要失败的。

涉及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周恩来指出,“中日两国经历了战争以后,出现了新的因素。不少日本人从中国回去,也有不少日本人留在中国。战争本来使人对立,但也增加了相互的接触和了解。诸位知道,五千多日本妇女同中国人结婚了,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两国已经有了亲戚关系。战争带来不幸,但也带来新的因素。当然,往来和婚姻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友好,而不是干涉内政”。中国和日本已经成为亲戚国家,更应当友好相处。当有些日本人提出中国将来可能成为亚洲的中心,而日本会被孤立时,周恩来回答说,中国不应成为什么中心,也不会成为什么中心,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更方便。

后来,当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时,周恩来又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总是把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平等作为一个必须执行的原则,警惕中国外交工作人员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倾向。他对外国朋友说,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好处是容易体会到需要与别的国家相互支持和团结,而大国有其利的地方,但也有坏处,那就是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重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意见和利益。这一点不论是哪一种制度的大国,都容易犯。我们对这一点很警惕,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拿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做镜子,也要

拿中国过去封建帝国时代侵犯人家的历史做镜子,我们在教科书里也加进了这样的内容,使后代不犯大国沙文主义。

中国反对战争和侵略的思想不仅是中国和平外交的历史传统的一个遗产,而且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社会制度和我们的信仰决不允许我们威胁和侵略其他国家”。

周恩来还指出,中国即使将来变得强大了,“我们仍然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我国人民如此,我们的国家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的制度不允许向外扩张、挑衅、掠夺”。周恩来说,如果中国强大了,要特别警惕大国沙文主义,它强加于人,目空一切,骄傲自满,不公正。现在要警惕,将来也要警惕,要以此教育后代。

当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作用时,周恩来清醒地指出,中国不能因此而走称霸世界的路。197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著名的讲话,认为战后25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还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周恩来为此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达到此地步,即使中国将来发展了,也绝不做超级大国。中国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不做沙文主义大国,就是说,凡是我們不做的,不要人家做,越是小党小国,越要注意,否则是大国沙文主义。

1973年10月,周恩来又对什么是超级大国作了自己的解释:超级大国就是超越别人,超越一切的意思,现在超级大国已变成世界上谋求霸权的国家的一个特有名称了。中国是个大国,但我们不做超级大国,不谋求霸权,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但目前还没有做到,是在朝这个方向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62、711、357、429、685—686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65、434页。

努力。又说,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是世界大动乱的根源,迟早会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是我们的国策,我们反对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

不称霸是周恩来对外工作的最后的遗嘱。他在 1975 年 6 月 30 日,会见最后一位外国总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时指出,“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毛主席说,将来如果中国的下一代称霸,全世界人民就应该群起而攻之,一起来推翻它”。

### 三、邓小平关于发展起来的中国 不威胁任何人的论述

#### 1. 中国首先需要发展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需要发展是因为中国太落后,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

和平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利用和平来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中国实行反对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以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是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总战略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早在 1975 年时就曾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我们的人口多,有八亿人,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钢要达到你们和欧洲、日本的水平,至少要五十年时间,而到那时候,你们又发展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国内实行改革,还有一个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需要有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626 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468、497、534、654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63 页。



50—70 年时间来建设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年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至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我们的力量越发展,这个仗就越打不起来,从而维持更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即使不说是永久和平。对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来说,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总战略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在不断变化。在 1980 年以前,中国设定的发展总目标是达到或者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所以在 1978 年到 1980 年期间,邓小平经常说中国要达到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 1980 年以后和 1986 年以前,邓小平把发展目标设定为接近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从 1986 年 12 月起,邓小平再次修定目标,提出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目标在一步步地更接近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充分表明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邓小平也多次回答中国发展了将会对世界局势起何种影响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动力。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发展的,就是说,只有西方国家发展了,只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中国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反过来,中国的发展又会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它将为西方国家提供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5、349、386、230、295、327、344、350、385、399 页;《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17 页。

更大的市场,容纳更多的西方商品和资金,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出路。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可能给第三世界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资金,提供更新的经验。例如,中国 1985 年的外贸总额才 500 亿,如果达到 1000 亿,甚至 2000 亿,那不也是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容纳更多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吗?

第二,发展起来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力量,将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中国有一天强大起来,发展起来会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疑问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中国由于过去不发展,所以“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当中国发展起来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时,中国的总的国家力量就会大大提高,但是中国不会走霸权主义国家的道路,“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中国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也会更有分量。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 2. 发展的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多次指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反霸条款不仅是对大国的约束,也是约束中国,表明“中国永远不称霸,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

邓小平早在 1975 年 1 月就曾指出,“我们永远不称霸。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霸?问题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我们也成了一个发达国家,是不是也要称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不是讲现在,是讲将来永不称霸。我们在联合国声明过,如果说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我们是用这样的路线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邓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还曾经说,关于中国的未来,我们要用这样的信念来教育后代,如果说一百年,不说一千年的话,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要搞霸权主义。

邓小平 1990 年时再次向世人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邓小平在最后一次去南方视察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称霸还并不完全是由于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庄严承诺,也包括了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早在 1973 年,邓小平就曾经谈到,中国永远不侵略别国,是从我们的信念、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的,我们相信一条,凡是侵略人家的人,最后总是要倒霉的。中国一百多年来被帝国主义踩在脚下,一直到 1949 年才翻身。这一百年历史教育了我们自己,凡是把我们踩在脚下的人,我们还不是把他们赶走了?凡是压迫别人的人,都得要失败。我们为什么要去侵略人家呢?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6、74、2、134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8、383 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74 页。

## 第八章 从对外开放思想 到对外开放战略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重大发展。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侧重于从理论上、文化上论述学习外国的长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又经常从反面提出问题。其中,学习苏联经验与批判苏联经验的矛盾在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侧重于从经济上吸取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把中国的经济建设、现代化事业与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贸易等相联系。在反对闭关自守,认识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与世界各国相联系上,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比毛泽东进了一大步。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则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战略的高度,从中国的基本国策的角度,对对外开放作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论述,使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成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 一、毛泽东的学习外国和对外开放的思想

#### 1. 关于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思想

1937年7月,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外交政策时,第一次阐述了独立自主与外援的关系。他提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

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 社会主义的苏联;(2) 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 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毛泽东的评述明确地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为此应“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相配合”。为了吸引外国人来边区,毛泽东认为,应该“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还特别提到要“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还特别论述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认为不论有无外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对外援不能期望过高,但自力更生不能理解为闭关主义,因为“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而且,中国的敌人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性的,中国需要“外援的配合”。

毛泽东谈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时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在当时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对外开放的条件并不好,但毛泽东还是为根据地实行对外国人开放的情况规定了方针和原则,认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抗日战争是毛泽东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第一个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重点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争取外援。但其中也包括了边区可以对外国人开放的思想。从开放的核心内容上来说,它只是一个萌芽的时期。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内战的危险,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问题,但这时的提法是要

“自力更生”。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毛泽东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己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不允许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后来，毛泽东又提出，独立自主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美国的事情由美国自己管，我们不管它，但美国现在管得太多了”。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对不要外国援助也能进行革命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指出，有些人对英美的援助怀有过高的期望也是幼稚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苏联方面去寻找。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面的观点没有改变。他在 1956 年 8 月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毛泽东在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上的观点是一贯的，其基本的主导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不能没有外援，外国的援助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得尽可能多的外援，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应该始终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15—16、4、5、51、78、223、96、245 页。

## 2. 毛泽东的学习外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谈到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时,给人的一个感觉是,似乎毛泽东的思想是比较封闭的。而有些人反对这种意见的时候,往往引述毛泽东的一些关于应该和必须对外开放的讲话,以此证明毛泽东是主张对外开放的。笔者认为笼统地说毛泽东就是主张封闭的,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毛泽东的确讲过许多关于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的话,而且有一段时间讲得还很突出,对封闭的观点也进行了批驳。但以毛泽东的讲话来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多么开放,似乎毛泽东一直把对外开放当作中国的一个基本方针,也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合,因为中国在 60—70 年代是相当封闭的。

所以实际上这里有一个矛盾,即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较大的矛盾,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因此,在评述毛泽东到底有无开放思想时,要从全面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角度来看,不能光看一面,也不能光看一个时期。

人们通常以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是在 1956 年前后讲得比较多,但实际上,在 1945 年前后,甚至在 30 年代,毛泽东也讲过一些很重要的思想,表现了他的对外开放观,而且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学习西方,与后来向苏联学习的思想还不一样,这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

1945 年,在七大上,毛泽东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有一段删去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是有利的。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策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国家,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的思路是很开阔的,思想是很开放的。这

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有意义。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主要表现在 1956 年前后，多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的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毛泽东在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表示，“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这个提法打破了过去中国只向苏联学习的提法，把向外国学习，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提到了一个更清楚的地位。由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开始暴露苏联制度中的许多不好的东西，因此毛泽东在 1956 年时特别强调，中国不能光把眼光盯着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眼界应当更开阔一些。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毛泽东指出，学习外国应当全面，不能只学一两个国家，“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2) 学习一切外国的好的东西。不仅学习的对象可以扩大到一切国家，而且在学习的内容上，只要是好的什么都可学。这也改变了过去认为只有外国的先进技术才可学，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方面不能学的传统意识。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与西方的矛盾和对立，也“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当时，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因此向苏联学习成为新中国的一个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这种学习不仅是一般地学习苏联的经验，而且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377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35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83、236—238 页。



在关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在关于最重要的权力运转的方面,也向苏联学习。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电报,指示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为此,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提交的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这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当天毛泽东也因此给菲利波夫(即斯大林)发电报说,“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

毛泽东还曾特别提出,要向中国的近邻日本学习,他对日本朋友说,“我们中国的缺点很多,一直到现在,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点,你们比我们强,几十年内你们能够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所以你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3) 对任何外国的经验都不能照搬,必须进行分析。毛泽东认为,对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尤其是对待苏联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毛泽东还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对苏联的东西,中国“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毛泽东经常谈起过去全面学习苏联时的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74—475页。

一些教训,指出“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学习苏联的好的经验,也不能只是模仿,而要有独创精神,要把“学习与独创结合”。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学习外国的好的东西要与本国的特点相结合。他说,“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外国有好东西为什么不学?……这是讲学好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是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可是,有时也学了一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这个责任不能由苏联专家担负,而应由我们自己担负。这是指对苏联经验随便硬搬,十个指头中间有一个指头学得不对。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先进经验,但也把一部分不适合中国的经验学来了。这也有一个好处,不适合的经验我们再改进,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经验。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就行不通。要学先进经验,这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

毛泽东还认为,学习外国的经验应当参照其他国家学习这个国家的一些体会。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曾看过一份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哈格尔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说李森科一切都对,将德国权威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孟德尔学说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这是不对的,因为科学可以有多种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毛泽东认为这个提法值得注意,要中宣部进行讨论,可见毛泽东提出正确对待苏联经验也是注意到了东欧人的观点的。

这一方法不但适合学习苏联的经验,而且也适合学西方的东西。毛泽东认为,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要有两种态度,就是“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要在破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2、240、283、310—311、312、313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74页。

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坚决抵制和批判”。

(4) 学习外国是中国应当长期坚持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中国与苏联关系已经破裂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苏联经验,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凡是苏联经验中好的东西,中国仍然要继续学习,并认为过去学习苏联经验是必要的。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会议上说: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毛泽东还指出,苏联领导权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毛泽东对开放思想阐述得最好的一次讲话是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体现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从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这一基本出发点,谈到了学习外国与发展中国两者之间的关系,主张要在充分学习外国的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来。他在讲话中既批判了全盘西化,又批判了对外来文化全盘否定的两种错误思潮。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3—394、236—238、239页。

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写东西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毛泽东还指出,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東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東西。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毛泽东开放思想超越同时代其他人的地方,就在于毛泽东自己超越了当时中国人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定式,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理解外国文化中那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中外一致的东西。毛泽东说,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上述分析表明,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倡导过学习外国,在思想上是主张向外国的好的东西开放的。

毛泽东在实践中的许多做法,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与毛泽东借鉴苏联经验教训有关。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在斯大林之后出现修正主义,主要教训就在于斯大林生前没有选好接班人。鉴于苏联的这一教训,毛泽东就提出自己退居二线,让可能接班的领导同志在一线上得到锻炼,更加成熟,更有威信。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页;同前书第9册,第37页;同前书第6册,第175—182页。

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 3. 毛泽东的开放思想的局限性

无论从实践的结果还是从思想的深度来看,毛泽东的开放思想都存在问题:

第一,毛泽东的开放思想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关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的发展不可能展开,而中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中的国际环境,又使毛泽东在对西方国家开放方面走上了一个较为封闭的道路。如在处理如何打破西方的封锁方面,毛泽东经常从反面论述问题。中国不应当害怕西方的封锁,应当自己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管怎么说,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总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应当想尽办法打破这种封锁,这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但毛泽东则经常认为,西方的封锁对中国是件好事,甚至认为,美国的禁运,“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好处甚大”。在1958年时,毛泽东把美国的禁运作为中国应当搞大跃进的一种理论论证,认为“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也就是说,毛泽东后来的较左的东西,固然有毛泽东自己的主观认识的问题,但中国恶劣的被封锁的外部环境,也对此起了推动作用。不过问题的主要一面,正如后来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还是由于思想上较为封闭。

毛泽东虽然说要学习外国,也比较注意美国、苏联在对外政策上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3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8、345—346页。

的变化,但对美国的政治似乎了解不深,所以他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国内那么注意“水门事件”这样的“屁事”,当然更不能理解尼克松竟然后来不得不为此辞职。毛泽东为此感到遗憾的是,他与尼克松开始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大业被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拖后了。

第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开放的认识,和过去相比,似乎没能发展过去的一些较好的东西,反而还有所退步。如过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还提到过中国人不能做闭关主义者,中国不能闭关,涉及到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的问题,但后来毛泽东对此不再提到,有时反而以被封锁为荣,使自力更生走到了实际上的闭关自守,表现出浓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又如,在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时期,那时没有什么条件实行开放,但毛泽东反倒在那时提出了一些较具体的开放措施,如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曾提出要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要引进外资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的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中国应吸收大量外资来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中国发展工业的资金,“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当时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建设将会需要美国的参与,因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惟一国家”。但后来毛泽东的开放思想中很少有这些具体的想法。

第三,未处理好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毛泽东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并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性错误,但在实践中,毛泽东把二者放到了对立的立场上。他总是强调中

---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参见蒋建农:《毛泽东的开放观与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国应当独立自主地建设一切,这与当时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把独立自主和中国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对对外开放的思想并未真正重视。

第四,当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导致不可能把学习资本主义看得真正很重要。从毛泽东和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来看,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处于垂死的状态,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前途,将很快为社会主义所超过,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真正可学的东西,或者说,虽然在理论上还承认资本主义有一些东西比社会主义的先进,但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对它是拒绝的。例如,毛泽东在1956年时讲了许多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话,但到1957年毛泽东就宣布东风压倒了西风。他认为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西方已经被“永远地抛下去了”,社会主义“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苏联人将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而中国也将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所以整个资本主义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没落时期。如果说毛泽东讲过学习西方,也讲过西方帝国主义正处于垂死时期的话,那么,后者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从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强调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关于要学习西方的话,1958年后几乎就很少讲了。而且,关于学习西方,之所以在1956年前后比较集中地提出来,也有一个与中国和苏联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对西方的经验不仅缺乏了解,而且对了解到的一些好的东西,不以为然,特别是对西方的科技和人才,毛泽东有时是很不服气的。他甚至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大谈否定权威,大谈青年出成果,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这段话也表明毛泽东当时学外国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对于西方的科学,是有保留的,甚至是鄙视的。

毛泽东关于向苏联学习的话,在60年代以前应该说是真心话,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并且做得很彻底。但在苏共二十大以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5—296页。

后,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态度逐渐变为不以为然,并走上了一条与苏联经验不同的路。到6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封闭,他把自己完全关在中南海的书房中,与世隔绝,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外开放的思想。

第五,毛泽东虽然也讲过不少对外要开放的话,但这只是一般而言,并没有落实到政策层面上。对于怎样对外开放,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原则和方针是什么,毛泽东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一些对外开放的想法,也没有落到实处。例如,对外开放中最主要的内容,即如何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人才和经验等,在毛泽东关于开放的论述中很少提到,这当然主要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这一客观因素,但从毛泽东的主观因素来看,他实际并不十分重视这一点。毛泽东的大量讲话,只有一处与这样内容有关,那是在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曾看过外交部编印的《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的情况》这一资料,并批示让人代为保存,以“备我利用”。其实后来毛泽东对此并没有利用。

在对外开放上,毛泽东还有一些个人方面的阻碍因素。例如,毛泽东曾经说过,希望有机会到别的国家走一走,看一看。1954年12月,来访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邀请毛主席有一天能抽空去缅甸访问,毛泽东表示“我也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我是中国的土人,很少到外国去。如果有机会到缅甸,我一定很高兴。我的知识很少,如果能到缅甸去增长一些知识,也是很好的”。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又再次表示,“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这些说明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于毛泽东的出访是有制约的,但毛泽东还是有机会出去看一看的。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与周恩来会见时说,尼赫鲁总理指示他,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周恩来说,尼赫鲁访问中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33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5—186、223页。



国时曾与毛泽东提起过此事,毛泽东当时说,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一定要到印度去。印尼总统访问中国,印尼朋友也问起毛泽东能否访问印尼,毛泽东说愿意去。周恩来也表示,原则上已经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时间上和条件上的可能性问题。这需要与毛主席商量。

可是毛泽东实际上除了苏联,什么国家也没有去过,这恐怕不能完全归于外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毛泽东本人不太愿意出国。从心理上看,毛泽东不太愿意坐飞机旅行。再有,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敢于与大国和强国作斗争,敢于藐视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具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他来说,什么都向外国学习,似乎有损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使新中国以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也使他对对外开放可能引起的深刻变化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第六,怎样学习外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其实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完全应当如此”。问题在于,1958年后,毛泽东学习外国经验,尤其是学习苏联经验,总是盯着外国的坏东西,进行批判,然后进行思考,试图寻找比外国更好的东西,但又往往出错。毛泽东后来的讲话中客观地虚心地学习外国的好的经验的内容已经不是主题了。

1958年5月,毛泽东一方面讲要正确对待苏联经验,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另一方面,又说要破除迷信,实际上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否定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反而使中国走上了更加错误的道路,结果并没有真正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如苏联过去一度也曾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并提出过“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但毛泽东那时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生产建设像打仗一样,用人海战术,对苏联的这一经验不服气,毛泽东在讲到列宁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共产主义”的口号时说,为什么我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0页。

们现在不提苏联的口号,而“提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号,反而快些好些,为什么?我们的口号高明些,干部、技术、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

1959年2月,毛泽东指出:“必须虚心地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同时采取积极主动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和对外政策,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误解”。

## 二、周恩来关于对外开放为新中国 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

### 1. 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周恩来不仅主管中国的外交,而且是一国总理,对全国的各项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怎样通过外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是主张中国要独立自主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依靠外援,任何国家也不能满足,必须依靠自己来建设。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

周恩来认为,中国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全国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表示,“中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周恩来看来,一个国家的独立,不仅要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要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7页;同前书第8册,第39—40页。

参见《周恩来传》上,第666、880页。

表现在经济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还不能算是完全独立。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农业还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帝国主义还可以欺侮我们,占领我们的台湾。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后,要管理自己的国家,就需要从经济技术上也获得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离真正的独立还有距离。当然,我们说的独立,并不是孤立自己。现在世界上采取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的,行不通的。我们希望在互相尊重独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如果对方也有这样愿望的话。这样,他提出了通过中国外交的努力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与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任务。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就富有远见地把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日内瓦会议的主题是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政治问题,但周恩来在组团时却特别提出要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代表团的顾问,主要用意在于抓住中国与英法等国进行接触的时机,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结果表明,周恩来的这一想法是很英明的。周恩来通过与出席会议的英国首相艾登的磋商,达成了中英两国发展贸易的协议,会后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出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打破了美国的封锁,也为以后与苏关系发生变化时改善中国的贸易关系留下了伏笔。周恩来后来总结说,“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美国害怕这两点,和平它怕,死抱住扩充军备和紧张局势不放;贸易它也怕,怕别人跟它竞争,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周恩来在1960年与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进行会谈时说,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你知道,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一百年,如果不是两百年的话。我们要在经济方面,在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就不能够等一百年,因为一百年以后你们又前进了。我们说各国应该平等,但是平等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平等要看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

的国家,因此,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加快我们的建设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内战使得中国极端贫穷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源是在内战和外来的压迫。

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己,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靠别国援助是援助不过来的,必须自己努力。但周恩来的自力更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他认为,我们一贯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但它不是中国自己单干和自给自足。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我们认为,这个方针适合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如果连自己有条件生产的东西也不去生产,那么,又拿什么去同别人进行交换呢?任何国家都不能永远借债过日子。

外交以政治为主,但经济内容从来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周恩来从建国初就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包括与各国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 2. 周恩来关于经济开放的思想

周恩来还从历史高度来认识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问题,他曾经对新西兰朋友说,“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中国在世界上产生比你们的国家早得多,但因为长期闭关自守,所以进步很慢”。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80、377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1页。

周恩来认为,对外开放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守,总是要互相要求,首先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中国不仅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外开放,“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

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也有政治意义。“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因为一个国家总是有某些东西是缺少的,假使和平在这个地区维持半个世纪,那就好了。这样我们都发展了。实际上这样对西方国家来讲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我们发展了,需要的东西就更多,可互通有无,这样也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去制造政治危机,对双方都有好处”。

中国在经济上对外开放是周恩来对外活动的一个中心注意点。他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必须与外国经济联系起来,必须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部分。1955年周恩来在与比利时客人会谈中指出,中国的建设规模是很大的,中国6亿人口的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将来工业化后,我们的需要会更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自己供给一切。有些东西生产得有剩余,而有些东西生产得不足。剩余的我们要出口,不足的要进口,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不仅要使贸易关系正常化起来,而且其他各方面的关系也要正常化起来。

1957年12月,周恩来在与缅甸政府代表团就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情况交换意见时设想,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成就主要是政治上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应当在经济合作上取得成就。他认为,“在经济上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会更加加强。亚非国家中,除日本外,我们都是落后国家,我们不需要互相竞争,互相排挤,因为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平等互利,不要特权。我们亚非国家在经济上来个分工。这一点要说服日本,不要在亚洲搞独霸,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把日本搞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27、128、145、213页;《周恩来传》(1949—1976)上册,第283页。

穷。日本有些物品和技术是我们需要的,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分担供应,如缅甸供给大米,中国供给铁砂、煤,东南亚国家供给棉花,印尼可供给盐,缅甸还可供一些石油。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缺乏的。在供应时小国优先,大国在后,因为大国主要是国内市场,国家小对外贸易很重要,需要的东西多。这样我们互相合作,大家都会发展。和平共处不仅要用在政治上,也要用在经济上、文化和技术交流上,这才是真正的共处”。

周恩来还认识到,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学习和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他指出,只要所有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都努力起来,发展工业,就可以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如果有可能的话,东西方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合同是需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其实现。譬如说,中国并不拒绝同美国恢复关系,发展贸易;我们反而需要他们的东西,问题是,现在是在禁运当中。我们建设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些需要的东西是美国所有的。

周恩来经常出访各国,虽然没有直接去过西方发达国家,但他在访问一些非洲国家如摩洛哥的过程中,常常参观这些国家在西方援助下修建的工程项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参观摩洛哥的炼油厂后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好,管理得也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比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更有感慨地说,苏联帮助中国在兰州建设的炼油厂与这个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这个厂才 300 多人,而我们却需要 6000 人,相比之下,我们人力资源浪费是多大啊!周恩来当即表示,回国后,要石油部派人到这里考察。在访问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有同样的感想,他向中央报告说,“这些国家用外援兴建或接管的新工业,都采用了现代化的设备,特点是投资少,设备新,自动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劳动力少。这对于我们进口工业装备和进行援外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周恩来回国后,加强了国内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步伐,先后从日本、英国和法国引进价值近 3 亿美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25、227 页。

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上册,第 279—280 页;同前书,下册,第 755 页。

元的84个项目,使我国在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精密仪器等方面拥有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

1972年,周恩来再次把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人才和经验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不能光靠国内,还必须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特别是在引进外国科技成果方面,周恩来曾经批评当时外交部、外贸部关于派人去东欧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意见,说,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日、加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于1973年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并得到批准。这是“文革”以来首次批准实施的大宗进口成套设备方案。不久,周恩来又指示,在积极发展本国造船工业的同时,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外国船只,组成中国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周恩来还批判了当时的“左”倾思想,指出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到了1973年6月,周恩来对外开放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他不仅提出了学习引进外国技术和人才设备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经验的问题。他在与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谈话时指出,中国与美国的金融往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通过银行间的往来推动两国的贸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美国办了第一个交涉,中国和美国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周恩来在比较了中美两国发展贸易的情况后说,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59、571、580、581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02页。

### 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是否与传统相违背”的问题,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开放”这一概念。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和近现代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论述。邓小平的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 1. 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指出: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开放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国庆35周年的庆祝会上正式宣布,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二是“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什么是开放?邓小平理解的开放是什么?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误解,主要是以为开放就是经济开放。在有些时候,邓小平所说的开放的确主要是指“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或“对外经济开放”。但这不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惟一内容。

实际上邓小平的开放首先是从科技开放开始的,它的主要内容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0、103页。



就是凡是中国比外国落后的,都要学习,都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在 1977 年就指出,承认中国落后是对外开放的出发点,“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

邓小平强调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主要是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着眼的。他在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当时他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特别落后,因此必须学习外国,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他后来还多次提到这一点,如在 1978 年 5 月第一次谈到开放的内容时,就主要是针对科技而言的。他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世界各国的都可以学。他在第一次使用开放概念时,也是把开放与学习外国科技联系起来的。邓小平大声疾呼中国科技已经落后外国很多,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这里所说的科技开放,不仅指引进科技设备等,还包括引进和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以及聘请外国专家等。邓小平后来又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几个钱”,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所以“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同时,还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0 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5、49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1、132 页。

同他们搞技术合作。

当然,引进外资也是邓小平开放概念中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通过华人、华侨引资的思想:“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邓小平后来也把开放叫做经济开放,表明了开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目标。他指出,“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文化开放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开放也可用于文化建设,特别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设上。他尤其大胆地提到,“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邓小平还指出,不仅经济上要对外开放,在文化上也要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在干部制度上,也可以学习外国。邓小平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干部制度上中国也要学习外国。

在有些时候,开放也指“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需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强调指出,开放就是要使“信息灵通”。

## 2. 开放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同志对中外各国开放经验进行了思考,对封闭,闭关自守,闭关锁国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现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4、77、260、266、306页;同前书第2卷,第156、181、225页。

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互相融合,交流的。” 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许多内外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 。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他认为,我们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不可能离开国际的合作。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 3. 开放与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关系

邓小平指出,“ 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国际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367、90、266页。

上,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大三角”的一角,“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是一种保守主义”。

#### 4. 开放必须改革,改革必须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点。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邓小平由此提出了“两个开放”的观点,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他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和开放都是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这个中心的,是为实现中国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服务的,缺一不可。要发展经济,“就要尊重社会经济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因此,“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总之,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改革要求开放,两者相互渗透,不可分割,但侧重点不同。改革主要是指对内开放,对内搞活;开放主要是指对外开放,发展与国际间的广泛联系;二者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改革和开放是手段”。

#### 5. 正确处理开放引起的问题

改革必须开放,发展必须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开放,但开放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265、311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11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265、266页。

也不是一厢情愿,因此必须对开放引起的各种后果有所认识。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因此,在开放的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最重要的是,开放不能破坏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破坏我国的政治稳定。“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开放对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最多的还是表现在经济犯罪上。为此邓小平认为,开放如果不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就可能会失败。

在文化方面,对外开放也会出现西方的消极东西进入中国的现象。邓小平认为,不能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引进西方的学术文化,尤其不能容忍连西方国家也认为是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流入中国,造成精神污染。

但同时,对开放带来的消极和不利影响也要有正确估计,既不能丧失警惕,又不能惊慌失措。对资本家赚中国的钱的事,邓小平认为,“外国资本家总是资本家,钱他们肯定要赚。但是,他赚,我们也赚,而我们得的益处总比他得的更多”。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要太担心西方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毛主席说过,他开始读孔夫子的书,以后学的是资本主义,但他终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末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邓小平还指出:首先,对开放的消极因素不用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其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4、139、156、306、3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6、70页。

次,开放的利弊权衡,是利大于弊,开放“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

邓小平指出,“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这些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奇怪。既然开放,接触多了总会有影响,问题是你能否消除这些影响。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大惊小怪,又要认真抵制,采取有效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消除这些坏的东西。”

对外开放是否会引起资本主义呢?邓小平认为,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二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果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不等于坏东西的代名词,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同时,要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成果区分开来,因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 6. 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关起门是不行的,必须对外开放。那么,实行开放,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邓小平认为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1984年邓小平又指出:“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他还说,开放政策长期不变,“我们对外开放二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284、139、65、373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5页。

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 7. 制定正确的开放策略

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国的开放实践中,不仅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开放的必要性,而且也注重如何开放的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开放策略包括:

有重点的全方位开放。开放的主要目标是要吸收和借鉴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和方法,因此这决定了我国开放的重点是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但这种开放又是全方位的。“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邓小平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十分关注。他在1992年提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抓住时机,利用矛盾,坚持和扩大开放。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上去。……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199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不能坚持开放?邓小平同志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自己不能变,而且“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在对外宣传中,不仅要讲开放对中国的好处,也要讲开放的中国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91、103、373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379、32、354页。

对世界的好处,宣传开放的相互影响。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历史最终将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开放既要坚决,又要稳妥。邓小平指出,中国总的来说是开放不够,因此必须把握机会,继续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要有“闯”和“冒”的精神。“看准了的,就大胆试,大胆地闯”,要不怕冒险,不怕吃亏,尤其要打破对资本主义的恐惧。但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尤其要注意如何搞开放,“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开放必须重视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邓小平在 1977 年时就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 8. 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理论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9—80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7、372、133、308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5 页。



大发展。

从 1917 年俄国革命产生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的 80 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存在过不同的类型,它们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苏联模式,即苏联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形成的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模式;二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三是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的改良型模式;四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划分这些模式的标准,过去是从这些模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点,如南斯拉夫实行民主自治、代表团制和联邦共和国制等,而苏联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一党制、少数领袖集权制等东欧模式则强调允许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多党合作制,实行统一战线,经济上更强调商品经济和市场的作用等。

实际上,这些划分都有一些勉强之处。这些模式实践上的区别并没有理论上说的那样清楚,尤其是在 80 年代之前,所有这些模式实际上的差别是很难区分的,总的来说与苏联模式并无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

现在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社会主义与外部的关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这就是以 80 年代中后期为限,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 80 年分为两个时期,即 1917—1978 或 1985 年左右为第一个时期,之后为第二个时期,划分这二者的标准是开放与否和开放程度。所有存在过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两种模式,那就是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和封闭半封闭的社会主义。中国从 1978 年后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之前存在的其他的社会主义都可以叫做封闭和半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冲突中,失去了竞争力,所以它们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封闭和半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对对外开放及其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列宁对对外开放都有过许多重要和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述落后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时，把这些国家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作为一个必要前提。马克思认为，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只有“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可怕的“卡夫丁峡谷”，俄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在马克思看来，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发展。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的理论是建立在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基础的分析之上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对外扩张性的世界体系，它无情地冲破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不断地从西欧扩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资本扩张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体系、世界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体系。与此相联，马克思倡导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世界性的，这不仅体现为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应当相互支持，尽可能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而且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也要相互支援。尤其是首先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援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对落后的俄国在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情况下，为什么和怎么样对外开放的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精辟论述，把马克思的对外开放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取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但这是以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先取得政权为前提的。那么，在落后的俄国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又处于被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情况下，又应当怎么办呢？马克思不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列宁认为，俄国必须在一国环境中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等待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列宁又指出，单靠自己的力量搞独立的经济是一种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必须“在经济上极力利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431页。

用和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西方”。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有没有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需要的技术、设备、资金提供给社会主义国家呢?列宁认为,不要仅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一面,还要看到两者有进行经济交往的可能性。有三个原因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可以向西方国家开放:一是资本的本性在于获得利润,只要与俄国打交道有利可图,就有可能吸引西方资本;二是俄国有西方资本所需要的市场和原料;三是各西方国家利益有不同,可以利用矛盾来打破对俄国的封锁和包围。所以,俄国必须要学会与西方打交道,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发展经济互助和互利等。这样,列宁就为俄国奠定了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可惜,列宁去世太早,未能充分把对外开放的思想付诸实践。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则使苏联走上了一条封闭和半封闭的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强调两种制度、两个阵营、两大体系的对立,在形势变化后还过于坚持一国建设,强调经济体系独立于西方经济,存在两个平行市场,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只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或不太重要的补充等。在实践中,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要么一国自成体系,要么主要是在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交往,形成对西方封闭的市场,在这个圈子中是完全开放,但与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联系较小。如苏联的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30—40年代为1%—2%,50—60年代为3%,70—80年代才上升到9%,而且其中的70%—80%是对东欧国家贸易,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只占贸易总额的20%—30%,且其中向西方的出口只占3%。除了客观因素外,这种状况主要是苏联自己的自我封闭和半封闭造成的,而这正是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他的东欧国家,即使它们想对西方开放也因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不能实行。至于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就更谈不上了。

而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和形

成的,对外开放是它的基础和奠基石,又是它的动力和养料,是它发生变化的催化剂,这也是它不同于过去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

邓小平的开放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尤其是继承了列宁关于依靠自己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努力扩大对外联系,积极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等思想。但另一方面,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无论在实践的规模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又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深化了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的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作用来谈对外开放的,而列宁则主要从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对当时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来看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的思想时,着重从近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尤其是总结二战后整个人类世界的变化来进行论述,更具有说服力和启示意义。

第二,深化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可能性的认识。马克思把对外开放的可能性建立在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认为无产阶级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理所当然应当相互支持,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定会从首先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手中得到极为宝贵的经济援助。至于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胜利后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对外开放,马克思没来得及思考。列宁领导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列宁对外开放的可能性主要是放在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之上,如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利用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国家”,租让勘察加半岛是希望日本与美国“干起来”,有时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相处”,认为“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能同帝国主义列强保持牢固的贸易关系。这只是暂时的间歇”。

---

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64页。

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牢固地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之上,把对外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区别开来,也不把利用国家之间的矛盾作为对外开放的基础和主要策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搞对外输出革命,不把西方国家视为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阵营,也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反对西方的一个阵营,而是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互利和合作视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之一。

当然,对外开放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但中国认为只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对外开放原则,就能打破外部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因为中国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不怕军事干涉;有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比较丰富的资源,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发展经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是个巨大的市场,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对许多国家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相信,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中国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通过世界市场得到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技术、资金和设备。

第三,对外开放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外开放或争取外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列宁也曾论述过对外开放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从列宁晚年的思想来看,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作为俄国依靠本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把对外开放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对外开放已经不再仅仅是争取外援,不再仅仅是发展外贸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次要的辅助的策略性的问题,而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现阶段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关键和突破性意义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从 1984 年起,党中央就已把对外开放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中国外贸总额 1991 年达到了 1357 亿美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了 45%,1996 年为 2890 亿美元,也占 40% 多,1998 年达

到 3240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 11 大贸易国;二是对外开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代表着大趋势和大方向,对整个国民经济起着带头和示范作用。对外开放最早和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最快的地区,是经济最发达地区,是带动整个中国向前发展的龙头地区。1997 年中国利用外资达 2775 亿美元,成为当年轻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占 1998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4%—15%。

第四,对外开放的范围和作用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设备、经验,以迅速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的含义。完全可以说,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相对于过去的封闭的半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社会主义,它的核心内容在于形成能进行国际交换,部分参与国际分工,在世界经济之中进行活动的开放经济,但开放的社会主义也要求对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进行重大的改变,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在政治上,开放要求把过分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适当地下放到地方和企业,以使对外开放地区及其企业能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市场的需要,并及时作出反应;开放要求拒绝和抵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也要要求更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要求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决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和各种腐败行为,为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同时也要求处理国内政治问题要更加小心谨慎,在外交活动上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在经济上,开放经济不仅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也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经济制度上容纳私营经济,收入上允许较大的差距,实行市场经济,并在税收、价格、汇率、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为开放经济创造良好的国内经济环境。

在文化思想领域,对外开放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实行对外开放,一方面要求“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交流、合作。开放必然打

破和冲击许多旧的传统观念,扩大人们的视野,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宣传、社会科学等从内容到形式发生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过去有过的所有社会主义都不同的鲜明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超越了过去 70 年中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成就。

所以,由于对外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而且从各方面都改变了社会主义的面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继承了 19—20 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且在实践上也大大超越了 20 世纪曾经有过的其他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和这些模式的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大多具有封闭或半封闭的特点,与世界经济,与世界市场不能有机结合。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由于开放,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特征。如,在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过去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真正做到和平共处,它们的经济与西方经济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如,在物质文明上,过去的社会主义在物质供应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使市场供应如此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在经济发展方面,过去的社会主义也从来没有像中国今天这样,在连续 20 年中一直保持 9%—10% 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理论,意义是深远的,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对马克思、列宁开放思想的发展,尤其对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 第九章 一国两制思想与台港澳问题

一国两制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在局部范围和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在台港澳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也是由中国国情产生和决定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对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

邓小平的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但又有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坚持祖国统一,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问题,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等观点,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相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而言,又有质的飞跃,带有时代的鲜明的特征,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有关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从一种暂时的、策略性的思想,上升成为一种战略思想,并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外交决策。

### 一、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思想

#### 1. 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

在建国之初,解放台湾一直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主导思想。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这是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年12月31日,中央又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就是解放台湾等地。为此,中央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并在沿海布置了50万大军进行准备。

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于1950年6月27日公然派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后又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



约》，对中国统一构成了重大障碍。这也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新的思考的重大原因。

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思路，有三个基本点，第一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1956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毛泽东还提出过要与台湾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说“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的微妙的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

1950年3月，毛泽东亲自让张治中先生（军委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会副主席）出面做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并致电张治中先生说，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政协报告稿中加进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内容，指出我国政府多年来曾经再三强调：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又说：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

1958年10月，毛泽东说，“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解决不好，可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1959年2月，毛泽东又指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恰当地估计，不能否定一切。稍后，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记者时又进一步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他们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来了大陆就是大贡献，把枝同大陆连起来，根还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74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71页；同前书第6册，第32—33页。

是他的,他可以搞他的一套,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军,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毛泽东还表示,只要台湾断绝与美国的关系,与大陆和平统一,大陆方面对台湾也将采取灵活措施,“一切都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双方都不要相互派特务去破坏对方,这些可以通过双方达成协议来解决。毛泽东在1961年6月与印尼总统苏加诺谈话时再次清楚地表达了台湾可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想法。毛泽东向苏加诺指出,“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毛泽东在1963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可以用“一纲四目”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政治、军事、人事大权由台湾自己安排;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如有不足,可由大陆中央解决;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可以后延,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改革也由双方协商;双方协议互不派人破坏对方。

第二是台湾问题争取和平解决,但不能完全放弃武力方式,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着急,没有一百年时间是难以解决的。

毛泽东在1959年指出,“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因为有美国人在那里。毛泽东在1963年就说过,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

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基辛格时说道:“至于我们与台湾之间的

---

参见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13、319、320页;吴怀连等:《台湾政治风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

参见徐日彪:《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奠定扎实基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香港回归》,《人民日报》1997年6月24日,第九版;钟兴明,曲峡:《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6年第1期。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8、502页。

问题,就相当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他们是一批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再过100年再去管它。对此事不要太急。有什么需要着急的呢?”1975年,毛泽东又说,“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100年的话,我们会要它,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

第三是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毛泽东很清醒地看到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提出了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两个方面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

“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因此,中国必须和美国谈,“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由于涉及到一个与美国的关系,所以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为此在50年代末还制定了在台湾问题上的“边缘政策”。在大陆炮轰金门马祖时,只打蒋介石的军舰和部队,不打美国的军舰。“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

毛泽东因此指出,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

但不论从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看,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只能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必须坚决反对两个中国论。毛泽东指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两个德国、两个越南和两个朝

---

《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8—382页。

鲜,这些一个民族分成两个国家的情况都是由于国际条约的规定而产生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这是与它们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 2.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

周恩来在 1955 年 5 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曾经明确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战争方式,二是和平方式,把两种方式提了出来。

1956 年,周恩来见到英国人马坤,对他说,如果见到蒋介石,可以向他传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南京。……蒋还在台湾,枪也还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要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好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在这段话中,已经包含了通过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思想因素。

1957 年,一个美国青年问周恩来,中国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声明不使用武力?周恩来回答: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国家拿武力占据了美国的檀香山,然后说美国不许使用武力收复,如果使用武力,这会引起世界大战,那么美国人会有什么感觉呢?有意思的是,1998 年 6 月克林顿访问北大时,一个女学生也向克林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80—383 页。

1958年炮打金门时,党中央曾有过先收复金门,后收复台湾的分阶段解决的想法,但后来又变为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周恩来在会见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他说,“我们这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周恩来还提出了对台湾和谈的一些具体设想,指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将来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但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还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这时也表示,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上的,现在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对此,周恩来具体说,蒋经国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1960年5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讨论了对台湾的工作,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介石手中,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党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想办法,逐步地创造条件。当时的张治中等在给台湾的信中转达了中央的意见:

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委于蒋;

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旦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

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到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1年下半年,美国请陈诚访问美国,企图离间陈蒋关系。周恩来向有关人士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越过这条界。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写信给陈诚,向他们转达了由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这对台湾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人提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想法。1965年3月陈诚病逝,留下的遗言中未提反共反攻,而是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台湾的回归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此他说,在台湾问题上,“急是无用的,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 3.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思想

解放初期,新中国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的原则,但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又采取了灵活的态度。毛泽东当时就提出,要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因为香港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发挥过特殊作用,急于派军队解放两地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反而是让它们保持原有地位,对中国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更有利。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到英国政府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不同,认为从中英关系考虑,也不宜用兵。出于政治考虑,解放军在1949年10月抵达粤港边境时,正式对外表示,新中国无意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稍后,中国共产党又宣布,不会通过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来改变香港的现状。

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于朝鲜战争后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香港和澳门保持原状对打破封锁有利;二是在中国的社

---

参见《周恩来传》上册,第477—479、474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6页;《周恩来总理生涯》,第284—285、288页。

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香港和澳门可以成为新中国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的特殊渠道。

到 50 年代中期,港澳问题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联系得更紧密,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更多地要考虑到国际因素。1957 年 10 月,英国与美国曾就香港问题达成一个协议,美国同意把防卫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问题,而英国则表示,在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上与美国采取一致的立场。这样又产生了一个不让美国插手香港的问题。从这一方面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1957 年正式提出了保持香港和澳门现状,为我所用的政策。毛泽东在 1959 年又提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在以后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多次说,现在我们暂时不谈香港问题。到 1960 年,周恩来又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周恩来在港澳问题上的思想,侧重于强调利用两地与西方社会的联系来为内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1957 年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的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至于将来怎样办,我们不会像内地那样也搞三反五反,在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

---

参见徐日彪:《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奠定扎实基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香港回归》,《人民日报》1997 年 6 月 24 日,第九版。

《周恩来总理生涯》,第 225—226 页。

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在 1963 年毛泽东指出,“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主要是从香港对中国的经济来考虑的,他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但毛泽东也指出,“我们不动它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这已经表达了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的意思。

到 1973 年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我们甚至不会去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碰澳门,最多也只会碰一点点。因为它是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掌控的地方”。但在香港问题上,毛泽东似乎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有过明确的一国两制的思想,他在 1974 年对英国人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 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战略思想

### 1. 一国两制战略思想形成的三个理论前提

在毛泽东时期,邓小平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观点,没有超出毛泽东的考虑的范围。邓小平在 1964 年指出,美国占领中国的台湾,但我们仍要同它谈判,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已有七年,中心问题是美国要霸占台湾。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那办不到。1974 年邓小平对日本朋友指出,台湾总是要解放的,不管用什么方式,总是要解决的。也许早一点,也许晚一点,我们跟美国人也是这样讲的,你们要抱住

---

参见徐日彪:《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奠定扎实基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香港回归》,《人民日报》1997 年 6 月 24 日,第九版。

《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02、606 页。



台湾不放,那靠不住,怎么能够设想,中国自己的领土会长期不回到祖国的怀抱呢?祖国不实现统一还行吗?

到邓小平时期,一国两制思想从一种策略的临时性的思想上升成为一种战略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中国国内形势变化和国际形势变化所必然要产生的。一国两制从策略思想上升成为战略思想有三个理论前提。

第一个理论前提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关思想,同时又有很大的发展,也可以说有质的变化。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提出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思想方法上,必须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为此必须纠正长期的‘左’倾错误。他在1984年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一国两制思想的哲学基础,他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依据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

毛泽东的一国两制思想虽然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但在毛泽东的后期,他的思想路线大大偏离了这一主线,在一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7、82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101—102页。

国两制问题上也未能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贯彻始终。而邓小平之所以能使一国两制成为一种基本的战略思想,正是以实事求是的思想哲学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结果,也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的结果。

第二个理论前提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这既指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因素,还指在思想上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过去人们提出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还提出了在一国内两种因素长期和平共处的问题,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内,不但资本主义因素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内存在,而且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也可以在局部地区存在。

邓小平早在 1980 年就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于“兴无灭资”的老口号,邓小平认为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批评一些同志“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邓小平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不合理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因素,前一个方面在过去走得太远,也说了很多,所以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后一个因素。因此,邓小平在多次指出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消极腐朽因素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的政策“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

为,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国两制中的主体,是一国两制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会“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讲到一国两制中的两种制度的关系时,邓小平一再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就变成‘一制’了”。

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后,一国两制就显出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了。因为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充分的发育,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

在邓小平 1992 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更直接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可以说是中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一个结论性的总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制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

毛泽东虽然也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但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将会在一个短时期内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斗争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从短期来说是可能的,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并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战略思想在长期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上,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必然产物。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将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这就必然产生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长期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允许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因素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存在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三个理论前提是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新思维。

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也是和平共处原则在国内运用的表现。他在1984年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在毛泽东时期,虽然也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在那时,这并不是主流思想。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制定过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因素而难以实现。在50年末期,也还有过炮击金门的事件,以后一段时间,解放台湾一直是一个主要口号和目标。所以,虽然这时有过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但它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插曲,不能说是一种成熟的战略考虑。

## 2. 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提出

除了以上三个因素以外,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战略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设想,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实践因素,这也是毛泽东时期并不具备的条件。对毛泽东来说,香港回归还是一个较远的事情,没有提上他的实践日程,也没有具体的思考。在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中,也没有提到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这一思想更多是因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59、103、219、149、148、372、217、218、96—97页。

为实践的需要而直接提出的。

邓小平到底在什么时候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的？现在看来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邓小平在 1974 年 5 月时，曾经陪英国首相希思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他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说，反正要到 1997 年，还早，可以让以后的年轻人去考虑。这里的年轻人当时就是指邓小平，邓小平也许正是在这次会谈中开始涉及到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的。

但应该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的产生还是从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早在 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在与缅甸总统吴奈温的谈话中就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1979 年 1 月，邓小平又指出，“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邓小平在访问美国前夕又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能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起来。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在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在演讲中还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 29 日与香港总督麦浩理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指出，香港主权属于中国，这一点不能讨论，但“我们将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自己在 1984 年说,在此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一政策,又说,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他指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 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邓小平后来说道,“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邓小平在 1982 年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进一步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想法,1983 年又明确地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从而使这一思想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邓小平在 1984 年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注意,这里讲的制度,实际上涉及到两种制度,一种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主要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即主要指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种制度是从国家制度层面上来说的,主要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向来是指联邦制度或者中央集权制,但一国两制突破了这种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在整体与局部关系上,既不是联邦制,也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结合了两种形式的特点,有联邦制特点,也有中央集权制特点,是一种中国式智慧产生的新的国家形式。

### 3. 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一国两制思想是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之下,处理国内问题和国与国关系的一种新思维。“提出‘一国两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17、91、97、106、109、110、115、381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102、58 页。

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即香港和台湾问题”。邓小平 1982 年指出,香港在 1997 年回归中国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中国主权的问题,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中国必须采取强硬立场。不管英国方面采取什么政策,中国都必须收回香港。英国方面合作当然好,但如果英国方面不合作,中国方面也准备采取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他告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试图坚持英国对香港的管理权时,邓小平对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必须收回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中国与英国谈了两年,但在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作让步。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同时邓小平坚持,作为主权的象征,中国必须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不能动摇。邓小平还对英国人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

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

香港回归虽然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又直接涉及到中国与英国两国关系,因此,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与英国进行合作,共同处理好有关的问题。在收回香港时,邓小平也估计到了会有一些人制造混乱。

邓小平还指出,一国两制也涉及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主要是涉及到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邓小平在1983年6月谈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时说,关键的问题是祖国统一,还有一个是和平问题,又要统一,又要和平,就只有实行一国两制,这样既能维护祖国统一,又能维持两岸的和平。两岸的制度可以不同,但国家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上,一国两制也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将与香港有所不同,它在地方自治方面将比香港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也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与香港不同,它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关系。虽然中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深深地卷入了台湾事务,一再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台湾问题用一国两制原则来解决,也是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事情,可以在维持两国关系大局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而又不损害中美两国的关系。但是邓小平也指出,祖国统一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在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和平地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又坚持说,我们“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



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邓小平指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一国两制只是作为统一的一种和平方式提出来的,如果这一条路走不通,也不能排除武力方式。邓小平在 1974 年就表示过,台湾总是要回到祖国怀抱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实现统一,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但如果和平方式不能解决怎么办?恐怕只有非和平方式,不能放弃非和平方式。至于什么时间,我们没有时间表,还要看台湾。“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统一原则,最具体地表现为外交权为中央政府专有,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代表国家,只有一个中国;其次,中央政府掌握在紧急情况下干预特别行政区的特别权力。邓小平指出,“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央政府就应当干预。

第二,一国两制是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很好的和平方式,也是处理国内地区之间、国家主体与局部地区关系的和平方式。邓小平指出,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首先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也有利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对中国来说,用一国两制方式收回香港,既可以收回中国的领土,保持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尊严,又可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因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有好处”。实行一国两制,就可以让外国资本留在香港,即使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03,267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14、30、75、78、85 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109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00 页。

在宣布收回香港后有些外资会撤走,但以后也会回来。

邓小平认为,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在香港问题上,如果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那么英国和香港居民难以接受,所以提出了一国两制。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用于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既符合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的愿望,它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完全是和平的,互利的,又与美国一再表明的希望两岸用和平方式统一的愿望一致。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所以,“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思想用于台湾问题,当然也考虑了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当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还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邓小平还指出,“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

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都是他们吃亏,这不对。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与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大特点,是同时考虑各方的合理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

第三,要做好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一国两制将是一个长期战略。

从一国一制到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制度的重大变化,不仅涉及到国与国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国内各地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邓小平为此指出,一定要重视过渡时期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保证过渡时期不发生大的动乱。

邓小平指出,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主要的是要保持政策的不变,一国两制的政策不仅在过渡时期不变,而且将会长期实行。香港将在四个方面保持不变,这就是:“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而台湾则除了四个不变外,还要加上一个军队不变,即五不变政策。邓小平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04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1、13、59、86、62、86、97页。

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邓小平指出,两岸实行一国两制,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统一,也要有一个适当的方式。邓小平为此提出了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而先以两个执政党的名义进行平等会谈,实行两岸的合作。双方要多接触,增进了解,大陆要派人去台湾观察,台湾也可以派人来大陆,双方保证对方的安全,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在两岸的谈判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外国插手。“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好这件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

为了保证一国两制的实现,邓小平认为必须长期实行这一政策。邓小平指出,在香港回归实现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首先是保证在1984 - 1997年的13年过渡期中政策不变,而且这一政策在回归后50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50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邓小平甚至认为,“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邓小平看来,“一国两制”是国策,不能变,变了对中国没有好处。“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的理由,变了对我们不利,香港会成为国家的包袱,几百万人的生活怎么办?要靠国家来养这怎么行!变不得的。”

第四,一国两制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国际争端中去。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的方式不仅适用于与中国内部有关的问题,适用于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关系领域,而且也可以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新方法。因为一国两制思想的实质,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是以争端的两方互利双赢为结果的,没有失败者。这种新思维完全可以扩大到国际关系中去,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想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邓小平还指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邓小平认为,如果香港的一国两制取得成功,将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为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一个范例,而且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开始就已经考虑到国际争端的解决。“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 4. 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

它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

第一,在和平共处方面,过去都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现在邓小平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国家内部,运用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上,大大发展了和平共处的精神实质。和平共处是在一球两制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而一国两制则是一球两制在国家问题上的体现。同时,在中国的一国两制上,又包含了一球两制和平共处的内涵,即中国在对香港、台湾、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时,与英国、美国、葡萄牙三国在解决具体问题上也保持了和平共处。因此,一国两制在推进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和平共处上具有示范意义。它可以被运用于不同的国家处理一些国家间的历史问题上,起到一种示范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

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做和平共处”。

第二,一国两制思想大大发展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来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一思想早在列宁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要在一个国家中,在一些局部地区长期实行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而不仅仅是利用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这应当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极富创造性。它在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上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来吸收和消化世界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成果;二是大陆通过这些与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有各种联系的地区来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可以更有选择性,更有成效。

邓小平在谈到一国两制的意义时也指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81、200、352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58、86、73、49、59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57 页。

## 第十章 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和 外事管理原则

外交不仅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有许多外交管理、外交艺术、工作原则等问题,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主要思考中国外交的大战略、大框架,相对而言论述较少些,而周恩来长期从事中国外交的具体工作,因此对外交学的本质与形式,具体的外交管理原则等考虑较多,这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 一、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外交本质论

周恩来在新中国建立后,直接主管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为此他不仅倡导中国的外交原则,协助毛泽东参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原则的制定,而且特别重视在理论上提高中国外交工作的水平,是新中国第一个提出建立新中国外交学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亲自参加中国的外交实践的同时,对如何理解、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看法,这也是他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和贡献。

周恩来倡导的中国外交学的内容包括:

#### 1. 建立中国外交学思想的提出

周恩来认为,要对中国的外交工作进行理论总结,对外国的外交理论进行介绍和吸收,并把它们与中国的外交工作的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外交学理论体系。

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把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学的任务提了出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但把这些外交经验“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

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惟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 2. 外交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周恩来对外交学的本质进行了理论探讨。他认为,外交首先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外部事务的管理,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

他认为,一国的外交与一国的内政是有密切联系的,与国家的军队、实力等分不开。他指出:“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但军队不能代替外交,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外交和国防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外交相对于其他工作而言,是直接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第一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外交涉及一个国家的重要利益,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者来说,必须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外交工作者要增强自信心,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这对我们外交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周恩来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表明了他对外交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



一点要搞清楚”。

### 3. 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

外交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生活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那么,外交在国家生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它与其他国家活动形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恩来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1960年,他在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理阿巴斯会谈时说,“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应有主从,我们认为,应该以武装斗争为主,外交斗争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武装斗争是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外交斗争将软弱无力”。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周恩来对外交在整个国家活动中的地位的看法。这里只是相对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的关系而言的,但又绝对不是仅仅在这一领域。实际上,相对于其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而言,外交都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它要紧紧围绕国内的各项建设来进行,国内进行的建设始终是第一位的,外交始终是为国内的建设服务的。

由此,周恩来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中国的外交应该服务于中国的建设,为中国的建设开拓广阔的空间。他在1954年7月提出应当修改建国初期的关门外交,即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指出,“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这一思路进一步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缓和局势与和平共处,本是我们的口号,现在艾登、尼赫鲁都说了,形势大变了。我应与一切愿与我建立关系的国家建立关系,应该派一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做外交就是做建设工作”。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7、16、52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91页;《周恩来传》上册,第189页。

#### 4. 外交学的主要内容是分清敌友

周恩来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团结更多的朋友,对敌人则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谁是国家的朋友谁是国家的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外交的首要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外交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他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友不分”。“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

分清敌友不仅是个策略问题,在一定时期也是个对外战略的问题。周恩来在 1972 年 7 月指出,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的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

根据这一思想,周恩来在 1954 年时首先把不同的国家分成四大类:一类是以美国为首的好战集团,第二类是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第三类是以印度为首的新独立国家,是和平中立派,第四类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类国家实际上是中国的敌人,第二类、第三类国家是中国要争取的力量,第四类国家是中国的同盟国。但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还是中间派,其中的情况又是有变化的,新中国的外交就是要从这些变化中寻找出真正可靠的朋友,对付最大的敌人。

周恩来把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对立的两大阵营与外交上的友与敌区分开来,反对按姓社姓资来区分敌友,不赞成把姓资的都视为敌人。周恩来指出,“就社会制度来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是讲到国际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把两个世界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这样就是

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不是缓和国际局势了。这样对我们是不利的”。

周恩来根据长期的实践,提出了具体的分清敌友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出了两种朋友的思想,认为“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是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能的。……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这里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不以意识形态,即不以姓资姓社分朋友的思想。在当时意识形态起很大影响的情况下,提出这种思想是具有远见的。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他根据情况对它们进行了区别。“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它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与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周恩来的基本思想是:“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周恩来对敌与友这一重要的外交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他对国际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33页;《研究周恩来》,第242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53、53—54、59页。

矛盾的分析之上的。

对友方面,周恩来把中国作为苏联阵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把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朋友,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周恩来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一块铁板,因为它们存在三个矛盾:一个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主张和平的力量反对战争势力,其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后来,周恩来又说,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在变化,事物在发展。

周恩来还提出,对于那些在一些问题上非敌非友的国家,采取中间立场的国家,中国在外交上应该予以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那些新兴的独立的国家,它们不愿意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也不愿意参加西方阵营,在一些问题上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另一些问题又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应该作为中国外交争取的对象,把它们看作是潜在的朋友而不要看成是潜在的敌人。例如,在 50 年代初兴起了所谓的不结盟运动,它们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方针,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反对任何战争,反对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周恩来认为,中国应当支持印度等国提出的和平中立政策。

1957 年 1 月,周恩来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提出了第三阵营的思想,指出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对立的阵营之外,还存在正在形成的第三个集团,这就是民族主义国家如亚非国家、拉丁美洲及将要走向中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从经济制度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属于第三阵营,而当时,帝国主义想占领这些国家,因此发生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应坚持我们的战略,争取更多的国家,推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些国家处在中间状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和要求独立的斗争中,它们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军,但它们也怕社会主义,怕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我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646 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550 页。

们又要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它们安心。

对当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周恩来也以变化的观点来对待,不把参加这一以美国为首的对中国持敌意的军事组织的所有国家视为与中国敌对。如当时的巴基斯坦参加了这一组织,但中国却较早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朋友。对菲律宾也是如此,周恩来在 1964 年对菲律宾客人说,中国与苏联结盟,菲律宾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与美国结盟,两国都是结盟国家,并且处于较对立的地位。但是,结盟国家的情况和性质也会有变化,中国需要从这一变化来观察敌友问题,提出了改善中菲两国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菲两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并不妨碍双方关系的发展。

分清敌友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对新中国的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新中国在当时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能够不为两大阵营所囿,为新中国广交朋友,形成更加广阔的外交空间,采取更灵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

当然,友与敌的国家概念都是会变化的,即使是敌人,也不是说要与它绝对处于对抗状态,也要采取措施改善关系,缓和关系,并使之向关系好转的方向发展。1960 年,正是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的一个重要时期,但周恩来在这时仍然提出,中国愿与美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国的争端。他对斯诺说,和平共处的政策也适用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人民和政府愿意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虽然我们两国还没有互相承认和建交”。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善意,中国还释放了因驾驶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俘获的 11 名美国飞行员。

这一年,也是中苏矛盾开始公开化的一年,但周恩来为了挽救中苏关系,减少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也尽量采取了争取苏联的方针。如在 1960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已经收到苏联驻中国专家组组长关于苏联将在 8 月派 8 次国际列车来接专家回国的通知,此事已经不可能挽回了,但周恩来还是在最后时刻尽自己的努力,他对波兰大使说,我们的态度是我们需要这些专家,我们挽留专家,苏联专家工作得很好,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苏联

政府一定要坚持,那当然也是很大的遗憾。

为了使中苏关系免于破裂,周恩来后来还进行了多次的努力,希望与苏联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主动向苏联提出,由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但在访问苏联期间,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出言不逊事件。

这一事件使周恩来的努力未有结果,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弃。1965年2月,周恩来与访问越南后路过北京回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进行了接触谈话。周恩来真诚地对柯西金说,双方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终究能够了解。不求一次了解一切,多次交换以后,总会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周恩来还对增加两国友好的一些活动表示赞成,希望加强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 5. 新中国的外交是和平外交

把和平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周恩来对当时新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基本是以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为指导的,但也有一些不同,表现为周恩来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更侧重于和平力量大于战争,战争打不起来这方面。

周恩来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和平的影响在一天天扩大”。

周恩来对二战后的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战争打不起来,但这需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去努力争取。周恩来认为,二战后,全世界的力量对比是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发展,但对帝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3、426、293、295页,《周恩来传》上册,第319、320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85、428、436页。

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也要作好充分准备,除了用军事战争手段对付帝国主义者外,还要努力争取用非武装的工作制止战争的爆发。周恩来指出,通过外交的努力制止战争,外交工作才有意义,“我们要在目前可能的条件下加强保卫和平的工作”。这“在外交上说也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争取和平,使各国人民觉醒,另一方面也要预防和抵抗战争,不能高枕无忧。因此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要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这种在国外的的工作,就是一种触角。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很好地开展工作,这对保卫和平。防止战争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打了胜仗,就会鼓舞爱好和平的人民,这说明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就是要动员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这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的办法。因为人民不要战争,各国人民通过联合的或分别的活动,反对战争,就可以阻止战争,使战争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也是要失败的。防止战争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外交告诉各国的政府和那些好战的人,战争对他们是没有利益的。

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在谈到新中国强大后,会不会威胁别国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

和平对新中国是极为重要的,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还要进行几十年工作,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因此,中国需要国内国外的和平环境”。

### 6. 外交是实质与形式的统一

周恩来指出,外交的形式对实现外交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认为,外交必须首先强调它的实质,但外交形式也是重要的。他

指出：在进行外交工作时，不能只讲实质，也必须照顾外交形式，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必须重视。注意形式并不是迷信形式，而是为了完成外交任务。任务和形式是完整的，统一的，形式虽然要服务于任务，但形式还是重要的。从这点上说，外交机关就是不同于其他一切机关和学校”。

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外交形式的概念，如官方、半官方、民间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军事外交等。

## 7. 外交与外交队伍的培养

还在 1946 年，周恩来就开始注意到必须为今后的新中国培养外交队伍。他为此提出，要把当时各解放区的外事干部，尤其是参加过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晋西北中央外事组的干部集中起来，不让这些有点外事基础的人才流散，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队伍的建立留下了一个基本的班子。

周恩来在建国初期提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必须按解放军的模式另起炉灶，建立一支新型的队伍。他首先提出的外交人员的基本素质是政治素质，要求必须忠实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忠于党、国家和人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中国的外交人员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建国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外事的干部，当时许多解放区都有地方外事处，在中央还设有中央外事组；二是从各地上调一批优秀干部；三是从大学选拔一批较优秀的学生进行培养。外交部门一般不用原国民党政府中的外交部人员，但也有少量的旧外交人员担任专家和顾问。建国时的外交部有 170 多人，到 1960 年有 1879 人，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全面和稳定的外交队伍。

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具体要求是 1951 年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要求他要站稳立场，因为立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62、15—16、48、92、303、16—17 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89—90 页。



场不稳,就可能倒向外国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必须始终把爱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维护中国的利益。在周恩来的外交实践中,有一些问题是重大的,不能有一点马虎。如中国在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有一个重大的立场,那就是必须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这其中的合法两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1972年7月,周恩来在与受日本首相田中委托来华商谈中日联合公报内容的日本客人谈话时,郑重地指出,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正统的政府。这正统两字看起来与合法差不多,但实际上这其中包括一个原则立场的问题:因为合法的反面是非法的,而正统一词的反面是偏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若干个正统政权与偏安政权同时存在的情况,而偏安则有在一部分人眼中为合法的含意,可能会产生误解。又如,田中访问中国时,在其演说词中曾经就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表示这给中国添了麻烦。周恩来后来也指出,添了麻烦一语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到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了麻烦。对此给予了严正的批评。

对于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员,周恩来也总是严格要求,特别在涉及到原则立场的问题上更是如此。1974年3月,国内发生了一起荒唐的事,中国民航局给中国赴日考察组订购了经台北去日本的机票,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斥责,指出这是一次最出丑的官僚主义和丧权辱国的行为。

第二,掌握政策是指外交人员要认清总的形势,把握总的外交战略,从全局上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针路线,让外交人员把自己的一言一行纳入到外交政策的轨道上来,因为外交人员的一次活动,一次握手,一顿饭都有它的意义,会对外交的全局产生影响。

第三,在熟悉业务上,周恩来要求外交人员一定要了解世界上重大事情的具体情况。1971年8月,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外贸部、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二部等负责人,解释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立场,当问及美国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同哪20个国家开会时,被问者都答不上来。周恩来当场严厉批评说,我真有点

---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40、553页。

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样子不行。周恩来提出了外交人员不但要掌握外交业务,还要学习哲学、政治、经济、中外历史、地理等。周恩来认为,外交干部要做到五勤四多一化:五勤是眼勤,即多读书看报,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耳勤是多听各种不同意见,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嘴勤是积极有效地宣传自己;手勤是亲自动手写报告,做笔记;腿勤是多走动,多交朋友。四多为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看书,多实践。一化是外语化,学会外语。

第四,严守纪律,即要求外交干部严格执行中央政策和纪律,实行统一集中领导,不允许各自为政,不允许各单位自由主义,凡事要请示中央。周恩来经常教育外交外事干部说,“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事,不准边斩边奏,更不准先斩不奏”,“因为某一件事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来看,这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另一个问题是提出或解决的时机是否得当,因此同样必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决定”。周恩来还对驻外大使们说,你们都是特命全权大使,但其实特命全权大使授权有限,大使在外一切重要行动,正式讲话,事先必须请示,事后必须报告。没有中央授权,不准在外滥发议论,特别是同中央原则相悖的言行,绝对严禁。因为对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

周恩来曾经把中国的外交队伍的布局总结为三三制,即三分之一在国内,三分之一在国外,三分之一在培训,提出了外交队伍轮换制度化,使干部既了解国内情况,也熟悉国外情况,又能补充新的知识。

## 8. 重信义,说话算数,考虑对方,争取双赢

外交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作为一个负责的政府,对外作出了承诺,就应该实行。为此,周恩来在领导新中国外交的26年中,一直在

---

参见甘步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设》,载于《研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315页;陈叔亮:《新中国外交的伟大开拓者》,载于《不尽的思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443页。

国际上树立中国政府说话算数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中,“信”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它要求人们守信用,言必行。周恩来把它运用到国际行为中,把它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诉外国人,中国政府历来是守信用的,只要说了,就要去做。

外交当然首先是维护和争取本国的最大的利益。但在周恩来的外交学中,实现本国的根本利益是与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力求在双方的事务中求得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办法,从而使双方都能在和乎外交的活动中得到一种较为长久和巩固的利益。

在周恩来领导新中国 26 年的外交活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体现了周恩来作为一个重信义和礼仪之国的总理的双赢外交思想。在任何一个外交活动中,甚至在与敌对国的交往中,周恩来都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在争取中国的合理和合法的利益时也考虑到对方的难处,从而给对方以很大的周旋和活动余地。

1963 年 4 月,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在柬埔寨金边搞爆炸,破坏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访问。中国使馆根据西哈努克的意见,建议推迟刘少奇的访问。但周恩来认为,中国已经定了日期,推迟访问在政治中不利,因为这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访问柬埔寨。周恩来坚持要按原计划进行,并且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

1964 年 1 月,周恩来出访非洲 10 国中的加纳时,正好发生了一名士兵刺杀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事件。本来也准备前往加纳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取消访问。在还要不要继续访问加纳的问题上,中国使馆主张推迟访问,但周恩来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有困难就取消访问,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认为这可以表现中国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治信义。在改变了礼仪的安排后,周恩来仍然如约前往加纳进行了访问,使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格外高兴,加深了两国的友谊。

1962 年在解决中印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当印度决定使用武力来解决两国的领土争端时,周恩来坚决反对,并主张对印度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坚决打退印度军队

的挑衅,并认为,“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侵略立场,只有自卫反击,逐渐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我们不给他以大的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但在冲突发生后,周恩来认为应从解决问题的立场出发,给印度以重新回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原则上的机会。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三项建议:(1)主张双方武装脱离接触,各自后撤20公里;(2)双方应同时将军队各自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内,保证不越过此线;(3)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不便,那么中国总理可以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但尼赫鲁提出要中国军队退回到1962年9月时的状况,使中国接受印度在1959年后对边境有争议地区进行侵占的现实,使会谈未能举行。1962年11月,中国政府再次采取主动行动,宣布单方面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将中国军队自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印度仍不进行会谈的条件下,周恩来再次给印度政府以机会,作了重大让步,原来宣布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任何印度人不得进入,但在1963年1月4日周恩来提出,在东段,可让印度的行政和民政人员进入。1963年3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提出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在信中从印度方面考虑说,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对内对外的需要,还不准备进行会晤,那么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为推进两国的和谈进程,中国方面还在1963年4月释放了印军人员,归还了他们的武器弹药,表明中国方面的诚意。当调解中印矛盾的阿联等6国采取偏向印度一方的立场时,周恩来一方面提出批评,但又表示,中国赞成6国提出的双方停火进行和谈的建议,并再次体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困难说,如果尼赫鲁政府不能一下子转变,我们也可迎合他。周恩来还对阿联总理萨布里说,“我说过我愿意去德里,这是给很大的面子。去德里并不好受,我是准备去受侮辱的,中国又不是小国,也不是没有文化,没有自尊,但是为了亚非团结和中印友好,我们可以作此牺牲,我已经去过四次,再去一次也不要紧”,甚至还表示,中国在目前不能允许印度派人员进入中国军队

---

参见《周恩来传》下册,第699、715、72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77—84页。

退出的西段实际控制线以内,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求新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对印度的一种让步。总之,在中印冲突的过程中,周恩来根据他的外交学,不仅考虑中国的利益,也总是设身处地替印度政府着想,希望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双方的问题。虽然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但却表明了周恩来的和平外交、礼仪外交和外交双赢的思想。

周恩来一再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他指出,朝鲜战争时,中国通过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告诉美国,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不理。当时印度政府也确实告诉了美国,但美国听不进去,不相信中国会援助朝鲜。结果,中国在美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毅然决然派出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军队进行了近三年的较量,使美军在战场上受到重大损失。在越南战争中,周恩来又警告美国,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但如果美国扩大战争,中国不会不理。中国会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承担更大的牺牲,不惜与美国军队再决一战,并指出,中国决不是说大话,因为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1965年5月,周恩来向苏联大使指出,中国愿意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不因两国的分歧而中断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严肃地告诉这位大使,“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为了促成中日关系的发展,周恩来对日本方面的一些困难也给予了理解。在田中首相访问中国时,中国依据建交三原则的精神,本应当要求日本在中国建交时,马上宣布与台湾断绝关系,但日本对此并没有作出承诺,反而还要求中方对日本国内政治情况给予考虑。周恩来对此从实际出发,同意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不提出日本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的问题,而由日本方面采用另外的方式处理。日本方面表示,作为日本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日台条约的结束。但日本方面对何时作出这样的宣布也没有明确。为此,周恩来是本着信任对方的原则来处理的。他在1972年9月28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进行第四次会谈时指出,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

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行,行必果。周恩来还把手书的“言必行,行必果”的条幅送给田中首相。

1973年6月,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就中国进行氢弹试验提出抗议。周恩来对此表示了理解并向日本大使解释说,要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表示的中国核武器不威胁日本的立场,并认为,因为日本是惟一的原子弹的受害者,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周恩来进一步说明,核武器的尘埃首先要通过中国4亿人口的地区,如果说核试验有害的话,我们中国会首先受害,因此中国对待这个问题是慎重的。

作为一个大国,周恩来特别要求中国外交外事人员在对外工作中要从对方的立场着想,不要只想到自己。1973年10月,周恩来曾经就中央乐团访问日本改期,引起日本方面提出意见一事批评有关方面说,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

周恩来根据中国外交的实践,于1963年4月提出了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中国应坚持的原则。这些原则有:(1)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2)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3)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懦弱可欺。(4)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朝鲜战争和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就是这些思想的运用。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2、447;《周恩来传》下册,第1118—1119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49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28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8页。

## 二、外交工作原则论

### 1. 毛泽东关于外事工作和外事管理原则的思想

毛泽东不仅对涉及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外交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且对一些很具体的外交外事工作,对有关外事管理的原则,外事工作的程序,涉外交往中的策略等,也有过具体的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

#### (1) 毛泽东外交谈判的艺术和风格

毛泽东曾经直接和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进行谈判,后来又在苏联与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友好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毛泽东还直接领导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许多重要的谈判。这些谈判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毛泽东的谈判艺术和谈判风格。下面仅以朝鲜战争中,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进行谈判的过程,来分析毛泽东的谈判艺术。因为这是新中国较为典型的外交谈判,也是在毛泽东亲自和具体过问之下进行的谈判。

1951年7月11日,毛泽东亲自部署了中朝与美军的谈判。在以后的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又多次对李克农副外长就如何进行谈判作出了指示,所以李克农主持的这一时期的谈判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谈判思想和策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说,撤兵一条必须坚持。在谈判结束以前,不要让记者参加。因为,第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其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第二,请你们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团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以下几点:中立区的面积究竟以多少公里为适宜,为保障双方代表的安全,应考虑撤退当地居民问题,是否能迅速撤退,我方武装撤退后应否以非武装人员维持秩序,设立板门店双方联络员联合办事处的问題。同天,毛泽东又致电李克农说,关于敌方提出的双方代表团全部人员限制为150人的问题,你们应留有机动的余地。如果美

方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照你们的意见提出双方代表团工作人员各由自己规定互不干涉,但如美方坚持要规定同等人数,你们也可以同意这种规定。因为这是无关大局的。在划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如果可以不牵动大范围的居民,则可以同意美方半径 5 英里的数目。否则可以划一个通板门店的走廊及一个开城附近的较小圆圈,以便只迁移小范围的居民,究应如何,请按情况灵活决定。这次谈判反映了毛泽东的谈判策略,即以大局为重,在枝节问题上灵活处理,如美方提出的让新闻记者进入谈判现场,遭到中方拒绝,因为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就让记者参加,不适宜。但当美方提出让美国记者作为美方代表团参加时,毛泽东没有再坚持,同意了美方的建议,在中立区问题上也同意了美方的意见。

但在撤兵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原则。7 月 17 日,毛泽东再次指令李克农说,在谈判中提出将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问题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来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有权讨论撤兵。

关于谈判中的策略,毛泽东指示说,可以先用第一个发言稿,然后再看对方如何表现,第二天上午还是如此,到第二天下午,如对方坚持反对我方新建议时,再用第二个发言稿。

进行谈判的同时,毛泽东还在 7 月 26 日指示彭总,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 9 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当时,7 月 24 日,彭总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美帝国主义处在矛盾之中,我再有几次胜利,打至三八线,然后我再撤回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走在朝鲜的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的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是存在的。如经过上述办法而不能达到和平,则继续打下去,最后得到战争胜利是肯定的。从全局观点来看,和的好处多,战亦不怕,我军于 8 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

毛泽东的意图是尽快进行和谈,但发现美方并无诚意,是拖延战术,毛泽东于是也改变战术。他在 1951 年 10 月 3 日指示李克农说,



要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

1951年12月28日,李克农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敌人如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则我即同意,表示我们不怕拖。毛泽东回复说,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1952年4月22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并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李克农请示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对方的压力,迫使对方作较大的让步,势非取消这个行政性会议的形式不可。自行政会议以来,对方并未作过任何让步,却利用这一秘密形式蒙蔽其国内群众,提出取消行政会议,使谈判走向公开。毛泽东表示同意取消行政会议方案。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可以见到毛泽东的谈判思想的精华是:A.坚持设立中立区和撤兵这两个基本原则,不能在此问题上让步;B.但任何谈判都是让步和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和让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谈判,毛泽东亲自指令李克农在四个问题上作了让步:让记者参加,代表团人数多少,中立区面积大小,行政会议等,以争取谈判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C.在谈判过程中应精心准备多种方案,逐步实行,争取最好结果,避免最坏的结果;D.处理好谈判内外的配合,争取和平,他指示彭总,在未订立停战协定之前,一定在战场上给美军以打击,争取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大的收获;E.让步必须以对等为原则,不能单方面让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必须采取强硬立场,甚至不惜采取拖延战术,不能急于求成。

## (2) 外交和外事的工作必须请示中央

外事无小事是新中国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的过程中形成的。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92、410、412、417—426、465、642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4页。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虽然不断增加,但总的来说在量上是较少的,因此那时的外事有许多都由党的最高领导层亲自处理,亲自过问,已经形成了外事权力高度集中的思想和体制。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天津、北平市委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涉外工作大量增加,已经不可能事无大小都由中央亲自掌握和亲自处理,大量的外事工作由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中高层人员来处理,或由有关的部委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外事工作的管理给以了高度的重视。

1950年5月,发生了解放军三十二军政治部触犯外事纪律的事件。当时,该军政治部驻扎于福建南平的一所教会中学——剑津中学内,其中有6—7名美国传教员。该部驻入后,先后有二十个同志与美国人交谈,文工团还请三位美国人看戏并进行翻译。这件事在现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属于与外国人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化交往,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极为重视,还亲自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通报,认为“此事件是严重的,我们着其从思想上彻底认识此次事件之严重性,并作深刻自我检讨。望即通报所属以此进行教育,严戒再有违犯外交纪律事件发生”。

不仅军政治部的外事工作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而且连外交部也因为在有关工作上请示不够而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与邓小平沟通时,发现文件中所说的关于朝鲜政府派出600人到中国学习一事,与原来商定的不一样,并且发现外交部发出的电报事先未送审,于是作出了较重要的外交复文送审的决定。他在给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批语中指出,“外交部最近有些较重要的外交复件未送中央审阅,对朝鲜的复电与中央的决策及我们面告朝鲜同志者不相符合,是不妥的。以后请加注意,除例行事务外,凡较重要的外交复文,均须送总理及我审阅之后,再行发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36页;《毛泽东年谱》下,第440—441页。

出,以免出乱子,此事去年(或者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即告诉过你,要事不送审是不对的。你曾作了自我检讨,如何又忘记了?”在章汉夫检讨后,毛泽东又批道:“章汉夫检讨尚好,这是第二次,仍不拟给予处分;如将来再犯,再议处分”。

(3) 外事工作要合乎情理,要得体,要得当,该让则让,该争则争,事关国家大局,务必精心处理,不可草率从事

1954年,中国和印度两国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平友好时期,毛泽东为加强两国友好,对有关中印关系的事情都一一给以指示。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将来华访问,本来有周恩来亲自关照如何接待的事宜,毛泽东按理应该放心,但毛泽东还是亲自批示,在尼赫鲁访问前夕,让周恩来迅即通知空军及有关方面,注意严格保护,不得发生任何微小的误会和不便,以让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专机安全到达。

1959年4月,中印关系恶化,在印度和挪威等地发生侮辱中国国家元首的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向当事国提出了抗议。但毛泽东认为,中国对印度、挪威等国发生的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反应太软。他指示陈毅和周恩来,对印度的抗议“要极端强硬。对挪威也要这样办,但硬性可略为降低,对锡兰也要如此办,硬性也要降低些”。后来,外交部给驻印使馆指示说,印度社会党人去我孟买领事馆示威并侮辱我主席像事,同意由你馆和孟馆以备忘录形式分别向印外交部和孟买地方政府指出,这是对我国元首和我国人民所敬爱的领袖的莫大侮辱,当暴徒进行侮辱时,警察在旁非但不干涉,且将围观者拉开,让记者拍照,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愤慨,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对此事件迅速进行调查并作必要处理,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修改说“要更强硬一些”,后来外交部加进了“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52、562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68页。

决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政府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不达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也不能停止”。

后来中国驻印使馆在5月6日就此事报告说,中方向印提出抗议后,印方照会说,主席像贴在孟馆墙上只有一二分钟,向像上投的只是几个西红柿和两个鸡蛋,印方警察对此进行了干预。中国驻印使馆提出,要进一步追究印方的责任,再向印方交涉,但毛泽东批道:“尼赫鲁已表示歉意,对此事不要再追究了,再追究,印方必还是照样回答,我方也不好作。就此了事”。

有些时候,在何时处理问题,何时公开也是一种策略,毛泽东对这样的细节也是很注意的。如过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极不友好,无端攻击,中国外交部于是决定要发表一篇文章来批驳他的谬论。1959年2月,陈毅外长就杜诬蔑中国之事,组织了一批人写文章进行反驳,写好后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文章本身没有作什么批示,但对发表的时间提出疑问,他在陈毅的请示件上批道:“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毛主席还对文稿作了一些修改,但后来时机不适合,此文一直未发表。

## 2. 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原则

周恩来把中国革命长期形成的思想路线和工作原则引进到新中国的外交领域中,创立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体系,这些外交原则包括:

### (1) 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周恩来针对当时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的现象,提出“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24—225、259页。

想”。

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有区别的。对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主张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周恩来不但认为是中国外交应当支持的,而且中国也应当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因为“在国际上,我们主张民族应该独立,应该有自决权。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有独立的要求。当然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在和平运动中并不反对民族主义者”。

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周恩来认为,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和共同点是,两者都坚持民族独立。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还要坚持国际主义。周恩来还特别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好的,但也尊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尊重它们,决不过问它们的内政”。

#### (2) 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

周恩来指出,“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我们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我们不崇拜资本主义,但也不要说中国一切都好,“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周恩来认为,爱国是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的共性。不管什么制度,人民都要爱国。所以,“我们提倡爱国主义,每个人都有爱护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反对别国干涉内政。爱国就是反对人家干涉内政”。

#### (3) 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人打算,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 (4) 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授权有限,反对越权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4—55、152、153页。

周恩来指出,外交必须“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属于国家机密的问题,不要去谈。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香港 100 年前是中国的,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但台湾问题,时机就已经成熟,应该提解放台湾。

周恩来在与夏衍的谈话中还指出,外事工作授权不多,不能越权,更不能越轨,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中国与美国就朝鲜战争进行谈判时,周恩来曾指示李克农和乔冠华说,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该说则说,不该说则不说,说话做事都要考虑分寸。周恩来还经常教育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的同志说,外交无小事,外交授权有限,这是外交外事工作的一个绝对的纪律。

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再次强调,要注意处理好遵守纪律与灵活机动处理有关外交的事务性工作的问題。他指出,外交政策必须由中央掌握,必须报告请示。但也不要养成任何事情都请示,甚至于有些技术性,事务性的动作也请示中央的习惯。外交决定权在中央,但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5、153、55—56、7、56、83 页。

具体的事务处理,需要在外交前线的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导,灵活处理,随机应变,过去这一方面外交部门做得不够,依靠自己的认识来放手实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勇气还不够大,今后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5) 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指出,“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6) 坚持勤俭朴素,反对铺张浪费

“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要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 三、外交艺术论

外交工作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一样,是一个国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的国内工作,有共同的特点,有共同的任务,受共同规律的支配。

但外交工作又是一个特殊的工作,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必须按照它的规律办事,否则就会给国家民族带来被动甚至造成重大损害。外交艺术是贯彻外交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方式方法,是对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找出其带有规律性的原则并用以指导外交实践的一门科学。

建国之初,新中国极其缺乏外交上的经验,因此尤其要总结过去的外交工作经验,要注意探讨、学习外交工作的规律。周恩来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从过去革命和战争时期的外交的游击战,转为

---

参见《研究周恩来》,第20—21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1页。

外交的正规战，“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仗，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这就更要认真探索外交的规律和艺术。1955年，周恩来对将要从事文化部外事工作的夏衍谈话时，要求他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学一点外交艺术。

周恩来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对外交艺术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原则。

### 1. 外交不能冲动，必须进行周密的分析研究

任何工作都必须经过思考后才能进行，但外交工作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它有着比别的工作更严格的要求。

周恩来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1962年8月，英国政府曾经宣布，将于1962年12月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问英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到10月时，英国外贸大臣又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地推迟这一访问。这一消息宣布后，中国驻英国代办熊向晖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三点建议，希望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主动取消外贸副部长的访问，削减从英国的进口。但周恩来收到这一建议后，当即指示不予采纳，并指出这些建议不符合中国对外政策，让其作检讨。但这位代办认为自己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尊严，主动取消访问，可以表明中国的高姿态，中国以自力更生为主，不依靠英国，而削减对英国的进口，却能打击英国，所以中国应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因此坚持不作检讨。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5、56—57页；《研究周恩来》，第20页。



后来,访问改为1963年上半年,并且取得了成功。周恩来为此批评这位代办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英国与美国不同,主动邀请中国访问,但1962年发生了中印冲突,而印度是英联邦的一员,要是按计划邀请中国副部长访问,不好向印度交代,决定无限期推迟,也是留有余地,中国又何必小题大做,提出取消访问,把事做绝?取消英国的进口,对中国也不利,还会使中国负上不守合同的坏名声。周恩来还特别教育这位代办说,你也不年轻,40多岁了,还这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

为了做好外交工作,周恩来经常要求有关部门把准备事宜做细,争取在外交活动中取得更好的效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周恩来为此让各方面提供有关田中角荣生活情况的资料。后来,在欢迎田中的宴会上,周恩来让乐队演奏了一首田中老家的歌曲,让田中感动得几乎流泪。

即使对一些民间交流,周恩来也是当一件大事来做。如1956年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要率领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在看了文化部上报的接待计划后,把当时负责这件事的夏衍和阳翰笙叫去谈了两个小时,对这一计划提出了批评,主要是这个计划考虑问题太不周到,如只写团长的职务和年龄,对他过去的经历、专业、有没有到过中国,不清楚,又说,计划上写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位,是什么专长,也不清楚,周恩来因此让文化部重新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把情况搞得更清楚再上报。

### 2.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精华

周恩来一再强调,“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具体来说,求同存异就是:

(1) 认清双方的共同点,追求共同利益,这是双方达成妥协和让

---

参见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不尽的思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398页。

参见《研究周恩来》,第24、248页。

步的基础。

周恩来在谈到新中国与英国有关建交问题上的共同点时指出，两国的“同”在于：双方要和平，双方要做买卖，要推进中英关系。这是中国可以与英国求同的地方。

(2) 认清双方的异。这种异有根本的异，如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也有具体问题上产生的异。周恩来在分析英国与中国在 1954 年的“异”时指出，这些异是无法改变的，不能违背原则，所以“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3) 重要的是，对双方的异只能走到澄清的程度，不要去追究谁是谁非，不要去争论，更不要去扩大争论，因为这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制度不同，对于双方的不同是“不必讳言的。又指出，但是，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

(4) 求同比存异更重要。

求同是在外交场合上求得共识，达成协议的基础。强调求同，可以化解原有一些分歧和误会，化解双方的隔阂，也容易在现有的共同点上找到新的共同点。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灵活运用求同存异的艺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会议上，有些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进行攻击，但周恩来在作补充发言时，没有正面反驳这些攻击，而是根据求同存异的目标，号召亚非国家加强团结。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遭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81、82 页。

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所以周恩来在会议上号召,“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意见”。

(5) 不要将异强加于人。

周恩来把等待对方转变,不将己见强加于人,作为中国人办外事的第一个哲学思想,认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明自己是求同存异的大师。他在会议开始前就申明,中国代表团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在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只有7个,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抱有敌意。当一些代表对中国进行攻击时,周恩来在发言中却强调各国都是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应当从中去寻找共同基础,中国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这样,周恩来用中国的和解精神化解了对中国的敌意,增强了会议的团结。

在会议的宣言上,当黎巴嫩的代表说和平共处中的共处是共产党的词时,周恩来又大度地说,不应该由此进入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去,既然共处不行,就换一个词,在联合国宪章中有和平相处的词,这应该大家都能接受。后来,周恩来根据一些代表不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又提出了一个与五项原则精神一致的七项原则。

一位美国记者在谈到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时评论说:“周恩来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的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从这一时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122、327页。

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实确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的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还对那些批评中国的国家的正确立场给以支持,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立场,但并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立场。

当然,在必要时,当求同的条件成熟时,存异也可以成为一种避免矛盾激化,求得关系改善的一种手段。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两国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根本无法达成重大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讨论中美联合公报时,根据存异的思想,提出了各说各的这样一种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公报草案,使堪称外交高手的基辛格也不得不佩服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周恩来反对美国方面提出的回避实质性矛盾,用漂亮词句掩饰起来的公报草案,主张明确表述双方的意见分歧。在尼克松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也只讲中美之间的分歧,没有渲染双方的共同点。基辛格博士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路也有所发挥,当中国方面挖空心思也没有解决怎么表述一个中国的提法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所谓“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提法,周恩来为此称赞,“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后来的中美第一份联合公报采用了周恩来的原则,各自表述了双方的立场,尤其是在台湾的前途的表述上,美国方面表述为希望和平解决,而中国方面则强调只能争取和平解决。

### 3. 外交工作必须做到不亢不卑

不亢不卑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精华。他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要,一再要求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做好这一点,并在外交活动中言传身教。周恩来对不亢不卑的理解是:这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艺术,首先是中国过去的旧式崇洋媚外或盲目排外的外交习惯相对立

---

〔美〕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62页。  
参见《周恩来传》下册，第1107—1110页。

的。他指出：“我们今天的外交传统不是旧的，但将来外交工作开展了，还是要与旧的外交传统接触，也多少会受点影响。因此，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掌握得体”。

中国曾经在近代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旧中国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面前，总是屈服于它们的压力，接受它们提出的种种损害中国国家权益的要求和条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周恩来在总结中国近代的外交教训时指出，新中国的外交学要把与西方帝国主义打交道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首先要树立不害怕强国的信念。在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但“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的不亢不卑的艺术包括以下内容：对强敌要不亢不卑。对于强大的对手，“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容易流于自卑，而今天革命胜利了，却又容易流于骄傲”，因为自认为是代表一个先进的革命的大国，对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是藐视的，容易与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处于对抗状态。

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强大的朋友，也要做到不亢不卑，尤其对于中国正在学习的苏联，更要做到不亢不卑，不要为它们所看不起。周恩来说：“今天在国际战场上，我们的朋友是强大的。而我们又是一个后来者，但又是一个大国。我们要向先进的学习，同时要做到不亢不卑，要有适当的分寸。在外交场合上，任何一个行动都不能随便”。

不亢不卑的外交艺术特别经常地被运用于中国与大国和强国的外交场合中。因为过去的中国是一个遭受西方强国欺侮的弱国和贫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5、16页。

国。清朝的政府在强敌面前多是委曲求全,实行的是屈辱外交,表现的是一个弱国的一切不如人的自卑心理。而新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表现出她的自尊自重,表现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尊严。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周恩来为中国制定了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就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在对外宣传上不夸大,不要过头。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敌对国,周恩来的不亢不卑主要是,中国不能以弱国之势待之,当然不能逞强,但也绝对不能示弱。周恩来为此特别对有关人员强调,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在与美方就尼克松访问中国进行技术安排的会谈时,产生了一个通过卫星转播有关实况的问题。当美国提出,美方可以直接提供所需的卫星和费用时,周恩来不同意,因为这有损中国主权。周恩来提出,由中国政府出资租下通信卫星,然后再由中国租给美国方面使用。周恩来后来解释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国方面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些技术。当美国方面表示美国将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时,周恩来也表示反对,因为这种说法好像是说中国似乎靠外国支持才能独立和生存,这有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形象。新中国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成长起来的,它的独立和生存不依赖于任何国家。周恩来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周恩来的这种对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不亢不卑的态度反而获得了美国外交官的尊敬。尼克松总统的发言人齐格勒因此称赞周恩来是世界上少见的令人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

参见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不尽的思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06页。

而在中国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周恩来的不亢不卑又更为侧重于不亢,注意反对在对外活动中流露出来的大国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

### 4. 真诚待人,实事求是

周恩来认为,对新中国的缺点、落后不必掩盖,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和问题。

在对外交往中,免不了谈到和涉及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认为,“关于内政问题,有什么说什么,根据实际情况讲。我们不要失掉立场,但也不必讳言我们的缺点。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是人民赞成的,但也有少数人不赞成。不要把我们说成十全十美。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我们要承认,如工业就比英国落后,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但从近代水平来看,我们是落后了。总之,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毛病不必讳言,但是要有分寸,不要掩盖了主要的成就。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要把进步说得过分,另一方面,讲缺点要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主动。我们应该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人家提出好的意见要接受,有缺点知道了就要改”。

周恩来对当时外交外事活动中的一个习惯提出了批评。当时,宣传口径是“桃李不言”,意思是打马虎眼,能不说就不说,但周恩来却说,中国人要在外国人面前讲真话,不能“不言”,成绩缺点都要讲,中国的贫穷落后,不讲外国人也知道,可能知道的比中国人还多,所以不言就太消极了,应当一要坦率,二要实事求是,三要沉得住气,听到外国人挖苦讽刺也不要生气。主要是要增进了解。

周恩来还对英国客人指出,凡是外国客人想看的東西,都可以看,还有一个原则,即不仅要看好的,也要看坏的,看进步的,也要看落后的,还有看由坏变好的,中间发展的东西,否则就看不到中国的全局。和英国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上都是落后的,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不发达,近代的文化水平低。但同时,我们建国只有5年,成

就很少，希望外国朋友以朋友的立场来指教我们，改进工作。

### 5. 友好为先，抵抗在后

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独立自主在外交活动中的表现是，“凡是对我们友好的国家，我们就以更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敌视我们，我们就以同样的态度进行抵抗。也就是说，我们在推进友好方面是积极主动地以友好的态度求得人家的友好相处的；如果谁敌视我们，我们将进行抵抗，但是敌视不为人先，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些原则用两句话来说，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对各国人民来说，我们这些政策是丝毫不成为问题的。因为绝大多数人要和我们友好，只有极少数人敌视我们。当然，反动派要在人民当中制造敌视气氛，有少数人会受到影响。不管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信仰的人，总是应该友好相处。即使对过去同我们敌对过，作过战的日本，在战后，我们也主动伸出友好的手，日本人民接受了，友好关系就发展了起来。这是好事，证明我们可以友好相处。我们对美国人民也是这样，我们一向表示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

有一些国家，虽然对中较友好，但如果原则立场上与中国对立，中国也要坚决反驳。如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半外交关系的。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未能采取彻底的立场，还在联合国中承认台湾的地位，中国对此是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在1955年1月，英国驻中国代办向周恩来表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希望中国理解美国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协定，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对台湾的保护，并劝中国从实际出发，和平解决问题。周恩来当即不客气地对他说，英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不对的，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人们却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收复自己的领土，这行不行呢？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2—83页；《研究周恩来》，第25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90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06页。



即使是一些与中国发生过武装冲突的国家,周恩来也仍然强调先礼后兵,先采取和平友好行动,尽量采取克制态度。1964年1月,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谈,谈到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冲突时,周恩来提出,中国采取维护边界现状的办法是:如少数印军入侵我实际控制线后撤走,我将只记录在案;如印度进一步派军队占我领土不肯撤走,我将要求印军撤走,同时请南亚6国出来调解,劝说印军撤走,在6国劝说过程中,我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如6国宣告调解无效,我将采取自卫措施。

在万隆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已经一再表明中国代表团不打算进行争论,并且也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但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还是在会议的第三天对中国发难,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了东南亚国家。周恩来等到会议后,请他留下来个别交换意见,问你是否要破坏会议,如果照你这样发言,我们肯定要争论,结果是达不成任何协议,作为会议的发起国,这样的立场等于是破坏会议。在周恩来的不客气的批评下,锡兰总理只好退却。第二天在会议上头一个发言声明,他昨天的发言只是个人见解,大大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在中日建交时,有一个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先是从友好出发,向日方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进联合声明。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却提出,在联合声明中不用写进战争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为此周恩来很生气,严厉地批驳了高岛的说法,他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时严肃指出:高岛以日本与蒋介石政府间的所谓条约作为法律根据,提出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的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97、397—398页。

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高岛的说法遭到批评,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了以下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 6.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在周恩来领导外交工作的二十多年中,一个最突出的外交艺术就是他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的结合。

如,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为此直到 1972 年前,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在 1964 年时,周恩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产生一个新的思想,那就是政治与经济分开。本来,日本首相池田曾经提出过处理中日关系时要实行政治与经济分开,但是周恩来表示基本上不同意,因为按照日本政府的意思,所谓政治与经济分开,就是政治上承认台湾,经济上与中国做生意,两者分开,实际上是所谓的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但这违背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周恩来明确表示池田的政治经济分开的观点不能被中方接受。但是周恩来也感觉到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于是在此基础上顺势提出,如果日本政府能倒过来,变为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么,中国则可以接受。这样,周恩来在一个原来遭到反对的主张的基础上,经过改造,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新思想:既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可以保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让经济问题单独解决。同时,周恩来为此提出的发展中日贸易三原则,也是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在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为两国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条件。而且,“我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

周恩来这一外交艺术在外国与中国建交问题上也是很明显的。当时,按照中国的建交原则,只有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的,才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等国,它们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另一方面在联合国继续

---

《周恩来传》下,第 1118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419—420 页。

支持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按照原则,中国不能与它们建交,但周恩来从当时新中国要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局面出发,采取了完全建交与半建交方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对英国和荷兰,中国同意与它们保持半建交关系,双方在各自的首都互设代办处。只同那些完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才互派大使。对一些新独立的国家,由于各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实际情况,也有些国家一方面表示承认中国,另一方面又慑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难于与国民党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周恩来也采取了半建交的方式来处理,在这些国家设立商务代表处作为一种过渡,照顾这些国家的实际困难。中国与埃及、中国与黎巴嫩关系的建立都曾经有过这种过渡。

中法建交过程也表现了周恩来善于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作出让步的艺术。法国原则上同意中国提出的建交条件,但又要求中国照顾法国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原则的表述采取灵活的方式。第一,在法与台湾的关系上,法国提出与中国先建交后与台湾断交,周恩来表示同意,后来法国是与中国建交,让台湾自动提出与法国断交,用这样的方式照顾了法国的要求。第二,法国提出不用书面形式确认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周恩来考虑到法国已经用其他方式表达了这一原则,同意由中方申明,由法国方面予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第三,法方提出不按原来互换照会的方式处理承认中国的问题,即先由法国照会中方,表示承认中国,再由中国复会法方,表示同意和欢迎。法国认为这样似乎让人感觉是法有求于中,于是改成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的方式。这样,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又照顾了法国方面的要求,双方都满意。

### 7. 抓住时机,当机立断

1969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试图有所调整。尼克松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馆与中国驻华沙大使馆进行接触,美国驻波使馆人员在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提出了要与我大使进行会晤的要求。周恩来接到国外发回的请示电报后,当即请示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着敲门砖了”。周恩来头天收到电报,第二天一早就复电,指示驻波使馆与美方进行接触。1969年11月14日,周恩来与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单独会谈,对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作出回答。周恩来请叶海亚转告尼克松,如果他真有心与中国和好,那么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一个星期后,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表示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转告尼克松,中国政府不仅欢迎派总统特使来,也欢迎尼克松自己来。这样,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关系终于出现了一个松动的迹象。

## 8. 外交外事调研是外交决策的基础

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就重视建立对外交外事问题进行调研的机构。他指出,为了在建国后掌握政权时,进行外交活动,必须要积累国际工作方面、外交方面的经验。为此他指示中央的外事组和地方的外事处要编印些有关外交和外事的工作手册。在建国前夕,他又指示要在大城市的军管会中设置外交问题研究组。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在外交部内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当时他规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一般问题,专门问题,特别指定的问题,中国外交政策问题。

周恩来要求在进行外交决策之前,要进行理论研究,进行调查。为此他还亲自规定了进行研究的一些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注意到事物的矛盾,分清其主次,从多侧面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剖。周恩来尤其强调对一个问题要有不同意见,认为考虑问题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有了一个看法之后,还可以从反面来考虑。为了为中央的外交决策提供依据,周恩来要求中国驻外大使对驻在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在解决中国外交的一些重大问题时,周恩来亲自做调查。例如,在解决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时,周恩来不仅专门批示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资料的整理、收集,而且还亲自查阅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汉朝以来的史料,弄清了中国历代对这一地区的政策,对比了各个时期的地图,以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及其原因,还对19世纪以来各次边界冲突和纠纷的情况进行了了解,清楚地掌握了边界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还对有关的国际法和

---

参见《研究周恩来》,第15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71—573页。

国际惯例作了大量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对后来中缅两国边界问题处理提出了极为明确的并对两国都公平合理的意见,使得边界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向外国朋友学习和请教是外交外事调研的方式之一。周恩来利用与外国客人会见的时机,曾经就许多问题请教于外国朋友,并获得了大量的宝贵知识,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周恩来接见过约 3000 人次的外宾。

## 四、人民外交论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外交工作中,已经体现了人民外交的思想。如在 1955 年 9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就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撤退留在我国大陆的日本人的问题发表声明,一些日本人有所反应。毛泽东为此提出,“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虽然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以民逼官的外交策略。后来毛泽东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一个文件上又批示说:在岸信介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例如出口少量生漆)。两国民间的往来应当继续进行。适当时机也容许有某些官方人物的往来。

周恩来在 1952 年 4 月 30 日的讲话,也已经包含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他提出外交是国家之间的正式关系,但必须考虑到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新中国的外交学与西方外交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和不同。在以后的实践中,周恩来又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外交学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 1. 人民外交概念

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阶级概念,而是一个外交概念,是指除统治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384 页;同前书第 8 册,第 40、49 页。

集团中的执政集团外的一切力量,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统治集团、统治阶级中的非执政力量,是指一切不能代表国家,不能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企业、学校、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等。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

外交是国家间的关系,外交的目标和使命是和平,但正如周恩来在 1957 年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进行谈话时指出的那样,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周恩来指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在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周恩来后来还指出,“外事工作有党的、国家的、人民的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有区别,又有结合,结合是主要的,应该目标统一,互相配合与协作。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不限于外交部,外贸、外经也都是如此。外交前线工作要统一领导,要集中到使馆的党委”。

## 2. 人民外交的主要内容

人民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仅要考虑到政府的立场,而且要考虑到该国人民的立场,并以此为据制定出相应的对外政策。

周恩来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同一个对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可能不同,因此,不应该把政府的立场等同于人民的立场,要把政府与人民的态度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态度。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40 页。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8 页。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11 页。

中国与美国在战后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但周恩来一直认为,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始终是友好的,需要友好交往的。从这一思想出发,周恩来曾经多次说,美国人民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美国是从欧洲移去的新民族,有朝气,有先驱精神,敢于创造,特别是在科技上有贡献。美国人民很热情,这些都值得学习。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本来有传统友谊。我们曾经多次声明,要区别美国的统治者和人民,我对美国人民有好感,我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最多。在6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遭到中国的谴责,但周恩来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人也是不同的,他对阿联驻华大使的以色列人是很危险的说法持反对意见,认为,对人民不能这样说,人民总是好的。在犹太人知识界中还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如马克思、爱因斯坦等。

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时就运用了人民外交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法国人民与法国政府的立场是不同的,法国人民希望停止印支战争,认为继续战争使法国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主张在印支恢复和平,停止战争。

人民外交不仅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交往,而且也包括一国的上层与他国的普通民众的交往。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

(2) 通过人民外交影响政府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目标服务。

最典型是的在建交过程中,通过人民外交催促政府与新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种影响较成功的例子发生在1954年5月。当时,英国工党在1953年底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到中国访问,经过周恩来的筹划,中国决定以外交学会的名义发出邀请,让英国工党派团来访问,从而大大推动了英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

最成功的是中日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周恩来在谈到民间关系对官方关系的影响时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虽然是民间的,但与官方有关系,“因为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表处乃至政府贸易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55、556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7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43页。

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

在 1972 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大量的人民外交活动,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有很深厚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不像美国,虽然当选总统和政府积极,但国会反对和牵制,虽然起步比日本早,但关系的正常化,却比日本晚了好几年。这与中国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坚持不懈地推行对日本人民的人民外交有极大的关系。正如周恩来对外国朋友介绍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本来很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新中国坚持对日本人民做工作,许多日本人在“七八年的工夫,由欺侮我们的人变成了我们的朋友。经红十字会遣送回国的日侨有两万八千多人,许多人在报上写文章,开会演讲,宣传中国人民对他们友好。……不但人民要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周恩来后来把这一过程总结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

(3) 人民外交的内容不仅仅限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也可以通过两国有关的组织协商,达成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具有某些政府间外交的性质,周恩来把它们叫做国民办外交。

这种思想在周恩来处理中日关系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周恩来指出,“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我们两国人民团体的来往,已经创造了新的纪录,这就是两国人民团体彼此达成了许多协议,并且由两国人民团体来执行。中日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涉及议会、渔业、侨民、文化、科学、贸易、工会等方面。这些协议大部分都实现了,而且行之有效,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为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

---

江培柱等:《中日关系舞台上的辉煌乐章》,《研究周恩来》,第 228 页。

参见《研究周恩来》,第 44 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46 页。



系铺平道路。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

(4) 国民外交以争取外国人对中国友好为目的,所以必须自觉地对外国人做工作,让他们了解中国,争取对华友好的人越来越多。

周恩来曾经对夏衍等从事对外交流活动的人指示说:国民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广交朋友,增进理解,但我经常在你们的计划或报告中看到某某来宾思想进步,对华友好,某某思想保守,有反共情绪等,这种非彼即此,不是红的就是白的,不是进步就是反动的划分不科学。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进步的可以变为进步的,对华不友好的可以变为友好,工作做得不好,伤了感情,就是对我们友好的人,也会变得不友好。而从总体上看,对华友好的真正亲华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是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想到中国来看一看的中间派,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努力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外国朋友,增进理解,解除疑虑,使他们对华友好。

而且,周恩来认为,与外国人交往中,不要从他们的一事一言来看,而要从一个时期,从总体来看。不要根据外国人的一个事情就把人看死了。如,一次文化部组织一批日本作家参观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但有几位作家提出,要去参观市场,不去参观万人坑,于是文化部负责接待的人在总结报告中就认为他们是有意避开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其中一人还是过去的日本随军记者等。周恩来看完报告后,对此提出了批评,说,参观万人坑有一个感情上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不能因此断定不去参观就是军国主义分子,因为当时日本的征兵制度很严格,当随军记者也有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至少,这些人不去访问台湾而来访问中国,总该算人中间派吧?对这样的中间派就是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做思想工作。不仅国家之间要求大同存小异,在国民外交中也有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存,就不会有什么国民外交了。

国民外交在中国外交格局的开创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周恩来在

总结国民外交对推动中日关系的作用时说，“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

但必须正确估计国民外交在整个外交活动、外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恩来倡导的国民外交虽然在推动新中国的对外格局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打开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但周恩来始终认为，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国家政府间外交。因此，两者的关系是，当两国关系处于没有国家间正式外交的时候，国民外交应当起主要作用，用它来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可以说，国民外交在国家间关系发育的初级阶段能够起很大作用。当两国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应当推动国民外交向国家间关系发展，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这个时候国民外交在这种双边关系中，就只起一种次要的和补充的作用，国家间外交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渠道。周恩来在中日关系从国民外交到国家间外交转变的时刻，尤其注意到要处理好这两个层次的外交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当日本田中内阁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国内对日本政府的变化宣传报道不够。周恩来认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来往，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在报道上也要反映这一情况。

## 五、邓小平的政党外交论

在周恩来时期，国民外交大量的表现为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所以民间外交成为周恩来时期中国外交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在 80 年代，随着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各国政党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处理执政党之间、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社会主义政党与非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成为非正式外交的重要内

---

参见《研究周恩来》，第 26、228 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534 页。

容。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与大量的外国政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提出了中国处理党与党关系的许多思想,构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的一个方面。

利用政党关系开展外交工作,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是从属于党际外交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决定国家关系,国家关系包含在党际关系之中。意识形态的争端与国家利益冲突搅在一起,使两者的关系很不正常,党的关系常常代替和超越国家关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没有从外交上对党际关系作出界定,论述也不够明确。

到了邓小平时期,对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关系有了新的观察和认识,他提出了党与党要建立新型关系的思想,大大发展和深化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倡导的政党外交思想。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时期的党际外交首先是在区分国家关系与政党关系、国家利益与党的利益之上进行的,党际关系实际上成为了周恩来提出的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属于国家间的外交的,又对国家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邓小平提出的党际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各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

关于党与党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的思想,早在 50 年代中期就已经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1956 年邓小平与刘少奇在同苏共代表团会谈时,邓小平指出,在斯大林后期,苏共对各国共产党有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原则。邓小平还向苏共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苏联对东欧国家采取的政策应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放手,让他们独立自主,不加干涉,相互平等。1960 年邓小平向苏共领导人重申,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关系。1963 年邓小平又指出,各共产党国家关系的准则应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

干涉内政,以及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援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怎样处理党与党交往对国家关系的影响?邓小平认为,党与党的交往,应该与国家关系分开来,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党与党的关系,更不能因此而影响国家间关系。这里有几种情况:

### 1. 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根据什么原则来处理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在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一些公式,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就算用马列主义的公式去评判也难免犯错误,这些党的国内政策只能由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去判断。但是,如果一个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对别国进行侵略,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这就是说,内外有别:属于各国党内部事务,属于这些国家的内政的,不应进行干涉,但在对外政策上则不同。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党,由他们自己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这一思想反映了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思想在党际思想中的反映。邓小平特别指出,中国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反对他们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与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的关系,虽然在实践中与国家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也有一个区别和界限。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相同,就用两党之间的合作来代替国家间的关系,不能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利益去取代国家利益。

最复杂的是中国共产党与那些虽然是社会主义,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又与中国共产党有重大矛盾和分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

---

参见《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8、30、42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

党的关系。由于都是执政党,都掌握着国家政权,因此两者间的矛盾和分歧往往通过国家关系的渠道来体现,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往往掩盖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这突出地表现在过去的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涉及的国家关系上。

邓小平提出,虽然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接近和相同,但必须反对领导中心论,反对领导党。他总结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才能取得成功。各国党应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每个国家的事情由每个国家的政党自己独立地处理,反对别国党对此进行干涉,反对来自外部的指手画脚,反对一个党控制指挥另一个国家的政党。尤其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每个政党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照搬苏联模式的情况,这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到了 50 年代,苏联模式已经表现出自己的弊端,表明任何一种模式完全移到国外都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反对以一个党的经验来判断他国的实践,尤其反对一些国家把自己的经验强加到别国头上。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的共产党之间,也必须强调各国党的完全独立自主、完全的平等和尊重各国党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权。

可以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不能指手画脚。

在处理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邓小平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是,对过去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共产党之间产生的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不再争论,采取向前看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方法。邓小平在与意共总书记贝林格会见时说,“过去吵架,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当然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邓小平还提出了两条原则作为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准则，“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自己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应该说，我们现在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障碍也就排除了”。

## 2.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非共产党的关系

从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争取社会主义在本国取得胜利而进行的斗争，但这些政党又多是执政党，是与所在国的执政党有矛盾的政党。因此，从国家关系出发，中国共产党与这些政党的关系不能太密切，对它们的斗争的支持也只能是有限的，不能超越国家关系，尤其注意不能超越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

7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意识形态色彩浓厚。1978年后，邓小平主张，党际交往应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要计较国家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否相同，对所有国家的所有政党，除了少数极反动的政党外，都可以进行接触和交往，建立不同的关系。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它们在1978年后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这里遵循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二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谁也别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邓小平认为，不论与什么政党交往，都是为了促进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合作，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为国内争取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中国共产党不应该试图在这样的交往中输出自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4—175页。

己的意识形态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于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重大分歧甚至是对立观点的政党,可以绕开这些矛盾和分歧,寻找共同点。

# 第十一章 中国外交的策略战略思想

## 一、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战略思想

### 1. 毛泽东关于对外妥协不要求对内妥协的策略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即把国家的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分开来处理的原则。这一思想是在二战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当时,国际上出现了所谓“美苏必战”的论调,许多人认为,为了克服战争危险,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某些妥协的前景,因而认为,国际形势的这种妥协的可能性,也要求在国内实行妥协,共产党就应和国民党进行妥协。1946年4月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指出,战争的危險是可能克服的,在美国、苏联和英法之间,必会出现某种妥协。但是,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1948年,毛泽东对一些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也像国际情况一样进行相互妥协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指出:“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对指导解放战争的胜利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如果当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9页。



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妥协国内也要妥协的思想办事,那么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情形可能就是另一种局势了。

## 2.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策略战略思想

在面临国际较强大的力量对自己进行压制时,要敢于进行斗争,要不怕敌人的强大,但在进行具体的斗争时,又要制定灵活的策略,重视这个强大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与国际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打交道时,一贯实行和坚持的外交战略和策略。

把一切强大的敌人都视为纸老虎,是毛泽东 1946 年 8 月,总结历史经验时提出的。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进一步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俄国沙皇是纸老虎,希特勒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斯特朗在谈到毛主席和她谈起“纸老虎”的情形时说,他最初说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的时候,这个词译成了“Scare-crow”。毛主席立刻打断谈话,要我告诉他“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那是扎成人形的稻草人,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立刻表示这样译不够好。他说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是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

在这样一种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与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中国又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纸老虎,在朝鲜直接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1—62 页。

参见宋一秀、杨梅叶编著:《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红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3 页。

与强大的美军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尽管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共和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使美国在朝鲜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使得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

在 50 年代，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面前，始终坚持纸老虎论，认为美国尽管强大，但并不可怕。1955 年，毛泽东在与英国客人会见时指出，“我们称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它还叫嚣，不相信。可以这样说，战争如果打起来，在战争初期和表现形式上，它可能是铁老虎，可是到后来便会成为纸虎。因为美帝国主义不得人心，人民反对它，它只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虎的实质”。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对纸老虎的思想作了重大的补充，他在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同时，对这一外交战略作了具体的解释，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

1958 年，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又讲到了关于“老虎”的转化问题，认为新兴的独立国家要敢于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和崇拜，“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1958 年 12 月，毛泽东更完整地讲到了他的“老虎”论。这一次他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

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认为,任何强大的国家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有一个从强大到削弱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无法抗拒的历史过程,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加速这一转化过程,正如他所说,人们应当认识和掌握这一社会运动的规律,然后“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

当中苏两国矛盾公开化,两国关系从友好结盟转为敌对时,毛泽东的纸老虎不仅指美国,而且也用在了被认为是世界上与美国同样强大的苏联身上。他在与外国朋友谈话时指出,苏联和美国一样,也希望一切事情都按它的意思办,但如果人们敢于和它斗争,那么,它也和美国一样,也会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苏联是只纸老虎,我们不信它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难道一切事情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但现在中国人敢于和它斗,所以苏联和美国一样,也成了两大纸老虎之一。毛泽东关于美国是纸老虎的话在朝鲜、越南被得到证实。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一个到处侵略扩张的霸权国家,从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变为纸老虎则表现得更为充分,毛泽东说苏联是只纸老虎的话仅仅过去二十多年,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

### 3. 关于“另起炉灶”的策略思想

另起炉灶,是指在外交上当过去达成的协议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使协议的内容无法继续实行的时候,重新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重新就原来的协议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协商。这是毛泽东在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6、299、339—340、362—364、520—523页。

建国初期，就处理新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个策略思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过去国民党时期与外国达成的各种协议、条约。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采取了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各种协议和条约的立场。

这一思想早在 1947 年 10 月 10 日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一文件中，毛泽东指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1949 年 1 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文件时又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稍后不久，毛泽东又就此指出，在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就是“另起炉灶”。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朝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朝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在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毛泽东认识到，这样做，有可能使帝国主义国家更加不会承认新中国，但是，即使如此，新中国也要这样做，而且，新中国也不急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

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急于去解决”。

## 二、邓小平的外交策略论

邓小平是外交战略家,更是外交策略家,也可以说邓小平是一个大外交策略家,他高度重视策略问题。他的外交策略思想既来自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策略思想。

当然,邓小平的策略是服从于他的总的外交战略的。他在说到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时指出,“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那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策略是可以灵活的,但“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

### 1. 中国要强大但不当头的长期策略

有些人可能认为,邓小平在冷战后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提出了不当头的策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不能当头是在1982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时,明托夫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邓小平回答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后来,邓小平在1982年8月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会见时,再次提出了中国不当头的策略。当时,邓小平提到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关系调整不理想,问题很复杂,在这一方面要做工作。中国也要做工作,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邓小平指出,“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3、77、79—80页。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2页。

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说，中国应当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同样，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后，世界社会主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剩下的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最大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对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中国只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而不能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某种形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也不能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更不能建立和恢复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来与西方进行对抗。

邓小平的不当头策略思想也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中国不当第三世界的头的思想的影响。这种不当头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过去在以苏联为首时期吃到过太多的苦头的历史教训有关。对邓小平来说，中国不当头主要出自于四个因素的考虑：

其一，中国没有实力当头。中国虽然是个大国，近年来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中国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个落后国家，还有相当多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这要求中国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国内问题上，而当了头就要求中国更多地关注国际问题，减少对国内事务的关注。

其二，中国不当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如果当了头，就会被各种力量推到矛盾的焦点和第一线，成为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霸权主义秩序、建立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秩序的斗争的第一线国家，这不利于中国自己的国内建设，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也会因为意识形态而影响中国的外交战略。

其三，中国也无法当这个头。因为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一个包括各种国家在内的松散的大概念，第三世界内存在着许多利益相互

---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参见陈忠经：《冷眼向洋看世界》，第9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矛盾的国家势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有许多矛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反对中国的势力。

其四,中国绝不能当头,因为当头违反中国的外交原则。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思想,那就是中国任何时候都不称霸,中国永远不搞霸权主义。当头就有高于其他国家一等的含义,很容易发展成为霸权国家。而中国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深切地体验到,现在的国家关系必须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任何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领导国家都必然会失败。虽然这个指挥中心国家可以风光一时,但到头来只会损害自己。中国不会允许别国对自己发号施令,但也决不会对别国发号施令。

不当头的思想与邓小平提出的反霸思想是密切相连的,当头就可能称霸,反霸就不能当头,二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所以邓小平多次说,不称霸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当头也是这一原则的体现。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所以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是永不称霸”,由于反霸斗争是长期的,所以中国不当头的策略也是长期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当然要对世界事务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但这不等于使中国具有对别国进行“领导”的含义。

### 2. 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期的应急策略

邓小平的策略思想在冷战结束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与冷战结束时的世界形势有重大关联。

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方式实现的,是以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共产党领导的解体甚至国家的解体的方式实现的,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外产生了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的大合唱,试图通过对中国的新的制裁和遏制,迫使中国改变社会制度,实行西方式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的一员。

在国内,冷战结束时产生的巨大的冲击波引发了两种思潮:一种是迎合西方的压力,认为中国应当自动实行和平演变,主动地顺应苏联、东欧剧变的潮流,尽快地实行以多党民主化,市场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同时,对于苏联、东欧剧变的回响又产生了另一种思潮,认为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中国应当停止改革开放,重新实行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中国必然会出现苏联、东欧式的灾难。局势提出的尖锐问题是:中国是否一定会像苏联那样发生剧变?中国是否能避免苏联、东欧式的剧变?

1989年9月,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他的策略思想:“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每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钱其琛同志在总结邓小平的外交策略思想时指出,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不信邪,不怕鬼,不怕战争,不怕孤立,自己不乱,绝不示弱,保持威势,保持警惕,放松不得,泰然处之等。

以上这些思想构成了邓小平冷战后中国外交的策略体系。这一体系中,冷静观察是基础。冷静观察,首先是观察当时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的情况,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当时这一剧变还处在变化进程中,有些结果已经看得清楚,有些则还不清楚。当时邓小平已经有一个结论,就是苏联、东欧国家肯定是要乱的,东欧国家的社会主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63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义已经变质,苏联的旗帜也保不住,苏联肯定要乱,但是这里不清楚的是,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向什么方向演变,苏联、东欧的社会动荡会乱到什么程度,这种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会有多大,都还不好预料。

其次,冷静观察是观察当时的西方国家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对中国的政策会是什么样的。西方国家不但希望苏联、东欧国家都乱,也希望中国动乱,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肯定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会要中国也改变自己的制度。在1989年7月,西方七大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不许高级官员接触;但西方国家到底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办法,对中国的压力会有多大,通过什么办法来施加压力,除了经济制裁、政治封锁外,会不会采取军事手段,在多大程度上会参与中国内部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西方国家内部在这一问题上是一行行事还是存在矛盾,这些也需要进行冷静观察。

最后,冷静观察也包括观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这种大动荡的国际社会中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中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苏联、东欧变化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但邓小平同志却高瞻远瞩,深刻地洞察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指出了世界大变化时期的许多不定的因素,对中国的发展也存在机会,因此悲观是没有根据的。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稳住阵脚是邓小平策略思想体系中的第二步。稳住阵脚,首先是指要避免不战自乱,不要因为苏联、东欧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

剧变就以为中国也必然会产生同样的情况,不要因此自乱阵脚,采取投降主义或极端行动,不要产生盲动情绪。

冷静观察之后是冷静分析和思考。邓小平首先指出,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不要因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而动摇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人自己应当对自己有信心,中国是有力量的,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

其次,稳住阵脚也包括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压力要有冷静的分析。对此当然要保持高度警惕,但也不要过高地估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压力而过低估计中国抗压的力量。邓小平指出,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矛盾,在对中国施压上不会完全像美国或法国那样。

稳住阵脚的策略思想中还包含有反对极端的思想,这是针对在国际形势突变的情况下,防止采取匆忙的不经深思熟虑的做法而提出来的,这种极端既是指主张在西方压力面前实行西方式民主化政策的投降主义思潮,又指主张以反对西方“和平演变”为由而重走回头路的极左思潮。

最重要的还是要沉着应付。

邓小平提出的应付办法是:首先,最重要的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要坚定不移地搞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为此,中国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29页。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动摇。

其次,在西方国家向我们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当然要顶住这种压力,但采取的方式要得当,不要过头,不能因此与西方国家断了关系。邓小平指出,虽然发达国家对我们会更加戒备,但中国与西方国家还是要友好交往,朋友还要交,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又指出,在国际风云变幻多端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着急,也不悲观,应泰然处之,尽管苏联、东欧国家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年代,保持自己国家的政局稳定就更为重要。因此,邓小平的沉着应付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提出外乱内稳的思想。邓小平指出,中国只有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一时期,稳定两字在邓小平的外交策略中占有压倒一切的位置,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与外国客人讲明中国决心保持稳定的立场。

邓小平认为在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同时,还要有所作为。这里的有所作为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要在国内有所作为。邓小平指出,中国不管世界上如何变化,也不管如何受到影响,有一点是始终不能放松的,那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咬定青山不动摇。“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了不起的胜利。”国内有所作为就是要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放在第一位。有所作为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大国,作为多极化中的一个极,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总是应当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并起到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59、33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一个大国的作用。有所作为的第三个表现是中国要努力推进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在邓小平的策略思想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关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中的韬光养晦策略。这个问题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主要分歧在于,这个策略是指中国自己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不事张扬,还是一种针对某些国家的强大压力,暂时隐藏锋芒,等待时机,以图后发制人的谋略?

有的同志指出,韬光养晦这句话在《邓小平文选》中没有,现在慢慢流传出去了。照词典上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可以说有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不完全准确恰当。它是一种正大光明的韬略,与睥睨一切,以势压人的作风正好相反,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谨慎谦虚、不事张扬的精神风貌的反映,用以保证我们埋头苦干、注重实绩、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尽快办好”。

还有的同志指出,韬光养晦就是指中国要对发达国家采取正确的态度,对他们要有警戒,但还要与他们交朋友,心中有数,不要随便批评他们,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谦虚做人。

其实,邓小平这一策略思想并不单是针对 1989 年和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策略的,邓小平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同的想法。所谓不当头的策略思想早在 1982 年就提出来了,它包含的思想其实也有隐藏不露的意思。邓小平在 1987 年提到的另一个相同的提法是,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前,中国“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

现在不少人把邓小平的这些在冷战结束时期的策略看作是一个外交战略。笔者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思想是在 1989 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提出来的,主要是为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而制定的,把这些策略作为中国外交的总的战略,是不恰当的。当然,一般地说,任何时候我们对国际形势都要进行冷静的观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在正常时期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有当局势发展到很容易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混乱,容易急躁地作出

---

陈忠经：《冷眼向洋看世界》，第 97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99 页。

某种不合时宜的决定的时候,强调冷静观察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同样,只有当形势的变化可能对我们不利,面对强大的外在压力,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并且内部可能产生分歧,可能产生混乱时,我们才强调要稳住阵脚,而如果我们在平常时期总把要稳住阵脚作为一个“战略”,这不会让人感到高明,而只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所以邓小平的这个策略在冷战时期产生过重大作用,在以后国际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时,也会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在正常发展时期,不应乱搬用这一策略,更不应把它视为中国的外交战略。

还应当指出,在邓小平的策略思想中,也包含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从理想主义出发,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敢于说话,敢于承担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对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出现的霸权主义行为进行斗争,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就意味着要得罪人,要管别人的事,要站出来为一些人说话而反对别的一些人。遵循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就可能自然而然地“当头”,使自己处在一个不太韬光养晦的状态。但从现实主义出发,中国又不能这样做,中国的外交要从中国的实力和国家利益考虑,因此中国又不能也无力承担讲公道话和办公道事的义务,所以邓小平才提出了不管别人的事,谁也不得罪,不做过头的事,不说过头的话的看法,要我们量力而行,有多少力量说多大的话,办多大的事。中国只能实行锋芒较为不露的策略。

邓小平的策略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中国市场作为中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冷战后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与政治高度一体化,一国的外交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贸易紧密相联。而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就一直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的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几十万家合资、独资或合作经营企业在中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这一发展态势首先是中国实行正确的开放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外交变为积极的开放外交,从单一的政治外交变为政治经济外交的一

个体现,但同时市场因素也成为中国外交策略运用中一个活跃因素。

邓小平在外交活动中,为推动解决中国外交中的一些问题而多次使用经济外交和中国市场这一策略手段。打破中美两国关系自1989年7月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以来的僵局,是中国外交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邓小平除了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政策作斗争以外,也多次提出,中美两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应当改善两国关系,为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创造更好的条件。1989年10月,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 结 束 语

新中国在1999年10月1日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这50年,是新中国在国内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50年,也是在外交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50年。50年来,新中国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积弱贫穷之国,一个备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凌侮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中国的地位日益上升,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大国,一个对人类世界会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过去50年的中国外交之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走过的,这些思想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灵魂。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思想仍将是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当然,我们面临的世界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正进入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中国需要新的外交思路、新的外交战略。这种新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离不开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

承发展。今天我们总结这些伟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为了学习和掌握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立场,结合我们新的外交任务,创造出新的外交思想。

可以看出,在一个日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将比过去起更大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说,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否得当,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战略得当,有可能大大加速一个国家的发展,大大增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反之则可能大大延缓一个国家成长壮大的进程,影响一个国家国民生活的质量。

在中国新的 50 年起步之际,在世界进入新的世纪之际,中国外交在解决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与处理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处理加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社会接轨,加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与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问题上,无疑面临着极为艰巨和复杂的任务。我们只有坚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基本方法和立场,紧密结合中国外交的新实践,探索新问题,寻找新办法,才能产生出与新时代特点相适应的新的外交智慧,使中国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从容自如,稳如泰山,为中国在新世纪的腾飞创造最好的外部环境。

## 主要参考书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3.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年），人民出版社。
5.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
6.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8. 师哲：《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 1997 年版。
9. 萧延中等编著：《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年版。
10.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11.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13.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14. 熊华源、廖心文著：《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6. 李海文主编：《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17. 《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1994 年版。
18.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9. 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 20 . 陈忠经:《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21 . 丛凤辉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6 年版。
- 22 . 《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 台湾《中国时报》1999 年 1 月 10 日。
- 23 .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 24 .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57—1969、1970—1978),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1998 年、1999 年版。

## 后 记

近年来国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取得了不少成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国内有关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谨对这些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大学教材出版基金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的赞助和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研究和写作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领导、老师和学生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正是这种宝贵的精神鼓励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巨大信心和勇气,使我能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金娟萍等编辑,以其细心和辛勤的工作使本书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本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又是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本书中肯定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还望读者一一赐教。

叶自成

2000年1月20日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 后 记

近年来国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取得了不少成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国内有关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谨对这些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大学教材出版基金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的赞助和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研究和写作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领导、老师和学生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正是这种宝贵的精神鼓励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巨大信心和勇气,使我能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金娟萍等编辑,以其细心和辛勤的工作使本书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本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又是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本书中肯定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还望读者一一赐教。

叶自成

2000年1月20日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 第二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关于战争、革命、和平、发展的思想

新中国的外交不是一个孤立国家的外交,它首先与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的总趋势的分析和认识紧密相关。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战争即将临近,那么反对战争和准备打仗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就是如何避免和防止战争;而如果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主要和现实的危险,那么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和建设国家就成为第一位的任务。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和平外交战略的大师,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争取中国的和平环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正是在如何判断世界总趋势的发展方面,邓小平根据后来发生的变化,在继承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的同时,又大大地修正了毛泽东的外交总战略,把建设国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一切工作的总任务和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总战略。

### 一、毛泽东的时代观: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

毛泽东总是基于对当时的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他对时代的认识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毛泽东一生中总是对世界时局极为关注。

早在1941年6月中旬,我党做国际情报工作的同志从几个渠道获得德国即将发动对苏战争的消息。6月16日,收到这一情报的周恩来同志在一封电报中告诉毛主席,国民党政府内部传说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定在6月21日。党中央立即把这一情报电告斯大林。当时,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会立即发生,所以苏德战争爆发时,延安的人包括毛主席,和全世界一样感到突然和震惊。当时,党中央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毛主席也为苏德战争写过一篇社论《苏必胜,德必

败》，可以看出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毛泽东认为，苏德战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6月26日，由毛泽东修改过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说，“今天的战争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7月12日，毛主席又专门写了一个指示，说，“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硝烟和革命激情的时代，也是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和平建设的年代。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时代浪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一个新的矛盾：那个年代，到底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年代？如果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那么要一心一意进行和平建设就是不可能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准备战争和推动革命方面；如果是战争打不起来，就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平建设，外交上致力于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两种判断是很不同的。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两种思想是交替出现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主旋律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来，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的主调都是有变化的。

### 1. 第一个时期：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毛泽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战争，战争引起的结果将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末日来临，那也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之日。这一观点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的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

这种比较乐观的观点在1938年有过较完整的表述。毛泽东在当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目前开始了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

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在毛泽东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由于战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战线可能有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所以,“目前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 2. 第二个时期:战争危险与和平建设并存的年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60 年代中期,是局部战争不断,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时期,是革命形势不断成熟的时期,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紧进行建设,并有可能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超过帝国主义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争危险始终存在,但不会真正发生世界大战,这一时期是战争与和平建设并存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东欧出现了新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也有很大发展,但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那种帝国主义总崩溃的局面。战争削弱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同时又造就了一个新的世界强国,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两个世界阵营的对立和对峙。两个阵营保持高强度的军事对

抗,但世界性的最后决战不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就是冷战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可以说是最早看到这一特点的政治家。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两者结合形成的洞察力,使他在观察问题的时候比较其他的政治家更容易看到战后世界形势的本质。早在1945年10月,当毛泽东回答“是不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时就指出:“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历来都是由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而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空前强大的局面,这就迫使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而且一定会与社会主义国家达成某种妥协,所以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1948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局势时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另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不致爆发战争。毛泽东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世界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帝国主义就更不敢发动战争了。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开始就与美国处于严重的军事对抗状态,还在朝鲜半岛与美国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军事较量,但毛泽东对世界总局势的分析没有发生变化,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它不可能真正发生,世界人民有力量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1950年6月,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对世界和平较为乐观,因此,在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和平建设的讲话。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



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毛泽东希望,能与西方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一起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以保证几十年不打仗。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后来,毛泽东又几次讲,中国最好能有一段和平的时间,“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至少要争取到十五年时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这一年,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裁军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和建议。他对英国客人说:希望美国“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让我们大家统统解除武装,我们自己的几个兵也都不要了。让我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倡议一下,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毛泽东希望,能以“和平为上”,东西方国家能避免战争。“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

毛泽东认为,战争从政治上来看,对美国不一定有利,他指出:“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这“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整个世界或世界的绝大部分将处于革命状态。……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

小”。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对和平较为乐观，还与毛泽东经常用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有关。他认为，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另外，从军事力量的聚集来看，美国似乎也没有真的要打仗的样子。“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无法打仗。看样子美国现在是想霸占些地方，不一定会打起仗来”。

毛泽东认为，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和平友好是基本的”，战争、和平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打不起来的可能性大。

这样，一方面，战争危险存在，另一方面，战争打不起来，毛泽东把中国对战争的立场确定为两条，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为什么反对？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

但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那么中国也要奉陪。之所以不怕，是因为，第一，怕也没有用，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也没有办法，怕也不行，怕也要挨打，不怕也要挨打，不如不怕。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不如）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第二，不怕是因为，真的打起来，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力量不一定就不如美国，毛泽东指出，“但是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不要打，它打来，那末便要扫它几下。在亚、非、欧，扫它是有把握的。如果打起来，三个洲都会变成一个腔调。因为我们有力量，对帝国主义我们并不怕。……（我们）准备打他几年，把战争从三个洲的土地上扫出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第三，不怕是因为，真的打起来，中国当然

会受到严重损失,但其最后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这)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

基于这样的立场,毛泽东有时也把准备反侵略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在1958年指出:中国现在要“准备反侵略的战争。……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

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在战争危险存在的情况下,要把立足点放在抓紧时间进行国内建设上,只有建设搞好了,实力提高了,才更有可能阻止战争。而把力量用于准备战争,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 3. 第三个时期:战争与革命思想的“复归”

这十多年中,毛泽东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和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政治向“左”倾斜,毛泽东把主要精力从过去搞经济,转为抓阶级斗争,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来引发“文化大革命”。而国内的“左”倾路线也对外交思想有重大影响,表现为从过去主张和平共处,发展到后期的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放在重要地位上,期望中国的新革命能引发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二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是中苏关系紧张,后来又发展为军事武装对抗,60年代末期发生了边境战争和流血冲突。这使过去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思想更为发展,过去战争危险并不是迫在眉睫,而现在有了新的紧迫感,来自北方的威胁与一直存在的战争威胁,使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因此,毛泽东希望有一个新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6、162、213、170、207、171、205、224、347、206、211、347页。

的世界革命的高潮来缓解对中国的战争压力和威胁。这样,在这一时期,革命与战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问题,战争一定会打起来,各国革命者通过革命来制止战争的战略成为毛泽东的主导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变化还与当时越南战争的扩大有关。1965年3月,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并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1965年5月3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发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上,有一篇题为《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的文章,说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现在,是否要把轰炸扩大到海防、河内,有争议。这表明,美国政府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注说,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1965年1月,斯诺见到毛主席时,曾问:“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毛泽东回答说,中国革命最后的安全这点很难讲,中国实际上不安全,因为美国和苏联都没有真正裁军,但毛泽东没有否认斯诺提出的问题。

1965年后,毛泽东与外国客人谈话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所以他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支持越南人民进行的反美斗争,鼓励日本青年起来进行斗争,影响日本广大的群众和其他阶层,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赞扬在两千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号召所有国家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并认为“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

新时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主席希尔时说，“请你考虑一下，世界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在1969年4月，毛泽东又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毛泽东1970年5月发表的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标志着毛泽东这一个外交思想的完成。他在声明中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各国人民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毛泽东还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时，再次重申了战争将会爆发的观点。当年，来华访问的布迈丁问及美苏协议与战争问题，毛主席说，协议有可能，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它是一时的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世界战争，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5、577、579、563、567、570、574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4—586页。

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打不打原子战,可能打,也可能不打。

毛泽东还讲了朱元璋的故事,说朱元璋召见朱升,问他当时形势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同意,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学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时说,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他们没有一个真正裁军的,因为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和平长久不可能,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正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越到晚年,毛泽东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也越成形。

他在1974年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则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泽东在1976年2月23日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也重申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他说:“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

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在认定战争将会马上发生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中国制定了革命外交战略。它的基本内容就在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延缓战争的爆发,或通过革命来制止战争,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有这种含义。它的实质在于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同时,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独立主权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缓解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压力。

在这一时期,支持革命斗争成了毛泽东外交的主导思想,主要是出于三个考虑,一是希望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能够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减少对中国的压力;二是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和平;三是从力量对比出发。过去不怕美国发动反华战争,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而现在苏联不但不可靠,反而成了中国的另一个主要的敌人,到1969年以后甚至成了最主要的敌人,使中国对抗美国侵略战争的力量大大削弱。虽然,过去中国不怕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可能进行的侵犯,但现在毛泽东实际上担心的是中国同时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因此,在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考虑中,这一时期是把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因素来看待的。

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这一做法,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恶化了与有关国家的合法政府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还出现了输出革命的做法,在各种涉外场合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模式,给中国外交带来危害。毛泽东后来在1968年对输出中国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一些修正的意见,如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认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80、331、383、417—418、524页。

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说:“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但这些没有能够消除这种错误做法的根源。

在思想方法上,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外交思想也较多地受到了他自己革命经历的影响,实际上是把过去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战争、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和策略运用于外交领域,把广大的第三世界作为“农村”和“广大群众”,把这些国家所处的广大的地区作为中国外交安全迂回的外交战略空间,用军事战略的构思来进行外交斗争。

同时,由于感到战争的危險更加迫近更为现实,所以毛泽东在国内又把大规模的备战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远远高出了前一时期作为遏制对中国的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最主要方法和手段的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实力的任务。他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他甚至还劝法国人也搞一点“民防那一套”。

1965年4月,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起草了有关加强战备的中央文件,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绝不能不理,准备随时与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还要准备对付把战争引到中国国土上来,所以要加强战备。要估计敌人可能冒险。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对付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础,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国的土地上作战。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中、大打,都要做好准备。4月14日,这个指示以中发65208号文件的形式下发。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全面进行了战备工作,各地大建防空洞和各种备战设施,对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一个重大失误。

从7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对这一战略进行修正,避免两线受敌,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7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9页。



而且也改正了因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与各国政府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形,与各国当权者开始进行更多的接触,并得出一个结论,即要解决问题,光靠人民战争不行,还要靠各国的统治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了与美国政府的接触。这意味着毛泽东放弃通过广泛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来改善中国国际安全的做法,改为更为正规的外交斗争和外交方法。

## 二、周恩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 1. 对战争危险的分析

周恩来在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分析上,总的来说是受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但也表现出自己分析的独特性。

1950年3月,周恩来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作了判断,得出了战争打不起来,人民有力量制止战争的结论。他指出,“战争究竟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呢?今天的世界形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对比。八万万人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在帝国主义一边,“美帝国主义最希望的是别的国家替它打。但是,今天的欧洲人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欧洲是工业发达地区,打烂了不容易恢复。……在东方,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要控制日本。”但日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至于美国本国的人民,也不想打仗,“要本国人民打先锋,这就要危害美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因为从美国人民来说,打仗将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大量财产遭受损失,这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怕战争,都主张为了和平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以制止侵略战争,但两人的思想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毛泽东在反对战争时,更多的是表现在从战略上对战争的藐视,甚至极而言之,从最坏处着想,认为即使是核战争也不能毁灭人类。这种说法只

是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周恩来则认为，必须高度重视战争可能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所以必须尽量避免战争。周恩来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要侵犯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出来打大战，准备核战争呢？如果爆发核战争，将无前后方的区别，双方都将遭受损失，几十年的建设将遭到破坏。这一点，美国人民以及不少资本家甚至垄断资本家都是了解的，都认为核战争是一种冒险。因为资本家第一需要劳动力，第二需要市场，如果打起核战争，人口损失一半，市场也因之缩小一半，资本家将失去剥削的对象，无从再获取巨额利润”。

周恩来把高举和平的旗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他指出，“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和平更贵重的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应该支持和平中立地区的扩大，因为这个圈子扩大了，战争就不容易打起来。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我们的回答是，要和平，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搞对立的军事集团”。

周恩来对北约进行了抨击，因为它是一个排斥性的有针对性的军事集团，而“和平是集体的事情，不应该排斥任何人”。

1957年初，周恩来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和平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战争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孤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可以争取得到的。

对于帝国主义的战略意向，周恩来也认为要有正确分析。1961年9月，他根据毛泽东50年代初的一个讲话的观点，在分析当时的世界局势时认为，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的一个基本道理，还在于从军事战略来看，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还是处于战略防御状态，无论是马尼拉条约，中央条约组织，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防御性质的，当然，说它们是防御性，不排除它们可能冒险。

关于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观点，周恩来的看法与毛泽东

---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06页。

《周恩来传》，第304页。

的也是有所不同的。1970年5月,毛泽东发表声明,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时却指出,虽然25年来局部战争不断,但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原因之一的确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一场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害怕打。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夺核优势,越争取开支就越大”。周恩来分析说,战争扩大不一定是世界大战,原因是大国不敢发动核战争。与毛泽东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要用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不同的另一个地方是,周恩来强调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并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对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周恩来也作了较缓和的解释,他说革命不一定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战争,夺取政权,更主要的是民族独立运动,如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甚至捍卫二百海里领海线捕鱼权的斗争,也具有革命的意义,而且是更主要的。因此,周恩来的结论也是与毛泽东大不同的,毛泽东强调世界形势的紧张,而周恩来则认为,“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

## 2. 关于世界和平力量能够防止核战争的思想

周恩来对核战争的恐怖也有极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认为要正视核武器带给人类的巨大危险,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类防止和制止核战争的能力和智慧,没有必要对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也没有必要为人类的前途过分悲观。1963年7月,周恩来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秘书匈曼和普特尔就核战争与人类的前途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匈曼向周恩来转交了罗素的新书《非武装的胜利》,并说,这本书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以来,人类就尽一切力量做愚蠢的事,最后有核爆炸,表示人类将以此告终。周恩来说,太悲观了,我看人类历史不会走这样的路。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道路。我们看来,人类历史会前进,人类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并且还会得到更大的范围的发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51、152、224、318、465—466、467—468页。

展。

匈曼认为,人们很担心的是,核战争很可能会被雷达的错误情报所引起,因为雷达是分辨不出敌视和自然现象的。人们必须在1分钟至15分钟内作出决定。同时,国际局势也很紧张,国家领导人可能经不住这样的紧张,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可能引起核战争。

周恩来不同意,说人们在偶然现象损害力小时,注意力就小,但知道偶然现象的损害力大时,注意力就大。人们现在知道核战争的毁灭性,对它的保险和防御就要注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知道核武器会伤人,也会伤自己,所以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同意不用核武器,我们认为,拥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破坏力,就会找预防的办法。世界科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的,一种新武器发明了,就会有一种更新的东西来保证它不出乱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拥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危害性,最后就可以达成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这些思想反映出周恩来对人类的理智和社会进步抱有坚定的信念。

周恩来对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在国内建设的思路有所不同。周恩来在1956年时就提出,要以今后主要是和平时代为依据来安排国内的经济建设,要减少国防工业的比重。周恩来认为,战争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一种较次要的可能性,因此他“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允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如果“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

### 三、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64—365页。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 1.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有许多战略思想,“中国同任何国家关系都是从战略出发的”。但这些战略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有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区分。

外交总战略或全球战略,是邓小平战略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最具有全球性质的长期和基本的战略。

那么,什么是邓小平的外交总战略和全球战略?邓小平曾经有不同的表述。

在 70 年代中期,邓小平首先把中美两国关系这样的政治问题视为全球战略。他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所谓政治问题,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这里邓小平明确地使用了全球战略这一概念。什么是全球战略?这还取决于对当时的主要大国的全球战略的分析。到 80 年代初,苏联的进攻咄咄逼人,所以邓小平首先指出,苏联有一个争霸全球的世界战略,认定“苏联要争霸全球的长远战略目标是既定的、决不会放弃的。它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一有机会,就可以马上下来。对苏联的长远战略目标,大家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挫败它的争霸世界的战略部署”。针对这样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把团结一切力量反对苏联的争霸战略作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全球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从全球战略出发,不但提倡欧洲和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加强协调行动,而且主张日本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历来对美国人也说,对日本人也说,日本应该第一是同美国的关系,第二是同中国的关系,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又说,“中国总是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个全球战略出发考虑问题的。中国同东盟、同日本、同美国和西欧发展关系,都是从这个全球战略出发的”。

---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42 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148、222、234、235 页。

邓小平也常用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概念来代替中国的外交总战略或全球战略这样的概念。但不同时期,邓小平所指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容是不同的。如1980年5月12日,邓小平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三句话: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5月29日又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针对霸权主义,力求日中美欧第三世界联合;10月17日邓小平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概括为中国的对外政策,这里的对外政策,就有中国的全球战略的含义。邓小平后来又在多处表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同内容。

(1) 1982年8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1989年时邓小平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邓小平在1984年时也曾把这三句话合成两句:一、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将来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这些表述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作为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2) 邓小平在1984—1986年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表述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 邓小平的第三种表述是在1985年提出的,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

(4) 第四种表述是邓小平在1986—1987年时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5) 1990年3月,邓小平对此又提出了新概括:“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27、228、233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

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在所有这些表述中,虽然都有强调和平的共同点,但又各有侧重,反映了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的变化。总起来说,笔者认为邓小平最后一种表述更为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的外交总战略的性质。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在一起。所以,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它们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具有纲领性质,是总政策,基本政策,在中国当代的外交战略体系中,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将处于支配、制约其他战略的地位,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中国的外交走向,其他战略不论如何变化,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首先要根据对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来制定。如果认为国际形势处于战争时代,随时可能发生大的战争,特别是会发生针对本国的战争,那么很显然,进行战争准备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和竞争的时代,如果判断资本主义将很快灭亡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那么很显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任务就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并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的到来作准备。对大形势和大趋势的判断失误,会对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重大的灾难性影响。因此,对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判断,历来是外交战略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在 1978 年之前,人们关于时代的特征受到了传统的时代观的深刻影响,这一时代观的主要内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它是腐朽的、没落的、行将灭亡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另外,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和最大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世界各国人民起来进行革命。简言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9、56、105、116、126、156、105、156、162、233、353 页。

但实际上,这种时代观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是不完全符合的。资本主义虽然面临种种危机,但仍然在继续发展,新的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相反,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面临着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任务,不存在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形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同时,在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前景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相互妥协的一面,世界战争难以打起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观。它是对当代世界局势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邓小平早在 1982 年 10 月就使用了“南北问题”这一概念,把发展——南北问题与和平——东西问题并列,这一观察问题的视野是过去没有过的,它超越了过去把战争与和平看得最为重要的观念。

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对此问题的表述是有变化的。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用和平问题与南北问题来概括世界形势,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邓小平认为,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南北问题,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极其重大,这是世界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邓小平在 1985 年 3 月又以和平与发展的提法代替了和平与南北问题的提法。他指出,看问题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政治角度,就是和平与战争问题,一个经济角度,就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把它们叫做世界上带有全球性战略问题,并且总结到: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其中,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指出,“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1990 年 3 月,邓小平在讲到国际形势问题时再次指出,和平与



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 2. 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

邓小平的和平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三个意义:

第一,邓小平的和平概念是指对世界形势发展大趋势的基本判断。作为形势判断意义上的和平概念,着眼于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导致的国际战争与和平的变化。邓小平所说的和平是针对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提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在和平环境中,世界各国有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而各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增强和平的物质基础。和平环境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新的趋势,所有国家都希望发展,许多国家的发展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大增强,同时也大大改变了过去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关系,使世界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的重大变化。对世界形势大趋势的判断是和平还是战争,这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前提,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执行什么样的国策:是准备战争,反击外国的侵略,还是立足于战争可以避免,立足于加强国防,但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平建设。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对外战略。

第二,邓小平的和平概念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对外战略,即将维护和平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和长期的任务。和平既是一种大趋势,又是中国要争取的一个战略目标,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作为和平战略的和平,着眼于“维护”两字,它的主要内容是要以把握世界各国的和平与战争的力量对比为基础,争取和扩大和平力量,反对和防范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和平战略要求分清哪些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哪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哪些是阻碍和平的主要力量。和平战略还要求确定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目标。

第三,邓小平的和平概念也是中国外交的始终如一的和永远的目标,是一种理想,它最终要体现在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上。

和平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和平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要求和平。邓小平在 1986 年指出,发展与和平是互相关联的,第三世界越发展,和平就越有希望,反过来说,只有保持一种国际和平环境,才能赢得国家的发展,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建设国家,二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邓小平又指出,“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中国的政策……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主要任务”。

可见,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和平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支撑邓小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柱。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是在超越过去的和平与战争的主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邓小平又是什么样的考虑呢?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准确判断并科学考察和分析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基础上的。

讲和平与战争,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也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邓小平最初提出“和平问题”是从核战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着眼的。邓小平认为,“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但邓小平更多更主要的是从常规战争角度来谈和平问题的。

70 年代末期以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受到毛泽东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观点的影响。虽然毛泽东也认为世界战争不一定打得起来,世界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可以阻止战争,但在指导中国外交和国内建设时,却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备战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322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86—387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250 页;同前书第 2 卷,第 77—78、241 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邓小平在1977年指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希望战争晚一点来,我们总要准备它早来,来凶的,准备它早打,大打。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分析国际形势时还认为,苏联全球战略没有准备好,美国处于防守状态,所以世界战争可以延缓爆发,可以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但仗总有一天要打起来。

1978年后,邓小平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了新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结论。

邓小平认为,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但不能说有多么严重。80年代初期前,邓小平的思想是:战争不可避免,但通过各国人民的努力是可以延缓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是可能的。邓小平认为,虽然国际形势很复杂,非常动荡,充满危机,但延缓战争,争取和平时间更长一点,这是可能的。这一观点还多少受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但邓小平的分析也与毛泽东的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毛泽东的分析把战争危险看成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危险,主要是从反对战争的力量的发展来讲阻止战争的爆发的,主要是从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在高涨,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已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来看问题的。

而邓小平的分析侧重于两个方面,除了毛泽东所讲的那一方面的因素外,邓小平还从谁能发动世界战争的角度来分析。他认为,只有美国、苏联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但这两个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谁也没有准备好,它们的全球战争部署都没有到位,所以世界大战的危险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而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再有,毛泽东的战争打不起来是建立在各国人民反战的基础上,同时他也要求中国采取实际的备战措施。但邓小平认为,战争既然没有现实危险,就可以不进行大规模的备战,中国可以减少军费开支。1980年3月,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邓小平在1982年8月表示,中国必须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至少20年不打仗,希望最好有50—70年的和平时间。

---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9、161页。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思想开始转变,但不稳定的,不时出现反复。1981年9月,邓小平在检阅部队时的一段讲话表明,邓小平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思维。在他看来,战争威胁还是严重的,因为超级大国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和我国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邓小平看来,战争的因素还在增长,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中国要防备有人把战争强加于中国。

从1984年11月起,邓小平的思想就开始变为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和平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因素,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泽东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把他自己对世界形势所作的新判断作了一个总结,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

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到1989年,形势更加明朗,邓小平也因此进一步认为,“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邓小平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和结论,为中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提供了正确的依据。它首先导致中国扭转了过去实行的半军事经济体制的战略,使国内经济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其次,中国在1985年6月宣布裁军100万,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实行和平外交的决心。

总结起来,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思想,是基于四点考虑:第一,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打世界大战,但这两个超级大国谁也没有部署好,战争没有现实威胁;第二,现代战争是核战争,它可以使双方同时毁灭,没有胜利者,美国和苏联都相互拥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谁也不会先动手。第三,世界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反对战争的力量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加。反对战争的,不仅有中国,第三世界各国,还包括欧洲和日本,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让世界各国都面临压力,要求把发展经济和科技放在首位,准备战争和发展军事与这一大趋势不符合,也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就国际形势方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关于正确对待和平演变问题。这个问题与战争问题一样,也是事关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的一个大前提:如果把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看成是一个很现实和很危险的问题,那么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一个样;而如果认为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的问题,那么采取的对策又是另一个样。

和平演变是一个早就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就已多次讲过。

毛泽东为反对和平演变,防止中国变修,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路,使中国经历了一场大灾难。所以,中国在新的时期里如何看待和平演变问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的基本走向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时,对和平演变也是高度重视的,甚至一度有失望情绪。邓小平在1989年11月与尼雷尔会谈时指出,“美苏双方会谈,裁军的势头不错,我们表示欢迎。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邓小平把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看得较为严重,把它作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基本态势。

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没有改变过去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他认为,不管西方国家是否进行针对中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针对中国进行新的和平演变的攻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能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不能变。邓小平告诉外国客人说,“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这一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第二,和平与战争的核心问题是反对霸权主义。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过的观点,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在于搞霸权主义的国家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不仅世界大战的主要威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且许多地区战争、局部战争也是源于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些地区的争夺。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

在过去,霸权主义表现为对弱小国家的直接干涉和控制,但在新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为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并以人权为借口,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试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国家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所以,正如过去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侵略控制一样,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新的霸权主义行为,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论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面对西方的压力,中国要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

以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是新时期西方国家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新形式,其实质和过去一样,也是“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西方国家以人权损害别国的国权,就是对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一种损害。“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

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所以“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为了维护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第三,中国要和平但并不怕霸权国家的战争威胁,为了和平必须进行裁军。

邓小平早在1964年就曾指出,世界上有些人说我们好战,是好战分子,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有和平的环境来改善我们的国家面貌,在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要花几十年时间,既然我们面临这样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和平不是更好吗?当然我们中国人民有这样一点,谁要是用战争来威胁我们,我们不怕。美国就一直用战争来威胁我们,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原子弹是吓人的,但总拿它来吓人,是吓不倒人的。1973年在与英国客人会谈时,邓小平又指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来自北方,这个历史很长,苏联把百万大军放到我们的边界上,我们并不怕,中国对于来自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的态度是两条,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和加强自己的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

由于对战争形势的判断的变化,邓小平在裁军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

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苏美的裁军和缓和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不彻底,欺骗性很大。在苏联和美国没有进行彻底的核裁军以前,邓小平对建设无核区并不持太肯定的态度。1975年邓小平在重申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主张各国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立场后,表示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不如中国的两条,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反对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344—345、348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20页。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7、75、159页。



美国和苏联继续搞军备竞赛上面。对于苏联主张的欧安会,邓小平认为赫尔辛基协议只是达成纸面协议,其真正作用在于掩盖苏联扩军备战,欺骗世界和欧洲人民,达到分化和控制欧洲国家的目的。到1985年,邓小平对美国苏联裁军开始持较积极的立场,认为美苏就裁军达成协议,可以起到缓和的作用,改变了过去所持的态度。在谈到美苏首脑会谈时,邓小平也表示欢迎,虽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认为减少一些核武器总是好的,当然最好是两家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这才能让世界人民放心。

在对和平与战争的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后,邓小平下定决心,作出了中国也要裁军的决策,在1985年6月4日宣布中国裁军100万,表明中国不参与军备竞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 3. 关于“发展”的概念

与和平的概念一样,“发展”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的发展概念包括三层含义:发展是一种世界大趋势;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既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独立发展的问題,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发展也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首先,发展是与和平密不可分的世界形势的大趋势。

说发展是二战后出现的世界大趋势,有一个问题与此相连,就是过去人类世界也有发展,能不能用发展两字来概括过去的世界的大趋势?这里涉及到现在的发展与过去的发展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二战后的发展大趋势与过去人类世界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发展的主要不同在于,第一,动力不同。二战后的发展是以新科技浪潮为动力的,尽管过去人类世界也有过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但无论从其深度还是广度,以及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上,它们都不能与今天的世界性新科技浪潮相比。第二,现在的发展是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的大趋势,把世界所有各国都卷进去了,而过去的发展主要是地区性的,主要在欧洲和亚非拉的个别国家。第三,过去的发展导致两个结

果,一个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富,而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却越来越贫穷,另一个结果是,过去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军事力量的发展超过经济力量的发展,在一些强国之间和另一些强国之间不断产生战争,并由此引发了两次人类的大灾难。所以,在过去,人们谈到发展时,总会想起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现象,而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并超过过去的发达国家和强国时,就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新的冲突,那时战争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因此,发展与战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邓小平不强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与战争的联系,而强调发展就一定会减少战争的危险?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用另一种新的思维来看问题。邓小平认为,第一,所有国家都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失去优势,就会变成落后。这会使所有国家都来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外政策,并把和平放在首位,其中也包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经济发展将会超过军备竞赛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这样,“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第二,发展的趋势对第三世界和欧洲、中国有利。发展的趋势将会减少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而中国、欧洲、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增强,“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所以,只是到了二战后,发展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时才显得更为明显,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逐渐都把发展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其次,邓小平的发展概念还涉及怎样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的分析包括四个层面：

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的问題。原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继续发展,这就有一个资本找出路,贸易找市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发展总是要受限制的。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南北关系问题。发达国家要解决继续发展的问題,就必须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二种,富国越富,贫国越贫,解决这一个两极分化是国际社会一个重大问题,但解决起来也难。要富国多拿出钱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南北问题的表面现象是南北贫富悬殊太大,但它的实质却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邓小平认为,南北关系的实质问题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的问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个关系使得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发达国家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所以邓小平认为,在解决南北问题上,“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应当的。但要做到这点不容易,因为人越富,越吝啬,要他让一点,他不肯。

但要实现发展又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因为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发展中国家占了四分之三,前者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后者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而且,在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下,发展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不大容易,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邓小平的观点是:“第三世界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

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讲了多年的南北问题,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并且越来越大,邓小平对此经常感到很担心,因此多次把这个问题作为发展的重点来讲。他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在谈到南北合作时,邓小平也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与西方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合作的同时又必须进行斗争,“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与北方国家合作和与北方国家斗争,这两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不能偏向哪一个方面。

第三个层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要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好自己问题,不能把希望完全放在发达国家身上,“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邓小平认为,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邓小平指出,“要发展自己就需要加强相互谅解和相互合作。对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惟一的出路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8、28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20、56、106页。

.....我们发现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我们相互变成对方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在很多方面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彼此都有好处。甚至在技术方面,也不能说我们全都落后,我们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时,还必须注意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要注意发展的实际效果。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政策。只要政策符合实际情况,经济发展就可以快一些”,但经济发展也可以不那么急,“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调整经济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

此外,邓小平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科技力量要发展,“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钱就要花。.....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发展的第四个层面是南南合作,也就是发展中国家要进行集体自力更生。邓小平在1982年时曾高度赞扬南南合作这一提法,认为这是个新提法,“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因为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这是两条腿走路。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但同时也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国家的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邓小平认为,过去南南国家都是落后的,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得较好,因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特别是60—80年代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1、238、346、387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以来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发展,有东西可以交流合作。这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

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减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邓小平特别提到,像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进行合作:“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1、211—212、215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3—184、20、56、282页。



## 第三章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新中国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重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和更加和平的世界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多极化的思想,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不断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 1. 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四项原则到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党,制定处理对外事务和对外关系原则的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对外事务和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利益原则高于一切,国家利益甚至也高于党的原则,不能从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毛泽东在 1936 年 7 月 23 日与斯诺谈话时,第一次谈到了党与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同和区别,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活动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外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但又带有外交的性质,正如 1944 年 8 月 18 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外交工

---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 561 页。



作的文件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外交往来还须经过它的承认,而国民党政府是不愿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力争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禁令和约束,争取开展独立的外交。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都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办外交要首先站稳民族立场。

1945年,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由此提出了独立、平等、互利等原则。

1949年1月,毛泽东又把不干涉内政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原则提了出来。他指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949年4月,在英国军舰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把前面提到的三个原则,作为新中国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三个原则,“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包含有和平共处原则思想萌芽的讲话。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新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

---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6页。

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但这里指的是与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还未提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在 1954 年 8 月,这是在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毛泽东在回答英国工党代表团提出的中国与西方国家能否和平共处的问题时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稍后,在 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把这一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基本准则。这首先是指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其次是指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平共处。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国家,是否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指出,这一时期,这个所有国家实际上不包括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及阵营的关系还是一种特殊关系,意识形态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 1957 年 9 月,毛泽东还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分为三层,“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显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了,因为毛泽东在谈到五项原则之中的平等互利时,深有感触地提到了过去的经验和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9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60—16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88 页。

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这里显然是有所指的。

平等互利这条原则,毛泽东认为它首先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国家大小只是形式”。要做到大小国地位平等,大国应当采取主动,对“小国的地位也应尊重”,应把小国的代表团“当作大国的使者来欢迎”。在毛泽东看来,大国小国都只是相对的,大国往往是由许多小国组织成的,中国在古代就是由一万个左右的小国组成,后来变成八百个小国,以后又变成七个小国,最后才统一成大国,中国在柬埔寨老挝等国面前是个大国,而在美国苏联面前,“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日本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

毛泽东还对什么是不干涉内政作了解释。“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1—19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4、521页。

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在与老挝客人会见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里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

互不干涉内政也包括不对外输出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

毛泽东还将邀请外国政府派军队和专家来本国,与干涉内政作了原则区分。他认为,“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

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应该长期实行的外交方针和原则,不是权宜之计。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他还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1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6—187页。

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

## 2. 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发展

周恩来不仅协助毛泽东提出和创立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在这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巨大的贡献。

1950年2月,周恩来在与苏联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就提出了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的思想,并在条约中第5条体现出来。这一条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就西藏问题进行会谈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后来写进了中印与中缅的联合声明中,这一提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和认可,逐渐形成成为新中国指导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周恩来对制定这一原则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国庆讲话中,又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后来,周恩来又在实践中深化了和平共处原则的内涵。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前四条,是基本的准则,和平共处是这四条原则实现的结果,也是这四条原则要争取实现的一个目标。只有实现前四条才能有和平共处。什么是和平共处?周恩来解释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事实。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可以和平共处。譬如英国有国王,这是英国人的事,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的事,英国也不应干涉。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社会制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6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3页。

度不同并不妨碍和平共处。

对于不干涉内政,周恩来也有过一些解释,他说,这种不干涉内政,不仅是指别国日常的事务不应干涉,而且包括这个国家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譬如发生政权更迭,只要没有外国干涉,那么在中国看来,这就是属于内政的范围,外国不应进行干涉。他指出,对别国政权的更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选举组成新的政府,另一种是武装政变,只要不是外国干涉,不管我们同过去政府的关系怎样,也只能尊重他们本国的行动,所以即使是武装政变,我们也都不能干涉它们的内政。

平等相处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要平等地同中小国家打交道。1971年12月,周恩来对挪威大使说,我们准备在瑞典办博览会,原来不准备去挪威,后来挪威提意见,要求也去挪威办展览,我们就接受了,并且对挪威大使说,“凡是合理的事情,不管哪一个国家提出来的,我们都接受,这才叫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然叫什么平等!国与国之间应该平等相处,这样才可以互相商量,交换意见,以为只有一方的意见对,另一方的意见是错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互相交换意见,才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才能在国际创造出一些好的气氛,否则,只是一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是要不得的”。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不仅把五项原则用于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且还逐渐地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要求苏联用五项原则精神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不断坚持下,苏联逐渐也接受了一些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在1957年3月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中,团结和互助一向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但是,正由于这种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还缺乏充分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中还不能说一切都是完满的,正常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的大国主义倾向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都曾经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解。现在,这些缺点和错误正在克服当中。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宣言,表示要根据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69、465、616页。

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项原则,发展和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声明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主要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尤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主张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我们知道,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就意味着这些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和平竞赛。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敢于进行这种和平竞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向外扩张,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主张由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愿意同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保证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它提出了正确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问题,这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中国与自己周边的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能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它不仅着眼于维护不同国家之间的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为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交流提供了原则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独立国家搞好关系是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一个重大发展,但它更重要的内涵在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吸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引进技术等有很重要的意义。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共处,则是周恩来对这一思想的直接的具体的贡献。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95页;苏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初探》,《研究周恩来》,第157—169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97页。

2.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五项原则是周恩来的又一重大的理论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适用五项基本原则,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五项原则与国际主义准则是一个什么关系。周恩来对此提出了这两条原则并行,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的双重基础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它们的关系是以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但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以独立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这一观点对当时存在的国际主义准则高于一切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一直被视为神圣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似乎都只能是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曾经说过,对无产阶级来说,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经常发生一些国家借口国际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事情,使得这些国家不能按照自己国家的国情和特点来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在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适用双重基础原则的时候,也指出了过去曾经有过的错误,就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忽略民族平等原则的沙文主义的错误。

双重基础的意义还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活动分成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部分。一部分基于意识形态,即国际主义,也就是说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思考问题,执政党在这一方面起重要作用;另一个部分则基于国家利益、国家关系,即从各个民族具有特殊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国家政权在这一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在这两个部分中,周恩来的五项原则更侧重于国家关系,包含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所区分,不能以意识形态代替国家利益的思想。

1954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团会见时又进一



步提出,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开的思想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适合于不同国家的政党之间。周恩来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我们应该把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确有许多分歧。在这一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否则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了。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

因此,周恩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要考虑国际主义,也要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平等,要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应当指出,在谈到周恩来关于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来认识。必须承认无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虽然也主张平等、互利等原则,但实际上还是比较强调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等原则的,甚至可以说是把这些原则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的。如周恩来在1961年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指出,维护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兄弟国家之间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这里,周恩来是把国际主义、团结等原则放在最前面的。

3. 五项原则对于反对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五项原则的提出,最初并没有反对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含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但越到后来,越具有反对大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意义。

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特征就是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对广大中小国家、弱小国家进行侵略、欺负和干涉。而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它要求国家不分大小,不论贫富,不论意识形态,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大国不能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小国,必须尊重小国弱国的主权。只有独立,才能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共处,这也是建立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社会必备的条件。五项原则在经济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内容主要是体现于主张国与国的经济关系应该以互利为基础,应该以国家的经济主权独立为基础,不能以援助为名对中小国家和贫穷国家进行控制,不能以此要求特权,也不能以此作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五项原则不仅是对外国的,而且首先是对中国自己而言的。周恩来一再声明,中国的外交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办事,不容许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周恩来曾经指出,各国的事情各国都有自己的办法,不能把别国的办法强加于一国身上。中国有中国的办法,日本可能有日本的办法。这要由自己国家的人民来决定,别的国家不能干涉。中国有一句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愿意别人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干涉别人。

正如钱其琛同志指出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70年代末,已经有90个国家在同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和苏联实际上也承认这些原则,并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与我国改善和发展关系。

## 二、世界多极化思想的萌芽与毛泽东的世界大战略

世界多极化格局,严格地说,是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出现的,但打破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让中国、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思想,毛泽东却早就提出来了。

毛泽东的这个世界大战略思想萌起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方针,应该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已经

---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5页。

有了产生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最初的土壤。1939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该严守中立”的观点也有一些类似的含义。

毛泽东有关世界多极化的思想有两大基础,第一个基础是世界各大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和势力;第二个基础是各大国中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两个霸权国家统治世界。

### 1. 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集团

第一个思想基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有一些萌芽。他不把世界各大国,尤其是不把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成铁板一块,而是看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正是在这个国家不同、利益不同的基础之上长出了世界多极化的最初幼芽。毛泽东是较早地看到这一点的政治家之一。1940年,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日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另外还有“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这实际上是把当时世界上的各大国进行了划分,将它们划为英美、德意日及苏联三个不同的势力集团,并且制定了依靠苏联,团结英美,打击日本的策略。毛泽东为此还提出了后来在多极化时代经常为人们所运用的策略原则:“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是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国家,也可以算是一个单独的势力,实际上加上前面的三家,也就是四家。当然这时贫弱的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极,但在其中也可以见到一些多极化的雏形。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划分尤其具有意义。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集团外,毛泽东还在1939年提出过“两个世界五个集团”的划分方法。他认为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即社会主义的苏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页。

联,这是光明世界,还有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而资本主义世界又有四个集团,这就是欧洲的两个集团即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再加上在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四个集团。这四个集团又划分为帝国主义的两大阵线,即英美法阵线和德意日阵线。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吸收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意见,形成了把欧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而不把它完全看成美国的附属的思想。如毛泽东曾经很赞成当时驻英代办宦乡 1959 年 1 月 5 日给国内的报告。这个报告分析说,1958 年,英美两国相互依靠,而实际上,两国各谋扩大自己,削弱对方,经济矛盾有新的发展,会更深刻化,英法矛盾白热化,英德矛盾更尖锐,英与美法德矛盾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力量的发展和对比对社会主义有利,美国经济危机影响到西欧,竞争空前,民运发展,德国再次崛起打破了平衡。毛泽东对这种观点表示赞成,在中央文件中批示说,“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

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当时西方一些专家的有关看法。

1960 年 4 月 8 日,新华通讯社呈送毛泽东的《美报打击英国分化英法》的资料中说,美报记者提醒戴高乐将军,在访问伦敦时不要因为现在受到的热情接待而忘记第二次大战间流亡英国的待遇。另一个材料是美国《明星晚报》谈西方矛盾的文章,其中说英国反对西欧一体化并特别担心西德强大,美英关系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支持一个欧洲六国集团,而反对英国统治的外部七国集团。第三篇材料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它指出英德关系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危害,西德由于它过去的历史地理工业和无民主,可能再次成为对欧洲的威胁;共同市场是改善英德关系的主要障碍。毛泽东在看这些材料时形成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毛泽东在这些资料上批道: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25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8—29 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36、39 页。

“英法将走向合作,对抗美德,是一件大事”。在这些观点中包含着欧洲联合起来成为一极的思想的萌芽。

## 2. 反对世界霸权主义

另一个思想基础,即反对一两个世界大国称霸世界的思想,则产生较晚,严格说来,是产生在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较长时间中是把中国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是两大阵营的对立、两极对立占主导。但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并逐渐产生了反对“两大纸老虎——真老虎”称霸世界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体现在毛泽东争取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反对苏联和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可以说,毛泽东的反霸思想最早是通过做欧洲国家的工作慢慢体现出来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第一次谈到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全世界的问题。他指出,美苏两国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到处都在碰钉子,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对美国不满意,东欧国家对苏联不满意,实际上都是一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1964年1月,毛泽东已看出美国和苏联都有控制全世界的企图,指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这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大国称霸世界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欧洲应成为一极反对两霸的思想,以及中国要支持各国反对两霸统治世界的思想。

196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团时说,中国与法国虽然是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但中法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大国欺侮,不许大国控制自己,而不管这个大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思想,毛泽东鼓励法国像中国与苏联作斗争那样,起来与美国作斗争,提出法国可以与中国合作,在欧洲与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31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7页。

美国顶一顶,并希望通过法国“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法国靠拢一些,毛泽东尤其希望,法国能带头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形成反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统一阵线。毛泽东指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还引述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和法国的戴高乐将军的话说,要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毛泽东对法国在建立多极世界中的作用是情有独钟,多次提到要法国带头独立于美国,表示中国“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的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

毛泽东对欧洲与美国的同盟也持一种分析的态度,并不认为它们就是一块铁板,毛泽东指出,“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尽管中法不是同盟国,但中国与法国两国有许多共同点,谈起来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1965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稿上批示说,这个文件很好。这个文件写进了毛泽东同时反对两个霸权国家的观点,批判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批评苏联对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实行军事上的控制,把中国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指出苏联的所谓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苏共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苏联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毛泽东指出,现在美国到处霸占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0—522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毛泽东反对霸权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使其他大国找到了更多的切身利益，使它们与两个大国拉开距离；同时，这些大国本身又没有力量单独与两个大国对抗，必须与其他大国进行合作和配合。这正是以多极化反对霸权国家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在对法国客人谈话时指出，不仅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有损欧洲国家的独立性，而且苏联对欧洲也一直怀有野心，表面上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但“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这才是欧洲的真正危险。因此，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国家的斗争中，应当联合起来。这些大国真正独立，对别的国家就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特殊的联合的方式。美国也好，苏联也好，相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同时对付所有其他大国的能力。毛泽东在 1974 年 5 月和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苏联对中国和欧洲的威胁时，明确地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希思认为，苏联的实力得到增强，对欧洲形成了主要威胁，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而“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对此表示，“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毛泽东关于多极化世界的战略构思的两个思想基础，从 1939 年提出两个世界两个阵营五个集团，到 1964 年提出反对美国、苏联两个霸权国家，尽管前后相距 25 年，但却是有逻辑联系的。大国划分为不同的势力集团，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和分歧，这是世界多极化的一个基础。它必然导致一些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起来反对另一些最强大的霸权国家控制和主宰世界的企图，而在反对霸权国家的斗争中，这些大国的独立性也会随之增长，一个利益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394—395 页；第 13 册，第 180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97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02—603 页。

多元化的世界也将形成由多个国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的局面,这时候,世界的多极化时代也就到来。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达过世界多极化的概念,但在他的思想中,世界多极化的轮廓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认为,反对两霸统治世界,其目的是争取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就开始涉及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秩序的问题,当然毛泽东那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来。

### 3. 毛泽东对多极化格局的初步分析

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世界上五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而且也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在这样一个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毛泽东向基辛格说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国并不把中国看得太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优先次序,第一是苏联,第二是欧洲,第三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同样,毛泽东也把中国算在五大力量中心之内,但在这些力量中,中国只能是第五,是五个指头的小拇指。他在分析这五个力量时指出,世界上美国与苏联是超级强权国家,在五个指头中,美国是老大,其次是苏联,再次是欧洲、日本,最后才是中国。毛泽东向美国人指出,现在的多极化格局还不成形,主要是欧洲太弱,欧洲国家不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日本国内有人想搞霸权,对日本成为一极,毛泽东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是十分警惕的。基辛格虽然一再为美国将苏联列在美国外交的最优先地位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的分析。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 三、从“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的发展

#### 1.“中间地带”论的提出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论。当谈到美国是否会进行反苏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美国的确在准备反苏战争,但从当时的局势来讲,美国更主要的目标并不在于直接进攻苏联,而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其中也包括在反苏的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真正的实际目的,“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外交战略家,对国际局势有着深刻的见解。从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美国在二战后,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反对苏联扩张的口号下,发动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冷战”。它的真实意图不在于用军事手段来消灭苏联这个国家,而是防止苏联进一步越出它的势力范围向外扩张。同时,美国在冷战的口号下,实现着美国的霸权,建立起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力量,把西方国家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内。而毛泽东在这时提出的“中间地带”论,可以说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60页。

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指出美国在反苏的口号下实施其霸权计划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隐含了反对美国世界霸权以及把美国 and 苏联与其他的国家区分开来的双重意义。这在外交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实际上是把除美国 and 苏联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后来,毛泽东一直坚持这一看法。1954年,毛泽东又重新提到了它。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谈到,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这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这就是说,这里所指的中间地带,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和广大的新兴独立国家。在1946年第一次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时,毛泽东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包括在中间地带中的。1955年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毛泽东一再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主要目标是为了占领中间地带,不一定是为了要打仗。他在1958年指出,美国到处驻兵,在亚非拉欧四洲都有军队,“这么几个兵,分得这样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这时候,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美国霸权,二是把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争取到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来,这

---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59—160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0页。

也是中间地带论的一个主要目的,三是表明对战争的看法,认为美国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马上发动反苏战争,因此世界战争不会打起来,四是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包括在中间地带之中,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是在中间地带之外的。

## 2. 两个“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论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1962年,当时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毛泽东在把日本和西德这些地方都称做中间地带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这其中的重大变化在于把中间地带中的西方国家与二战后出现的新兴独立国家区分开来,这是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向第三世界思想转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963—1964年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中间地带有两个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东欧的问题,说“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未把东欧与苏联放在一起,未把中国与苏联放在一起,反而认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实际上已经开始把美国、苏联放在一起。这样,三个世界在这里已经有了它的最初的雏形。毛泽东还进一步总结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

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 3.“第三世界”概念的最初含义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与一批美国老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可以看出,这里的两个“第三世界”概念,是直接由“两个中间地带”概念演化过来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进一步把东欧国家与苏联区别开来,正如过去把西欧国家与美国区别开来一样,尤其是把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古巴也同他吵。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还把中国与苏联的分歧透露给了那些外国客人。稍后,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与法国一样,在反对大国控制上有共同点,他在与法国客人会见时说,中法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都是不允许的”。毛泽东还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也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能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但在与法国议员团的谈话中,毛泽东了解到,法国人讲的“第三世界”与他提出的不一样,因为法国强调的是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第三世界中不包括法国和发达的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8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5—51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0—522页。

西方国家。这对毛泽东后来修正他自己提出的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理论有较大影响。

在 1965 年到 70 年代初,毛泽东对外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支持新兴独立国家的正义斗争。他多次发表谈话,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斗争给予声援。在这样的活动中,毛泽东感受到了新兴独立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重大差距,这也是他对中间地带论和第三世界理论进行重大改变的一个直接因素。

当然,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期就已经很重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了,把它们视为中国争取在国际社会中提高自己声望的一支重要可依赖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多次讲过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毛泽东一再鼓励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不要受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指出,“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但它们到处侵略占领,它们实际上是野蛮的,“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所以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应当在人民中进行教育,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毛泽东鼓励它们说,“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发展中国家必须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在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时,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搞好自己的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在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要害怕帝国主义。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将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共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47 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19—32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38—339 页。

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有与毛泽东同样的思想。1957年周恩来在总结自己出访亚洲8国的情况时说：“亚洲和非洲正在觉醒和复兴。独立了的和正在争取独立的亚非国家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和平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万隆会议第一次证明了这个力量的存在，埃及事件又更加明显地证明了这个力量的发展。亚非人民自己掌握亚非地区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特征”。

到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支持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的立场更加坚定。1964年6月，毛泽东指出，“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反对外来干涉”。毛泽东认为独立的主要内容是要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要争取在几十年时间中将经济搞上去，赶上西方国家。到1970年，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客人会见时，第一次将西方国家排除在第三世界的概念之外，指出“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而这里的帝国主义，不仅指美国，也指英国等西方国家。

#### 4.“第三世界”概念的新发展

在中国反对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与控制的斗争中，毛泽东发现，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中国应当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1973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与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会谈中提出，“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毛泽东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总统会见时的对话更是表明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

毛：两个超级大国有点怕第三世界。

---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03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4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6页。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7页。

尼：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它们就不会怕。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

毛：那不能这样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为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必要的援助，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早在1956年，中国刚刚走上经济建设的正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毛泽东就指示，要尽可能地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及客人说，“中国也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中国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当然，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不可能给予发展中国家较多的经济援助，所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还是以道义声援为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是支持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援助”。

1974年，毛泽东正式完成了其从中间地带论向第三世界论的转变，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从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两个理论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但

---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52、379、38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3、558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又有重大的不同:

从总体来看,中间地带论主要是反对美国的霸权,强调争取西方国家,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第三世界论则意在反对美苏两霸,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反对美苏两霸的主力军,把西方国家作为争取的对象,目的在于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利益和地位。

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来看,在中间地带论中,美国是主要敌人,苏联是反对美国的最主要力量,二者是对立的,起的作用是相反的,苏联的利益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利益是有重大的一致之处的;而在第三世界论中,美国与苏联虽然仍是对立关系,但二者都是试图控制别国的霸权国家,因而二者都是其他国家反对的对象。两个理论的变化中,苏联的地位和作用变化最大,从过去的正面国家,变为负面国家,从世界反美国家的头号领导国变为与美国同样的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的国家。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有重大变化。在中间地带论中,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同一条线上,但发达国家是重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在第三世界论中,这两部分国家已经分成了两个单独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而且作为第三世界主体的亚非拉新兴国家是反对美苏两霸的主力,西方国家则处于较次要的地位,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既有矛盾也有共同之处。

在思想方法上,中间地带论还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了美国和中间地带中的法国、英国、德国等,但又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而在第三世界论中,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作为观察国际格局的出发点。

中国在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两个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在刚提出中间地带论时,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是中间地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中国建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部分,不属于中间地带。在第三世界论中,中国是作为第三世界中一个重要成员,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一起,共同组成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统一阵线。



应当指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是西方人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

有人认为,一些法国学者如艾尔弗雷德·索维 1956 年在其《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文中说:“我们常说有两个对抗世界(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世界),常说它们可能会发生战事或能够相互依存等,却常常忘记还有一个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像第三等级一样遭到忽视剥削。”由此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

还有人认为,1955 年印尼万隆会议时,法国报纸就引用了第三世界一词。60 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条目。1964 年英国学者 P·沃斯林还出版了《第三世界》一书,是最早的专著。最早从世界战略来看这一概念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他说,今后的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苏联世界的竞争将压倒一切,法国必须在这两大世界之外的世界里占据领导地位。到了 50 年代,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以法国为领导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并连结大西洋彼岸的统一的革新的拉丁世界,使之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虽然这不是现在的第三世界,但开创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先河。1960 年 3 月,戴高乐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又说:“巴黎政府以及国家的一部分收入支援第三世界,相对地说,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支援的数目都大”。这里提到的“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国家。他在对外活动也很重视第三世界的国家,先后出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既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又促进了第三世界这个新词的流行。所以,在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论时,这个概念已流行了十多年了。

但实际上,从前述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的变化和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第三世界论的形成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有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绝对不是因为法国人讲了之后才产生了第三世界的

---

参见扬铮文:《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3 期;《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6 期。

转引自《戴高乐言论集》,第 231 页;《战争回忆录》第 3 卷,第 202—174 页;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41、271、273 页。

参见罗时平、朱维红:《关于第三世界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的考释》,《晋阳学刊》,1991 年第 5 期。

理论。在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中,已经有第三世界思想的萌芽。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50—60年代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及其在国际舞台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这一客观现象,也才越来越引起世界政治家们的重视。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主要是通过自己长期以来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毛泽东1946年提出了美国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在中间有一个辽阔地带,提出了中间地带论。他在1962年提出了中间地带国家性质各有不同的观点,1963年又明确提出有两种性质的中间地带,1964年提出第三世界概念取代中间地带的概念,1970年再进一步把西方国家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分出去,直至最后完成第三世界概念的表述。可以说,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有自己明显的发展轨迹。毛泽东第三世界论的发展过程虽然也受了外来思想的影响,但有很强的独立性。

从内容上来看,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与当时流行的第三世界的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1) 对世界的划分不同。1969年法国的《小拉卢斯辞典》说,第三世界是所有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不属于自由经济工业化国家,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1975年美国的《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认为,第三世界是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不同于美国、苏联;1985年英国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指出,第一世界是自由经济国家,第二世界为中央计划国家,不发达的自由市场国家为第三世界。苏联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世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而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则将美国和苏联作为第一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其余为第三世界。

(2) 对第三世界看法不同。西方把第三世界视为贫穷、疾病、战争、经济不发达的同义词,而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把第三世界作为反对美苏两个霸权国家的主力军,是革命动力,对国际关系有深刻影响。

(3) 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同。人们一般都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作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东西方矛盾为主要矛盾,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超越意识形态,把全世

界人民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视为主要矛盾,在这一斗争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第三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所需争取的对象。

#### 四、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思想

##### 1. 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的提出

早在 50 年代中期,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束缚后,很快意识到,一个国家要想独立,必须要发展民族经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巩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就必须打破原来的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导的、对亚非拉国家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一旧秩序已经成为新兴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严重的阻碍。正因为如此,在 1954 年的亚非会议上,新兴的亚非独立国家就国际贸易条件、原料价格、技术转让和金融机构等涉及自己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对旧有的体系进行改革的建议。随后,1964 年亚非拉国家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第一次会议上组成了 77 国集团,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拉开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序幕。1973 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其《经济宣言》中,第一次使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1974 年 5 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文件,同年 12 月,联合国第 29 届大会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1979 年 2 月,发展中国家又通过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这样,发展中国家首先在 60—70 年代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独特的作用。中国一方面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一员,也尽可能地对一些亚非国家提供援助。

周恩来作为这一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制定了中国援外工作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中,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的和平外交哲学,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包含着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性主张。

周恩来在 1957 年初指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我们同任何国家的经济合作或者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援助都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并不排斥这些国家同任何别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或者接受任何别的国家的经济援助。我们愿意看到,一切对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援助都不附带任何条件,真正是为了帮助不发达的国家得到独立发展”。

在周恩来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义务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1963 年 8 月,当索马里总理就中国的援助向周恩来表示感谢时,周恩来说:“不要感谢了,这是我们的义务,谁叫我们先胜利,谁叫我们是大国呢?先胜利的大国就有义务援助后胜利的小国,世界上有人说,我们只同贫穷的小国做朋友。这正是中国的特点,我们是大国,不能依靠人家援助,别人也援助不起,大国主要靠自己;而大国应该援助小国,使它们也能逐步靠自己。我们最高兴与贫穷小国交朋友。世界上小国有 130—140 个,是多数;大国有几个?大国要垄断一切是不可能的。”

1964 年 1 月,周恩来又提出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

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周恩来把是否控制受援国看成是区分真正援助这些国家,还是搞殖民主义的标准。他在与瑞典大使布克会谈时指出,是不是殖民主义的援助的分界线,第一要看是否要求特权控制;第二要看是真正帮助别人建立独立的经济,还是使别人永远依赖下去,只限于为他们提供原料和进行一些加工;第三要看是真正帮助别人投资后很快投入生产,还是在很长时间建设不起来,很大部分的投资、贷款花在他们的技术人员身上。

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权平等、互助互利、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和发展经济等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不仅一再宣布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任何措施,而且还表示,“不容许自己的后代走殖民主义的道路,中国强大了以后,也要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

周恩来提出的这些原则为邓小平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思想提供了素材。同时,邓小平也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在1974年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时,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坚决

---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4、388—389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67页。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06—307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9、314—315、179—180页。

支持建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立场。

到 1988 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苏联实行改革,与西方国家搞缓和,东西方关系大大改善。同时国际关系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想垄断世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国际上的许多问题都有待国际社会的合作来解决。国际社会应当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建立这样一个合作机制,这就成了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条件下,不仅提出了要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而且还认为,光有经济方面的国际新秩序还不够,还必须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两者应当联系起来,由此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在 1988 年 9 月与斯里兰卡总理会见时,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1988 年 12 月 21 日在与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晤时,邓小平又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世界总的形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 1974 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提”。1989 年 10 月,邓小平又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邓小平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的两个最根本的任务之一,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13 页。

## 2. 多极化是建立新秩序的政治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建立在多极格局之上,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社会。用多极化反对超级大国的世界霸权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主张。

邓小平在 1990 年 3 月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包含着以下内容:

第一,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发展的大趋势。

过去的秩序是建立在一、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基础上的,但实践表明,正是这样的一种旧秩序不能解决有关世界事务的任何重大问题,因此,今后的国际新秩序,一方面还要发挥大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打破少数国家垄断一切的格局,充分发挥世界各主要国家在解决世界事务方面的作用。90 年代初以苏联、东欧剧变为标志,旧的格局宣告结束,新的格局正在形成。虽然人们对什么是新的格局还看不准,但邓小平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的国际秩序必定是与过去少数大国垄断一切完全不同的。

第二,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趋势,还有许多问题要进行研究。

邓小平虽然对多极化的发展抱有乐观的信念,但又清醒地指出,多极化进程在 90 年代初才刚刚起步,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首先,旧格局是不是已经结束,新格局是不是已经形

成？邓小平认为，旧的格局正在改变进程中，新格局也还没有形成，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这一过程才算完成，以什么作为标志，这是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其次，苏联在旧格局结束新格局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过去两极中的一极，但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苏联在这一动荡的年代综合国力大大下降，苏联已经不能控制东欧国家，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解体的趋势在当时已经很明显，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作用即将结束。那么，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起什么作用？邓小平认为，俄罗斯肯定还会是一个重要力量，在多极格局中会有它的一个席位。但和过去的苏联相比，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的作用与苏联在两极格局中的作用将会有什么不同呢？最后，多极格局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多极？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邓小平提出了三极、四极或五极的具体形式。毫无疑问，邓小平这里讲的几极是有所指的，肯定地包括了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西欧和中国等重要力量中心在内。但多极也不限于这些，邓小平也没有排除出现更多的极的可能性，比如印度、巴西、东盟等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国家联盟在多极格局中将会有什么作用？

处于多极格局中的这些力量中心相互之间将会是什么关系？已经处于多极格局中的大国与那些不是极的大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多极化强调大国的作用，那么广大中小国家在未来格局中又将起什么作用？它们与大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中国在多极格局中将会起什么作用？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不管怎样，中国都是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这表明了邓小平将发展中的中国在多极格局中的地位定位为有所作为，中国在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将超过过去在两极格局中的地位。

3. 五项原则是新秩序的主要内容，不干涉内政是新秩序的核心原则

邓小平指出，“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



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不干涉内政,认为这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在处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上,邓小平也是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的。如在1978年10月,智利军政府外长来华访问,邓小平就对他说,对智利1973年的事件,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当然是有看法的,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中国就不应该干涉智利的内政,他指出,“对智利国内七三年事件,我们采取了同别人不同的态度,因为中国在国际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413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328、359—360页。

事务中从不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第三世界国家用什么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从不干预。我们不愿意任何国家内部的事情影响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关系。当然,从道义上讲,我们不是没有一点意见,也感到某种遗憾”。1977年,邓小平又表示,中国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决策,间接的也不行。我们对朝鲜,对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1990年,在与美国友人谈到苏联发生的变化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别人不幸的事,不好的情况,不会落井下石,我们不会发表或采取伤害别人的言论和行动。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我们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

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国家提出来的,但可以适用于全世界。他说:“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

#### 4. 建立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机制是新秩序的重要任务

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认为,为了实现和平,应当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方式,并建立法律和道义双重和平监督机制。

周恩来认为,和平不能光是一个口号,必须要有监督。中国“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怎样监督呢?周恩来提出了两种监督的办法:“国际上有两种约束,一种是法律上的约束。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扩大成为集体和平公约,这种公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军事集团,而是为

---

转引自陈笃庆:《邓小平同志对拉美工作的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242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9、185、365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3页。

了集体和平；不排斥别人，也不反对任何国家，各国以五项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固定下来。另外，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各国通过彼此来往，可以发表声明，签订协议，发表演说，强调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这样做不仅可以形成国际的道义上的约束，而且可以作为对国内人民进行教育的内容”。周恩来还曾经提出，外国军队应该从一切外国领土撤走，而为了保证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大国可以订立和平公约，可以订立亚洲—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

邓小平继承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在 80 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指出，当代世界虽然自二战后没有爆发大战，但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用老的办法不能解决，必须寻找新的办法。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出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邓小平经过思考后提出，中国的外交有两条经验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作为参考：一是中国为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他表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这是可取的。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二是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设想。邓小平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用中国的思路来解决国际争端，是邓小平后来多次强调的一个问题。早在 1978 年 8 月，邓小平就指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一代找不出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邓小平表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

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些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邓小平还用和为贵的思想来劝说有争端的国家用和平方式来解决。邓小平多次亲自出面为两伊和解做工作。1985年邓小平对来访的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说,“我们实在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请阁下考虑一下,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结束这个战争。如果为了结束这个战争需要中国方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十分愿意做的。我们同你们是朋友,是友好国家,同伊拉克,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也都有友好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过去不介入。但如果你们双方都觉得需要中国出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很高兴去做的”。后来,他又对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说,希望两伊和平共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我还是那句话,“和为贵”,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只能选择对话,不能选择战争。

两伊战争开始时,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较好,与伊朗的关系有些问题。因此伊拉克认为,中国会支持伊拉克。但邓小平却始终从劝和的立场出发,对伊拉克做工作,劝其在双方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达成和平协议。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邓小平也是以和平解决争端来劝导冲突各方的,他明确提出阿以争端要和平解决。邓小平在多次批评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时指出,美国不放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中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同时,邓小平也一直劝说阿拉伯国家和

---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87—88、19—2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4、325、425页。

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他赞赏埃及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和解的政策,并劝告埃及要以兄长对弟弟的态度来对待容忍当时阿拉伯国家对它的批评。邓小平给阿拉法特做工作,向他说明美巴对话在解决中东冲突中的重要性,如果不承认以色列,就不可能同美对话,路也就断了。邓小平向阿拉法特指出,可以将承认以色列与要求以色列归还所占领土以及巴在约旦河西岸建国联系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剥夺了以色列发动侵略的一切借口,并使人感到巴解组织尊重现实、合情合理,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赤裸裸地支持以色列,站在以色列一边,它道理就少了”。

### 5. 反对建立和保持任何军事集团是新秩序的组织原则

邓小平在 1975 年时就提出,两大阵营这一形式已经过时。他说:“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因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拿帝国主义阵营来说,当然老殖民主义还在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掠夺第三世界,但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邓小平还明确地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

邓小平一再坚持,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这个战略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搞军事政治结盟,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不结盟国家。

---

转引自雅菲:《从中东地区的外交实践学习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论文集》,第 233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282 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412 页。

## 6. 反对霸权是新秩序的基本要求

反对霸权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也是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指出,建立新秩序就是要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也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新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而且,霸权主义也行不通,因为“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世界霸权。1975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曾说过,“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后来邓小平还指出,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反霸条款既是约束中国,表明“中国永远不称霸,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

---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6、74页。